

# 毛澤東全傳

MAO ZE DONG QUAN ZHUAN

1

新訂本

風

華

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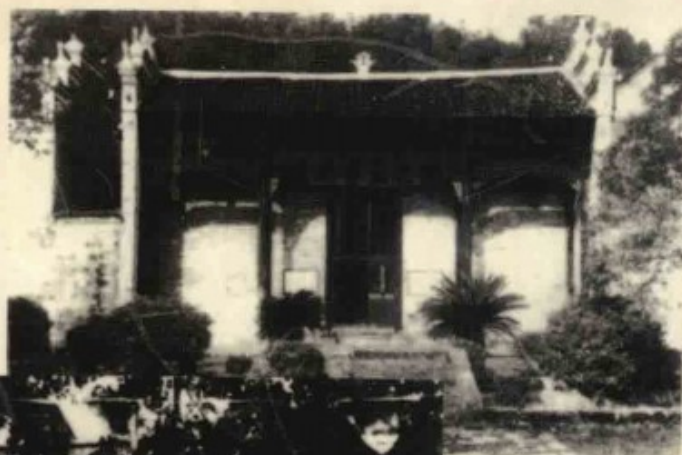
茂

辛子陵 著



新子陵  
忠天  
PDG

忠天出版社



《毛泽东全传》的重大特点，除了对毛一生的完整描述外，尚在于具有珍贵的资料价值。作者在本书中引用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和中共秘密档案，其丰富、可靠程度是海内外其它著述所难以企及的。对于中共党史、毛泽东生平里的疑案，据此便可作澄清与解答。

ISBN 7-80099-693-X



ISBN 7-80099-693-X/Z-108

定价：128.00元（全套）

9 787800 996931 >

辛子陵著

# 风华正茂



中天出版

图书在编(CIP)数据

毛泽东全传 卷一:风华正茂/辛子陵主编. -呼和浩特:中天文化出版社,2004.9

ISBN 962-7766-1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48475 号

## 毛泽东全传

---

中天文化出版社发行  
北京普瑞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15

2004年9月第1版 200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

ISBN 962-7766-11-9 定价:128元(全集)





北京大學紅樓。1918年8月—1919年3月—毛澤東在此任圖書助理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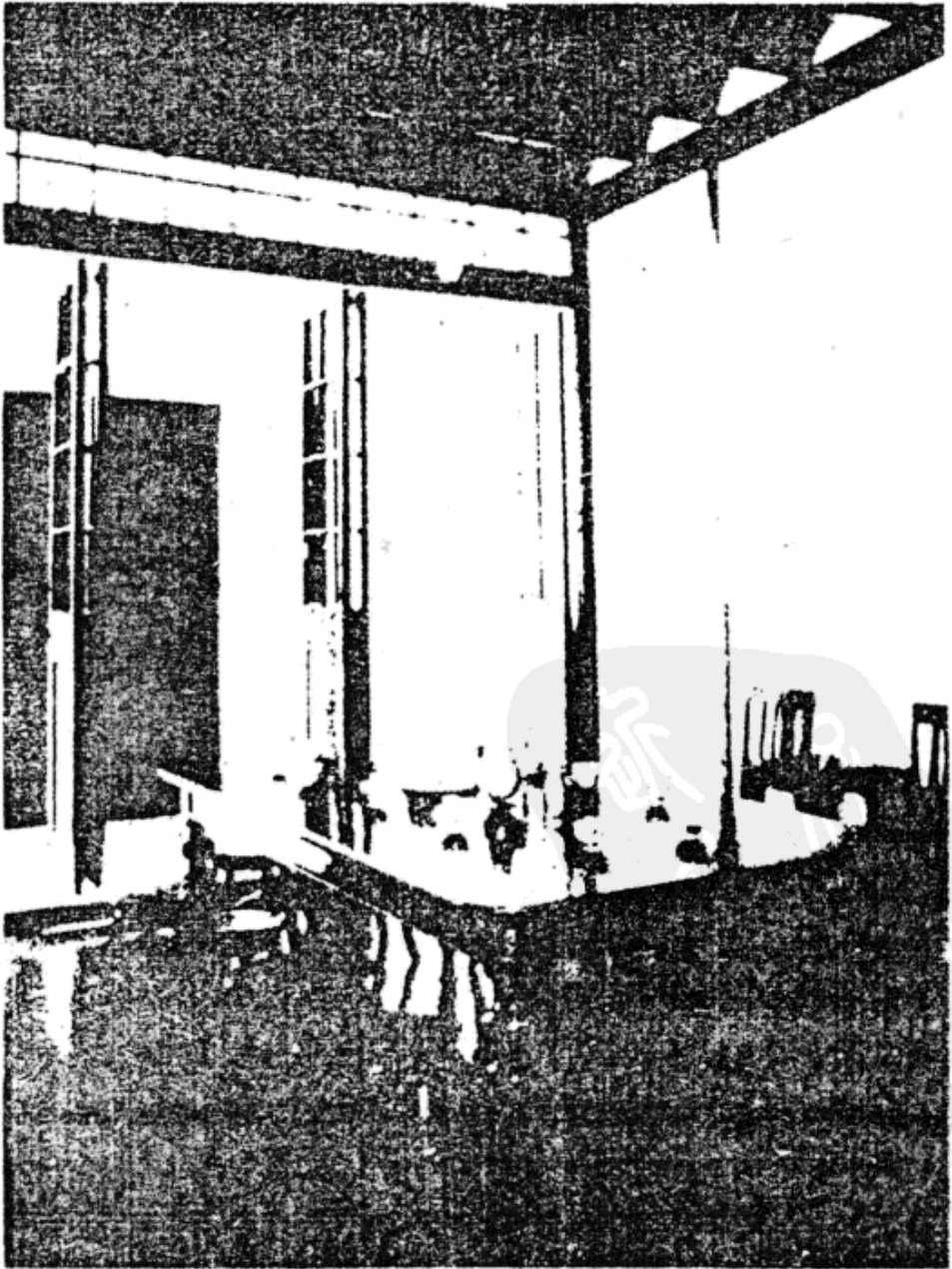


1919年3月，環球中國學生會在上海送別留法學生。

1919年3月，環球中國學生會在上海送別留法學生。后排右一為毛澤東。



中共一大會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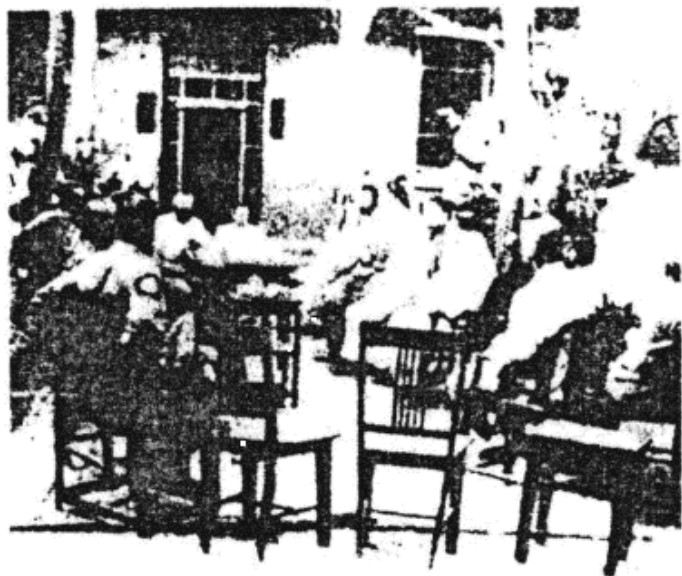
1921年7月，中共在此宣告成立。



1924年5月5日，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國、共黨員舉行慶祝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三周年紀念活動時合照。前排左為胡漢民，左七為汪精為，后排左二是毛澤東，左十為戴季陶。



1925年春，毛澤東回鄉開展農民運動，建立秘密農動組織雪耻會。圖為該會舊址。



1927年6月10日，汪精衛在鄭興馮玉祥舉行會議，醞釀分共。



1927年6月20日，馮玉祥（前排左一）與蔣介石在徐州開會，決定合作反共。蔣馮合作促成了后來的寧漢合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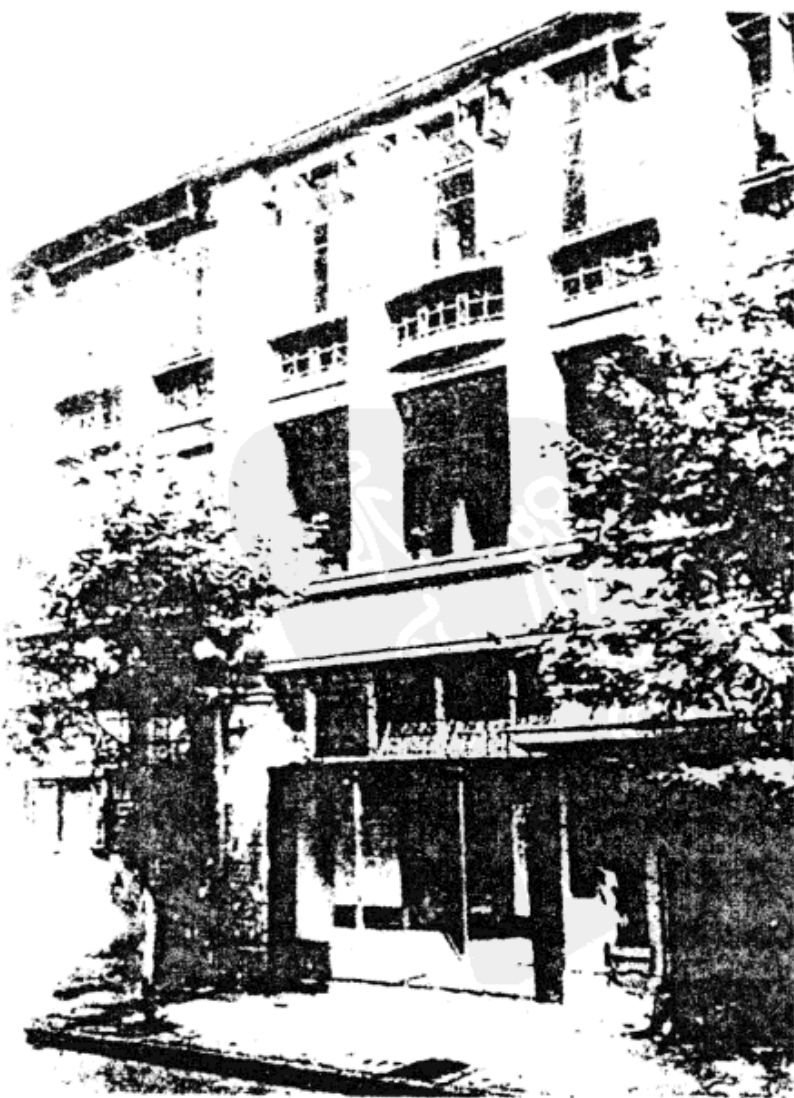
1929年6月，朱毛矛盾公開化，毛澤東失去前委書記職位并病倒。為解決此事，9月，周恩來以中共中央名義向紅四軍發信（《九月來信》）。



《九月來信》肯定了毛澤東的成績與地位，11月，毛澤東重新視事，回信中共中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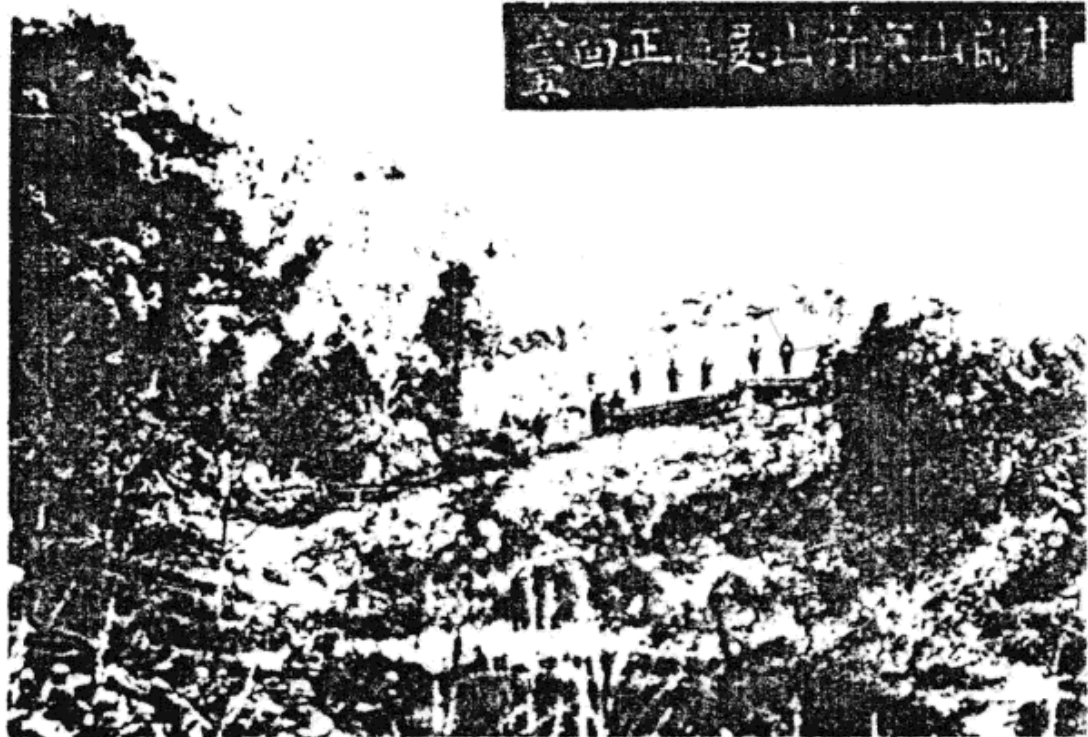


八七會議會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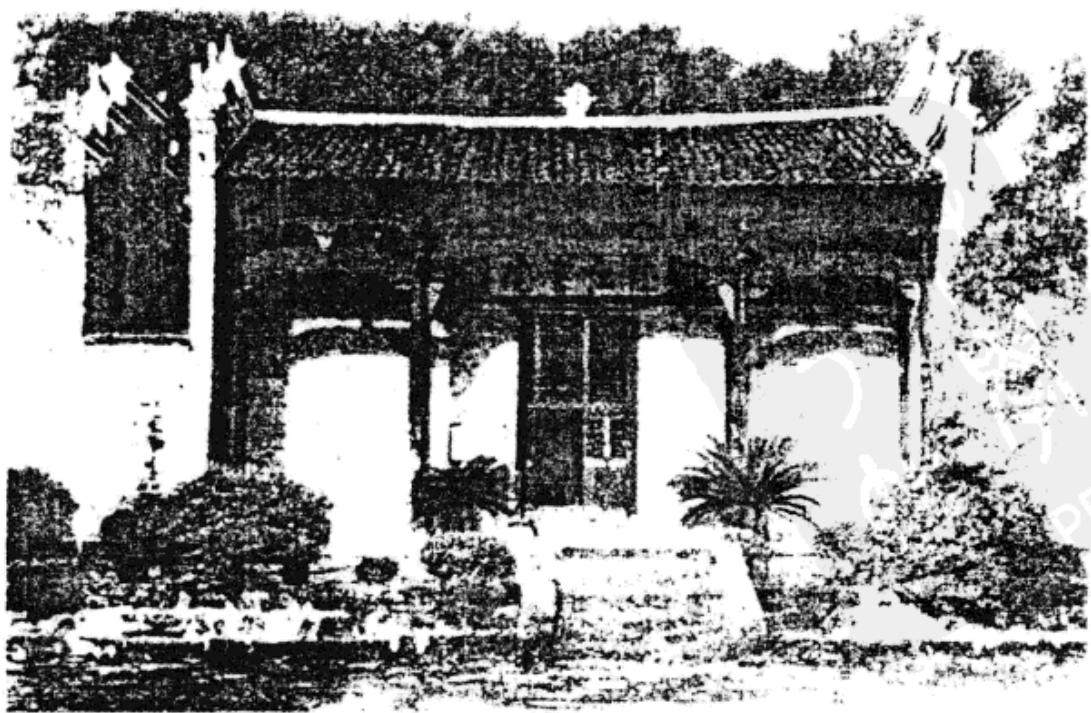


1927年8月7日，中共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武裝反對國民黨，特派毛澤東回地發動農民暴動。圖中會議會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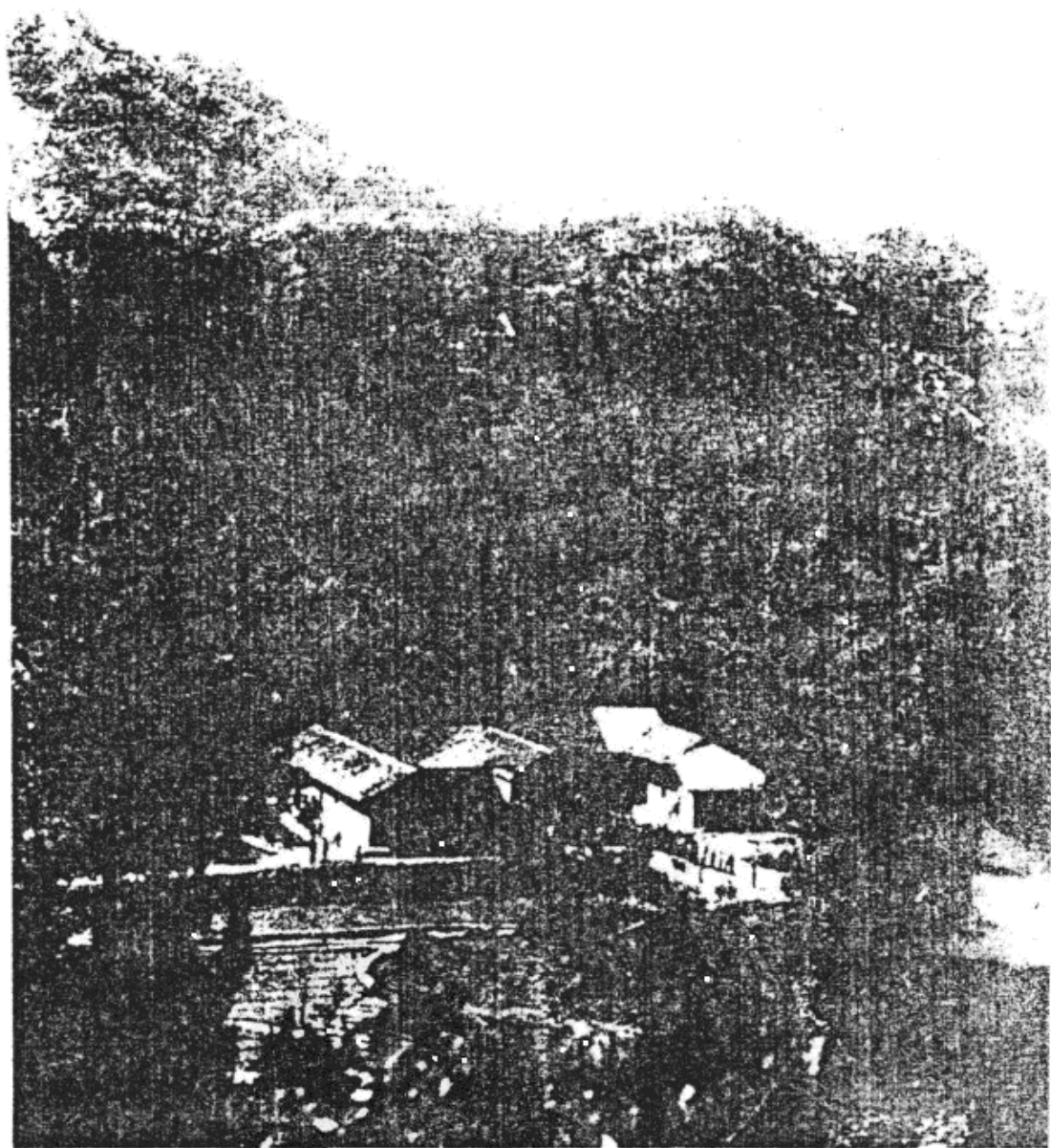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7年10月，毛澤東率秋收起義部隊開上井冈山，建立首個中共根據地，因為聶于1929年初的井冈山荆竹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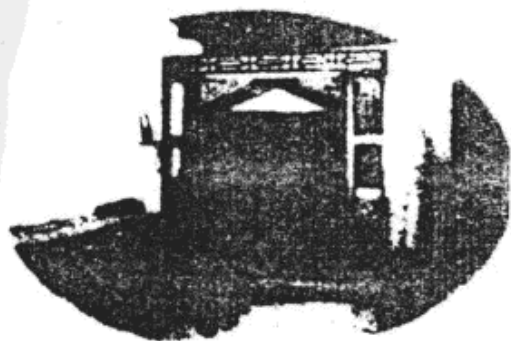
1928年4月，朱德，陳毅率部與毛澤東在井冈山磐市龍江書院會師。



毛澤東韶山故居



毛澤東出生的房間





## 目 录

### 新版序言

- 中国的改革开放性〔新〕毛泽东全传新版序言 ..... (1)
- 秋水文章不染尘——自序 ..... (15)
- 开篇词 临江仙 ..... (17)
- 01 追随洪武 千里转战建功业 ..... (18)
- 定居韶山 五百年后王者兴
- 02 辛亥革命 军阀篡权天下乱 ..... (33)
- 少年立学 学不成名誓不还
- 03 学子聪颖 穷究天理通世故 ..... (47)
- 遵师慧眼 欲栽大木拄长天
- 04 有德有才 第一师范显身手 ..... (61)
- 能文能武 妙高峰下退贼兵
- 05 斯文行乞 怪学士漫游州县 ..... (73)
- 萍水相逢 奇女子预卜流年
- 06 组建学会 为担大任寻同志 ..... (87)
- 送友出洋 相约异地求真知
- 07 北京学潮 反帝反封争民主 ..... (104)
- 湘江评论 振聋发聩着宏
- 08 横征暴敛 张敬尧祸湘有术 ..... (118)
- 辞严义正 毛泽东能量无边
- 09 马列初传 赴沪请教陈独秀 ..... (132)
- 蔡萧争论 回信同意萧和林

· 目 录 ·

- 
- |    |      |           |       |       |
|----|------|-----------|-------|-------|
| 10 | 十年夫妻 | 杨开慧无私奉献   | ..... | (146) |
|    | 一朝永诀 | 毛泽东抱恨终天   | ..... |       |
| 11 | 毛润之言 | 三十年后取天下   | ..... | (160) |
|    | 共产党兴 | 四亿神州起风雷   | ..... |       |
| 12 | 回湘建党 | 面向工农寻志士   | ..... | (176) |
|    | 自修大学 | 掩护革命育英才   | ..... |       |
| 13 | 访贫问苦 | 毛泽东深入矿井   | ..... | (188) |
|    | 有胆有识 | 李能至唤起劳工   | ..... |       |
| 14 | 省宪初颁 | 黄庞人头落地    | ..... | (205) |
|    | 工潮再起 | 润之威信提高    | ..... |       |
| 15 | 竞存背叛 | 中山蒙难来上海   | ..... | (220) |
|    | 国共合作 | 诸贤集会聚羊城   | ..... |       |
| 16 | 中山辞世 | 几名右派倡反共   | ..... | (236) |
|    | 润之来粤 | 一支铁笔扫妖氛   | ..... |       |
| 17 | 兴师北伐 | 北伐蒋介石旗开得胜 | ..... | (254) |
|    | 考察农运 | 毛泽东立场鲜明   | ..... |       |
| 18 | 四月十二 | 蒋介石屠杀工农   | ..... | (269) |
|    | 七月十五 | 汪精卫背叛革命   | ..... |       |
| 19 | 遇变不惊 | 敢在危城开秘会   | ..... | (286) |
|    | 临危受命 | 秋收时节点甲兵   | ..... |       |
| 20 | 初上井冈 | 团结袁王与大业   | ..... | (299) |
|    | 急赴茶陵 | 诛杀陈徐云三军   | ..... |       |
| 21 | 龙江书院 | 会朱德相见恨晚   | ..... | (313) |
|    | 西乡塘边 | 见子珍难却红颜   | ..... |       |
| 22 | 冒避湘南 | 杜修经导引哗变   | ..... | (328) |
|    | 起义平江 | 彭德怀率部上山   | ..... |       |
| 23 | 指导六大 | 斯大林功过参半   | ..... | (348) |
|    | 游击两省 | 毛泽东星火燎原   | ..... |       |

- 
- |    |      |         |       |       |
|----|------|---------|-------|-------|
| 24 | 顾全大局 | 陈毅光明磊落  | ..... | (362) |
|    | 拥毛贬朱 | 林彪别有用心  |       |       |
| 25 | 二战长沙 | 立三冒险攻城市 | ..... | (376) |
|    | 一番争执 | 润之辣手拘政敌 |       |       |
| 26 | 富田事变 | 彭德怀识离间计 | ..... | (392) |
|    | 龙岗布阵 | 张辉瓒作阶下囚 |       |       |
| 27 | 二次围剿 | 蒋介石调兵遣将 | ..... | (406) |
|    | 四中全会 | 陈绍禹唤雨呼风 |       |       |
| 28 | 各个击破 | 毛泽东神机妙算 | ..... | (423) |
|    | 损兵折将 | 蒋介石痛苦失声 |       |       |
| 29 | 出使国际 | 陈绍禹临危避祸 | ..... | (438) |
|    | 建都瑞金 | 毛泽东暗降明升 |       |       |
| 30 | 赣州失利 | 书生用兵初碰壁 | ..... | (451) |
|    | 闽南报捷 | 润之出山展新局 |       |       |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毛泽东全传 卷一：风华正茂

作者=辛子陵主编

页数=466

SS号=12798258

出版日期=2004.09

出版社=中天文化出版社

原书定价=128.00

参考文献格式=辛子陵主编.毛泽东全传 卷1 风华正茂.中天文化出版社,2004.09.



## 新版序言

### 中国的改革开放姓〔新〕

在香港回归祖国前夕，利文出版社决定推出新版《毛泽东全传》，作为回归的献礼。一方面是要纪念这位传人创建新中国的丰功伟绩；另一方面是为了保持香港的稳定繁荣，避免毛泽东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错误在香港重演。这就需要从历史的深层次明辨是非，用科学的理论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廓清前进的道路。这一目标使笔者既喜且惧。喜的是出版者如此看重拙著，如此理解作者的初衷；惧的是子陵人微言轻，处江湖之远，恐力不逮也。为不负厚望，作此序言，将雄书四卷一些言而来尽而又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点透，不揣浅陋，直抒胸臆，就教于时贤。

毛泽东一生，开国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这是以讲真理不讲面子在中共党内深受敬重的元老陈云说过的话。历史尘埃落定之后，将如是评论毛泽东。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的学说，其起点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其终点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方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毛泽东思想这一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宝贵的历史遗产。作这样的界定是为了彻底摆脱毛泽东晚年那些似是而非的〔左〕的理论对改革开放的纠缠。在一九九二

年召开的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公开举起了邓小平旗帜,提出「坚持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这在中国有割分毛邓两个时代的重大历史意义。现在有人抹煞毛泽东与邓小平在建国理论和路线上的原则分歧(邓为此付出了重大代价),抹煞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区别,别有用心地强调邓对毛的「继承性」,然后用毛的大大「左」的理论衡量、限制和「纠正」改革开放事业,否定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政策。因此,搞清楚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哪些东西,摒弃了毛泽东哪些东西,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极大的建设意义。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按照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方案,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在政治上,毛泽东强调要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权,并指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两者结合起来,就是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

在经济上,毛泽东提出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以国有经济为主体,允许个体经济、以私有为基础的合作经济、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份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长期并存和共同发展。

他解释说:「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是不对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束缚着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破坏者广大人民的财产。我们主张的

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和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憾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论联合政府

在文化上,毛泽东提出要清理中国古代文化,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包括各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文化和科学技术,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毛泽东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新民主主义论》)这种新民主主义不同于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是一种属于社会主义范畴的新式的资本主义,新在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和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保证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沿着有利于国民生计的轨道充分地发展,为在将来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创造强大的物质基础。

毛泽东是作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名垂青史的。回想建国初期,广大人民群众,包括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本人,是心悦诚服的尊敬,是发自肺腑的拥戴。共产党人选贤举能,艰苦朴素,为政清廉,关心人民疾苦,为人民辨实事,让人民得到实际利益,与解放前国民党官贪污腐败、以权谋私、裙带关系等旧官场习气形成鲜明对照,整个社会风气为之一变。那时候,虽然百废待兴,政府拿不出多少钱来改善人民生活,但那是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政府与人民群众开关最好的时期。

人民最大的遗憾是,以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毛泽东提出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为标志,他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建国理论,废止了行之有效、受到阶层广泛拥护的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急于向社会主义「穷过渡」,「使生产

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大跃进、公社会，直至文化大革命，导致生产停滞下降，两度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饿死几千万人，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从反右派开始，接踵而来的各种文化学术批判运动，严重伤害了知识分子，阻碍了科学、教育和各种文化事业的发展。从反右倾开始到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许多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乃至开国元勋，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院统计、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者多达七十四万四千五百五十四人，迫害致死三万四千七百六十六人，受牵连人数超过一亿人。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亲自发动、亲自领导」者，毛泽东是难辞其咎的。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言论，唯有个别看似正确的语句和观点，但综合起来考察，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其根本成熟是严重脱离实际，违背经济规律，主观上想加速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阻碍窒息了生产力的发展，破坏和毁灭了大批生产力。用人造的制造阶级斗争，不断地变种生产关系（即法律上的财产关系）的辨法，对有限的社会财富进行分配和再分配，虽然是越分越小，越分越少，但要在贫困的条件下寻求社会公平，消灭阶级，消灭差别。所谓「贫穷的社会主义」就是这么造成的。邓小平说在毛的领导下连「什么是社会主义」都没有搞清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直至毛泽东逝世，抓起了「四人帮」，原以为借助革命运动将自己的国家推进到了更高阶段的中国人民，忽然发现国家被拖到濒临灭亡的深渊。于是邓小平出来领导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果断结束和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



为了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对纠正毛泽东建国以后的成熟，扭转中国的历史方向，使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是有伟大功绩，起了历史性作用的；但如同遵义会议决议一样，又有它的历史局限性，即由于斗争策略的需要所遗留的纠「左」的不彻底性。中共元老彭真指出：「由于当时党内和社会上的客观因素，包括心理上的因素，没有对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体系进行必要的、有系统的纠正、批判，以提高全党的政治思想和理论水平。因此，‘左’的思想，‘左’的意识，包括带有封建色彩的意识，在今天的改革开放中便成了障碍。」

遵义会议决议的不彻底性表现在仍然承认王明，博古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直至延安整风才解决。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不彻底性主要表现在仍然肯定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正确的，现在到了解决的时候了。如果仍然肯定它是正确的，今天农村的包产到户就没有存在的根据，雨后春笋般的私营企业就是对党的决议的背离。据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公布的资料，截至一九九五年年底，中国的私营企业雇工八人以上者已达六十五万五千户，从业人员九百五十六万人，注册资金二千六百二十一亿七千万元（人民币）；个体工商户（雇工七人以下者）二千五百二十八万五千户，从业人员四千六在一十三万六千人，自有资金一千八百一十三亿一千万元。两项合计两千五百九十四万户，五千五百六十九万九千人，共有资金四千四百三十四亿八千万元。而一九五六年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时，全国大小资本家是五十三万三千户，从业人员二百五十万人，共有资金三十三亿元。如果一九五六年改造得对，今天冒出这么多私营企业就是错误的，就是「复辟」、「倒退」，接下来

的问题就是：何时对这一大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呢？一九八八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一条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这起到了一些安定人心的作用。但人们心里还是不踏实。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都是党的决议比「人大」的法律权威大得多。六中全会决议纠「左」的不彻底性使私营工商业者心存疑虑，许多人不敢扩大再生产，许多人把赚的钱挥霍浪费掉，也有人把资金转移到外国去，都是为了「迎接」不知哪一天就会到来的第二次「社会主义改造高潮」。

舆论导向是以党的决议为依据的。在中国干资本主义合法，说资本主义犯错误。书报杂志上绝对不敢承认有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存在，给私营经济和私营工商业者起了许多新的名字。我的故乡河北省是执行改革开放路线较好的省份，一九九三年夏天召开了一次「发展非国有经济代表大会」，意在放手发展私营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提出了五个不限：比例不限，速度不限，经营范围不限，经营方式不限，经营规模和从业人员不限。但在会标上巧妙地避开了「私营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等字样，冠以「国有经济」，只在前面轻轻地加了一个「非」字，使内涵悄悄地起了变化。这反映了一些领导干部既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又怕担复辟资本主义罪名的良苦用心。

改革开放出现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私营企业的户数超过了一九五六年改造前的四十八倍，从业人数超过了改造前的二十二倍，资金超过了改造前的一百三十四倍。从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五年间，私营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商品零售总额和上缴国家税金递增速度均在百分之二十五以上。一个新的中产阶级正

在崛起。其代表人物四川的牟其中、北京的李晓华等已是世界闻名。他们的资产和气魄远远超过了老一代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李晓华聘用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为私人顾问，在霍克陪同下访问美国，会见了前总统布什和现总统克林顿。一九九六年经中国申报，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共同批准，国际编号三五五六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李晓华星」。对于这个新兴的阶级，视而不见是不行的，改变名称是无用的。它逼着执政党回答：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是改革开放的成果，还是改革开放的错误？是改革开放的正路，还是改革开放的邪路？这是横亘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不能绕过、不能回避、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就要沿着这条道路勇往直前走下去；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就要立即进行第二次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宣告改革开放路线的失败，重新回到改革开放前的旧轨道上去。问题就是如此尖锐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面前。

再搞一次「三大改造」会有什么结果呢？

首先来说农业，把九亿农民再度纳入公社会或合作化的樊篱，农民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会有一些人高兴，会有一些人拥护。这就是因为各种主客观原因没有富起来的贫困户。他们早就希望再来一次「共产」。这一部分人约占农村总人口的百分之十，是极「左」路线的社会基础。对贫困户的问题政府没有忽视，行之有效的「扶贫计划」正在有步骤的使他们脱贫致富。农村中的富户、「大款」也是少数，至多占农村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其中大多数靠精明能干，对现行政策了解快、行动早发得财；也有极少数「为富不仁」的分子，严重脱离群众。百分之七八十是中等收入的富裕户，他们大多盖了新房，有了家用电器和农用机械，拥护包产到户，拥护市场经济，希望政策稳定，依靠

现行政策的保护,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致富奔小康。如果再来一次公社化或合作化,固然极少数「为数不仁」的分子受到打击(这些人的问题应依靠法制来解决),但「左」风一刮就会席卷整个农村,百分之八十的中等富裕户也将受到伤害,最重要的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打击,农业生产又会陷入停滞和下降。城市人民又将恢复每人每月三十斤粮、二两油、两个鸡蛋、半斤肉的日子。搞得不好就会引发一场大的社会动乱。决定政策的着眼点应该是九亿农民的和生产积极性,即「生产力标准」,而不是抽象的「平等」、「公平」,不是空想的大同世界。

其次来说工商业,这就是前面提到的「私营企业」两千五百九十四万户。它解决了五千五百六十九万人的就业问题,也就是饭碗问题。如果要「改造」,也就是消灭这些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五千多万人的就业吃饭问题怎么办?国营企业能吸纳得了吗?许多国营企业现在就开工不足,效益不好,工人发半薪,如果再硬挤进千万人去分本来就很小的那碗大锅饭,国营企业能承受吗?从私营企业下来的工人能接受吗?再一个办法就是把五千多万人送到农村去,再来一次上山下乡运动。但农民和农村干部还能接受城市甩出来的包袱吗?还允许城里人从他们人均几分地里去刨食吗?这几千万城里人你能送得出去吗?不怕激出一场动乱吗?一个大中城市,如果有五十万人(这只是五千万人的百分之一)排起队来去找市政府要活做,要饭吃,市政府就应付不了。五千万只是在业者,劳动力、每个人如果是四口之家,那就不是五千万人,而是两亿人。所以,可以预言,如果再搞一次「三大改造」,肯定是国家大乱,政权倾覆。

列宁认为,在经济落后资本主义发育不成熟的国家,「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它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政

策》), (见《列宁全集》第九卷第三十四页)回头路走不得! 是绝路, 是死路, 是逆历史潮流的反动。

敢不敢承认中国有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存在, 敢不敢承认中国有中产阶级出现, 这又成了对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气魄的一次考验。其所以不敢, 还是怕人说搞了「资本主义复辟」。这项弥天大罪使许多高级干部身败名裂, 使在位者心中余悸。因为中共党内确实有人打着伟大领袖的旗子, 举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随时准备扣人, 所以我献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为改革派一壮行色。毛泽东有明确定义,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 是允许有利于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的; 但又属于社会主义的范畴。有人问改革开放姓什么? 当着我们回答姓「社」的时候, 这些人不服气, 「姓社你发展资本主义?」? 为了彻底说服这些人, 我们说它姓「新」, 新民主主义的「新」。在我们的概念里,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回事情。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改革开放路线, 继承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路线, 继承了中共「八大」路线的正确方面(这些正确方面的主张是属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以及邓子恢、彭德怀、张闻天、薄一波等人的, 见本书第九十三回)纠正了毛泽东建国以后向社会主义「穷过渡」的种种谬误, 开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没有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回到了伟大领袖制定的那个全党公认为正确、人民衷心拥护的蓝图上。在政权性质上、经济成份上以及文化建设上是新民主主义的延续和发展, 我们管它叫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照邓小平的解释, 是「事实上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不够格」还要这样叫, 是表示我们纠正了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错误, 但我们不去丢掉社会主义旗帜, 坚

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共产主义理想。能否在这里达成共识,结束左顾右盼,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理直气壮地前进呢。

中共党内有人指责邓小平这一套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其实,以邓小平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标志,中国共产党才真正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的正确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要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东方国有先搞社会主义。那种「穷过渡」的理论,那种认为「一穷二白」更容易消灭阶级差别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从根本上就违背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陷入了空想社会主义泥潭。恩格斯说:「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肯定说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更容进行这种革命,他就只不过是证明,他需要再学一学社会主义初步知识」。恩格斯认为,要有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水平」。因此,实现社会主义,「不但需要有能阶级」。(《流亡者文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十八卷六一〇——六一一页。)根据恩格斯的论述,资产阶级在创造社会主义物质条件的历史阶段,代表先进的生产关系,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有气魄有能力在执政的条件下,容纳和管理一个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在一二百年之后,再来考虑消灭阶级差别问题。关于消灭阶级差别的条件,恩格斯在上文中也有精辟论述:「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阶段,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



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持久巩固,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力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衰落」。消灭阶级的条件关键是最后一句:不会引起生产的停滞或衰落。如有造成生产停滞衰落之虞,消灭阶级的条件就还没有成熟,就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应该按照这样一个远景,义无反顾地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是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社会进步的基础。差别、贫富和社会阶层、阶级的出现,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增加的结果,因而总体来说社会的进步;但同时又包含着退步,出现了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统一体,这是人类告别野蛮时代进入文明门槛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形式。马克思主义基本着眼点是前者,这是唯物史观的基石。过分强调后者的是空想社会主义流派。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等,是调动社会成员积极性,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有一个合理的「度」,超过了这个「度」社会就要爆炸,消灭了这个「度」,社会就失去了活力和动力,其结果都是矛盾统一体的破裂,让位给新的王朝或新的制度。

领导者或统治者的全部艺术就是掌握好、控制好这个「度」。由于超过了这个「度」引发了人类历史上无数次造反、起义和革命。欧美资产阶级在几百年统治中的最大成就是找到了这个「度」,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相对稳定发展的全部秘密。恩格斯在一八四五年亲身观察了英国伦敦等大城市贫富两极的尖锐对立,看到失业工人「受尽了千辛万苦,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地睡在街上」,奄奄待毙,他写了一本充满信心地预言无产阶级革命将要到来。到了一八五八年十月七日他在曼彻斯特给马克思写了一封信,说英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希望了,因为「英国

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这是英国统治阶级的高明之处。他用提高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办法，换来社会的长治久安，并流过了一次次经济危机，保持了经济的持续繁荣。

共产党人为理想社会奋斗几十年，政策上的最大失误就是企图消灭这个「度」，用「大锅饭」的办法「均贫富」，只要公平，不要效率，甚至以「均贫」而自豪，使社会主义逐渐失去了存在的活力前进的动力，造成几十年内生产的停滞和衰退，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人类美好理想搞得声名狼藉。

在小生产占优势、工业不发达的前资本主义国家，用变动生产关系、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以来共产党人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成错误。列宁在晚年认识了这个错误，并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他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道路、方法和方式」。《论粮食税》，（见《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三四二页）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完成了他引为骄傲的「三大改造」之后，迅速认识到了这是个错误，提出过他的新经济政策。他说：「上海地下工厂同国营企业也是对立的。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袖子一长一短，扣子没有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做新经济政策。我们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二百五十万人（工业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

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定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共和国走过的路 -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五三——一九六年]第三〇八页)「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是毛泽东认识到了但没有勇气实行的一项政策,他没有列宁那样的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勇气。这些对自己错误的反思,像火花一闪很快就熄灭了。现在我们要把和毛泽东认识到没有勇气改正的错误改正过来,实行他的新经济政策。

不要因噎废食。看到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就惊呼「大事不好,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了」! 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近代的欧洲。没有资本主义制度,就没有香港的繁荣。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就没有未来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制度「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各种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关系的发展,更有利于一个高级新社会形态所需的各种要素的创造」。(《资本论》第三卷第九六二页)东方经济落后的国家,试图超越现代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能造成生产的停滞衰退和社会的进一步退两步。这是俄国十月革命以来至苏联和东欧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中国越南等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社会主义在世界三分之一的广大地域进行七十年实验所应得出的基本结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他的根据。苏联的瓦解主要的不是外国「和平演变」的魔法,是制度的内部机制使苏联社会主义丧失了活力,失去了动力,造成生产的长期停滞和衰退。至一九九〇年苏联巨变前夕,国民经济出现负增长。一九九一年上半年与上年同期相比,国民生产总值骤减百

分之十，国民收入骤减百分之十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居民达一亿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七；国内市场一千二百种基本消费品有百分之九十五经常断档。人民怨声载道。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被人民抛弃了。这从克里姆林宫红旗落地时广大苏联人民的冷漠可以得到证明。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既弥补东方式「社会主义」先天下是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唯一正确的理论和方法，是东方科学社会主义的曙光。中国共产党人要想代表历史的进步方向而不被历史淘汰，就要坚持邓小平的理论和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坚持不歇地发展一百年生产办再看分晓。不要重犯毛泽东犯过的错误，今天改造这个，明天改造那个，不发展生产力你谁也改造不了。

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制度和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一定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建立有效的制约监督机制，以遏止日甚一日的贪污腐败之风。部分官员的贪污腐败已严重玷污了改革开放路线，构成了对党的基本路线的严重威胁。许多老百姓误认为贪污腐败和改革开放是联在一起的，一方面从改革开放中得到了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一方面又怀念改革开放前弊绝风清的日子，这种民心取向的扩大是足以动摇改革开放路线的社会基础的。要提到挽救改革开放大业的原则高度彻底解决部分官员贪污腐败问题，法制要森严，刑要上「大夫」。不能坐自己的政权从根基上一天天烂下去。一个党要以「毒蛇噬手壮士断腕」的精神战胜自身的腐败，才能永保革命的青春。

辛子陵

一九九六年十月

## 秋水文章不染尘一自序

关心中国命运的朋友们,您想知道一介书生毛泽东是如何与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争天下的吗?您想知道毛泽东是如何在共产党内战胜一个又一个强大对手、得到全党拥戴的吗?您想知道「小米加步枪」的人民军队如何战胜八百万美式装备的「中央军」的吗?您想知道蒋介石和国民党是如何失掉人心败退海岛,毛泽东和共产党是如何赢得人心赤化神州的吗?您想知道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置刘少奇于死地吗?您想知道毛泽东和林彪分裂的内幕和林彪出奔逃亡的真情吗?请读这部《毛泽东全传》。

游巴山蜀水,偶见一联:

春风大雅能容物

秋水文章不染尘

上联是说能容人,下联是说讲真话。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国家,都应有这样的品格;有了这样的品格,才能立身,立党,立国。毛泽东在他的青年和中年时代是具有这种品格的,所以他成就了一番大事业。给毛泽东写传,也应该如此。基于这样的理解,这副对联成为在下写这部书的宗旨。「春风大雅能容物」,就是说心里要装着亿万人民,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评说历史,臧否人物:「秋水文章不染尘」,就是要讲真话,讲实话,是非功过,界定明确,不要这一方面,那一方面,强词夺理,文过饰非,

## · 风华正茂 ·

---

给历史蒙上一层灰尘,模糊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对毛泽东怀有偏见的人,不要的指望本书丑化毛泽东;希图再造神祇的人也不要指望本书给毛「重修庙宇,再塑金身」。本书要写的是一个有血有肉,有七情,有六欲,有抱负,有理想,有文韬,有武略,有功绩,有伟业,有过失,有错误的毛泽东。本书采用生动活泼的写作形式,为的是雅俗共赏;历史事件和背景材料都是有根据的,请勿作演义看待。后毛泽东中国的子孙倘能汲取一些历史的经验教训,不负作者苦心,则幸甚。

辛子陵

一九九二年春节



## 开篇词 临江仙

亿万苍生如江海，  
沉浮多少英雄。  
推涛作浪任西东。  
搅得风潮起，  
功罪后人评。  
前朝覆亡犹可鉴，  
回首辨述评踪。  
贪污朋党裙带风。  
民心先丧尽，  
天数自难容。

## 01 追随洪武 千里转战建功业 定居韶山 五千年后王者兴

新发掘出来的《韶山毛氏家谱》揭开了毛泽东家族的秘密。元朝末年，天下大乱。一三五一年（元至正十一年）五月，白连会领袖刘福通等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在河南聚众起义，占据朱皋，分兵克罗山、真阳、确山，义军人人头裹红巾，故号「红军」。从此，揭开了元末人民大起义的序幕。自红旗揭起后，全国各地，尤其有白连会活动的地方，纷纷响应。一三五二年白连会首领郭子兴起义于淮南，也号称「红军」。攻占濠州等州县，命部将朱元璋于一三五三年分兵赴江南。十年后，郭子兴死，朱元璋势压群雄，成为义军盟主。发表讨元檄文说：「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慨然有夺取天下之志。

一三六二年，朱元璋军克洪都（今南昌）瑞州、吉州、临江。吉州府龙城县（今江西吉水县）青年农民毛太华，不甘老死蓬蒿，参加了朱元璋的队伍。这个毛太华，就是湖南韶山毛氏家族的始祖。

一三六八年，朱元璋称帝，国号大明，建元洪武。一三八一年（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命傅友德、沐英、蓝玉三将军远征云南。明军从东北两面进攻，北路由四川南下取乌撒（今云南镇雄、贵州、威宁等地），东路由湖广向西取普定（今贵州安顺），进

攻昆明。不到四个月工夫，东路军便打到昆明，元梁王兵败自杀。东路军再北上和北路军会攻乌撒，消灭了元军。附近东川（今云南会泽）、乌蒙（今云南昭通）、芒部（今云南镇雄）诸彝族部落全部归附，昆明附近诸路也次第归顺。明廷分云南为五十二府，特派元璋的义子沐英统兵镇守。毛太华以「百夫长」（相当于连长）的身份随军征滇，后又被留下来，作为沐英的部下戍边。边陲地区根本没有汉族妇女，毛太华像许多下级军官一样，娶了一位当地少数民族姑娘为妻，先后生了四个儿子，取名毛清一、毛清二、毛清三、毛清四。后来毛太华到了退役的年龄，要求告老还乡。因他戍边多年，立有军功，遂被批准携妻儿迁回内地。于是，毛太华偕妻子和长子毛清一、四子毛清四内迁。他们被明廷分配到湖南省湘乡县北门外绯紫桥居住，分得田产几十亩。数年后，毛太华夫妇去世。毛清一和毛清四迁移到了湘潭县七都七甲，就是今天闻名天下的韶山。相传在远古时代，虞舜帝南下，由京城蒲阪（在今山西芮城县西北）出发，过黄河，跨长江，漫游八百里洞庭，巡视苍梧之野（苍梧山即九山，在今湖南境内），见山青水秀，松苍竹翠，就在一座山上，命奏「萧韶九成」的乐曲，引来凤凰起舞。此山遂被命名为韶山，陡峭的顶峰叫韶峰，山间潺潺的小溪叫韶水，山峦绵亘的山冲叫韶山冲。韶山隶属湘潭县，位于湘潭与湘乡、宁乡交界处，东北距长沙一百八十里，东南离湘潭九十里。冲里居住着毛、李、钟、周、邹、彭、庞等几姓人家，以毛姓家支繁盛，人丁兴旺。毛氏家族在韶山冲务农为生，世代相传，约有五百年的历史。自毛太华第七代孙始修族谱，定下二十代子孙名字的谱牒为：立显荣朝士，文方远济祥，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毛泽东的曾祖父毛祖人，字四端，是毛氏家族第十七代传人。毛泽东的祖父毛恩普，字寅宾，号翼臣，生于一八四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死于一九〇四年十一月二十三

日，葬韶山滴水洞火石鼓；祖母刘氏，生于一八四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死于一八八四年五月二十日，葬韶山东茅塘。毛恩普和刘氏，生一子名贻昌，生二女分别嫁张家和贺家。毛氏家族第十九代传人毛贻昌，字顺生，号良弼，即是毛泽东的父亲。贻昌生于一八七〇年十月十五日。十岁时，由父母作主与湘乡县四都唐家文芝仪之女文七妹订婚。农家女没有正式名号，因排行第七遂唤作七妹。后来美国记者斯诺访问毛泽东家世，毛泽东说母亲叫「文七妹」，斯诺写成英文后来又被译成中文，便成了「文其美」这样一个大家闺秀的名字，此是后话。七妹生于一八六七年，长得清秀端庄。圆脸庞，宽前额，有一双聪慧动人的大眼睛。在贻昌十五岁、七妹十八岁的时候，他们完婚了。第二年，为了替父亲偿清债务，贻昌外出当兵。他把饷粮积攒起来，只一年，就还清了父亲的债务。在贻昌十七岁开始理家，家里只有六、七亩地，一家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能过上个温饱生活。贻昌精明能干，肯劳动，会节省，善于经营。他把自家节余的稻谷加工成白米，挑到银田寺集市上，卖给手工业者，赚点加工费，又用米糠喂猪出售，生活逐渐富裕起来。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清光绪十九年阴历十一月十九日），文氏生下第三个男孩。因前两个孩子在襁褓中夭折，她把孩子抱到石观音庙叩拜菩萨，寄名为石头，取身体结实、长命百岁的意思，孩子的乳名就叫石三伢子。这个石三伢子，按毛氏族谱是第二十代传人，属泽字辈，毛贻昌给儿子取名泽东，字润之。泽东长得像他的母亲，天庭饱满，大而睿智的眼睛，十分逗人喜爱。后来文氏又生了泽民（一八九六年四月三日）、泽覃（一九〇五年九月二十五日）。还生过两个女儿，都早殇。一九一二年韶山出现大旱灾。收养了七岁的菊妹子，作为过继女儿，后毛泽东给了取名毛泽建。菊妹子的生父毛尉生，是毛贻昌的远房族弟。到毛泽东十岁的时候，家

中有十五亩地,年收六十石谷,全家五口人,年需口粮三十五石谷,食用这外,还有二十五石的节余,是一个殷实的中农了。毛贻昌带领全家人,继续省吃俭用,勤劳发家。文氏除抚养孩子,操持家务外,还要养鸡喂猪,种菜浇园,是家中最辛苦、最忙碌的人。泽东从六岁起就开始干活,他的任务是放牛和打猪草。儿童时代的毛泽东就表现出了他的组织才能。放牛时他把邻近的放牛娃召集起来,分成两班,一班负责看牛吃草,另一班到山上采野果子;第二天轮换。采集到杨梅、野桃、毛栗子收拢到一块,按人分配,每人都得一份。剩余的用绳子拴起来,吊在树枝上,比赛弹跳力,谁能跳起来够到就归谁。这样一组织,单调的牧童生活变得十分有趣。毛泽东成了公认的「孩子王」。后来,毛贻昌得到岳家的贷款帮助,到潮乡大平坳一带成批购进稻谷,加工成白米出售,谷米进出开始是肩挑,生意有起色就改成板车运送,最后发展到从银田寺包船装运白米,到湘潭易俗河一带出售。家里开始雇工了,起初是雇短工,后来雇一长工,在冬天碾谷的时候,还要多雇一个短工。毛贻昌多种经营,还从贩卖耕牛中赚了一笔钱。他的家「发」起来了。一九〇三年买进堂弟毛菊生的七亩水田,使田产增加到二十二亩,每年收稻谷约八十石。后来他不买田产了,把积攒的三千块银元往商业上投资,在银田寺长庆和米店入了股,并同样顺和、彭厚锡堂等店铺经常有商业往来。为了营业上的需要,曾自家印了取号义顺堂的纸票周转。这种纸票类似现在的商务支票,可以代替现金交易。又在吉春堂入了股,可以使用吉春堂的纸票。吉春堂是湘乡大平坳一家大商号,开有药材、肉食、杂货等几个店铺,老板姓赵,是文七妹的哥哥文玉瑞的丈人家,算是毛贻昌的远亲。一九〇二年春天,过了正月十五元宵节,毛泽东上学了。到离家不到二百米的南私塾先生邹春培的学馆受启蒙教育。邹先生五十多岁,

把毛泽东引到写着「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孔子之位」的神龛前作揖叩头，行完大礼，笑嘻嘻地对送子入学的家长毛贻昌说：「令郎有朝一日，定会名登高科，光宗耀祖」。毛贻昌说：「种田人家的子弟，不希图功名利禄，只要算得几笔数，记得几笔账，写得几句往来的信札，就要得了」。毛泽东天资聪颖，有过目不忘之才。很快就过了识字关，一年后就学《论语》了。在南岸私塾后边，住着邹四阿婆一家。宅旁栽种了一小片果园，种了桃树、枇杷树、梅子树十数株。每到果子成熟时，学馆的伢子们就来偷吃果子。邹四阿婆费很大精神守护着。这一天，下课的铃声刚刚响过，毛泽东和几个小伙伴见邹四阿婆没在树下做针线，像猴子一样敏捷，攀援上树，拣那红熟的果子，连吃带往兜里装。邹四阿婆从屋里转来，举着一根竹杆子，大喊一声：「你们这些小泥鳅，看我不打断你们的腿」。众学童跳下树来就跑。邹四阿婆紧追一个高个子孩子，边追边数落：「好呀，石三伢子，你充头领带这帮孩子来偷果子，我非逮住你交你爹惩治」！毛泽东对那邹四阿婆作一鬼脸，跳进一条沟里跑掉了。时值盛夏，天气炎热。上完两堂课，先生叫大家温习，回家办事去了。念了一会儿书，毛泽东说：「天这么热，咱们洗个澡再念吧」。会游水的孩子纷纷响应，跟毛泽东出了校门，跑几步，就到了河边，噗通！跃入水中，尽情玩耍。每次先生快回来时，他们早已返回教室。不料这次先生回来得早，在河边把毛泽东和他的伙伴逮住了。见学生们赤身露体（农村男孩子下游水从来是赤身下河），以为不雅，回到课堂上提出批评，并要惩戒下河游水的学生。毛泽东起立申辩说：「圣人是允许到河里洗澡的」。邹先生闻之一怔，怒斥：「毛润之，你说，圣人在哪个地方谈过可以下河洗澡」？毛泽东翻开《论语》读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川上不就是河里吗？孔夫子都下河洗澡，我辈圣人弟子为何不能」？先生



一时下不了台，就散了学，跑到上屋场找到毛贻昌说：「你家润之了不得啦，他的才学比我高，我教不了啦！」毛贻昌十分认真，听说儿子带头闹学，还敢跟先生顶嘴，当即火冒三尺，顺手从地上抄起一根南竹丫子，直奔南岸私塾来教训儿子。毛泽东正和同学们往家走，和父亲碰个正着，父亲抡起竹丫子劈头盖脸打下来，泽东回头就跑。父亲追不上他，就跺脚发狠道：「你敢回来，我非打死你这没王法的东西」。毛泽东不敢回家，就决定去县城。但是，他毕竟才十岁，还没出过远门，所以在山里走了三天，还没有转出韶山冲。儿子三天没回家，做父亲的也着了慌，托人帮助四处寻找。终于在离家八里远的地方被一个砍柴的老人找到，把他送回了家。毛贻昌见儿子被人送回来了，自是感谢不尽，送走了老人，对儿子没再责打。毛泽东第二天到了学堂，邹老师态度也缓和了。后来毛泽东转到毛宇居（毛禹珠）的书馆，读完了四书五经。「四书」是《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五经」是《诗经》、《礼记》、《春秋》、《尚书》、《周易》，这些被认为是儒家的经典。毛泽东博闻强记，应对如流。正书之外，爱读小说野史，读过多遍的是《水浒》、《三国演义》，有时就带到课堂上背着先生偷偷阅读。先生一来即用经书盖起来。毛宇居发现了这个问题，就给他单开《左传》，加大课业量，从难从严要求他。但毛泽东仍能应付裕如。一天，毛宇居外出，临行规定学生要在课堂背书，不准出去。先生刚走，毛泽东就背着书包爬到房后山上，边背书，边摘毛果子，书背熟了，毛栗子也摘了一书包。他回到课堂，给每个同学送上几颗，给先生讲桌上也放了一份，作为尊重老师的表示。毛宇居回来，不仅不领情，还责问：「谁叫你到处乱跑」？毛泽东说：「闷在屋里头昏脑胀、死背硬记也记不住」。「放肆」！老师一拍戒尺。毛泽东说：「那你叫我背书好了。」宇居知道背书难不倒他，便心生一计，把毛泽东叫到

院子里,指着一口井说:‘我要你赞井!’这时同学们也都自动离了位,到院子里看老师怎样惩治毛泽东。只见毛泽东围井口转了两圈,便道:

天进四方方,周围是高墙。

清清见卵石,小鱼圆中央。

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

他敏捷的才思和深刻的讽喻,给先生和同学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毛宇居暗暗称奇,认为这个孩子有曹子建七步成诗之才。一九〇六年,毛泽东向父亲提出,原停学务农,在家自学看书。毛泽东的本意是可以不受约束地在家阅读杂书野史。父亲说:「我原本就没指望你出去考秀才、举人,现在又废除了科举,再读书也没有用。田里活忙不过来,你回来也好」。于是,从一九〇七年春到一九〇九年秋,毛泽东半耕半读,村里能借到的书他都借遍了,一本接一本,贪婪地读着。

一天下午,太阳刚刚偏西。毛貽昌忽然发觉儿子没在田里劳作。他找到祖坟后面一棵大树底下,见儿子坐在那里,正聚精会神地看书,身边放着两个空粪桶。一见这场景,作父亲的火就上来,他大声斥责:「你为什么对老子的话全不放在心上」?「没有,爸爸。我很注意听你的话,你叫我做的活我都做好了」。「我要你照顾农田,按时在田里做活,不要再看这些坏书」。「我是按时在田里做活的,但是我也要同样按时看我的书。当我在田里把活做完以后,我就得闲了,我现在不是很空闲吗?我做完了你分配我的活,你就没有理由不让我看书」。「可是,孩子,你只挑了几担粪,就躲到这里来看书了」。「在到这里看书之前,我已经把你告诉我的事做完了」。「你挑了多少桶」?「吃过中午饭之后,我已经挑完了十五担粪,你如果不信,你自己到田里去数一数」。作父亲的一听,目瞪口呆,一时说不出话来。十五

担粪半天担完,确是繁重的劳动,如果儿子说的属实的话,实在没有理由再加抱怨。他带着受挫和忧伤的目光看了看他那不平凡的儿子,拖着沉重的脚步往田里走去。他认真地数了一遍,发现一担不少,正是十五担,三十桶。

毛泽东十四岁了。父母做主给他娶了一个比他大四岁的妻子罗氏。农家娶大几岁的儿媳妇是为了给家里增加一个劳动力。少年毛泽东还没有娶妻的要求,对这桩婚姻坚决不承认,也没有和罗氏「圆房」。父亲很生气,说他不孝。按封建规矩,「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遵父母之命成亲,耽误传宗接代,是列在第一位的不孝行为。为这事父子俩个没少呕气。父亲要打他。他也引经据典说:「经书上说,“父慈子孝”,可见父慈在先,子孝在后,哪有父不能慈而子能孝的道理呢」!罗氏到毛家,只是尽儿媳之责,帮助婆婆操持家务,缝补浆洗,成为文氏的助手。因身体瘦弱,有时回娘家小住。一九一〇年二月十一日,罗氏病逝,只活了二十一岁。

据毛泽东成名后略带诙谐的分析,他家分为两党:父亲是执政党,母亲、泽东弟兄三人以及长工伙计是反对党。反对党和执政党时起冲突。毛贻昌勤劳节俭,积铢累寸,一心想着发家致富。所以为人吝啬,反对周济亲友,施舍穷人。文七妹笃信佛教,心地善良,极富同情心,认为帮助穷人是积德行善,会得到神佛的保佑。每逢灾年荒月,经常背着丈夫悄悄送米送粮接济贫苦的乡亲们。泽东和弟弟们赞成母亲的善行,并仿而效之。一年旧历年关,父亲叫泽东去收一笔卖猪的账。他把钱收回来。在回家的路上碰见几个衣衫褴褛的穷人沿街乞讨,他就私自做主,拿出一部分钱给这些穷人分了。回到家,若来父亲一顿责骂。毛泽东的堂叔毛菊生,家境十分贫困,泽东和母亲每到年关就给这位贫苦的叔叔送米、送腊肉。可毛贻昌却在一九〇三年

狠心买下了菊生家的七亩水田。泽东当时就极力反对。父亲的逻辑是：「他要卖田，我不买就会落到别人手里去」。最后父亲答应，不把田价压得太低。泽东认为父亲「为富不仁。」有一次毛贻昌买了一个老阿婆的猪，讲好价，付了定钱，过了几天派泽东去把猪赶回来。但这时猪价上涨，老阿婆后悔吃了亏。泽东听明白老人的意思，没有把猪赶回来，只收回了预付的定金。父亲为止又生了一顿气，骂他无用，不会办事。还在泽东读书时，有一次母亲给他装好两箩筐白米，让他送到学馆交学费。泽东担米出门，行不远见本家毛承七夫妇在吵架，原来是因为家里断粮了。泽东问明原委后，挑箩筐进屋，把两斗白米倒进了承七家的米缸。母亲见他出门不久，挑着空箩筐回来了，很是惊讶，听泽东把情况说明，认为儿子做得对，又给他装了两斗米，叫泽东莫让父亲看见，赶快挑到学堂里去。

这些事情积累起来，在毛贻昌心里结成了一个疙瘩。一次当着客人的面爆发了。做父亲的责骂泽东懒惰，不会理家。泽东不服，顶撞起来，父亲要打他，他就从家里跑出来，到一个水塘边，以父亲要再逼进一步就投塘相威胁，开始了和父亲的谈判。父亲当着客人的面，怕把事情闹大，只好止步，但要泽东下跪认错。亲友也上来劝说。泽东见父亲止步了，知道自己占了上风，心想也要给父亲一点面子，就提出折中的条件：「只要你保证不打我，我可以单腿下跪」。父亲问：「为什么单腿下跪」？泽东的回答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另一条腿属于母亲，只能跪一条腿」。父亲无话可说，只好接受他的单腿下跪，了结这场风波。

青年毛泽东求知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他利用劳动之余的宝贵时间，在族叔毛麓钟的指导下，读了顾炎武的《日知录》、司马迁的《史记》以及《古文观止》、唐诗宋词等等。他喜欢诗词，能背诵许多名篇佳句。毛麓钟是个秀才，在蔡锷幕府当过文秘，文章

很有功底。毛泽东的八股文，在他的指导下也有长足的进步。把村里的书读遍之后，毛泽东又到湘乡唐家的外婆家去借新书。表兄文运昌积极向毛泽东推荐《盛世危言》、《新民义报》等进步书刊。新书报在毛泽东面前展开了一个新世界。他如饥似渴地读着。晚上，帮父亲记好账目，他就用一条蓝布单子把窗户严严实实遮起来，不让父母看见灯光，读到深夜方睡。

一八九三年出版的广东人郑观应写的《盛世危言》是毛泽东非常喜欢读的一本书。这本书给了他启蒙的现代政治意识。书中提出中国富强之道，在兴学校、讲西学、改考制、办日报、整吏治、开矿业、修铁路等等。而实行这一切新政的关键，在于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盖有议院揽庶政之纲领。而后君相臣民之气通，上下堂帘之隔去，举国之心志如一，百端有条不紊，为其君者，恭己南面而已。故自有议院，而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革野小民无所积其怨，故断不至敷代而亡，一朝而灭也」。《盛世危言·议院》这些崭新的议论与经书上的圣君贤相说大相逢庭，其着眼点在抑制「昏暴之君」与「跋扈之臣」，毛泽东一时成为变法维新的拥护者。

《盛世危害》激起了毛泽东恢复学业的愿望。他感到「天生我才必有用」。他在这个世界上起的作用，不应该止于挑粪和种田。这时，湘乡开风虚毛之先，把在邻近几个县有影响的东山书院改为县立高等小学堂，办起了新学。毛泽东几次去外婆家，听在东山读书的表兄文澜泉说，东山高等小学堂教经书，也教自然科学，还有英文、音乐等课程，教员中有日本留学回来的。毛泽东暗暗下定决心要到东山去读书。

然而毛贻昌却为儿子安排了另外一条道路——到湘潭一家米店当学徒。毛泽东认定的事情是绝对不能改变的。母亲深知

儿子的个性,就劝当家人让步;又请来教过泽东的老师毛宇居、毛麓钟、李漱清,以及表兄王季范、文运昌等有见识的人物来说情。毛宇居、毛麓钟等力言泽东有大才,将来必成大器。和志贻昌拗不过大家,只好答应了儿子的请求。

这时毛贻昌发家史上的鼎盛时期。在送走大儿子的第二年,即一九一一年,发生了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改为中华民国。毛贻昌模模糊糊地感到,一个新朝代开始了;泽东也许在将来会成为一个人物。转念至此,他认为当务也急是给已去世七载的父亲重修坟茔。儿子如是做了官,那是要祭祖的,但祖父坟上连块碑也没有怎么行呢!于是在滴水洞大石鼓,他请来工匠,修坟立碑。数日后竣工。一块高三尺,宽一尺,厚三寸的石碑,矗立坟首。石料为祁阳石,细腻滑润,类似汉白玉。碑文按传统习惯由右至左竖写:

中华民国元年壬子夏月吉镌

显考毛翼臣老大人之墓

男贻昌

孙泽东

孙泽铭 泽淋 敬立

碑中泽铭即泽民,泽淋即泽覃。

一九一九年十月五日,毛泽东的母亲文氏去世,终年五十三岁。毛泽东虽学运正忙,仍回家奔丧。当他赶到韶山上屋场的时候,母亲入棺两天了。泽民告诉他,母亲临终的时候,还在呼唤他的名字。泽东对母亲有很深的感情,闻言心如刀绞。十月八日夜,他席地而坐,为母亲守灵,对着黯淡的长明灯,写出一篇情真意切的《祭母文》:

呜呼吾母,遮然而死。寿五十三,生有七子。

七子余三,即东民覃。其它不育,二女一男。育我兄弟,艰



辛备历。摧折作磨，因此遭疾。中间万万，皆伤心史。不忍卒书，待徐温吐。今则欲言，只有两端：一则感德，一则恨偏。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惻慈祥，感动庶外。爱力所致，原本真诚。不作狂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紊。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不染一尘，身心表里。五德萃萃，乃其大端。合其人格，如在上焉。恨偏所在，三纲之末。有志未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天乎人欤，倾地一角。次则儿辈，育之成行。如果未熟，介在青黄。病时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又次所怀，好亲至爱。或属素恩，或多劳瘁。大小亲疏，均待其规。总兹所述，盛德所辉。必秉恻忱，则效不远。致于所恨，必补遗缺。念慈在慈，此心不越。养育深恩，眷晖朝莘。报之何时，精禽大海。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隳，灵则万古。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今也言长，时到苦短。唯挚大端，置其粗浅。此时家奠，尽此一觞。后有言陈，与日俱长。

尚响

祭文作罢，毛泽东犹感意未尽，思绵绵，又挥毫写拘联两幅，置于灵堂。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寸艮皆须补，长生新学佛，  
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其二

春风南岸留晖远

秋雨韶山洒泪多

一九二〇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的父亲贻昌（顺生）在文氏夫人去世半年之后，因患伤寒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此时毛泽东正率「驱张代表团」在北京请愿，未返里治丧，一切由两弟料

理。毛贻昌与文氏合葬于楠竹撬一座松青柏翠的小山上。立石碑一块,上书:显考毛公顺生 显妣文氏 老大人之墓

男

泽东

泽民

泽覃敬立

一九五〇年隆冬,韶山乡的土地改革已到了划分成份、分配土地的阶段。应该给毛泽东家划什么成份呢?当时负责土改的农会主席兼乡长毛寅秋作了难,按原有土地财产,应划为富农。土改中划为富农的人家,不仅要交出一部分土地,而且意味着政治上入了另册。毛寅秋不忍也不敢这样做。通融的办法是有的,但那又和土改政策相违背。于是,他提笔给在北京中南海的毛泽东写了封信。信上说:「家乡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您的亲切关怀下,土改现已进入划分成份、分田的阶段了。您老知道的,韶是山多地少,初步推算,人平均九分三左右,不知您老家有几口人分田?特向您汇报,请指示」。乡政府秘书看信上寥寥数语,问道:「那成份的事,还是没有讲」!毛寅秋说:「主席一看就会晓得我们的意思」。

信发出不久,毛岸英、毛岸青奉父命来到韶山,向毛寅秋等乡政府和农会领导人转达了毛泽东的三条意见:

一、所有财产分给农民;

二、划分为富农,则无旁议,付来三百元,作退押金;

三、人民的政府执法不徇情,照政策办事,人民会相信政府。

毛泽东就是这样执行中共土地改革政策的。所以那时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的各级干部,没有人敢于包庇家庭;有之,则不论职位高低均受到严肃查处。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回到了阔别三十二年的

韶山故乡。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和「七·一五」之后，在血雨腥风的日子里，毛泽东回过一次韶山，在一次群众会上他发下誓言：「再搞三十年革命，反动派打不倒，我毛润之不回韶山」！如今他回来了，他是以中国领袖的身份回来的。虽未「衣锦」，但属「荣归」。第二天，他请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吃了一餐饭。其中有他发誓时的见证人、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员邹祖培、庞菊中，有他的塾师毛宇居等。席间，毛泽东向毛宇居敬酒。毛宇居连忙站起来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笑着亲切地说：「敬老尊贤，应该！应该」！

毛泽东住在阡山宾馆。这天，一改睡早觉的习惯，七点钟就起来了。他大步流星，登上楠竹的小山岗拜谒父母陵墓。随行的卫士封耀松和警卫局沉处长开始不知他的意图，着到墓碑才知道他是来悼念父母的。机警的小封赶紧采了一束松柏枝交到毛泽东手上。毛泽东手的松柏枝默默地献上，深沉地鞠躬为礼。面对父母坟茔，故乡山水，他伫立良久，触景生情，浮想联翩，回到住所，挥毫写下七律《到韶山》一首：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三十二年，毛氏家族写这场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内容的民主革命，牺牲了多少人哪！他屈指一一数着：

大弟毛泽民，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在新疆迪化被盛世才杀害；二弟毛泽覃，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在江西瑞金附近与国民党军作战中牺牲；妻子杨开慧，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四日在长沙被何键杀害；堂妹毛泽建，一九二八年二月十日在湖南衡

山县被国民党枪杀；

堂妹夫陈芬(毛泽建的丈夫),一九二八年参加湘南暴动,在耒阳敖山庙战斗中牺牲;长子毛岸英,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五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在死朝鲜;侄子毛楚雄(毛泽覃子),一九四六年七月随三五九旅中原突围时在陕西镇安县牺牲。

近支的亲人牺牲了七位,远支的族人牺牲了多少人就数不清了;还有为此而献身的千千万万的共产党员、战士以及人民群众。胜利,来之不易呀……

毛泽东正沉缅在历史的回顾中,族弟毛泽连来探望。几句寒暄过后,毛泽东很自然地想起了小时候父亲买族叔田产的事,说:「旧社会那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二叔(注:即毛菊生,来访者毛泽连的父亲)是堂兄弟,买二叔那七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了,全无手足之情,谁的劝说都听不进去。我后来思考这件事情,认清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事。于是下决心要寻一条解放穷苦农民的道路」。为了寻找这条道路,毛泽东奋斗了一辈子。

## 02 辛亥革命 军阀篡权天下乱 少年立志 学不成名誓不还

一九一〇年秋，十六岁的毛泽东离开家乡到湘乡东山去读书。临行前一天晚上，他为父亲记完了账，撕下账本后面一张毛边纸，抄写了一首诗：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也，  
人生无处不青山。

这是根据他在《新民业报》上看到的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政治家西乡隆盛的一首言志诗略加改写而成。为适应自己的情况，他将原诗中的「男儿」改成「孩儿」，将「死不还」改成「誓不还」。诗中表达了泽东的宏图大志，也表达了泽东与父母感情上交融。毛泽东把诗用工笔抄清，夹在父亲的账簿里，因为账簿是老人每天必看的東西。第二天，毛泽东离别父母弟妹上路了。毛貽昌和妻子文氏带着泽民、泽覃、泽建，为长子送和地。回到家里翻动账簿，看到了儿子的诗，老人文化不高，不懂诗词，但这几行字是认得下来的，意思也是心领神会的，他没想到石三伢子会有这样大的志向，对于离家远游的儿子觉得好象陌生了。

毛泽东挑着行李，一头是被褥，一顶蓝色的蚊帐，几件褪了色的换洗衣服；一头是一个纲蓝，有他的文房四宝、书藉、笔记

本,还有他心爱的读得卷了角的《三国演义》和《水浒》。虽然刚满十六岁,但他发育良好,身体伟岸,像个大人了。行行复行行。步行五十里,从湘乡望春门出城,坐船渡过涟水,就看见了树木葱笼的东台山。山上有一片房屋,四周是很高的院墙,宽敞的黑漆大门,这就是东台书院的旧址,现为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

一进校门,门房工友就把拦住了。开始以为他是来给正在读书的少爷送东西的长工,当毛泽东说明自己要入学读书的时候,工友困惑了。

「我只求你去通报校长,就说我要见他」。毛泽东恳求着。

工友上下打量这个连件长衫也没穿,一身土布裤褂,汗泥满面的小伙子,说:「人家少爷来上学,都是老爷坐轿送来。你这样一个人,怎么能进学堂呢」?「如果你不通报,我就自己进去了」。「你敢」!随着工友的断喝,几个学生也跟着起哄:「你敢」!「你敢」!一个学生跑进去报告了校长,说有人跟门房工友打起来了。校长李元甫,留着八字鬓,四十开外,着玄色长衫,手持一杆别具风格的烟袋——那烟袋杆是湘妃竹精制,足有一米长,上装玉石烟嘴,下配有二两重的铜烟锅——走了出来,独有一番威严和庄重之感。

「是怎么回事,吵闹什么呀」?校长看看工友,又转脸打量毛泽东。「先生,请准许我进学堂读书吧」。毛泽东并无自惭形秽的表情,毫不畏缩,自信地但是礼貌地谈话。校长没有正面回答这个乡下青年的问题,转脸对门房工友说:「把他领到我的办公室去」。说罢转身回去了。

校长说的这个「领到」,应该是工友挑着行李,把毛泽东送到办公室。但工友实在不情愿,他料定毛泽东挨一顿训就得走路,就说:「你的行李放在门房吧」。



但毛泽东坚持随身带着行李。作为一种折中,毛泽东提着网篮,拿着扁担;工友给提着行李,把他「领」进了校长办公室。

校长坐在办公室桌前,熟练地装满一锅碎烟叶,吸了两口,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先生,我的名字叫毛泽东」。「有表字吗」?「表字润之」。「润之,家住哪里」?「湘潭韶山」。「你十几岁啦」?「十六岁」「看上去你有十七、八岁了。在村里读过什么书」?「读过四年私塾,还自学过两年」。「学过算术吗」?「学过珠算,加减乘除都会」。「你作篇文吧」。「先生,以什么为题呢」?「谈谈你的志向吧,作文题目就叫《言志》」。

毛泽东拿出文房四宝,边研墨边构思,然后展纸挥毫。等校长又抽完一袋烟,他双手把作文呈上。文章大意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个人的志向与国家的命运是联在一起的。

校长李元甫看

过之后,内心很是赞许,把国文老师谭春请来,让他看看这笔作文。谭老师看过,称赞不已。二人交换意见后,决定留下毛泽东。

「我们是湘乡县立官学,向来只收本县子弟。毛泽东是湘潭人,不好破例吧」。一个有校董身份的教师提出异议。

「中国学生可以去外国留学,湘潭人为什么不能到湘乡读书呢」?谭永春据理反驳。

李校长拿出了权威性意见:「我们东山学堂要录取这名建国才」。

谭老师特意关照,把毛泽东编在戊班,和自己的儿子谭世瑛同班。

这个学校的学生,大多家境富裕,衣履光鲜。传统服装是衣料考究的中式裤褂、青缎子牛皮底鞋;维新的则穿时髦的学生服、皮鞋。毛泽东一身土布裤褂,母亲给做的圆口布鞋,又不是

本县人,受到一些同学的轻视和讥笑。毛泽东在精神上感到很大的压抑。他决心以学业上的优异成绩压倒那些纨绔子弟,使自己抬起头来。

学校每星期日上午,都由老师命题,学生们交一篇作文才放假。毛泽东第一个星期写的《救国图存篇》,第二个星期写的《宋襄公论》,深得国文老师贺岗光的赞赏,批给全班传阅,让同学们当范文诵读。贺老师见他才思敏捷,议论不凡。特地将他珍藏的一部《了凡纲鉴》送给毛泽东。被老师这样看重,同学们认为是难以得到的殊荣。从此以后,谁也不敢藐视韶山来的毛泽东了。加上他有一肚子《三国》和《水浒》的故事,很快就有了一批追随者。在他的宿舍里经常聚集一批人,听他的绘声绘色的评书。渐渐地,在课堂,在操场,在饭厅,凡属重要一点的问题,都要等毛泽东先表态,唯他的马首是瞻。对于征服了这批纨绔子弟,他内心十分得意。

学校订有《新民业报》,这个刊物带来京城和国外的消息。他第一次知道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都已死去,新皇帝宣统登基已两年。《新民业报》每期都有梁启超那汪洋恣肆的文章。毛泽东爱不释手,读了又读,许多精辟的段落和句子,他都默记在心。康有为和梁启超成了毛泽东最崇拜的人。他交了一个好友萧植蕃(就是后来成了名的作家兼诗人萧三),从萧植蕃那里借得一本《世界英杰论》,书中有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卢梭、陈德斯鸠等人的传记,他如获至宝,读时圈圈点点,声节三叹,有时按捺不住还要发几句议论写在书眉上。还书时他对萧植蕃说:「我特别钦佩华盛顿,经过八年艰苦战争,使美国赢得独立。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

在东山高等小学堂住了一个学期,毛泽东想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他下一个目标是离家一百二十里的省城——长沙。事

有凑巧,东山高小教师贺岗光应聘到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去任教,他就请贺老师给写了一封介绍信去投考湘乡驻省中学。临去长沙之前,得回家一趟报告父母,作些经济上、物质上的准备。这时,毛贻昌的经济实力有了进一步增长,土地虽然没有增加,但典进了很多别人的田,在商业上的投资已在三千枚银元以上。而毛泽东在东山高小一学期的膳宿费和学杂费,才缴付了一千四百个铜板,折合十几块银元。毛贻昌有力量供儿子念书了。

一九一一年春,毛泽东乘湘江的小火轮到了长沙,顺利地考入了驻省湘乡中学。

一九一一年按照的甲子排列是辛亥年,这是一个激烈动荡地岁月。在驻省湘乡中学,毛泽东第一次看到日报——《民立报》,这是同盟会的机关报,由于右任主编。通过《民立报》,他知道了孙中山,知道了同盟会,知道了此伏彼起的反清起义。由于兴奋,他写了篇表示政见的文章贴在学校墙壁上,应该说这是他的第一张大字报,主张让孙中山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当时他还不知道孙文与康梁有分歧,把心目中尊崇的这三个人捏在一起了。这里表现了这个十八岁青年的幼稚。难能可贵的是,这是皇帝还在位的时候毛泽东发表的反对帝制的宣言。为了表示兴汉排满的决心,他毅然剪掉了辫子。四月底,他看到了著名革命党人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悲愤激昂不能自己。这时候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已维持不住了。学生们沸沸扬扬议论时事,毛泽东是积极参加者。一天,有位革命党人来到学校演讲,主张推翻满清,建立民国。这样尖锐明确地提出问题,大家听了非常痛快。一位同学跳上台去,脱掉长袍,激动地说:「只是高谈革命是不行的,要像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那样,行动起来,参加革命军」。全民大起义的时机成熟了。

十月十日(阴历八月十九日)辛亥革命爆发了。

辛亥革命是在孙中山和同盟会的影响下发生的,但不是孙中山等直接和具体筹划的。此时孙中山仍在美国,黄兴、胡汉民等在香港。武汉的革命秘密团体有日知会、共进会、群治学会、振武学会、文学社等。日知会全体会员加入了同盟会,但日知会被破获了,骨干分子在狱中。共进会大部分为同盟会会员,其核心人物焦连峰为湖南起义军首领;但刘公因家中藏匿炸弹被清政府查抄,逃走不知去向。群治学社以汉口商务手报为中心,参加多为文化人,也因策划起义和运炸弹被破获,社员式流亡四川和上海。振武学社是群治学社变名复活的一个组织,以新军士兵为主要骨干,分布在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四十一、四十二等标(相当于团),炮、马、工、辎各营,宪兵队以及陆军中学、陆军测绘学堂等处;但振武学社也被破获,复有其化形组织文学社出现。文学社成立于一九一一年一月三十日(阴历正月初一),在新军中联络面更广,以蒋翊武、蔡济民、马荣、彭楚蕃、孙昌复、詹大悲、何海鸣、胡瑛等为骨干。文学社曾计划十月六日(八月十五中秋节)起义,因准备不及,改期为十月十六日(八月二十五日)举事。十月九日,文学社的秘密机关又被破获,彭楚蕃、杨宏胜、刘当夔等被捕,并于当夜被杀害,预定的领导者蒋翊武逃跑不知去向。所以,十月十日的武昌起很难说是谁领导和发动的,是一次群众性、自发性的起义。

火星爆发点起自三十一标工兵营。当晚该营前队二排排长陶启胜查夜,看见值夜班的士兵金兆龙正在把子弹装入枪膛里,厉声问道:「这是干什么?你想造反吗」?金兆龙怒目相向,回答说:「老子就是要造反」!说罢二人撕打起来。金边打边喊:「弟兄们,赶快起来,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同排士兵程定国闻声赶至,从陶启胜的背后用枪托把他击倒。接着,管带(营

长)阮荣发闻声赶来,被士兵吕中秋、徐少斌当场开枪打死。左队士兵方与在营门前空地上扔了一枚炸弹,振臂大呼:「整队整队!集合集合」!

工兵营的骚动像一颗火星在油库里爆炸,步、马、炮、辎各营的士兵闻声一哄而起,背枪拖炮,立刻组成一支群龙元首的造反队伍,人数约四五千。经过商量,决定首先打当时作为军火库的楚望台。守台的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支持士兵们造反,大家就推举他作为革命军的临时指挥。

清廷湖广总督瑚澄听说革命党起事了,吓得躲到停泊在武昌江面的楚豫兵艇,武汉三镇的军事首脑、第八镇统制(相当师长)张彪躲进了日本领事馆。武汉成了革命军的天下。

这天上竿,武昌各界人士在谘议局开会,要推出一个有相当身份的人物来作革命的首领。议员刘赓藻建议推选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相当旅长)黎元洪为都督。临时指挥吴兆麟表示同意。于是就派议员刘赓藻、士兵马荣、蔡济民、汤启发等去请。

革命爆发后,黎元洪藏在黄土坡一下属谢国超家中,派厨师回去取行李,被来找他的人发现,硬逼着府师领着找到黄土坡。黎元洪钻进床底下被拽了出来。当刘赓藻等向他说明要举他做都督时,他坚决不干。被蔡济民用枪逼着「请」到了谘议局。进士出身的议长汤化龙也上来相劝,黎元洪说:「你们不要抬举我,我不是革命党,我没有做都督的资格。够资格的是孙文」。这时拟好一个湖北革命军都督安民告示,请黎元洪划行,黎就是不肯;又是蔡济民拿枪逼着,才写了一个「行」字。说来滑稽,这位被手枪逼着革命的黎都督,后来竟当了民国大总统。

为了提高鄂军都督的威信,十月十六日在阅马场举行祭告黄帝和革命誓师大会。由盟会元老谭人凰向革命军都督授剑、授旗。谭人凰字石屏,湖南新化县人,是同盟会中年龄最长者,

鬓发皆白，风度颇好，天生是权力的象征。孙中山派他来和湖北各革命团体取联络。今天扮演授剑授旗的角色，表示黎元都督是同盟会封的，他的权柄是同盟会授予的。这样使武昌起义正式和同盟会挂上了钩。黎元洪本来相貌魁武，加上戎装绶带，骑上一匹高头大马上，在汤化龙为首的一群官僚政客的簇拥下来到会场，还是很像个样子的。因为正式国旗还没有设计出来，他接过来的是用十八颗星代表十八行省的临时国旗。年号改称黄帝四千六百零九年，这是沿用代表汉族黄带轩辕氏的年号，是兴汉排满的意思。黎元洪行礼如仪，讲话中说：「请中山先生到湖北来领导革命」。

不管怎么说，辛亥革命胜利了。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湖南是全国第一个响应起义的省份。

湖南新军只有一个混成协(旅)，连四十九、五十两标(团)、合计四千人、协统云南人杨晋早已逃走了。旧军巡防营的人数远远超过新军，计有五十一队，一万三千多人，统领是湖南绅士黄忠浩。

武昌起义后，同盟会员焦连峰立即从武昌来到长沙，组织领导了湖南起义。十月二十日，长沙革命党人在大西门正街贾太传祠放了一把火，这是起义的信号。顷刻之间，驻扎小吴门外的新军就由营地出发，一路往荷花池去占领军械局；大队从小吴门进城，直奔抚台衙门。抚台衙门的卫队没有抵抗。平时威风凛凛抚台大人余诚格对这个局面的出现似乎早有准备，他跑出来对革命军一揖到底，说：「诸位要革命，兄弟是赞成的，是十分赞成的」。起义军令他在这一块很大的白布上写了一个「汉」字，制成一面旗子，在衙门里升起来，取代了大清国的龙旗。城里各机关、学校、商店也都纷纷照此办理，表示清朝的统治在这里被推



翻了。湖南巡防营统领黄忠浩,兵备道王毓江,长沙县知事沉瀛都因民愤太大被革命军处死。

当天下午,革命党人焦连峰被推举为湖南军政府都督,曾经当过新军排长的陈作新当了副都督,通电全国正式宣告独立。

在宣布独立以后,数量小的新军吸收了数最大的旧军,旧军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又大举招兵,因此湖南军队骤然增加到五万人,编成五个师,师长依次为余钦翼、赵春霆、曾继吾、王降中、梅馨。

谭延一,字组庵,湖南茶陵人,出身于官宦之家,清光绪进士,翰林院编修,原是个君主宪主义者,工于心计,长袖善舞,在军政府中任谘议局任议长。他私下表示支持第五师师长梅馨当都督。梅馨野心萌发,于十月三十日(九月初十)发动兵变,进攻都督府,当焦连峰出来向变兵讲话时,被当场打死。在此之前一瞬,副都督陈作新骑马到北门外和丰洋火厂处理兵变,走到城外古吊桥关帝庙附近,也被变兵杀害。

此时谭延文又支持其它四位师长与梅馨展开竞争,由于相持不下,不得不把推举都督的问题交给谘议局讨论决定,谘议局在议长谭延文的操纵下推举谭氏当了都督。从此湖南敢局同全国一样,进入一个动荡混乱的时期。

毛泽东和一批热血青年,原准备到武昌参加革命军,既然长沙也革命了,他们就近参加了湖南的新军。毛泽东被分配到辎重营当列兵。管带(营长)毛子奇,湖南平江人,认毛泽东为同宗。营部文书毛煦生与毛泽东友善。那时一个列兵的月薪是七块银元。毛泽东吃饭花去两元。剩下的饷银,除零用外,差不多都花在报纸上。他订了省内外的几种报纸,每天仔细阅读,研究国家大事与社会问题他给士兵们解释天下大事,帮他们写了家信,他的渊博的知识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副目(副班长)彭友腾

在公差勤务上对他颇多照顾。当时规定士兵都要到城外去挑水，毛泽东要阅读大量新闻，不愿意耽误工夫，就允许他免挑，花一点请别人代劳。毛泽东当了半年兵，并无三操两讲、公差勤务之苦，他像个军中记者一样，追踪于全国的政治动态。

继湖南之后，江西、陕西、山西、云南、上海、浙江、江苏、贵州、广西、安徽、广东、福建、山东、四川等省市相继宣告独立，不再承认北京的皇帝，摄政王载灃把北洋新军到创建者袁世凯请出来当内阁总理大臣。颁布宪法十九条，想实行君主立宪以缓和輿情，保持皇室的尊号和皇帝的地位。袁世凯知道，他这个遭「今上」贬谪的老臣能东山再起，全靠革命党人「帮忙」；如果武昌不举事，清廷是不会同意实行君主立宪交出政权的；一八九八年谭嗣同等六君子就是要求实行君主立宪的政体被砍了头，袁世凯的策略是利用革命军以威胁清政府，挟持清政府以对付革命军。清廷将倾国之氏交给他平乱。十月二十七日他的军事开到信阳，命令冯国璋率第一军猛攻汉口，占领了大智门火车站，并放了一把火，压一压革命军的气焰。清廷是多么盼望他再把第二军调上去，占领武汉三镇，救平「叛乱」啊！但是，他不。他让第二军军长段祺瑞随着他在豪华的专车里饮酒赋诗，再不往前线增兵。这样，清廷要保持既得利益就必须向袁世凯妥协，革命党要彻底推翻清廷也必须向袁世凯让步，袁世凯左右逢源，成了操纵局势的关键人物。十二月二日，革命军江浙联军攻下南京。十七省代表在南京组成议会，选举从海外归来的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孙中山行就职典礼，宣告中华民国的成立。有人问孙中山带回来多少军饷多少枪炮，孙莞两一笑说：「我带得革命精神回来」。孙中山只是各省革命军的精神领袖，不像袁世凯运用北洋军那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由于没抓住军队，孙中山自知地位软弱，就职当天就打电报给袁

世凯,说他当总统是「暂时承之,以待贤者」。不久,南北议和告成。清帝退位。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三日,孙中山做了四十四天临时大总统后,就辞职引退,让位给袁世凯。武昌起义以来,革命党人、清廷、袁世凯三股势力,在军事、政治上的斗争,一幕连接一幕,九曲连环,跌宕起伏。这一切都能在报纸上寻到直言无隐的坦陈和蛛丝马迹的透露。毛泽东每天抓到报纸就贪婪地读着,从第一片看一以第四版,逐字逐句,惟恐漏掉点什么。他在大潮大浪中学习,积累着政治经验。

南北议和,中国「统一」之后,毛泽东决定退伍。辛亥革命后一个春天,他离开了兵营,住进了湘乡会馆,很多士兵也住在那里,他们都是退伍或被资遣的湘乡人。一天,毛泽东街头闲逛,信步登上了天心阁。天心阁是长沙的摩天大楼,高七层,建在南门的城墙上。他抓上天心阁顶楼,朝西眺望,离城不远的湘江滚滚奔流,再远处即是兵麓山,郁郁葱葱透拖数百里,极目之遥,就是南岳衡山了。岳麓山脚下一摊白房子,那是历史上有名的白麓书院,宋朝理学大师朱熹讲学的地方,现在是省立了高等师范学校。毛泽东正在凝视山川,神游物外,背后响起了脚步声,回头一看,竟是住在一起的朋友谈悟本、刘行和彭世良。毛泽东热烈地和三人打招呼。刘行作东邀请大家到下面茶室叙话。他们围着一张桌子坐下,伙计送上四杯香荷,两大盘花生瓜子,四个老友边吃边谈,十分惬意。谈悟本是个大谈家,话匣子一开,滔滔不绝,无边无际,同学们送他个绰号「谈无边」。他个头和毛泽东一样高大,大头,宽肩,背微驼。当他议论纵攢的时候,双目炯炯,口沫横飞,矮小的鼻子就显不出来了,所以他的另一个绰号是「谈无鼻」。刘行细高挑儿,绰号「竹杆」。他家境宽裕,好交游,每以请朋友共餐为乐,彭世良个子矮小,活泼精悍,绰号「彭猴子」。这个场面,照例是谈悟本主讲。

「现在」,谈悟本清清嗓子说道:「我们的国家已经成为一个共和国。我们不再有皇帝了。我们都是平等的。天下是我们的了。我们是主人,官吏只不过是国家的公仆。甚至共和国总统也不琮是一个公仆罢了!我们都能够做总统,你和我,我们都能够做总统」。他环顾四座,重复一遍:「我们都能做……」「我愿意头一个做总统」!彭猴子看看三个朋友,希望他们不要抢这个第一。「彭猴子」,谈悟本斥责道:「你以为我是在淡笑话呀;我向你保证,我是十分认真的」。「哪里,我并没有认为你是说笑,我知道你很认真。我也是的,我真的要头一个做共和国的总统。我能够在之前做总统吗?我庄严地向你许诺,在天心阁由刘行和毛泽东作我的证人:当我做了共和国总统的时候,你一定是内阁总理」。

毛泽东对这个谈话的题目十分感兴趣。半真半假地向谈悟本提出了问题:「请你老实告诉我,个人要想被选为总统,他必须做些什么准备?他必须读很多书吗?在大学毕业以后,他应该熟知所有外国的情形吗」?

谈悟本出身官宦之家。对现实政治的内幕比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弟知道的多,乐于回答朋友的问题。等毛泽东的话刚落地,他大手一摆说:「不必,不必。取得权力不一定需要研究学问。试问秦始皇和汉高祖研究过什么学问?成吉思汗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士兵吗?就现在来说,我们每个人的学问都比他们任何一个都多。你要做总统,不必先成为学者。政治上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那么,一个人怎样才能取得政治权力呢」?毛泽东已完全为之心折。

「政客必须斗争」,谈悟本回答说:「一个政客必须毫无顾忌地攻击任何一个反对他的人。其它的人也想做总统,你必须把

他们制服。你必须和所有阻挡你的睡的人斗争，并且不惜一切代价求取胜利。有时候要杀人，做一个无情的凶手，可能是必要的」。

「但是，在政治上一个人怎样才能制服人的敌人呢」？毛泽东又问。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毛君，你不能用你两双空手去斗争。你需要很多和你共同进退的忠心党徒，他们愿为你工作。你必须把这些党徒纠合在一起。总之，你必须组织一个政党」。

说着无意，听者有心。毛泽东后来和他的好友萧子升说起这次谈话。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谈悟本的议论，并且非常坦白地表示对谈悟本惊人议论的赞赏。

人世之路到底怎么走？毛泽东思考着。他想进敬政学校，又想进政法学堂，制造肥皂的学校他也报过名。当他被一所商业中学录取的同时，又看到了公立高等商业学校的广告，经写信和父亲商量，父亲认为经商和发财是联系在一起的，读完高等商业学校一定能发大财，积极给予支持，于是他考进了公立高等商业学校。入学之后，毛泽东才知道很多课程都用英语讲授。而他的英语水平很低，除了认识字母以外，几乎一无所知。所以只耽了一个月就退学了。然后，他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考入省立第一中学。但只读了六个月，他又退学了。其所以退学是因为他感到学不到他想学的知识。他订了一个自学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读书。省图书馆在定王台，二层楼，楼上放置各种书籍，楼下大厅为阅览室。院中花草繁盛，还有一个金鱼池，环境十分幽雅。他感到这里对他非常适合，后来回忆说：「一到了图书馆，就像牛进了菜园」。他在这里非常专心地用功读书，只在中午时间出去买几个包子或烧饼充饥。天天必到，风雨无阻。

他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连两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名学》，斯宝寒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和《社会通论》等西方社会科学名著，以及希腊、罗马的文艺作品。阅览室壁上有一张，《世界坤舆大地图》。他经常伫立图前，仔细研读，知道了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有了具体的全球概念。这种读书生活使他兴奋极了，晚上回到湘乡会馆，睡到床上，想想一天的生活，觉得非常充实。但是，父亲不理解他，过了半年，父亲来信，认为他离开学校，不回家，不谋职业，成天闲逛是不正当的，再这样下去将断绝对他的供养。

一九一三年春，正是二十岁的毛泽东，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湖南公立第四师范。校长陈润霖看到他的作文后，深为赞许地对同事们说：「这样的文章，我辈同事中有几个作得出来」！第二年，第四师范和并于公立第一师范。四师春季始业和一师秋季始业的学生都编入一级，分为六、七、八、九、十班，毛泽东在第八班。

毛泽东跟湖南第一师范有过为时七年的密切关系：自一九一三年春到一九一八年夏天五年半时间在一师读书；自一九二〇年秋至一九二一年冬一年半的时间。任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校长兼师范国文教员。他在这个学校里经历了护国讨袁、南北战争、五四运动等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在斗争中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并且最后结成一个团体，为探求改造社会、振兴国家的道路而共同努力。毛泽东成名以后说：「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的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



### 03 学子聪颖 穷究天理通世故 遵师慧眼 欲栽大木拄长天

第一师范座落在长沙南门外书院坪,它的前身是城南书院。这是一所省立学校,政府拨给一师的经费较多,免费供给学生膳宿,并且发给书籍和校服。一师的校舍是一座日本风格的现代建筑,人们称之为「洋楼」。有能容纳两千人开会的大礼堂,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校舍四周围栏围绕。校园后面有山,名妙高峰,林木蓊郁,曲径通幽,是学子们读书、谈心和散步的好去处。校门前亘一条马路,出校门往右走是长沙城,往左走数百米,越过长株路,就是湘江,水陆交通十分方便。

毛泽东入学时一师的校长是日本留学的孔昭绶。他聘请了杨昌济、黎锦熙、方维夏、徐特立、王季范、王立庵等思想进步,学术精深,道德高尚的教师。老师的教导对毛泽东思想品格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杨昌济先生。

杨昌济(一八七一——一九二〇),字华生,留日时改名怀中。世居长沙东乡板仓,所以人称板仓先生。青年时具有爱国思想,参加过谭同任会长的湖南南学会,受谭同影响很深。一九〇三年后留学日本和英国,并去德国考察教育,致力研究首先教育和哲学,提倡以道德为中心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一九一三年归国时,主持湖南省政的谭延文想罗致他做官,要他出任省教育厅长,他婉言辞谢。那时留洋回来的人,不是做官,当议

员,就是当买办,办实业。杨昌济不流俗,选择了一个冷清的位置,作一名师范教员。他在湖南高师和第一师范教书六年,一九一八年应蔡元培之聘到了北京大学任文科教授。由于杨先生学贯中西,道德高尚,不仅言传,而且身教,受到学生们极大尊敬,俨然把他当作伟大圣人的化身。学生们送他的绰号是孔夫子。在湖南教育界,杨昌济有很高的声望。

杨昌济虽然研究过康德、斯宝塞等西方哲学,但他思想体系的基础和主体是儒家学说中的宋明理学,宋明理学分为两派:以北宋的二程(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学派和以南宋的陆九渊,晚明的王守仁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学派。宋明理学是封建统治阶层的世界观和理论基础。两派都把封建的「理」(仁、义、礼、智等伦理观念)作为宇宙的本体。所不同的是客观唯心主义主张「理」在心外,而主观唯心主义主张「理」在心中,心就是理。两派虽有争论,但维护封建制度的伦理纲常是一致的,所以清朝黄宗羲说:朱熹、陆九渊「二先生同植网常,同扶名教」。杨昌济的思想更多地继承了以南宋陆九渊、晚明王守仁为代表的陆王学派,他强调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决定于英雄人物的活动,主张人才救国、教育救国。他对宋明理学莛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从积极方面加以阐发,一九一四年自编讲义《论语类钞》,给学生讲授,并以自己信守不渝、身体力行的模范行动直接影响学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毛泽东的课堂笔记《讲堂录》反映了老师对学生志向、品德的巨大影响。

《论语类钞》第一篇讲「立志」。杨昌济引妃夫子的话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然后讲述发挥道:

意志之强者,对于己身,则能抑制情欲之横恣,对于社会,则能抵抗权势之压迫。道德者克己之连续,人生者不断之况争。

有不可夺之志，则事无不成妖。

临难勿敬免，见危授命，乃意志之强，同于良心之强之状态也。古来殉道者，宁死耐其志不可专；反对之者，但能残虐其身体，不能羁束其云魂。其志事虽暂挫于一时，而前仆后继，世界座大受其影响。

近世教育学者之说曰：人属于一社会，则当为其社会谋利益。若己身之利益与社会之利益有冲突之时，则当以己身之利益为社会之牺牲。虽然，牺牲之利益可也，牺牲己之主义不可也。不肯抛弃自己之主义，即匹夫不可夺志之说也。

毛泽东关于立志和献身，在读书笔记中有许多警句：「人必须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其合此理想」。「吾观古之君子，有杀身亡家不悔者矣」。「语曰：毒蛇螫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

欣赏过这类警句的人诚不算少，然真能身体力行说到做到的极少，也极难。毛泽东却是说到做到，一生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冒杀身亡家之祸而不悔。

在《论语类钞》「勤学」篇中，杨昌济说：

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他国。善治病者，必察病人身体之状态；善治国者，必审国家之特异情形。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势。

毛泽东对老师传授的这一思想，可以说终身信守不渝。他与教条主义者作斗争，反对和批判教条主义，都是运用和发挥教

师的这一思想。他发明的公式是：理论和实际相联系。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反对照搬外国的经验。

在《论语类钞》「坚忍」篇中，杨昌济说：

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着力，常以久制胜；他人以数年为之者，吾以数十年为之，不患其不有成就也。

余当谓天才高者，其成就或反不如天才较低者之大，要视其坚忍之力何如耳。（并且举达两文创《进化论》，斯宝寒着《道德原理》，司马光着《资治通鉴》，都是用了一、二十年的工夫为例，来说明毅力的重要。）

毛泽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对坚忍精神有精僻的发挥。一九一七年夏，他在为萧子升的一本读书杂记所写的序言中这样说道：学问的研究「有获有不获，则积不积之故也。今夫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耳，由是而二石焉，由是而三石、四石以至于万石焉。学问亦然。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高以下基，洪由织起，在乎人之求之两已。等积矣，又有大小偏全之别。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也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宝盛。此与夫执一先生之言，而妹妹自悦者，区以别矣」。毛泽东把这种坚忍不拔的毅力用在事业上，则表现为他提倡的「愚公移山」的精神。坚持奋斗，凡三十年，终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论语类钞》「致事」篇中，杨昌济说：

凡人欲在社会建功立业者，宜深谋远虑，动之万全，不可孤行己意，不顾利害。凡办一事，须以全副精神注之，始能有成功而不致失败。人之精力有限，故任事不可过多：任事过多，则神散而力分，必至事事均办不好。

凡办事有一定之顺序，吾人当按顺序，徐徐办去，终有成功之时。不可欲速。欲速则反迟矣。

关于办事,特别是办大事,毛泽东又有自己的深刻见解。他在笔记中说:「天下之道,未有见之不真,蓄之不厚,而可以敬为之者」。「盖未有力不足以举天下之烦,气不足以练天下之苦,性情不足以扶持天下之一偏,而可以大有为者也」。「拿得定,见得透,事无不成」。「人立身有一难事,即精细是也,能事事俱不忽略,则由小及大,虽为圣贤不难;不然,小不谨,大事败矣。克勤小物而可法者,陶桓公是也;忽小败大而可鉴者,恺撒是也。」杨昌济先生的学问道德对毛泽东世界观的形成有重大影响,这种影响,积极的一面是主要的;但也有消极方面,最突出的是英雄史观。虽然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后,说过很多群众路线的话,甚至说过「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但这是教育干部的,并不包括他自己。毛泽东晚年干纲独断,迷信自己,唯我独尊,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是英雄史观的充分表现。他是人治主义者,而不是法治主义者。理学宗师朱熹认为帝王的心术是天下万事的大根本,帝王个人的心术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毛泽东认为只要选一个「王将相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作接班人,他创立的基业就能「永不变色」。求社会的长治久安,不是从发展生产入手,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创造太平盛世,而是搞「斗私批修」,采用了王守仁的「去人欲,存天理」的治世学说。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在他晚年处处表现英雄史观对他的深刻影响。

杨昌济对毛泽东寄予厚望,希望他将来像曾文正公那样,成为「治国平天下」的人物。一九一五年四月五日杨昌济在他的「达化齐日记」中说,毛泽东家世务农,「而资历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注:即曾国藩;死后谥文正)、梁任公(即梁启超)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家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联系到湘乡人曾

曾国藩当年也是一介书生，办团练，创湘军，成为清朝的「中兴之臣」，因此特别勉励毛泽东学习曾国藩。毛泽东对老师的勉励是心领神会的。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给黎锦熙的信中说，过去人们认为康有为是有「本原」的人，「然细观之，其本原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千树立、枝叶扶疏之妙。」「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而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毛泽东佩服曾国藩，特别佩服他镇压太平天国干得漂亮，「完满无缺」。康有为曾是毛泽东心目中的偶像，如今弃之而改奉曾国藩，是因为康有为是个「华言炫听」的理论家，曾国藩是个「收拾洪杨」的实干家。他要像曾国藩那样建功立业。

一九一五年上学期，省议会作出新规定，秋季始业时，每个学生要缴十元杂费。遭到学生的激烈反对。有人说，这个新规定是校长张干为了讨好当局提议实施的。于是，学生们酝酿赶走校长张干。有人写了一篇宣言，专骂校长私德如何不好。毛泽东看后觉得没有打中要害；既要赶走校长，就要批评他学校办得如何不好。于是他另写宣言，历数张干办学无方，贻误青年。大家看后一致叫好，送到印刷局连夜赶印。第二天早晨，经办印刷的同学带着印好的宣言来到学校，被学监发现了。校长张干大怒，贴出布告宣布开除毛泽东为首的十七个闹事的学生。杨昌济力保他的心爱的弟子。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在黑板上写了两句诗：

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

说自己像桃花源中的太古逸民那样，不去做官而来教书，为得什么呢？就是要培养一批国家的栋梁之材，振兴国家。他联合方维夏、徐特立、王季范等先生出面为毛泽东等说情，校长才收回成命，改为记过处分。由于学生继续罢课，迫使张干不得不



辞职离开一师，以平息风潮。

一九一九年前后，杨昌济、黎锦熙、方维夏、徐特立等六位先生都住在李氏芋园。园内有假山、水池、树木，环境和幽雅。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熊光楚、张昆弟等，星期天或假日常到李氏芋园，向杨黎各位先生求教，讲学论道，议论时局，臧否人物。

杨昌济非常喜欢这一批青年，有时上午谈不完到了吃饭时间，就留他们吃午饭。杨夫人待人和气。她烧得一手好菜，餐桌上关照同学们加餐，惟恐有人吃不饱。学生们向师母表示感谢，并提出应该付若干饭费。杨先生说：「假定你们愿意这样，那是可以的，因为外国的大学生也有这种习惯。但只能付一点点，作为象征的费用，绝不能多。」在这种师生相得、相爱、相敬的氛围中，杨昌济真像园丁栽培名花异草一样，精心照料他的学生。他要求学生们的事情，一定躬身实践，作出榜样。如志存高远，深谋远虑，做事务实，治学有恒，言而有信，清心寡欲，崇尚俭朴，爱惜时间，冷水沐浴，长途步行，不作无谓应酬等，对学生的思想、治学、生活和为人处事各方面，都有深刻影响。

一九一五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出版，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新青年》高扬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号召广大青年解放思想，冲破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敢于去怀疑那些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旧观念。认为不论是什么事物和观念，如果经理性和科学判定为不合乎现代社会的，即令它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也一文不值也。」

《新青年》一开始就集中地对孔子思想进行猛烈的攻击，认为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儒家伦理学说同西方自由平等的伦理原则绝对相反，是阻碍中国人民觉悟的最大敌人。这种同几千年来统治人民的封建主义思想的彻底决裂，在中国广大知识青年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唤起了人们对国家命运的关心，促进

了人们民主主义的觉悟,形成了一个追求新知、追求真理的热潮。

毛泽东是《新青年》的最忠实的读者。有一个时期,正课之外,他读《新青年》,谈《新青年》,成为新文化的鼓吹者。据张昆弟日记载:「毛君润之云: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国人沈郁固塞,陋不自知,人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破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着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毛君又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杨昌济先生随时代的进步而进步。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八年他开设了伦理学课程,采用十九世纪康德派唯心主义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为基本教材。伦理学又称道德哲学。「伦」是指人与人的关系,「理」是道德和规则。「伦理」就是处理人们相互关系应遵守的道德和规则。

《伦理学原理》一书是蔡元培翻译的,译文流畅。这是毛泽东非常感兴趣的西方哲学著作。他与先秦诸子、宋明理学以及王船山、谭嗣同、梁启超和陈独秀等人的学说,联系比较,综合研究,有许多新鲜独到的见解。毛泽东的这些批语,多是读书中有所感,信手拈来,并无严密系统。但有三点在他的世界观方法论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一是「唯我论」。

批语中说:「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

值可也。」「吾人一生之活动，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宇宙间各物之活动，各物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吾从前因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若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而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存，苟无我，何有各我哉？是故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

「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

「服从神，何不服从自己，己即神也，己以外尚有所谓神乎？」

「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罪莫太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与宗敬、资本家、君主国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

毛泽东在这里接受的唯我论是他从宋明理学接受的主观唯心论的极端发展。在他还是个青年学子的时候，唯我论有个性解放的积极意义；当他成为政党领袖、国家元首的时候，这种唯我论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有极大的破坏作用。唯我论的世界观可引申出曹操的信条：「宁使我负天下人，勿使天下人负我。」

二是「矛盾论」。

批语中说：「人世一切事皆由差别比较而现。佛盲泯差别，不知其余道德界善恶问题如何处之。」

「世间有纯粹之平等、自由、博爱者乎？有之，其惟仙境。然则倡大同之说者，岂谬误之理想乎？既处于不大同时犹想望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而想平安。然长久平安，毫无抵抗、竞争之平安，非人生所堪。」

「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

是故治乱选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自古以

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亦自有实际生活之价值。

「凡宇宙一切之差别，皆不过其发现方面不同，与吾人观察及适应之方面有异而已，其本质只一个形状也。如阴阳、上下、大小、高卑、彼此、人已、好恶、正反、洁污、美丑、明暗、胜负之类，皆吾人各种之精神生活，即如此差别相构成之；无此差别相，即不能构成历史生活。进化者，差别阵迭之状况也。有差别而后有言语，有思虑；无差别即不能有之。」「余曰：旧念即实在，有限即无限，时间感官者即超绝时间感官者，想象即思维，形式即实质，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现在即过去及未来，过去及未来即现在，小即大，阳即阴，上即下，秽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质而言之，万即一，变即常。」

泡尔生原著中有一段话：「鸠之能翔于空中也，以有空气之抵抗；而彼乃以苟无空气，则其翔也更自由。此康德所以讽人，使之悟性之动，必须经验实事者也。人之意思，不可无对象之抵抗，亦然。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纯粹之幸福。如纯粹之真理然，有之其为神乎？在人类，则享幸福者必当有障碍若损害，犹之识真理者必当有蒙昧若谬误也。」毛泽东的批语是：「至真之理，至彻之言。」然后以诗一般的语言写道：「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

毛泽东在这里学到了最初步的对立物的统一的办证法观念。他看到了矛盾的普遍性，事物的差异即是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就没有语言，就没有思想，就没有世界。幸福与障碍相对抗而存在，真理与谬误相比较而发展。一治必有一乱，有生而后有死。这些批语标志蒋他从较深的层次上把握了事物的发展规律。同时我们也可以在这里找到他的著名哲学篇章《矛盾

论》的胚芽。三是「反映论」。批语中说：「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有生必有死，即自然物有成必有毁之法则。凡自然法则者，有必然性。」

「美学未成以前，早已有美；伦理学未成立以前，早已人人有道理，人人皆得其正鹄矣。种种著述皆不过为书其实际之情状，叙述其自然之条理；无论何种之书，皆是述而不作。吾人心灵本之自然，其范围有限，安能有一毫之创作？即宇宙亦终古在同状之中，无创作之力。精神不灭，物质不灭，即精神不生，物质不生。即不灭，何有生乎？但有变化而已。吾人之心灵限于观念，观念限于现象，现象限于实体。吾人之心灵有变化而已，安能有丝毫之创作哉？」

泡尔生之原著说：「叔本华谓人常不忆其所学而知之之真理，而误以为天赋，谬哉言也，且一切指示行为之语言，率已含有道德是非之判断。如诈伪贪鄙，已摈斥之意；公平节俭，已含有褒赏之意。」毛泽东的批评说：「由一人而论，从幼小也时即兼而得之，似为构成先天者；从历史观之，则纯成乎经验，而非所谓先天识觉悟也。而后知圣人者生而知之，不虑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之不可信也。」

反映论把人的认识奠基在唯物论的基础之上。先有自然、社会种种之美。而后才有美学；先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后才有概括这种关系的伦理学。任何天才的著作，都不过是一定领域之生活实际的反映。人之心灵生观念，但观念来自于现象，现象来自于实体，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千变万化的精神世界是千变万化的物质世界的反映。只有学而知之，没有生而知之。这就在认识论上接近了辩证唯物论。

在哲学界，凡主张物质是本源，物质派生精神的，属唯物论学派；凡主张精神是本源，精神产生物质的，属唯心论学派。主

张物质和精神两个独立的本源的称为二元论，其代表人物是康德，泡尔生继承康德，属于二元论哲学家。《伦理学原理》称不上是世界名著，但它是毛泽东第一本精研细读的西方哲学著作。先入为主。二元论世界观给了他极大的影响，在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以后，这种影响仍然保留着。在他的晚年表现为首尾不一贯，理论与行动割裂，毛泽东违背毛泽东思想。所谓「大跃进」是主观唯心论的代表作：「文化大革命」则是唯我论的代表作。

从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过程来说，接受泡尔生的二元论哲学是他走向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桥梁。在《伦理学原理》的启发下，毛泽东写过一篇题为《心之力》的论文，大受杨昌济的赞赏，给打了一百分。

青年毛泽东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物。他很欣赏孟子的一段话：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毛泽东来自农村，在第一师范以生活俭朴而闻名。他认为艰苦的生活有助于意志的磨炼。「贫者能成事」；「咬得菜根，百事可做」，他经常拿选两句话自励和励人。他在长沙上学五年半，总共只用了一百六十块钱，其中有三分之一是花在订报上，其余的钱还买了许多书籍和杂志。学校发的一套青色呢制服，他一直穿了好几年，褪了色，磨了洞，修补一下继续穿用。除制服外，他还常穿一件灰色布长袍，冬天在里面加件旧夹袄。白布裤是母亲给缝制的，四季穿用。夏天常常不穿袜子，布鞋也是补过的。星期日外出回校晚了，别的同学往往三五邀合，炒几个菜，他悄悄打点冷饭菜，匆匆吃罢就走了。

他非常注意身体的锻炼，叫作「野蛮其体魄」。每天天亮，



就来到校园的井边,脱去衣服,用吊桶打上水来,进行冷水浴,用毛巾擦全身,直到擦红发热为止。难得的是,春夏秋冬,四时不辍,人实行之日起直到毕业,一直坚持了四年。他还在下雨、下雪的时候,脱去上衣,在学校后山跑步。有一夜,暴雨、雷电交作,毛泽东遍身淋漓来到蔡和森家,蔡家在岳麓山脚下,他是从岳麓山顶上跑下来的,说是要体会一下《书经》上说的「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的意境。假日时,邀同学三五人,作长途步行和爬山,晚上或在寺庙借宿,或在野外露寝,作忍饥、受热、耐寒的锻炼。

有张昆弟一九一七年九月十六日日记一则,记锻炼之刻苦,述学友之相得。

今日星期,约与蔡和森、毛泽东、彭德怀作一二小时之施行。早饭后,彭君过河邀蔡君同去嵘湾市会伴。余与毛君先至荣湾市,稍久,彭君一人来,蔡君以值今日移居,不果行。此议发自蔡君,余诺之,并客之彭、毛二君也。事之难合,诚莫能料。三人遂沿铁道行,天气炎热,幸风大,温稍解。走十余里,休息于铁路旁茶店,饮茶解渴,稍坐又行,过十余里,经大托铺,前行六里息饭店,并在此午饭,饭每大碗五十文,菜每碗二十文,三人共吃饭五大碗,小菜五碗。饭后稍息,拟就该店后大塘浴,以水浇不及股,止。遂至店拿行具前行,未及三里寻一清且深之港坝,三人同浴,余以不善水甚不自由。午后,行十四里至目的地,时日将西下矣。遂由山之背缘石砌而上,湘水清临其下,高峰秀挹其上,昭山其名也。山上有寺,名昭山寺。寺内有和尚三四人,余辈以来意时晚,欲在该寺借宿,和尚初有不肯意,余辈遂有露宿于最树中之意,和尚后允借宿,露宿暂止。晚饭后,三人同由山之正门下,就湘江浴;浴后,盘沙对语,凉风暖解,水波助语,不知乐从何来也。久之由原路上,时行时话,不见山之倒立矣,和尚待于

门前，星光照下，树色苍浓，隐隐生气勃发焉。不久进寺，和尚带余辈至一客房，指旷床为宿处，并借余辈小被一块，房外有小楼一间，余辈至小楼纳凉，南风乱吹，三人语笑称善者久之。谈话颇久，甚相得也。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自觉悟地、持久地砥砺磨炼、为他后来的风餐露宿、雪山草地生活准备了一副好身体。

一九二五年，毛泽东回顾学生时代的生活，有《沁园春》一首，其抱负超过岳武穆，其慷慨远胜辛稼轩，词曰：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 04 有德有才 第一师范显身手 能文能武 妙高峰下退贼兵

毛泽东相貌奇伟,品行端正,善与人交,似有一种领袖群伦的魅力。但他并不装腔作势,夸夸其谈。据一师同学周世钊回忆,他「在班上是一个很规矩、很正派、很温雅的人。他走路不蹦跳,说话不粗率,时常正襟危坐,沉默寡言。」与同学相处,他平易近人,从不急躁和疾言厉色。大家在议论纷纷或争论激烈时。他总是保持沉静,细心倾听;听完了大家的意见之后,他才开口,常常以幽默语调析疑纠谬,说的人情人理,大家心悦诚服。谁若有悲观情绪,一经同他谈话,就能振作起来。谁若遇到解决不了的困难请他帮助,他一定能想出妥当的办法来。有一位同学由父母之命订了婚,女方是长沙一个中学校长的侄女,自己无力摆脱,十分苦恼。毛泽东就去拜访这位中学校长,请他出面说服双方家长,帮助这个同学解除了婚约。毛泽东抱负不凡,操守高尚。与同学交往,坚持三不谈,即不谈身边琐事,不谈盘钱,不谈男女之事。笃信「货色两关打不破,其人不足道也。」当然,他的优异的学习成绩,贴在橱窗里展览的议论纵横的文章,进一步在同学中提高了他的威信。

第一师范于一九一三年秋季创设技能会,目的在使学生「养成种种生活技能」;一九一四年改名自进会;一九一五年改名学友会。学友会的宗旨是「砥砺道德,研究教育,增进学识,养成职业,锻炼身体,联络感情。」会长由校长兼任,但不过是挂

名,实际负责的是「总务」,下设若干部。总务和各部部长由各班代表组成的代表会议产生;会员包括在校的全体同学和已毕业的校友,教职员为「赞助会员」。毛泽东由于极孚众望,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八年毕业时止,每学期都在学友会担任重要工作。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七年上学期,担任文牍;一九一七年下半年到一九一八年上学期担任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自毛泽东担任总务的这一学期起,学友会特别活跃起来,办的事情特别多,显示了毛泽东的组织才能。

这届学友会共设以下十五部:教育研究、讲演、文学(内分国学、英语、日语三种)、书法、图书、手工、音乐、武术、剑术、架梁、棒球(足球)、排球、野战、竞技、游泳。以前各部部长都是由各科教员担任,这一届学友会改由四、五年级的学生担任。这是毛泽东向学校方面力争的结果。他的理由是:四、五年级学生就要毕业了,应培养其办事的能力;如果有老师从旁辅导,他们是能胜任部长职责的。当时代会长、学监主任方维夏,就接受了这个意见。总务掌管学友会的全盘工作。据一师校志载,头两次会议即由毛泽东提议,通过本届学友会工作的六项决议:第一、征集会金;第二、确定各部「厂开演」(为当时术语,即指各部的活动,包括开会、讲演、研究之意)和学生参加各部的办法,聘请各部教员确定每周「开演」的次数;第三、编制预簿;第四、发表成绩,设立学生成绩展览处;第五、学友会各部都详细工作记录,建立「纪事录」制度;第六、设立小图书馆。

各部每周「开演」次数多是一次,各种体育活动有搞二、三次的,活动的时间是在下课之后或晚上,全校四、五百学生,每人至少都参加一部,多的有参加三、四部的。学校当局的行政或教务会,也吸收学友会代表参加。这样高度自治的学生会,在当时的湖南教育界还是创举世闻名。毛泽东通过学友会领导全校同

学,作各种有意义的课余活动,使学校充满了蓬勃朝气。

毛泽东很留心各人的长处,他极善于用众人之长,使其各展其才。他说:「看人首先应当看他的长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长处,大家应该鼓励和运用他的长处,而不管那长处是多么小,多么有限。」有一个国文教员,书教得不好,很受学生的轻视;但这个教员办过报纸。于是,有关编辑、排版、印刷方面的事宜,毛泽东就请他负责。这位教员因为受到学友会的看重,积极性很高。

学友会经费有限,精打细算,仍设法挤出钱购买当时各种新杂志,如《新青年》、《桌方杂志》、《太平洋》、《科学》、《教育研究》等,并向教职员、同学和校外募捐各种书籍。图书室内设成绩展览处,学生最好的作品,也当作图书,永久保存。当时校内订有各种日报,但没有长沙出版的很受欢迎的《通俗教育报》,学友会就特别订了两份,并且做一阅报栏置于校侧大椿桥,校内看完后第二天就贴在上面,以便夜校学生和附近工厂的工人阅读。

一九一七年五月,学校开运动会时,毛泽东担任会场记录,编制《快报》;组织贩卖食品,以所得补贴学友会的经费。那时乒乓球刚刚传入中国。他积极筹措经费,购置球桌球网,放置礼堂、学友会事务室、会客室等处,形成了一时的乒乓热。

每当学友会开全体大会或全体职员会议时,毛泽东照例担任主席。遇有不同主张,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等大家意见发表已尽,他才从容作出总结。某事急办,某事缓办,哪个部门负责,哪个部门配合,有利条件,可能遇到的困难,解决矛盾克服困难之办法,他都能条分缕细、网举目张,斟酌尽善。大家无不乐意接受他的意见,因为这些意见总是符合实际情况和迫切需要的。

一九一七年六月,一师进行过一次人物互选。这是学校考察学生学业与操行,选拔尖子学生的一种办法。考察项目包括

三个方面：（一）德育：敦品（教廉耻、尚气节、慎交游、摒外诱之类），自治（守秩序、重礼节、慎言笑之类），好学（不缺课、勤温习、好参考之类），克己（绝嗜欲、耐劳苦之类），俭仆（菲衣食、尚俭约之类），服务（重公益、勤服务之类）；

（二）体育：胆识（冒险进取、警备非常之类）及卫生、体操、竞技等；

（三）智育：才具（应该有方，办事精细之类），富语（长于演讲、论辩、应对之类）及文学、科学、美育等。

选举世闻名办法是：每票选举一人，各举世闻名所知将考语事实详注票内；每人至多可以投三票。被选举者不以本班为限，要满五票才当选。

全校十一个班（本、预科自第六班至第十五班及第二部第一班）约四百人参加投票，选出二十四名优秀学生，毛泽东得票最多。关于当选考语的细目也以毛泽东为最多，包括敦品、自治、文学、言语、才具、胆识六项。其它当选者所占的细目，最多的只有四项。如具有敦品项目的，除毛泽东外，只有三人；具有才具项目的，除毛泽东外，只有一人；而言语与胆识二项，其它当选者无一具备。

一九一七年十月的一天，在长沙南门外工人聚居区，墙壁上、电线杆上贴出了一种很特别的白话广告，引起了过往行人的注意。在街头显要处，一群人在围观，因后面的人看不见，也有不识字的工人想知道是什么事情，要求前面的人给念一念，于是有人念道：

列位工人来听我们说句白话：列位最不便利的是什么？就是俗话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才能写得几个字，算得几数呢？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校，今



年上半年学生很多，列位中想有听到过的。这个夜学专为列位工人设的，从礼拜一起至礼拜五止，每夜上课两点钟；教的是写信，算账，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若是要来求学的，请赶快于一礼拜内到师范的号房报名。有说时势不好，恐怕犯了戒严的命令，此事我们可以担保，上学以后，每人发听课牌一块，遇到军警查问，说是师范夜学学生就无妨了。

一九一七年上学期，第一师范和附小的教员曾经办过一次夜校，后来没有坚持下去。毛泽东建议，由学友会接办夜校。据《一师校志》记载，毛泽东在学友会开会时列举世闻名四点理由，说明夜校非办不可：第一，依据国家现状，社会中坚力量实是大多数失学的国民即工人和农民；第二，欧美的社会普及教育很有成效，国人虽境遇不同，但人人应有受教育的机会；第三，可做师范三四年级学生实习的场所；第四，可藉以打破社会和学校鸿沟分明、相隔相疑的局面。学友会议定，由教育研究部负责夜校之事。毛泽东兼教育研究部部长，便以极大的热忱投身到这项工作中来。这个很具特色的白话广告就是他写的。除张贴之外，又发动学生带着六百多份广告，到造币厂、电灯公司、铁路工人宿舍等处散发，并向工人们作口头宣传。几天以后，就有一百二十多人来报名，以后由于名额所限，只好截止报名。毛泽东在《夜学日志》上记载当时工人这种迫切要求学习的情形：「如嗷嗷之待哺也。」

夜校课程定有国文、算数、常识三种。《夜学日志》上说：「国文与算术近于技能，常识则近于精神。」国文内容分认字、短文、便条、写信等；算术以珠算为主，稍加笔算。常识包括历史、地理、理科、修身、卫生、实业、政法、经济、教育等。所有各课，都由教员自编讲义；编讲义的原则是少而精，必须同工人的日常生

活有密切的联系。毛泽东亲自担任历史课。《夜学日志》上写下了他的教学指导思想：「教以历代之犬势，及近年关系最巨之事迹；所以粗养其历史的观念及爱国心。（彼等从前从传统及演剧，亦得有许多零碎之事迹，惟无系统的观念及爱国心耳。）」

十一月九日晚上，夜校正式开学，学监主任、代理学友会会长方维夏讲了话。毛泽东将《上课说明书》逐条向学生详细解释。《上课说明书》很周到，非常体贴工人的具体困难，内中有这样两条：「每次上课，衣服听便，不必求好」；「本校已函请警察保护，来往只可放心」（当时南北军在期北正发生战事）。在他的主持下，夜校的大小事情都照料得非常细致而妥贴。例如《夜学日志》十一月十二日上记载着：「课毕由毛泽东报告不可喧扰，宜每次都来上课，三次不到者开缺不补。解手赴赴边厕所。下雨时雨具自置椅下看管。今次有未带笔墨者，下次宜都带来。习字纸带旧书好，下次带来评定甲乙记分等事。」「教室洋油灯四盏，灯在四角，中间颇暗，应添一盏。」

毛泽东随时了解授课进度，了解学生们的接受能力，注意改进。十一月十四日《夜学日志》记载着：「实验三日矣，觉国文似太多太深；太多宜灭其分量，太深宜改用俗语（介乎白话与文言）。常识分量之间嫌太多（指文字），宜少用文字，其讲义宜用白话简单几句标明，初不发给，讲解将终，取讲义略读一遍足矣。本日历史即改用此法，觉悟活泼得多。」物理教员因讲得太多，年纪大的都听不懂，打不起精神来。因此课后，「毛泽东报告，谓物理一科极有趣味，方才所讲不过发端，将来如电灯之所以能明，轮船火车之所以能速，其理必皆告汝等知之。此亦足以引起其追求的兴味，其法大可采也。」（十一月十六日《夜学日志》）学友会派往夜校任课的同学，在毛泽东的热忱感召下各司其职，备尽其责，夜校办得很有起色。

一九一八年上学期，夜校继续开办。毛泽东仍担任「管理」职务。《夜学日志》上仍有他的手迹。为了扩大夜校的社会影响，他特向《通俗教育报》投寄了介绍一师夜校的文章。这年三月十九、二十两日，该报专题介绍一师夜校的概况和教学、管理经验。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时，通过办夜校取得了联系工人的初步经验。学校附近工厂的许多任务人都认识夜校的毛先生，把毛泽东当作他们的好老师、好朋友。未出茅庐，毛泽东的影响已越出校园，走向社会了。

辛亥革命以后，军阀混战，南北对峙，湖南当军事之冲。北洋军阀企图盘据湖南为制服两广的基础，南方军阀则以湖南为北进阵地。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学习期间，湖南先后为北洋军阀汤芑铭、傅良佐、张敬尧所统治，成为南北军阀长期拉锯的战场。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想做皇帝。湖南督军汤芑铭上表劝进，禁止湘省舆论界发表反对帝制的文章，违者以「乱党」治罪。长沙知识界，包括一师的进步教师徐特立、杨昌济、方维夏、袁仲谦等，都缄口束手，一时想不出对策。独毛泽东想出妙招，他以学友会的名义，把汤化龙（参议院议长）、梁启超等社会名流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文章编辑成小册子，题为《汤化龙、梁启超等先生对时局之主张》翻印出版，到处散发。长沙社会人心因此大为振奋。由于这件事，汤芑铭派大批军警到一师检查，学生的行李、书籍都被搜遍了，由于早有准备，没有查到什么「乱党」的痕迹。这种「述面不作」的方法，使汤芑铭抓不到把柄，因为在长沙谁也没写反对帝制的文章，要办你去办汤化龙和梁启超。教师和学生们都称赞毛泽东斗争手段之巧妙。由于误传忘年之交的老师黎锦熙要到袁世凯政府去做官，毛泽东于一九一五年十一月致函在京的黎氏，信中写道：「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

人了此大危，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也。」

一九一五年初，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作为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条件。一月十八日，日本新任驻华公使日置益会见袁世凯，当面递交「二十一条」，重申「改共和为帝制，是中国的内政总是，袁大总统可以放心进行。」二月二日，外交部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与日置益开始谈判。三月十四日，日本增派军队三万人来华，压迫袁政府就范。

中日谈判是在极端秘密中进行的，但是日本调兵遣将以及袁政府忙乱应付的迹象，无法隐瞒。不久，就由外国报纸将日本的「二十一条」公布出来。条件共有五项：第一项关于日本在山东的特殊权利共四条；第二项关于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共七条；第三项关于日本在汉冶萍的特殊权利共两条；第四项关于中国全国领土之件一条；第五项关于中日合办企业之件共七条。这些条件包括允许日人在中国开矿、筑路、设厂，日本国民得自由进入中国，中国政府须聘用日本顾问及专家等。根据这些条件，不仅为日本吞并满蒙提供了充分条件，而且日本将在中国取得政治、军事、财政的监督权，取得控制警察的权利及军火垄断权，其势力伸展到长江流域和福建省，第一步把中国变为日本的「保护国」，第二步实现日本吞并中国的计划。

五月七日，日本政府向袁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于五月九日午后六时以前对日本所提出修正案作满意之答复，否则帝国政府将采取必要之手段。袁世凯急于登上皇帝宝座，于八日下午全盘接受日本修正案。二十五日，外交总长陆徵祥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北京签定《中日二十一条条件及换文》。

消息传出，全国鼎沸。各人民团体规定五月九日为国民纪念日。上海市民在九亩地举行国民大会，被军警制止，并拘捕代表数人。北京新华茶馆店主马麟痛心国事，跑到中央公园持刀

自杀，被人救下，复截去右手食指，以警国人。长沙两青年为尤心国之将亡，一投湘江自杀，一由天心阁跳下自杀。毛泽东读报至此，拍案长叹，愤激莫名，挥笔写道：「五月七日，民国奇心。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毛泽东对日本的认识，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展望，亦有独到过人之处，不仅超过了一般知识分子而且超过了一般的政治家：甚至像孙中山先生这样的大政治家，在对日关系问题上，都没有这个韶山青年看得深，看得透。有一九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致萧子升（即日萧瑜、萧旭东）的信为证：此约（按：指日俄协约）业已成立。两国各尊重在满蒙之权利外，俄让长春、滨江间铁路及松花江航权，而日助俄以枪械、弹药战争之物。今所明布尤轻，其重且要者，密之不令人见也。大隈阁（按：指当时日本以大隈重信为首相之内阁）有动摇之说，然无认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我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掇去，则入河南矣！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吾之内情，彼尽知之，而吾人有不知者；彼之内状，吾人寡有知者焉。吾顾足下看报，注意情况。

直到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孙中山《致犬养毅书》中，认为在未来战争中，「在欧洲则苏俄独为受屈者之中坚，英法为横暴者之主干，在亚洲则印度、中国为受屈者之中坚，而横暴者之主干亦同为英法，而美国或为横暴者之同盟，或为中立，而必不为受屈者之友朋，则可断言也。唯日本则尚在不可知之数，其为受屈者之友乎？抑为受屈者之敌乎？吾将以先生之志能否行于山本之内阁而定之」。

孙中山认为，侵略中国的未来敌人是英法，美国或助敌或中立，日本是友是敌还看不清楚。毛泽东则明确指出：「日人诚我国劲敌。」「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这些话都被历史证实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一九三七年——毛预言的第二十一年，爆发了卢沟桥事变，日本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段祺瑞委任的湖南督军傅良佐被两广护国军总司令谭浩明赶走了。在傅去而谭未来之时，长沙成了无政府状态，一夕数惊。第一师范原拟组织师生到城东五里的阿弥岭避乱，毛泽东独具识见，力言留校可保安全，离校则有危险。因为在学校，学生的身份是明确的，南北军各以对方为敌人，双方都不会跟学生过不去；倘离开学校进山，失去了学生身份，集数百「壮丁」在一起，倒有被抓丁拉夫，或被当「散兵游勇」遭到攻击的危险。师生们听他说的有理，就留下来。毛泽东在大事面前有胆有识，他当过兵，又是学友会的领导人，受大家推举，领导全校学生自愿军，书夜巡罗，保护学校。一天，溃兵三、四千人，在学校南面十公里处的猴子石徘徊（那是一块灰色的巨石，状如猿猴，遂为地名）。他们不知长沙虎宝，不敢冒然入城。他们打了败仗，入城的目的很明确：抢，发个洋财回家。假如他们入城，长沙要是糜的。如醴陵，在这次南北军战争中，「房屋八千被毁，及公署、教堂，尽付一炬。居民惨死数千人。又复连日迫烧乡村房屋数千栋。火势半月不熄。奸淫掳掠，至不忍闻。」（《湘灾纪略》湖南善后协会编，一九一九年出版）为保护学校，维持地方，毛泽东顿生奇计，他组织学生自愿军中百余人。拿着上操的木枪，占领了猴子石附近的几个山头，对溃兵形成包围之势。早已联络好附近的警察分所，利用他们的几支真家伙，扼守妙高峰制高点。溃兵在暮色中慢慢蠕动，试探着向长沙南门靠



近,当接近妙高峰时,毛泽东下令在山头的警察鸣枪。子弹从溃兵头上呼啸而过,溃兵本能地卧倒;占领附近山头的学生自愿军拿出济阳产的花炮来,劈劈叭叭,四处「枪」声,同时学生们齐声呼喊:「傅良佐逃走了,桂军已经入城,你们快缴枪吧!」溃兵又饿又累,脱离了大部队,料难冲出包围圈,几个军官商量了一下,表示在保证他们安全的条件下愿意缴枪,经查询,他们属于北洋军第八师。师长正当贤和其它高级军官已不知去向。毛泽东派人把他们引到第一师范前坪,亲自喊口令,让溃兵整队看齐,入下武器,向后转,齐步走。学生们把两千多支步枪搬进礼堂。当晚,安排这些溃兵吃饭,在学校前坪露宿。毛泽和警察分所所长带着几个人荷枪实弹,在校园执勤,警备非常。虽说「空城计」胜利了,也是提心吊胆地过了一夜。天一亮,毛泽东派人到商会交涉,商会闻说,称赞「一师」学生功德无量。答应给每个溃兵发四块银元。领钱后立即回家,不得在长沙停留。就这样有条不紊地把三四千溃兵遣散了。事后,学校师生们说:「毛泽东浑身是胆量!」班上同学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毛奇」。毛奇是普鲁士一代名将。这个绰号包含着对毛泽东的推崇和薄敬。

毛泽东的同学和亲友萧子升,后来走上了与毛泽东不同的政治道路。一九二六年他在北京政府教育部任事,当时的教育总长就是湖南湘潭人杨度。两人说起毛泽东。

「子升,你最好当心点。人们说你有共产党的倾向,在大学里,据说你常常称赞共产党的学生。不过,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你是毛泽东的好友,又常听到你说他为人有他的长处。你好象不断地为他捧场似的。」杨度边警告边询问。

「谢谢你的忠告。」萧子升说:「不错,毛泽东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我决不会成为共产党员。」「古人说‘祸从口出’。这年头,还是少说为妙。当然,在你我之间,我们可以无话不谈。告

诉我,你对毛泽东这个家伙的看法究竟如何?他是否具有真正的才分?」

萧子升说:「谁是天才?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就我所知,第一、毛泽东对他所从事的任何事情都肯花功夫去精心规划,他是杰出的谋略家和组织者。第二、他对敌人的力量估计得异常准确。第三、他可以催眠的群众。他确实有惊人的说服力,很少人能不受他说话的影响。假定你同意了他的说法,就是他的朋友;否则就是他的敌人,就是这样简单。我在很久之前就已经了解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假定你说有天份。那么他就是天才;张献忠和李自成这两个流寇头头也都是天才。他们的天份是类似的。同样,刘邦和刘秀这两位汉朝的皇帝也是成功的人;可是,假定他们的运气差一点,那么他们也就成为了强盗了。」

萧子升对青年毛泽东的三点评论,态度是坦诚的,结论是中肯的。萧半生在国民党政府做官,后来在海外教学和著述,从未回过大陆。出人意料的是,为袁世凯做皇帝大造舆论的「筹安会」发起人、警告萧子升不要当共产党的杨度,一九二九年参加了共产党,成了毛泽东的同志。周恩来在他觉得自己不久于人世的时候,特意把编纂《辞海》的负责人王冶秋找来,说明杨度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在白色恐怖下为党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在介绍杨度的辞条中应加以说明,传诸后世。

## 05 斯文行乞 怪学士漫游州县 萍水相逢 奇女子预卜流年

萧子升公正、客观地评价青年毛泽东，我们也应该公正、客观地评价青年萧子升。在第一师范萧子升是一个聪慧过人、品学兼优的学生，文章高手，兼擅诗词，尤其写得一手好字，左手亦能书，待人以敬，交游甚广。毛泽东和萧子升曾作彻夜之谈，探讨人生和国事，又常漫步湘江之畔，联句唱合。萧子升于一九一五年毕业离开第一师范，应聘到楚怡中学任国文教员，与毛泽东的友谊继续保持着。

一九一七年暑假，萧子升提议出去作游学式的旅行，毛泽东大感兴趣，说：「当年司马迁览潇湘，登会稽，历昆仑，周游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岂徒观览山水而已哉！我们也学太史公。」遂结伴同游。这种游学，实即行乞，是旧社会的穷秀才不辱斯文的一种讨饭吃的形式。其具体做法是每到一地，见生意兴隆的店铺或殷实富裕的人家，作一副含着祝福颂扬寓意的对联，用红纸书就，送上门去。主人就会招待吃一顿饭，甚至留宿过夜，临走还要帮助少许路费。毛泽东和萧子升出游，是想求书本以外的知识，到社会大学学习。

一个美丽的夏日，毛泽东带一把雨伞和一个小包袱，穿作学校发的已经破旧的自制服，赶到了楚怡中学。已做了教员的萧子升也脱掉长衫，改穿裤褂和布鞋，并剪掉了分头，和毛泽东一

样剃成光头。带的东西也是一把雨伞、一个包袱。湖南雨多，雨伞是出门必备的东西。他们和一般叫化子不同点，是包袱里带着文房四宝和《诗的集成》以便有灵感时作出诗联句。打点停当，把包袱在伞杆的一端，将伞抬在右肩上，而包袱则靠近脊背，使重量分配比较匀称，这样背起来轻松些。出大门的时候门房老庐露出惊异神色，萧子升作了一番解释，并嘱咐有信件请代为保存；然后，萧在前，毛在后，一起上路了。

他们坐船渡过了湘江。因为付不出船钱，船夫又不肯通融，和船夫吵了一架；船夫尽管很恼火，也拿他们无可奈何。上岸以后，他们沿着大路朝宁乡县城走。一边走着，一边谈论各种有趣的事情。但见稻浪起伏，竹影波娑，湖南山区的景致是很令人心醉的。他们没有表，走到太阳偏西，知道是到了下午了，大约走出十五到二十公里的样子，见路边有一小吃店，树阴下空着两把竹椅，二人休息了一下，女店主见他们满头大汗，疲劳不堪，但并不要荷点，知道他们身上无钱，好心地送他们两杯茶喝，声明并不要钱。他们见女店主本小利微，也不好意思提吃饭的问题。「你知道就近有读书的人家吗」？毛泽东问女店主。「有的。店子后面的小山坡上，住着一位姓刘的绅士，他是一位翰林，现已告老在家。他没有儿子，但有几个女儿，都已经出嫁了。」女店主的回答使二位穷客人很满意。「润之」，萧子升已成竹在胸，他嚷道：「刘先生‘要成为我们今天的东道了！我们第一个目标就应该向他进攻。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写一首诗送给他，用象征的语言表示我们拜访他的用意。」「好主意！」毛泽东表示赞同：「诗的第一句可以这样写：翻山渡水之名郡，」「竹仗草履竭学尊。」萧子升联上，并照联句的规矩说出了第三句：「途见白云如晶海，」「沾衣晨浸饿身。」毛泽东结束了全诗，并说：「我们马上去看他，看他究竟是怎样一位学者。」

萧子升打开包袱，取出文房四宝，尽力用最佳的书法把那首拜谒诗写好，两人分别签自己的真名。然后把诗装入信封，上书「刘翰林台启」。

二人谢过女店主，绕过店后的小山坡，看见一座白房子。一道长长的围墙，上面覆盖着一色黑瓦，看起来就像城墙一样。围墙前面有一个水塘，水面上满是高低错落的荷叶和亭亭玉立的荷花。来到庄院的跟前，见两扇黑漆大门，红色门心，右书：「照人秋月」，左书：「惠我春风」。这虽然是刘翰林的手笔。叩门之后犬吠声声，一个老仆走出来。毛泽东说明来意：「我们是从省城来的，替刘翰林带来一封书信。」并从门缝课把信递进去。老仆让稍候，他们就坐在石阶上等着。等了好一阵子，老仆才转回，把大门打开，说声「少爷，请进。」老仆把两位客人带进书房。少顷，刘翰林出来了。他年在七十已往，背微驼，已谢顶，白鬓稀疏只剩下几根了，着白长衫，手持一把绢扇，略带惊疑打量二位不速之客，毛萧二人向老者深深鞠了一躬，坐下叙话。

「你们为什么穿成这个样子？遇到什么意外了吗？」刘翰林问。

「没有，我们没有遇到什么麻烦。」毛泽东回答。

「你们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呀？」

「我们从长沙来，打算到宁乡县城去。」这回是萧子升回答。

「你们在长沙做什么事呀？」

「我们是省城的学生。」毛泽东说。

「你们或许是在哪个洋学堂念书的吧？我明白了，你们也会作诗。你们作得很好，书法也很不错。」刘翰林夸奖了他们的诗和书法，就表示要接待这两个读书人了。

「我们在学堂里不仅要学作诗，并且还要研究古书呢。」萧子升想从这里找寻共同语言。

「噢，你们还研究古书，什么古书呀？」果然提起了翰林的兴趣。

毛泽东回答：「读过《十三经》、《老子》和庄子。」

老人甚为高兴，问道：「你们既然研究过《老子》和《庄子》，对这两部书你们认为谁的注最好呀？」

萧子升回答：「最好的老子注是王弼的，最好的《庄子》注则是郭象的。」

「非常正确，我同意。你们家乡在哪里？」

「我的朋友毛泽东是湘潭人，我是湘乡人，但是住在和湘潭交界的地方，事实上我们彼此相距不远。」

「曾国藩就是湘乡人。」曾国藩是湖南读书人的骄傲，刘翰林不由地提起了曾国藩。

萧子升机警的接着说：「是的，我的高祖曾在曾在曾国藩家里当过塾师。」

「他既然在曾家教书，那一定是出色的学者了。请你们稍等一会。」客人猜想是叫他们等着吃饭。呆了片刻，刘翰林面带笑容走出来，一抬宽大的衣袖，露出了一个红纸包，二人明白，这是打发他们走了，申谢之后，即行告辞。

出得门来，打开一数，是四十个铜元。于是他们又回到了女店主那里，叫了饭菜，狼吞虎咽地吃饱，二人才花去八个铜元，还有二十二枚足够生活两天了。

当晚宿在一个小客店里。天亮上路，走了大半天，来到宁乡县城，在同学王熙家落脚。王熙和家人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第二天，由王熙陪同，游览了「楚沔第一景」宁乡香山寺，还拜访了宁乡动学所所长当地宿儒余士龙。然后，他们辞别王熙，出城西行，登回龙山，游白云寺。方丈善待他们，招待食宿之外，临走还给了几块光洋作盘缠。又走了一整天，直到明月当空，才找到沙



田杓子冲何叔衡家。

何家是典型的耕读之家。何叔衡做小学教员，父亲和弟弟在田间劳作，是自给自足的自耕农。每年收的稻谷，供全家食用面有余，自己养猪、养鸡，池塘里养鱼养鸭，边角地里种些蔬菜，并种一些胡麻，作为纺织之用，只需再买一些棉花，就万事俱备了。

毛泽东，萧子升的到来，何叔衡全家非常高兴。第二天中午正式设宴款待。何叔衡的弟弟拿来一瓶酒，刚从池塘打上来的鲜鱼，宰了几只鸡，园子里刚摘下来的蔬菜，还切了一些腊肉，就是农家的条件来说，备极农盛。

萧子升说：「这太叨扰了。你们实在不应该这样破费。你知道，我们现在还过着叫化子的生活呢。」何叔衡不解：「你们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们是作一个试验。打算走得越远越好，身上却分文不带。我们要像叫化子一样生活。」毛泽东作了这样一个不能令主人满意的解释。

大家边谈边吃。何老先生‘劝酒说：「你们两位都是学者，并且都是叔衡的好友。你们是我家的贵客，怎么能说你们叫化子呢？」老人以为几个青年人在说笑话，这样正式确定了来客的身份。从此，在何家谁也不再提做叫化子的事了。

何家盛情难却，他们住了三天，继续执行叫化子计划。何叔衡送客十里长亭，才握别归去。这天他们运气不佳，讨了三天，才把肚子填饱。傍晚到了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这里有玉潭和狮固山，是小有名气的风景区。二人坐在河边休息，观赏这里的景色。

「云封狮固楼，」萧子升远望山上云霞飘浮，出个上联。

「桥镇玉潭舟。」毛泽东见一座石桥横卧水面，桥下是一个泊岸的码头，几只小船停在那里，见景生情地对上了下联。二人

相视而笑。

新的一天开始了。经商议,他们决定往洸山一游。洸山上有一座建于唐代的古刹密印寺。行十公里,西行翻过一座山丘,又一到了中午了。一家姓王的老夫妇接待了他们,供应他们米饭蔬菜而管饱。饭后闲谈,知道姓王的老者在县衙谦让当过狱卒。

「我想你在衙门里当差,也得到不少钱吧。」毛泽东开始了他的社会调查。

「不过一点零用钱,和县太爷所得的不可以道里计;他审了一个案子,满脑子想的是钱,谁给钱多谁就能把官司打赢。」老王头回答。

「难道县太爷不怕别人告发?输家到省城告他一状怎么办呢?」毛泽东又问。

「他倒不在乎!」王老头解释道:「在省城打官司比在县里花费更我我,如果没有更多的钱去行贿,在省里就更没有打赢官司的希望。总之官官相护是尽人皆知的。」

「真是不成体统!」毛泽东愤愤然。

辞别善待他们的王氏夫妇,黄昏时分,他们到远洸山。密印寺真是佛门圣地,普渡众生。看和尚听他们说明来意,回答说:「拜佛和行乞本来就是一回事。」热烈欢迎他们,并带他们去沐浴。然后,拜谒方丈。方丈慈眉善目,五十开外,在堆满经卷的房子里用极婉转的口吻,动这两个青年人皈依佛门。老和尚头然误会了。两个年青人礼貌地听着。

「请问方丈,庙里的僧人有多少?」毛泽东抓住时机,扭转谈锋。

「约莫百余和尚属于本寺。但经常有来自远方的挂单和尚。因此,庙里常常用三四人之多。那些挂单和尚通常住几天

便离去了。从前最多住过八百人,但那是在我主持本寺以前的事了。」老僧笑着回答。

「数千里之外的和尚,为什么会跑到这里来呢?」毛泽东又问。

「他们是来听经传道的。本寺方丈向以说法著名。这里庙产其豆,招待挂单和尚停留数日,并无困难。全国僧人多数知道这个地方。和尚是出家人,四海为家,相互谈经论道,彼此都能得到启发。」方丈耐心解说。

「请问全国有多少和尚?」萧子升问道。

「这倒没有确切数字。除了蒙古和西藏之外,中原地区大概有数万人。蒙古和西藏僧人所估比重甚大,把他们加在一起,为数约百万,或者更多些。」方丈回答。

二人又问了庙里的组织系统,和尚们的分工等他们感兴趣的问题。然后,方丈招待共进斋饭。在下层僧人看来,这是极大的礼遇。

在寺庙住了一夜,接触了一些年青的和尚,和尚请他们题字留诗,他们都一一照办了。有一个名叫法一的小和尚,才十五岁,会背诵唐诗,字也写得挺好;但不知自己的真名实姓,也可能根本没有俗名,他是一岁被送到庙里来的。第二天破晓,法一送他们下山,依依而别。到了山下,行不远,见一巨石横卧,松如华盖,毛泽东提议在此小憩,把访问的心得写在日记上。

又走了一天的路,来到安化县境内。天黑下来了,四顾茫茫,离前边的村落还远。他们决定在河边的沙滩上过夜。明月皎洁,暑热全消,别有一番情趣。

天亮继续前进。走了约一个钟头,地势渐渐高起来。忽见前面山脚下有一凉亭,亭内置一长橙,二人坐下来休息。萧子升举目一望,山顶有一小庙,就顺着羊肠小道爬上去,见庙非常之

小,宽仅三五尺,高不过七尺,正中供一尊石像,并无匾额碑刻。他取出笔墨,在白墙上题写「远大」二字。下来后,毛泽东问是座什么庙?萧子升说:「不知道庙的名字;但山顶空旷,极目远眺,一望无际。我在墙壁上写下了‘远大’两个字。」

离开凉亭,又走了一段,山中不见有人家,只好向一个开工休馆的老板娘乞食。老板娘很大方,给他们每人端来一大碗米饭。「刚过来的那座小庙叫什么名字?」萧子升向后指着询问。「那是刘邦庙。」年轻的老板娘信口而答。

毛泽东沉思片刻,说道:「刘邦是汉朝第一个皇帝的名字。他不是这里的人,甚至他生前是否巡游过这一地区也成疑问。因此,我实在想不出这庙为什么要取他的名字。」毛泽东既是问他的同伴,又是问女店主。

「我的确不知道。」女店主说:「我在安化县城出生,在那里结婚,搬到这里才两年时间,对本地的事情实在知道得太少。」

这时女店主的丈夫来了,听见了关于刘邦的问答,主动作了些补充:「这座小庙为什么会取名刘邦庙,我们并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有人说是纪念刘邦皇帝,又有人说是幻念同名的另外一个人。听说很多年以前,有一个人生了病,病愈来愈重,快要死了。后来有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叫刘邦的人,给他开了一个药方,他醒来之后,但叫儿子照方抓药,煎服之后,病真的好转了。为了纪念他梦见的那个刘邦,于是便捐钱修了这座庙。」

向店家夫妇致谢之后,起包袱和雨伞,他们又踏上了漫游之路,一路上,刘邦皇帝便成了他们谈话的题目。「刘邦是历史上第一个平民做皇帝的,我认为他应该称得上是一个大英雄!」毛泽东摆出自己的观点。

萧子升表示不同意:「他是一个坏人。他只不过是一个怀有政治野心的成功者罢了。也许他开始并不坏,然而因为政治

野心的增长,终于使他心地卑劣,理想愈来愈淡,人格也开始堕落,于是他便成了一个坏人。」

「刘邦至少也算得是平民革命者,他成功地推翻了秦的暴政。」毛泽东让了一小步,但不同意说刘邦坏。「是的,他推翻了暴政,然而他自己却制造出另一种暴政。秦被推翻,汉取代了它的政权,又有什么区别呢?两者都是坏东西。」萧子升继续作他的刘邦坏的文章。

毛泽东不想简单地抬杠,他略为思忖了一下,反驳说:「你认为刘邦控制了全国之后,他应该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吗?」可是,在两千多年以前,哪里会有人想到民主共和这类事情。那个时代,他是不可能认识民主制度的。

萧子升也觉得需要充实说刘邦的论据,作新的答辩:「刘邦是个奸诈而无情的人。你记得他的很多朋友和将军为他打天下出生入死,在他做了皇帝之后,这些人也都成了独当一面的领袖人物,刘邦害怕这些人会篡夺他的天下,于是设计种种计谋把他们杀掉。你记得,在这些人之中,有的是被乱刀分尸,诛灭九族的吗?他心里藏刀,实在是非常残酷的坏人。」

「可是,假定他不杀他们的话,他的江山就不会稳固,而他本人的皇位多半不会长久。」为了求得某种共识,毛泽东笑着说:「现在我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刘邦对你的祖先是非常客气的,他把你的祖先萧何对为公卿之首的宰相。」

「是的。」萧子升表示同意。但又接着说:「那是因为我的祖先不是一个军人。假定他是军人的话,早在做宰相之前必然也会像韩信、彭越一样,被砍成肉块了。萧何只是对法律和文化有兴趣,因而,不会对刘邦的皇位构成威胁。」

「他对张良也不坏呀!」毛泽东又举出一个得到刘邦宽容的人。「那么,张良为什么修道去了呢? ……」

二人一边高谈阔论，一边信步而行，又见红日西沉，到了解决吃饭、睡觉问题的时候了。经过了这几天的跋涉、到达安化县城。他们昂然进了一家茶馆，拣了靠近窗子的一张方桌坐下，要了茶和早餐，但身上一文钱也没有了。肚子填饱以后，萧子升让毛泽东坐在那里写日记，他出去想想办法。安化对他们实在不友好，萧子升走了两条街，只讨到二十一文钱，十个制钱合一个铜元，他们这顿荷饭，总要七八个铜元，讨小钱的办法看来出不了茶馆了。二人商量的结果，还是得当「送字先生」，‘毛译东磨墨，萧子升卖回两张红纸。这种纸一公尺半长，三十公分宽，一分为二，恰是两副对联的材料，萧子升留神记下了几家大店铺的字号，把字号安排在对联的头一个字，这样竖看是对联，横看有店家的实号。因为把字号写在对联里了，店主是不好意思拒绝的，并且要给优厚一点的馈赠。送了两家都被接受了，得了十个铜元，会饭账绰绰有余了。又给一家茶庄送去，得了二十个铜元，连明天的伙食费也有了。他们下一个目标是益阳县，一路上海阔天空的谈着，话题一转，谈到了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毛泽东说：「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这样的政府一旦建立起来，人民也就可以组织起来了。」

萧子升反驳道：「但是，如果政府过于强大，那么，人民的自由就要受到损害。那情形好象是人民变成了羊群，而政府而成了牧人。那是不应该有的制度。人民应该是主人，政府只应该做他们的仆人！不过，所有的政府都毫无疑问的想做牧人或主人。」

「不过，我的确认为人民是羊群，《管子》里讲‘牧民’是有道理的。非常明确，政府一定要充任牧羊人的角色。假定没有牧人，由谁来保护羊群呢？」毛泽东发挥他的观点。「假定羊由人来管，那就意味着他们已经失去自由了。他们生活在牧人的慈



悲之下,全无自由可言。牧人对他们可以生杀予夺。所留给他们的唯一事情只是吃饭、工作和睡眠,他们为什么还要牧人呢?」说到这里,萧子升看见前面山坡上几头牛在吃草,就借题说:「润之,你看,他们不是很快乐吗?他们需要更好的组织吗?」这是,手持长鞭的牧人来了,安静卧在那里的牛立刻站立起来,那些本来站着的牛则开始奔跑。牧人想赶他们回家;但这些牛老是走不到一个方向上去。「你看到牧人对畜牲的效果了吗?他一到这里,那些牛就立刻生活在恐怖之中。」

毛泽东果断地回答道:「牛必须加以管制!不然他们走不到一个方向上去。牧人手里有一条鞭子,他必须用来鞭策他们。这个牧人太软弱无能了。」两人的观点表达得都很清楚了。萧子升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毛泽东则满脑子英雄史观。

来到益阳,因为以乞丐的身份求见县长,跟县政府的门房和卫兵几乎冲突起来;后来,虽然原第一师范化学教员、现在当了益阳县长的张康锋待他们为上宾,但他们心中的不快久久拂之不去。在益阳停留三天,看了一师毕业在益阳工作的其它六位校友,然后,踏上了去沅江的道路。

一天傍晚,他们在一家小店停下来,准备吃晚饭,并在这里过夜。一个美丽的姑娘,姓胡,名茹英,过来招呼他们:「二位先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呀。」

「我们来自益阳县。」毛泽东回答。

「但是你却没有益阳的口音呢?」如英说。毛泽东只好报藉贯:「我是湘潭县人,我的朋友是湘乡县人。」「唉呀!」茹英以女子惯用的惊叹叫了一声:「那地方距离这里很远呀!你们到哪里去呢?」毛泽东说:「从湘潭到这里有二百多里。我们就是要在湖南全省到处逛逛,我们是乞丐,乞丐旅行是没有一定目的的。」

茹英听了，眼睛睁得好大，然后放声大笑起来：「这怎么可能，你们这样斯文，怎么会是叫化子呢！」

萧子升证实朋友的话：「我们何必骗你呢。我们从长沙一路步行到你这个旅店，一直都是叫化子。」茹英仍然不信，还显得有点生气，意思是不该开这样的玩笑。毛泽东说：「为什么你就是不信呢？」

「简单的很，就是据我看来你们绝不是叫化子。」茹英充满了自信。

萧子升问她：「难道乞丐还有什么特征吗？」

她凝神注视着两位客人，说道：「我知道你们两位都是了不起的人物。」

「什么是了不起的人物？难道你会看相吗？」萧子升反守为攻，成了提出问题的一方。

茹英点点头说：「是的，看相，我确是懂得一点，并且还会测字，能卜凶问吉，这是我爷爷教我的。我爷爷是诗人，出版过一本集子，叫《桃园曲》；我父亲也是一位学者，但他们在三年之间先后去世了，只剩下母亲和我孤伶伶的这个世界上。因为生计无着，所以开了这个小店。」

「你说你懂得看相，可以给我们看看吗？」毛泽东为谈话内容所吸引，把饥饿也忘记了。

她迟疑了一阵，然后回答说：「好的，如果你们愿意我可以看，但假如我说错了，你们不要介意。」

只听后面传来老太太的声音：「茹英，不要胡闹了，你不怕得罪贵客吗？」

但毛泽东坚持要看：「我们毫不介意，请你照实说吧，你看出什么来，就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绝不生气就是。」「那么，好的，首先请你们告诉我贵姓。」「我姓毛，我的朋友姓萧」。「啊呀！

毛先生，你的姓不大好呢！洪秀全叫长毛，袁世凯叫毛猴子（注：袁猿同音），你也姓毛，糟糕，糟糕。」

毛泽东一阵沮丧：「我的姓跟我的长相有什么关系呢？你是要给我看相，而不是批评我的姓氏呀！」

茹英答道：「你的姓大有关系了。从你的脸相来看，你可以要做大官，做国务总理，或者做山大王。但从你的姓来说，你可能要成为洪秀全或袁世凯那样的人。你自视轻高，野心勃勃，但你没有半点温情！你可以不动声色地杀一万人或十万人。不过你很能沉得住气。如果在三十五岁以前，不给敌人杀死，那你就逃过了一个大关，而一过五十，你的日子更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在五十五岁左右，简直是逢凶化吉，万事亨通。你最少要有六个老婆，但儿女不多。可以看得出来，你跟家庭之间不大合得来，你不会一直住在乡下，你也不会有个固定的家庭。」

毛泽东听了非常有趣，更无半点不快之感，等她说完，就接口说：「好了，现在请你给萧先生看看吧。」

茹英转过头，眼睛盯着萧子升，说道：「萧先生，你的长相跟你的朋友完全不同。你让我想到道家，你有一种隐者的气质。看来你不属于世俗中人——真像仙人下凡一样呢。你是很有情感的人，和毛先生比起来，他像一杯烈酒，你却像一杯清水，我看得出来，你一生一定在流浪中度过，而你走的愈远，就愈会……」

萧子升打断她的话，插嘴道：「我也会六个老婆吗？」

「不，你将结婚两次，却只有一个螟蛉义子，因为隐士是既不需要家庭，也不需要儿子的……」

这是一次奇遇。看相算命当然是无稽之谈，有趣得是，有些事情竟被她说中了。

第二天早晨，吃过早饭之后，萧子升找茹英结账告辞，茹英

坚持不收食宿费。萧子升说：「我们记住你的姓名，假如有一天毛先生‘做了国务总理，或者山大王，说不定他会写信给你，邀你做他的顾问哩！」

茹英大笑，说：「但他是个没有温情的人呀！那时候他会完全把我忘记；连我的影子也忘得一干二净了。」告别了那位有些神秘的姑娘，他们来到沅江县城。这个洞庭湖边的小城，全被水淹了。当地人说，这是西水，每年夏天总要来的。因为长江发源于高山地带，春夏之交冰雪融化，澎湃的洪水便从上游滚滚流下。洪水一到就浸满全城的街道，四五天之后，水位增高，一切与外界的交通都告断绝。在这种情形之下，二人商量，结束冒险生活，搭船返回长沙。在船上，毛泽东说：「社会上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势利小人，都是灵云齷齪的拜金者！他们所思所想的只是金钱！我们离开长沙时，一个子儿也没有，听了很多刻薄的话，都看不起叫化子。」萧子升打趣道：「不要忘记那个俏姐，那个擅于看相、说你将来大福大贵的俏姐，她就不是拜金的人。」毛泽东表示同意：「对，在我们整个旅途中，只有她不是拜金的人。」

下船后，他们又来到了出发过摆渡的地方，萧子升提议：「润之，我们下去找找那个同我们吵过一架的船夫吧，我们现在有钱了，欠他多少，便给他多少。」

「我不同意」毛泽东说：「因为我们曾经向他说过，我们回镇会付钱，但他拒绝我们的建议；现在，我们再也没有义务去付钱了，因为他没有接受我们的许诺。」

在西门内有一家照像馆，他们拍了一张合影，毛泽东在左，萧子升在右，短发，短裤，草鞋，雨伞搭在右肩，背着包袱，保持风尘扑一扑的样子。

## 06 组建学会 为担大任寻同志 送友出洋 相约异地求真知

新民学会是毛泽东从事政党活动的预科学校。

在第一师范读书期间，逐渐地在毛泽东周围集聚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不追求个人名利，藐视军阀权贵，充满了为国家、为民族献身的精神。这批人成了新民学会的骨干。

这批人中最终先生‘了共产主义道路，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壮烈牺牲的有何叔衡、蔡和森、陈昌、罗学瓚、张昆弟、向警予、郭亮、夏曦等。

何叔衡（一八七六一九三五），字瞻蛄，湖南宁乡人。早年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在长沙楚怡小学教书。毛泽东组织新民学会时，他是会员中最年长的，已经四十二岁了。他待人赤诚可热心，做事最肯出力，是新民学会主要领导人之一。毛泽东对何叔衡的评语是：「叔翁做事可当大局，非学问之人，乃做事之人。」毛泽东在湖南的早期活动中，何叔衡是他的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会员们说：「毛润之所谋，何胡子所趋，何胡子所断，毛润之所赞。」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后，任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主办《湖南通俗报》。次年八月，协助毛泽东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和留俄勤工俭学。一九二一年七月，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中共的创始人之一。后回

长沙协助毛泽东从事建党工作，任中共湘区委员会组织委员，并兼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和湘江中学校长。大革命失败以后，在上海任互济会书记。一九二八年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三〇年回国，继续在上海主持互济会工作。一九三一年，他的两个女儿和两个女婿先后在上海和湖南被捕，大女婿在长沙就义。同年，中共中央决定他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工作，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工农监察委员、最高法院院长和内务委员等职。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中共时期，他因属毛派受到排斥打击。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长征时，他被留下坚持斗争。一九三五年二月，留守部队撤出江西向福建转移时，与瞿秋白等被国民党军队包围，此时他已年近六旬，坚决不作俘虏，在长江水口附近跳岸殉难。

蔡和森(一八九五—一九三一)，字林彬，湖南湘乡人。早年在湖南第一师范、高等师范读书。一九一八年与毛泽东等发起组织新民学会。同年六月去北京，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后带领母亲、妹妹和一批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一年在法国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中央工作。一九二二年起，任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主编。一九二四年参加创办上海大学，讲授社会进化史。一九二五年五月参与领导了「五卅」运动。同年去苏联，出席共产党国际第五届执委会，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一九二七年三月回国，在中共中央工作，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作斗争。「八七」会议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至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并被选为第五届、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二九年初又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次年回国。一九三一年任中共中央代表，去香港



领导恢复广东省委的工作；是年六月，因叛徒出卖，被港英当局逮捕，引渡到广州，在监狱里和法庭上，他极其坚强和英勇。国民党当局的刽子手况残忍把他四肢摊开，钉在十字架上，用刺刀戳烂他的胸膛。蔡和森受尽酷刑，只承认是共产党员，不失气节，壮烈牺牲。

陈昌(一八九四—一九三〇)字章甫，湖南浏阳人。一九一一年考入长沙第一师范，学习勤奋，生活朴素。以「赴义恐后，争利莫先」自律和动人。长于演讲，曾任学友会雄辩部部长。一九一五年毕业后，到长沙县五美高小任地理教师。一九一七年回到长沙一师附小任教。是新民学会的骨干分子之一。中共「一大」后，毛泽东回湖南建党，他是第一批入党的党员。一九二二年以后成为湖南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常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说。一九二六年，受中共湖南省委派遭到水口山铅锌矿工作，任工会主任。在水口山发动群众，整顿组织，成立工人纠察队，举办工人训练班，带领工人讲演队下乡宣传，推动农民运动，发展农会组织。一九二七年「五一」劳动节，在水口山召开有两万多人参加的大会，以革命法庭的名义，宣判两个恶霸的死刑。接着缴了矿警队的枪支，武装工人群众。同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在家乡浏阳隐蔽了一个时期，以教私塾为掩护，进行地下工作。一九二九年冬去上海，受组织派遣，去湘西贺龙部工作，途经澧县时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押回长沙，遭到严刑拷打，没有任何口供。一九三〇年二月被判死刑；临刑时，发表一篇激动人心的演说从容就义。

罗学瓚(一九三〇)，字荣熙，湖南株洲人。在第一师范读书时与毛泽东同班。性格纯朴，待人宽厚。在校时作《咏怀》诗一道：「不患不能以柔，唯患不能刚；唯刚斯不惧，唯有刚斯有为。将肩挑日月，天地等尘埃。何言夫富贵，夫胆为将来。」一

九二〇年到法国勤工俭学。大革命时期,在长沙从事工人运动。一九三〇年受中共中央的派遣任浙江省委书记时牺牲。

张昆弟(一八九四—一九三二)字芝辅,湖南益阳人。一九一三年考入长沙第一师范。在校时,思想、抱负、治学和生活各方面,均与毛泽东、蔡和森志同道合,三人共同访师长,登山远足,日记中多有记载。一九一九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一年与蔡和森等发动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被法国政府驱逐回国。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北平区执行委员、正太铁路总工会特派员。一九二三年任中共北平地方执行委员会工农部部长。一九二五年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总干事、当团书记。一九二六年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河南省总工会委员长。一九二七年,先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中共顺直省委工委书记。一九二八年赴莫斯科出席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审计委员会候补委员,会后出任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常委、党团书记。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任中共顺直省委工委书记。后到江西中央苏区,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旋调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任湘鄂西总工会党团书记。一九三二年在洪湖革命根据地牺牲。

向警予(一八九五—一九二八)湖南溆浦人。女共产党员。长沙周南女校毕业。在家乡创办溆浦女校,反对女子缠足、穿耳等对封建陋习,向学生灌输新思想。「五四」运动时,她来到长沙,参加新民学会,成为学会中第一批女会员。与蔡咸熙(蔡畅)等发起女子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一九二〇年与蔡和森在法国结婚。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七月,在中共「二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出任中共中央妇女部第一任部长。在此期间,她大力开展上海的女工运动,曾领导一九二四年上海丝厂、烟厂的女工举行同盟罢工。一九二五年冬,赴莫斯科学习。一九二七

年四月回国参加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对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会后留在武汉总工会、汉口市委工作。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她坚决留在武汉，负责湖北省委、武汉市委的领导工作。由于叛徒出卖，一九二二年春，在汉口法租界被捕。在法庭上，她先是用华语而后用流利的法语严词责问法国官员：「这里是中国的土地，你们有什么权力来审问中国革命者？你们把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都忘记了吗？你们法国人不是鼓吹自由、平等、博爱吗？不是说信仰自由吗？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来干涉我们信仰自由呢？」法国官员被问得哑口无言，没有立即把她引渡给国民党当局。后因国民党政府向巴黎交涉，法国政府撤换了驻汉口的领事，于四月十二日把向警予引渡给武汉警备司令部。她经受严刑拷打，威武不屈，在狱中组织难友，坚持斗争。国民党当局德行在五月一日杀害向警予。在去刑场的路上，她高呼口号，向群众发表演说。她的就义，震动了武汉三镇。

郭亮(一九〇一—一九二八)，字靖茄，湖南长沙铜官镇人。一九二〇年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一九二一年在长沙第一批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早年在湖南领导工人运动的得力助手。一九二二年领导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曾任中共湘区委员、粤汉铁路总工会主席、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中共湖南省委代理书记、湖南总工会委员长。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后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湘鄂赣特委书记。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后在岳阳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长沙就义。

夏蔓伯(一九〇一—一九三六)，即夏曦，湖南益阳人。一九二一年十月加入中共。国共合作后，经组织安排加入中国国民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在湖南开展统战工作。一九二五年在国民党湖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执行和监察委员。一九二七

年四月,出席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出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后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九三〇年回国,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三月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周书记、湘鄂西省委书记。从一九三二年五月起,先后四次开展肃后运动,错捕错杀了许多忠实的革命者,包括湘鄂西地区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同年十一月被撤销职务。一九三五年三月后,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湘鄂川黔革命委员会副主席。长征中在贵州毕节七星关附近牺牲。新民学会会员成为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的,还有李和笙、谢觉战、蔡成熙、张头生、熊瑾玎、萧子暗以及罗章龙、易礼容等。

李和笙(一八九六一—一九八四),即李维汉,又名罗迈。湖南长沙人。一九一九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二年与周恩来等在巴黎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回国转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一九二八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兼上海市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长征中任中央军委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到陕北后任陕甘省委书记、中央党校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中央城工部长、统战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政务院秘书长、国家民委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中共第四、第六、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谢觉哉(一八八四—一九七一),字焕南,湖南宁乡人。一九二一年参加新民学会,主编《通俗报》和《湖南民报》。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到上海,负责编辑《红旗》和

《上海报》，后任中共湘鄂西省委秘书长、《工农日报》主编兼文化部副部长、省委党校教务长。一九三三年到中央苏区。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秘书长、内务部长。一九三四年十月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历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内务部长、秘书长、司法部长、代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审计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驻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代表、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副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边区参议院副院长、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部长兼政法大学校长。建国后，历任内务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蔡成熙(一九〇〇—一九九〇)，即蔡畅，湖南湘乡永丰镇(今属双峰)人，蔡和森胞妹。长沙私立周南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一九一九年十二月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二年在法国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一九二三年转为中国共产党。中国妇女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大革命时期任中共两广区委妇委副书记，同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妇女运动讲习所主任，同国民党中央执行部妇女部长何香凝密切合作，领导两广地区的妇女解放运动。北伐期间，任中共江西省委、湖北省委妇女部长。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连续担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第一、二、三届主席，第四届名誉主席。她是中国共产党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第四、五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张头生，即张国基，湖南益阳人。一九二〇年赴新加坡在华侨中学任教。大革命时期回国，一九二七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主持的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务处工作。参加过南昌起

义。后长期在印度尼西亚牙加达从事华侨教育工作。曾任全国侨联名誉主席。

熊瑾玎(一八八六一—一九七三)又名楚雄。他在共产党内当了一辈子无名英雄。长期在上海以开商号的名义和妻子朱端绶驻守中共中央秘密机关。一九六六年元旦「文革」运动初起时,周恩来特去看望熊老板,给熊瑾玎留下一份亲笔书写的证明材料:「在内战时期,熊瑾玎、朱瑞绶两同志担任党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最后是人们熟悉的亲笔签名:「周恩来」。凭这份证明材料,熊瑾玎夫妇躲过了「文革」风暴。一九七三年一月十五日上午,熊瑾玎弥留之际,周恩来赶到医院探视。朱瑞绶珍重地转达了熊瑾玎对他最尊敬、最信赖的人的深厚感情:「叹我已辞欢乐地,祝君常保斗争身。」

萧子璋(一八九六一—一九八三),即诗人兼翻译家萧三,又名萧植藩、爱梅,笔名埃弥·萧。湖南湘乡人。萧子升胞弟。一九二〇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三年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并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一九二四年回国后曾任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中共张家口地委书记、共青团中央代理书记等职。一九二七年参加上海工人三次起义的组织工作。一九三〇年任教于莫斯科东方学院,主编《世界革命文学》中文版。一九三〇年回国后,曾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翻译部主任、陕甘宁边区和延安文协主任。建国后历任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局长、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国际笔会中国笔会中心副会长等。著有《和平之路》、《友谊之歌》、《伏枥集》、《萧三诗选》,译作有《列宁论文化与艺术》、《前线》等。

罗章龙,又名阶、纵宇一郎,湖南浏阳人。一九一五年毛泽东发出「二十八书生征友启事」,征得的唯一朋友就是罗章龙。



二人有诗唱合，互阅笔记，交换读书心得，「愿结管鲍之谊」。罗章龙的拟去日本留学，毛泽东作长诗一首《送纵宇一郎东行》。罗是中共早期党员，曾任中共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第四届候补中央委员，铁路总工会负责人，第六届中央委员，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兼主席。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因进行分裂活动，成立「第二中央」，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从此脱离政治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在湖南大学、湖北财经学院任教。

易礼容，湖南湘乡人。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积极协助毛泽东在湖南建党。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时，易礼容任中共湖省委委员兼农民部长，中共湖南省委行动委员会书记。起义失败后脱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第一届至第五届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六至第九届执行委员。

就是这样一批堪称人杰的青年，构成了新民学会的领导人 and 骨干分子。

关于新民学会发起和成立的经过，特别是具体情节，当事人的回忆互有出入。现将毛泽东写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三十日《新民学会会务报告》摘要如下：

新民学会的发起，在民国六年之冬。发起的地点在长沙，发起人都是在长沙学校毕业或肄业的学生。这时候这些人大概有一种共同的感想：就是「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乃成为一个迫待讨论的问题。这时候尤其感到的是「个人生活向上」的问题，尤其感到的是「自己生活向上」的问题。相与讨论这类问题的人，大概有十五人内外。有遇必讨论，有对论必及这类问题。讨论的情形至款密，讨论的次数大概在百次以上。至溯其源，这类问题的讨论，远在民国四

五两年，至民国六年之冬，乃得到一种结论，就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于是乃有组织学会的提议，一提议就得到大家的赞同了。这时候发起诸人的意思至简单，只觉得自己品行要改造，学问要进步，因此求友互助之心热切到十分——这实在是学会发起的第一个根本原因。又这时候国内的新思想和新文学已经发生了，旧思想、旧伦理和旧文学在诸人眼中，已一扫而空，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的生活之追求——这也是学会发起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则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的绪论，作为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七日，在岳麓山刘家台子蔡和森家，新民学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即成立大会。到会十二人，名单如下：蔡和林（林彬） 萧子升（旭东） 萧子暗（萧三） 陈赞周（绍休） 罗章龙（阶） 毛润之（泽东） 邹鼎丞（彝鼎） 张芝圃（昆弟） 周晓三 陈启民（书农） 叶兆楨（瑞龄） 罗荣熙（学瓚）

会章系邹鼎丞、毛润之起草，务文颇详，讨论中多主张删去不见诸行事的条文，经萧子升删削后通过。通过的会章共十一条：

第一条 本会定名为新民学会。

第二条 本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欲为宗旨。

第三条 凡经本会会员五人以上之介绍及过半数之承认者，得为本会会员。

第四条 本会会员须守下之规律：

一、不虚伪；

二、不懒惰；

三、不浪费；

四、不赌博；

五、不狎妓。

第五条 会员对于本会每年负一次以上通函之义务，报告已身及所在地状况与研究心得，以资互益。

第六条 本会设总干事一人，综理会务；干事若干人，协助总干事分理会协；任期三年；由会员投票选充之。

第七条 本会每年于秋季开常年会一次；遇必要时，并得召集临时会。

第八条 会员每人于入会时纳入会费银一元，每年纳常年费银一元；遇有特别支出，并得由公决征集临时费。

第九条 本会设于长沙。

第十条 会员有不正行为，及故达本简章者，经多数会员之决议，令其出会。

第十一条 本简章有不适用时，经多数会员决议，得修改之。

会章表决后进选举，萧子升当选为总干事，毛润之、陈书农为干事。聚餐后，讨论会友出省出国如何进行问题，至下午散会。

第一次会议之届至一九一八年八月有九人人会：

周元(世剑) 何叔衡(瞻岵)

李和笙(维汉) 邹半耕(半清)

熊瑾王丁(楚雄) 熊馄甫

陈章甫(陈昌) 傅昌玉 曾星煌

一九一九年有二十五人入会：

罗耻遇(宗翰) 张颐生(国基)

夏蔓伯(夏曦) 蒋集虚(竹如)

易阅灰(克种) 向敬予(女)  
陶斯咏(陶教,女) 彭殷柏(彭璜)  
李承德(振翩) 张伯龄(张怀)  
唐文甫(耀章) 沉均一(沉均)  
李钦文(思安,女) 周敦祥(肫如,女)  
魏璧(温奄,女) 劳君展(启蒙,女)  
谢维新(南领) 徐 瑛  
刘继庄(修秩) 钟楚生(国陶)  
张泉山(张超) 姜竹林(慧宇)  
刘望成(明伊) 欧阳玉林(欧阳泽) 杨润余(女)

一九二〇年有五人入会:

蔡成熙(蔡畅,女) 熊作莹(季光,女)  
熊作(叔彬,女) 任振予(培道,女)  
吴德庄(家瑛,女)

一九二一年有二人入会:

郭亮(靖茹) 谢觉哉(焕南)

会务报告载名但入会时间不明者三人:

易礼容 陈子博 贺延祐

据李维汉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所写《回忆新民学会》一文,会友还有十人:

彭道良(则厚) 陈纯粹

萧道五 李云杭

黄胜白 吴毓珍(女)

刘清杨(女) 周毓明(女)

许文煊(女) 载毓本(女)

新民学会会友已查明者共有六十六人。

一九一九年下半年,新民学会在周南女校开会,修改会章,

改选领导(总干事萧子升已去法国)。设执行部和评议部,执行部下又设学校、编辑、女子、留学各部。推举何叔衡为执行委员长,李钦文(女)为副委员长;胸斯咏、周元、毛澜之、周敦禅、魏温庵、陈启民、唐文甫、蒋集虚等八人为评议员。两次选举,毛泽东都没有担任主任要领导。但他办事认真,务实,全神贯注,不辞辛苦,主持日常会务,两次会务报告,三本会员通信集,都是他利用业余时间编写印发的。他在实际上成了新民学会的心脏和灵魂,赢得了会友们的信赖和尊敬。

一九一八年暑假,毛泽东和许多会友将毕业离校。毕业后的出路成为大家日夜萦怀的问题。恰在此时,《新青年》第十期刊载了留法勤工俭学的消息,号召青年们到法国去,一面做工,一面求学。这对家境贫寒的有志青年是很有吸引力的。新民学会第一个大的活动就是赴法勤工俭学的高潮。

据《新民学会会务报告》记载,勤工俭学「长沙方面之最初发起者,为蔡和森与萧子升。时子升在楚怡任课。和森就居楚怡,日夕筹议。何叔衡、毛润之、陈赞周等时复加入讨论。是时其它会友亦有几人行将外出,遂于六月尽间,在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陈赞周、萧子璋处(陈、萧在此任课)开一会议。计到会者:何叔衡、萧子升、萧子、陈赞周、周元、蔡和森、毛润之、邹鼎丞、张芝圃、陈启民、李和笙等,因事未到者几人。这次讨论,集中‘会友向外发展’一点,对于留法运动认为必要,应尽力进行。是日叙餐。自此,留法一事,和林和子升专负进行之责。」经过一阵讨论之后,萧子升说:「杨怀中先生接受北大的聘请,到北京去了。我写信给他说明我们赴法的计划,请他从北大校长蔡先生那里,探听一下华法教育会的情形。我一接到他的答复,便请大家第二次会议。」

一星期后,萧子升接到杨怀中先生的明信片,信文简短扼

要，内称：「昨按来信，今即走访蔡子民校长。蔡称彼乃华法教育会会长，今留法勤工俭学已组成俭学会，汝欲赴法勤工俭学，必得偿所愿……」萧子升立即把杨先生的复信告诉毛泽东、蔡和森诸会友，大家高兴万分。第二次会议遂决定，派蔡和森先往北京联系。

蔡和森六月二十三日乘船离长沙，二十四日在汉口上火车，二十五日到达北京。在鼓楼豆腐池杨怀中家里落脚。他拜访了教育界领袖、北京大学校长、华法教育会会长蔡元培（子民）和华法教育会的实际主持人、秘书长李石曾（振瀛）。蔡和森将在京得到的信息及时告知长沙会友，他在信中写道：「弟今天会见石曾先生，除以前所闻皆得证实外，又知借款机关亦已组织，我省为熊秉三（希龄）章秋桐（吐剑）二氏担此义务，筹有的款，以辅助绝无自借能力之士。此好消息出于意外，子民先生亦云然，尤足信实。」长沙会友闻知出洋经费有了着落，主要障碍已除，立即作赴京的准备。

八月十九日，毛泽东与萧子升等二十五名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到达北京，其中有新民学会会员十二人。非会员到京后，投亲靠友，各奔东西，也有改变初衷投考军官学校者。会员多数参加留法预备班学习，张芝圃、李和笙、曾星煌在保定班；蔡和林在蠡县布里村班；萧子升、萧子、陈赞周、熊锬甫、急鼎丞、罗荣熙在北京班；罗章龙考入北京大学文科；毛泽东协助组织了勤工俭学运动，但他自己并不想到法国去，经杨怀中介绍，他拜会了李大钊教授，李大钊兼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就安排他在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每月有八块大洋的固定工资，开始了他在北京一边工作、一边读书研究的生活。

在京的会友八人，在地安门内三眼井胡同七号租了三间民房，「隆然高炕，大被同眠。」开始下馆子吃饭，后来为了节省就



自己起伏。但北京大米少，而且价钱贵，就学着做面食。第一次萧子升把一盆面做成浆糊。女房东是个没落的旗人，见状又笑又同情他们，就主动教给他们如何发面，如何蒸馒头。后来送水的老侯帮助做饭，不要工钱，条件是允许他和大家一起吃。毛泽东在这里一直住到一九一九年二月。

毛泽东为什么不出国留学？他是怎么想的？他在给周世钊的信中作了说明：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逝」。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我觉得暂时在国内研究，有下列几种好处：

1、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知识。

2、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3、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

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采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对可以藉资比较。

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

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期所作的报童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选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

由此可见，毛泽东暂不出国留学，是有明确的指导思想的。他的见识过人之处是在出国热的高潮中，看出了在中国进行调查研究的必要；他并不是反对留学，他自己曾有留俄的打算，后来因为投身于实际斗争未能成行。

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提倡学术思想自由，对于各种思想流派采取「兼收并蓄」的方针。这样一个学习环境对于喜好独立研究的毛泽东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开馆时间他要到图书馆上班，业余时间则在北大旁听他感兴趣的课程，还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研究会的活动。

北京大学的新闻学研究会，每周举行两次讲座。参加的有三四十人。由《京报》总编辑邵飘萍主讲新闻理论和办报的业务经验。那时候邵飘萍在西四牌楼羊皮市胡同九号住家。毛泽东曾多次登门造访，请教办报的一些具体问题。邵飘萍在经济上还对毛泽东有过帮助。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向斯诺介绍自己的经历时说：「特别是邵，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一九二六年他被张作霖杀害。

毛泽东逗留北京的时候，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已经发生，但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没有系统地传入中国。在北京知识界，时髦的思想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克鲁泡特金（一八四十二—一九二一）是俄国无政府主义的主要代表，一八七二年在瑞士参加第一国际，属巴枯宁派。回国后参加民粹派运动，一八七四年被捕。一八七六年越狱逃往国外，在瑞士等国着书立说，代表作有《科学和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及其哲学》等。主张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废除国家，建立无政府社会，反对马

克思主义关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无政府主义在二十世纪初期就传到了中国。由于中国是小资产阶级众多的国家,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和现实的军阀暴政,使人们对国家、政府、法律、权威产生了怀疑和反感。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尤其容易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据统计,「五四」前后全国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书刊小册子达七十多种。北京大学和北京高师等校学生中,有秘密团体,传播和研究无政府主义思想。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回忆这时的情景说:「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一个经常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在中国的前景。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关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毛泽东只能从李大钊等人的文章和有限的材料中作初步的了解和探讨。

一九一九年二月,毛泽东离开北京沿津浦路乘车往上海。因钱不够,只买了一张到浦口的车票。途中数度下车,登泰山,谒孔庙,游览了四战之地的徐州。到浦口下车时,脚上穿的鞋子还丢了。正在犯愁,天无无绝人之路,遇到了一师同学李声解。李从一师毕业后到上海江南造船厂做工。他慷慨解囊,帮助毛泽东买了双鞋子和去上海的火车票。到上海后,毛泽东在南市斜桥湖南会馆下榻。三月十四日,送别了首批赴法的湖南籍青年,就启程回长沙了。

## 07 北京学潮 反帝反封建民主 湘江评论 振聋发聩着宏文

一九一九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像春雷一样，震撼着中国大地，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五四」运动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当时的中国虽然经过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任务并没有完成。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之后举行的巴黎和会，使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起来，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线。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派出军队侵略山东，租借青岛，建筑胶济铁路，并取得了铁路附近之采矿权。欧战起，德国无力东顾，日本政府以协约国的资格，乘机出兵攻占青岛，强行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北京政府对德奥宣战，废除中德、中奥条约，并派出二十万华工赴欧支持协约作战。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协约国与德国签订休战条约。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建日欧战后世界新格局的巴黎和会开幕。参加者为英、法、美、意等二十七国，但会议完全由美、英、法三国所操纵。北京政府任命陆征祥、顾维钧等为出席巴黎和会全权委员。二十八日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七个条件，希望列强放弃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各国驻华军队，取

消二十一条和收回一切被日本非法「继承」的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但美、英、法等国的外交家们的答复是：「希望」条件现在不是时候，二十一条与和会无关，至于山东问题，「德国……所获一切权利特权、胶州的领土、铁路、矿山、海底电线等，一概让与日本。」四月三十日，美、英、法三国政府首脑不顾中国的反对，最后决定：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由日本继承。大战中中国是站在协约国方面的，是战胜国之一，所得结果与战败国无异，这个残酷的事实使中国人民感受到不可容忍的耻辱。人民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昏庸横暴的北京政府，对于列强什么正当的对策也没有，就知道防范人民，首先是防范北京各校的青年学生。

北京大学的学生决定五月三日（星期六）晚七时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约清华大学、高等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朝阳法学院、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政法专门学校、医药专门学校、商业专门学校、汇文学校、高师附中、铁路管理学校派学生代表参加。十三校联席会议推举北大法科四年级学生廖书仓为临时主席，北大文科学生黄日葵、孟寿椿二人作记录，许德珩起草宣言。发言的有丁肇青、谢绍敏、张国焘、许德珩以及各校代表夏秀峰等多人。法科学生谢绍敏发言中悲愤填膺，当场将中指咬破，鲜血淋漓，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将与会者的情绪推向高潮。会议共议决办法四条：

（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归还青岛；

（二）通电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坚持拒签和约；

（三）通电全国各省市于五月七日国耻纪念会举行群众游行示威；

（四）定于五月四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学界大示威。

五月四日午后一时，北京十三校学生两千余人按计划齐集

天安门广场。到的最早的是高师、汇文两校。北大因整队出发时，有教育部代表及军警来劝阻，耽误了时间，所以到天安门最迟。天安门前，金水桥南，排列着整齐的队伍，竖起了大小白旗数十面，上书「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废除二十条！」等内容。驻足围观的市民愈来愈多。当场散发了《北京学生界宣言》：

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霸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是亡山东耳。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拱鄂守，当京汉、津浦两路之冲，实南北之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河山，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求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蒂，极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讲，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互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许多同学的演说，激昂慷慨，声泪俱下。市民闻之动容，自动加入了游行队伍。游行总指挥是北大学生博斯年。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从天安门出发，先到东交民巷使馆区示威，在军警林立的情况下，来到东交民巷西口美国大使馆，递交了英文说帖，群众高呼口号过去了。再到日本大使馆，只见军警围了三四层，其中还有许多日本警察，真是如临大敌

学生们包围日本使馆很久，高呼口号表达中国的民意。这时有人提议：「找卖国贼算账去！」于是游行队伍出东交民巷，经御河桥、东单牌楼，直奔赵家楼曹汝霖家。现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一九一五年签订二十一条时是外交次长，实际主持了二十一



条的谈判,是著名的亲日派,这时成了爱国学生的斗争目标。

赵家楼是一条东西向的胡同。游行队伍到时已是下午两点多钟,数百名军警已把胡同口封住了。学生们向军警进行爱国宣传,说:「我们是爱国学生,来这里找曹总长谈谈国事,交换意见,劝他爱中国。我们学生手无寸铁。你们也是中国人,难道你们不爱中国吗?」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感动了军警,让学生们进入胡同。曹宅门口朱门紧闭,警戒森严。学生们三四个人说服一个军警,把门口的警卫也说服了。国立高师的学生匡日休和北京大学学生罗章龙两个湖南青年带头,从曹宅临街的窗户爬进去,打开了两扇大门,众多的学生蜂拥而入。这时曹汝霖正在与另两个卖国贼章宗祥(驻日公使)、陆宗舆(币制局总裁)以及参战督办处军法处长丁士源、日本人中江丑吉在开会。他们原以为有重兵保护,学生不会进来。一见学生拥入,曹、陆二贼从后门溜走,客厅里剩下章宗祥、丁士源和中江丑吉被学生包围,不得脱身。学生们误把章宗祥当作曹汝霖,痛打了一顿。日本人中江因掩护章也挨了打。丁士源则乘混乱之机逃出搬兵。匡日休见曹汝霖的卧宝奢靡华贵特甚,又对照像片发现挨打的不是曹汝霖,一气之下,就把绿色的罗纱帐点燃了,顿时室内大火蔓延,房也就烧起来了。这就是所谓火烧赵家楼一案。

半小时后,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军统领李长泰率领大队军警赶到,用武力把群众驱散,逮捕了三十一一个学生和一个市民,押进前门内户部街步军统领衙门。三十二人被囚禁在一间牢房里,房内一条大炕,东西两边各摆着一个大尿桶,空气十分污浊。看守每天提一桶开水来,每人发一个大窝头,到中午放风一次。被捕学生中有许德珩,他有诗一首以纪其事:

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楚囚。

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

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

锄奸不怕死，采把中国救。

以日本为后台的政府实力人物段祺瑞主张严厉镇压，以屠杀政策来对付示威的民众，严办被捕的学生领袖，以儆效尤。大总统徐世昌则认为民众力量不可轻视，如果采取高压政策，势必火上烧油，使事态进一步扩大，乃至不可收拾，不如采取怀柔政策。但教育总长傅增湘、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被免职。

爱国青年并未屈服。北京女高师同学、因校长陈实泉顽固阻挠未能参加游行，五月四晚上列队到步军统领衙门请愿，要求和被捕同学一同坐牢。五月六日，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会址设在马神庙北京大学二院。从此开始了学校的横向联合，「学联」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学联」的领导成员也多是一时之后，如北大的许德珩、黄日葵、段锡朋、易克嶷、张国焘、康白情、陈宝鏐、清华的罗隆基、陆梅僧，法专的祁大鹏，俄专的瞿秋白，汇文的瞿世英，工专的夏秀峰，高师的熊梦飞，商师附中的赵世炎，农专的顾艾萃，铁路管理学校的郑振铎等。学联成立酝酿着更大的革命风潮。加上社会舆论的广泛同情，许多社会名流通电呼吁学生无罪，给北京政府造成了巨大压力，五月七日下午下令将被捕的三十一名学生和一名市民全部释放。

但曹汝霖不肯善罢干休，向法院起诉，要求按刑事犯罪「依法制裁」打人、烧房子的学生，并赔偿经济损失。据此，十三校学联名上书检察厅传说：如爱国有罪，人人愿意自首，不能由少数同学负责；如果法院传票传学生，愿意集体受传，少数同学绝不出庭。这一表示使北京政府按「刑事犯罪」处理的学生的企图归于失败。

五月十七日，北京学联代表十三校同学向政府提出：

(一)明确指示出席巴黎和会的我国代表拒绝在山东问题上签字；

(二)征办卖国贼曹、章、陆；

(三)挽留传增湘、蔡元培等。

十九日，北京学联宣布中等以上学校全体罢课，并发出罢课宣言。北京政府指斥学生「纠众滋事，扰及治安」，限令三天内一律复课。各校代表在北大三院开会商讨对策，被军警重重包围。会议决定扩大运动，派出代表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武汉、长沙、广州等城市，将「五四」精神推向全国。因北京大学外驻有军警，各门出入盘查甚紧，代表许德珩，黄日葵、邓中夏等跳墙而出，化装离京。

「五四」的斗争很快就波及全国。

五月二十六日，上海学生联合会发表罢课宣言：

自外交警讯传来，北京学生充当先觉之任，士气一振，奸党寒心；义声所播，咸知奋发。而政府横加罪戾：是已失吾人之望。乃以此咎及教育负责之人，致传蔡诸公纷纷引去。夫段其瑞、徐树静、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等，迭与日本借债订约，辱国丧权，凭假外援，营植私利，劣迹昭著，中外共瞻，全国国民皆有欲得甘心之意。政府于人民之所恶，则必百计保全：于人民之所欲，则一网打尽。更屡颁文告，严做学生，并集合、演说、刊布文字公民所有之自由，亦加剥夺。是政府不欲图民有一分觉悟，国势有一分进步也。爱国者有罪，而卖国者称功，诚不知公理良心之安在！

五月底，天津学生发表罢课宣言：

学生等力弱能薄，无权无兵，虽不敢涉及政务，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此次罢课，原祈政府诸公曲应该苦衷，一致对外。又恐国人之未醒也，作泣泪之演讲，撰哀号之报刊，以壮我民气。

在上者自当养我之气，意我之志，岂忍抑而挫之耶。今政府不察，阻我爱国之举动，禁我集会之自由，拘捕我学生，使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也。

为了唤起民众，六月二日北京的学生走上街头，举行全城沿街大讲演。是日讲演的学生被捕四十七人。三日，更多的学生上街讲演，被捕八百余人，并被打伤多人。消息传到上海，六月五日，上海商人宣告总罢市，其它大城市也相继而起，上海各业工人和沪宁铁路工人接着宣布罢工。

六月九日，北京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之下，不得不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并于六月二十八日宣布拒签巴黎和约。

在长沙，由于段祺瑞的嫡系、湖南督军张敬尧封锁新闻，直到五月九学生和市民才从报纸上看到「五四」运动的零星报道。就在这天，张敬尧召集长沙各校校长谈话，命令「省垣各校学生，不得听信谣言，借青岛问题，引起纠纷。」

五月二十三日，北京学生代表邓中夏等二人来到长沙。邓中夏是北京大学学生，与毛泽东在北大结识。邓一到长沙，首先找到毛泽东，毛泽东安排他们住在楚怡小学何叔衡那里。二十五日上午，经过毛泽东的组织，在楚怡召开了各校学生代表会议，到会的有第一师范的蒋竹如、陈书农，湖南商专的易礼容、彭璜，湖南工专的柳敏，湖南法专的夏正猷、黎宗烈，明德中学的唐耀章，湘雅医学院的李掘翩；周南女校的魏璧、劳启荣等，多为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介绍北京来的学生代表与大家见面。然后由邓中夏报告北京五四运动经过。他希望湖南学生实行总罢课，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

五月十七日，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选举彭璜（字殷柏）为会长。学生联合会设在落星田商业专门学校。六月三日，长沙各学校宣布总罢课。十五日，张敬尧发布《告诫学生训令》，扬

言如游行市街「一律遭捕,以保公安」;并通知各校提前考试,提前放假,以瓦解学生组织。学联立即作出决议:「既经罢课,就决不受试;如提前放假,亦即赞成,在校救国,放假亦不碍救国。」于是利用放假机会,学联组织各校学生,有计划地回到各县开展救国宣传活动。如长沙县属各乡镇在校学生,即组织讲演团几十个,到各乡镇宣传。

随着运动的深入,在全国出现了抵制日货的高潮。首先是上海码头工人拒绝装卸日货。上海各报拒登日商广告,先施、永安等大百货公司拒售日货。在爱国主义的召唤下,海外华侨和全国工商界也一致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六月二十五日,湖南学联联合工商界共几千人,在长沙举行游行大会,口号是:「一致对外,大家努力;毋忘国耻,坚持到底;提倡国货,莫买日货。」抵制日货,是群众表达爱国仇日心情的自发行动。几家勾结日商、经营日货的商号被捣毁了。七月七日,联合举行烧毁日货游行示威大会,据第二天报载:游行队伍从绸布公所出发,高举「烧毁日货游行大会!」和「同胞们注意,切勿买日货!」的横幅为前导,学生队每人肩扛一疋查抄的日本布,其后是绸布业的店员工人。游行队伍经过长沙最热闹的道路后,到了教育会坪,将布堆放在一起,浇上煤油点燃,直到布疋烧成灰烬,游行队伍和参观群众才散去。于是长沙和湖南各县抵制日货的运动就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在北京、天津、上海、济南、武汉、杭州、九江、唐山等大中城市,学生的爱国运动与工商界罢工罢市斗争结合起来了。上海成立了「商工学报各界联合会」。这种形势立即影响到湖南。七月九日,湖南学联联合工商各界开会,正式成立湖南各界联合会,当天参加成立会的有苏广业、纱业、染织业、轮船业、泥木行、印刷业、理发业、箩业(码头工人)等三十多个工商行业,以及基

督教联合会的代表。

大举焚烧日货之后，张敬尧亲自出面压制。他将各校学生代表和一些教职员找到教育会训话。因是暑天，四个卫士为他打扇。张敬尧粗鲁地说：「你们不准游街，不准开会，不准检查商店；你们要好好读书、教书，否则本帅就要办人！」张敬尧的表演给学生们的印象极坏，湖南的群众运动，逐渐变成了驱张运动。

为了把群众运动进一步引向深入，提高群众运动的水平，改造湖南，改造中国，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于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出版。《湘江评论》是以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名义出版发行的，出了五期就被张敬尧查封了。其中最主要的、令人振聋发聩的文章，就是在二、三、四期连载的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他总结了五四运动的经验，把群众运动的经验上升到理论的认识，教育人民认识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为自身的利益而斗争。文章说道：

我们竖看历史，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凡这种联合，遇有一种改革或一种反抗的时候，最为显著。历来宗教的改革和反抗，学术的改革和反抗，政治的改革和反抗，两造都必具有大联合。胜负所分，则看他们联合的坚脆，和为这种联合基础主义的新旧和真妄为断，然都要取联合的手段，则相同。

古来各种联合，以强权者的联合，贵族的联合，资本家的联合为多。如外交上各种同盟、协约，为国际强权者的联合。如我国的什么北洋派、西南派，日本的什么萨藩、长藩、为国内强权者的联合。如各国的政党和议院，为贵族及资本家的联合（上院若元老院，固为贵族聚集的巢穴，下院因选举法有财产的限制，



亦大半为资本家所盘据)。至若什么托辣斯(钢铁托辣斯、煤油托辣斯……),什么会社(日本的邮船会社,满钢会社),则纯然资本家的联合,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

自法兰西以民众的大联合同王党的大联合相抗,收了政治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随之而起了许多许多的政治改革。自去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如匈、如奥、如捷、如德,亦随之而起了许多许多的社会改革。虽其胜利尚未至于完满的程度,但必可以完满,并且可以普及于世界,是想得到的。民众的大联合,何以这么厉害呢?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资本家及其它强权者要多。贵族资本家及其它强权者人数既少,所赖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多数平民公共利益,第一是知识,第二是金钱,第三是武力。从前的教育是贵族和资本家的专利,一般平民,绝没有机会去受得;他们既独有知识,于是生出了知愚的阶级。金钱是生活的媒介,本来人人可以取得,但那些有知识的贵族和资本家,想出什么资本集中的种种法子,金钱就渐渐流入田主和工厂者板的手中。他们既将土地和机器、房屋收归他们自己,叫做什么「不动的财产」;又将叫做动的财产的金钱,收入他们的府库(银行)。对于替他们做工的千万平民,仅只有一佛郎一便士的零星给与。做工的慨然没有金钱,于是生出了贫富阶级,贵族、资本家有了知识和金钱,他们便设军营练兵,设工厂造枪。借着「外海」的招牌,便几十师团几百联队的招募起来。甚至更仿照抽丁的办法,发明什么「征兵制度」。于是强壮的儿子当了兵,遇着问题,就拿出机美枪,去打他们懦弱的老子。我们且看去年南军在湖南败退时,不打死了他们自己多少的老子

吗？贵族和资本家利用这样的妙法，平民就不敢做声，于是生出了强弱的阶级。

可巧他们的三种法子，渐渐替平民偷着学得了多少。他们当作「枕中秘」的教科书，平民也偷着念了一点，便渐渐有了知识；金钱所以出的田地和工厂，平民早已窟宅其中，眼红贵族、资本家的舒服，他们也想染一染指。至若军营里的兵士，就是他们的儿子，或是他们的哥哥，或是她们的丈夫。当拿着机关枪对着他们射击的时候，他们便大声的唤，这一片唤声，早使他们的枪弹化为软泥，不觉得携手同归，反一齐化成了抵抗贵族和资本家的健将。我们且看俄罗斯貔貅十万，忽然将鹜易了红旗，就可以晓得这中间有很深的道理了。

平民既已将贵族和资本家的三种法子窥破，并窥破他们实行这三种是用联合的手段，又觉悟他们的人数是那么少，我们的人数是这么多，便大大的联合起来。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一派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拼命的「捣蛋」。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叫做马克思。一派较马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的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们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作一国，联合人类作一家，和乐观善——不是日本的观善——共臻盛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作克鲁泡特金。

我们要知道，世界上的事情本极易为；有不易为的，便是困于历史的势力——习惯——我们倘能齐声一呼，将这历史的劳力冲破，更大大的联合、遇着我们所不以为然的，我们就列起队伍，向对抗的方面大呼。我们已经得到了实验，陆荣廷的子弹，永远打不倒曹汝霖等一般奸人，我们起而一呼，好人就要站起来

发抖,就要舒命飞跑。我们要知道,别国的平民是通常用这种方法,求到他们的利益。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

毛泽东提出民众大联合的办法,须以民众小联合为基础。农民、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警察、车夫、各行各业,凡有共同利益的人群,都应先组织自己的小联合,然后联合各色各种人群,组成一个大联合。毛泽东从历史和现实斗争中,看到了民众大联合的力量。号召人民起来,完成翻天,覆地的事业。他以高屋建瓴的气魄,清新动人的笔调,娓娓道来:

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纵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我们虽赞成他们的主义,却不曾活动;他们也用不着我们活动。然而我们却有一层觉悟,知道圣文韬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议的。我们有话要说,有事要做,是无论何时可以说可以做的。辛亥而后,到了丙辰,我们却又觉悟那么威风凛凛的洪宪皇帝,原也是可以打得倒的。及到近年,发生南北战争和世界战争,可就更不同了。南北战争结果,官僚、武人、政客,是害我们,毒我们,剥削我们,越发得了铁证。世界战争的结果,各国的民众,为着生活痛苦问题,突然起了许多活动。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辩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窑,全世界为之震动。匈牙利崛起,布达佩斯又出现了新的劳农政府。德人奥人捷克人和之,出死力以与其国内的敌党博战。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苦干的大革命,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向南,遏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赶高

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开易。唉！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民众的大联合》是毛泽东第一篇系统表达政见的文章，这年他二十六岁。毛泽东正确地指出了辛亥革命缺少民众大联合作基础，所以革命的成效甚微。孙中山斗不过袁世凯，斗不过段祺瑞，因为袁段背后有外国列强的支持，而孙中山没有；孙中山周游世界，游说列强，幻想某一强国支持他打败军阀，他不知道到亿万人民中寻找支持力量，不知道民众大联合的伟力。毛泽东这个初出茅庐的革命志士，对列强各国从来没有幻想，他一出山的方略就是六个大字：民众的大联合。这是他高于孙中山的地方。在以后的斗争中，毛泽东像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一感到力量不足就站在地面上那样，他一感到力量不足就去发动群众。这是他一生无往而不胜的秘诀。

《湘江评论》创刊号印了两千份，当天就卖完了，随后又加印了两千份，仍不能满足外地需要。因此，从第二期每期印五千份。这个刊物传到北京，李大钊认为这是当时全国最有份量、见解最深的刊物。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之主编的《每周评论》第三十六期指出：「《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字，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见现今的重要文字。」北京《晨报》也予以评介，说这篇文章「魄力非常充足。」全文转战《民众的大联合》一文的，有成都的《星期日》周刊，北京的《又新日报》和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

但这时候毛泽东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在他的思想中仍占着主导地位。在革命方法上，他主张温和革命，

反对暴力革命。「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湘江评论》创刊宣言)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主张。有些问题,「忠告运动」、「呼声革命」是可以解决的,像「五四」运动就解决了中国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问题;有些问题,像推翻皇帝,打倒军阀这一类事情,「忠告运动」、「呼声革命」就不行了,就必须实行「炸弹革命」、「流血革命」。批评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评,这个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见解,一年以后毛泽东就接受了。

## 08 横征暴敛 张敬尧祸湘有术 辞严义正 毛泽东能量无边

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是「五四」运动在湖南的一个发展，是刚刚开始的全中国反帝反封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驱张运动的主力是湖南的学生和教育界人士，广大市民阶层、工人和农民还没有发动起来。站在运动的前列，领导这场斗争的，是「湖南公民代表毛泽东」。

皖系军阀张敬尧是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八年间，直皖联军与湘桂联军作战，南败北胜后进入湖南的。张敬尧原为北洋军第七师师长。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段祺瑞政府任命他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张敬尧以「三天不封刀」的野蛮姿态入湘。他的第七师攻下平江，纵容士兵「大索三日」，以搜索残敌为由，肆无忌惮地闯人民家，抢劫财财物，强奸妇女，宰杀牲畜，抓走壮丁。三天后才出所谓「安民告示」。但是三天后的情形并未改善，奸淫抢掠仍然盛行，长官不闻不问。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旅沪湖南善后协会上南北当局书》，对张敬尧进入湖南的罪恶有如下之概述：

此次战祸，湖南受创最巨，惨酷之状，前史未闻。在湘客军，数逾十万，淫惊焚杀，无所不至。举其著者：

如醴陵之役全城焚毁，黄土岭之役女尸满山，此外城镇市村焚掠蹂躏，几无幸免。溃军、土匪更番扰害，全省公私财产抢劫



一空。恶探诬指，陷害无辜；局横暴，强攫商货；民命民财，朝不保夕。顷据湘省来人报告最近情形，如财政金融之紊乱，尤令人不寒而栗。既设裕湘银行，复私设日新银号，滥发纸币，互相兑换，狼狈为奸。湖南银行去岁在沪订印铜元票四千五百万串，原为收换旧票之用；今旧票不惟不换，更将收存未毁之烂票及沪印之新票，一并发出。计新旧铜元票一项，数已逾一万万串。又以纸币勒派各县，兑换现洋，每县数万元。综计吸收现金为数极巨。而军饷仍复欠发，纸币永不兑现。又强定最低兑换法价，银行可按法价易银，商民则不能以法价兑现。由是官家可以一纸之空票流通，商民则不能以贱价之法价交易。又日铸铜元数万串，均贩汉渔利，钱票日增，铜元日乏；遂至银钱两荒，市场金融根本破坏，人民无端破产，百业以之荒废。其受害尤烈者，首为民食。盖军民以纸币易米，米商不能以纸币易谷，终乃遂至无形罢市。不仅如此，湘岸权运局复巧立护照名目，加收监费，每包苛微倍于国课，使监商失业，穷民缺贩。故目前湘垣石米需钱百串，斤盐需银四两。人非淡食，即属绝粮。民不聊生，至于此极。

张敬尧对湖南人民的掠夺是骇人听闻的。有人算了一笔账，他一年横征暴敛，贪贼枉法所得，计：扣留中央监税二百数十万，附加监税三十余万，监税私加护照费一百五十余万，钱粮一百余万，铜元余利一百二十余万，厘金数十万，拍卖公产百余万，合计八百余万；加以中央筹集军饷约一千万；其以勒价收入定为每元四十余串之钱票，而发出定为每元十五串之钱票，利万倍蓰，总计有账可查的就是两千万银元。张自兼湖田督办，盗卖湖田一万二千亩；勒索军米百万石私运天津，卖给日本商人；将湖南第一纱厂卖给日本兴业株式会社。张本人是个鸦片鬼，军署上下及所部官兵，多数有瘾，相习成风。因此，强迫农民种植，每田百亩，种鸦片四十亩，每亩抽税二十元。这些收入还未计算在

内。

一九一九年，张敬尧做「四十大寿」时，授意湘江道尹王丙坤、督军署副官长杨开甲，组织「帅座大庆筹备处」，在督军署大兴土木，在教育会坪搭设戏台三座，派人到北京、汉口等地邀请名角前来演戏三天。城内八大旅馆均被指定为来宾招待所，定寿筵四百席，定制湘绣万民伞八十柄，绣旗三百二十面，所付定洋十万元。寿礼分福禄寿喜四级，即一千、五百、三百、二百元，指名分配。因铺张过甚，受到他的教师段祺瑞的「切责」，才扫兴地拆了戏台。但到九月二十一日寿辰这天，送礼的队伍仍排成一、二里。有个矿物局长奉金佛两尊。不仅张本人做寿，他的弟弟、妹妹、儿子、女儿、姨太太、姑奶奶等，无不做寿，每做寿都要收礼。除给活人做寿外，还给他死去十年的母亲做十周冥寿。由政务厅、副官处正式通知各机关，筹办寿礼。强强迫一个女校长做妾，用湖田贿卖她的家庭，使得舆论大哗。他的四弟、第一混成旅旅长张敬汤，他的义子、「烂五团」团长张继忠，横行霸道，贪污受贿，尤为人民所深恶痛绝。当时的民谣说：「堂堂乎张，尧舜禹汤（按：张有三个弟弟，排名敬舜、敬禹、敬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湖南各界各阶层人民，对张敬尧的苛政无不恨之人骨。

一九一九九月，毛泽东以学联为基础，联络教育、新闻各界人士，商讨驱张办法。因为张敬尧及其亲属，勾结日商，经营日货，获利甚巨。学联决定仍以检查日货为主要活动，同张敬尧斗争。十二月一日，长沙学生纠察队和店员工人在火车站查出大批日货，当即要求焚毁。商会会长张先赞是张敬尧的亲信，有恃无恐，拒不交出日货。窃运的奸商勾结军警将日货强行运至国货维持会，张敬尧立即下令保护。学联不顾军警的威胁，通知学校和各界，于第二天在教育会坪举行焚烧日货大会。这天黑铅

炼厂等处工人和许多店员工人都参加了。以学生为主的游行队伍,高举「民众联合」、「打倒强权」、「抵制日货」等旗帜,到国货维持会取走所有日货。同时,学生纠察队又从八角亭一带商店中,清出大批日本布疋,一齐运到教育会坪准备焚毁。这时,教育会坪集结群众近万人。学生将日货抛入广场时,欢呼之声雷动。正待举火时,张敬汤带领军警千余人,包围会场。张出言粗野,指着学生们骂道:「你们这般东西,怎么敢挡外(国)人,不怕惹起交涉么?在此瞎闹!你们知道我张氏兄弟拿钱你们读书,还要我们怎么样?我们兄弟是军人,只知道杀人放火,你们再不解散,我就把你们做土匪办,一个个拿来枪毙。」学联负责人和湘雅医学校学生等五人上前交涉,被军警拘缚至教育会内,张敬汤拿手枪威胁说:「你们不怕死吗?」随后给被拘者各拍一张照片,又有长郡中学教员为学生说话,声言焚毁日货,学生出于爱国至诚,并无不法,张手批其颊,并命令士兵拉去打了一顿马鞭子。随之,张敬汤下令军警对在场群众大打出手,刺刀、枪柄、拳足四向纷飞,当场打伤数十人,许多十余岁的小学生,也遭到毒打,哭声载途,民怨鼎沸,这是驱张运动的爆发点,张敬尧点火自焚了。

十二月三日下午,毛泽和一批新民学会会员在自沙井枫树亭易培基家里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易培基是第一师范国文教员,与毛泽东有师生之谊;他的政治背景是谭延文,代表谭延文支持学生们的驱张斗争。谭这时以南方政府委任的湖南督军的名义,统兵三千驻在永州。正谋统一湖南取张而代之。易培基介绍了北洋军直皖两系的斗争。驻防衡阳的直系大将、第三师师长吴佩孚已与湘军谭延文、桂军谭浩明结成反皖同盟,所谓反皖,就是在北京反寺段祺瑞,在湖南反对张敬尧。驻在常德的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唯吴子玉(佩孚)马首是瞻。张敬

尧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已孤立，驱张的时机已经成熟。毛泽东认为，现在关键之举是把群众首先发动起来，首先是把全体学生、教职员动员起来，同张敬尧斗争到底。经过讨论，决定第一步是立即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高举驱张大旗。

关于发动教职员的工作，毛泽东找到了健学会（湖南教育界人士的进步团体）的陈润霖、徐特立、朱剑帆等，请他们召集会员开会，统一对驱张运动的认识。学生是驱张运动的先锋和骨干。毛泽东与彭璜等学生领袖深入各校做学生的发动工作。然后以学联名义召开各校学生代表会，统一学生的思想。在最后一次各校学生代表会议上，还有少数学生代表犹豫，只主张请愿，不主张罢课。毛泽东即席发言，分析形势，激励士气，扫除了一部分的畏难情绪，统一了各校代表的思想，作出了长沙各校总罢的决议。

自十二月六日起，由一师、工专、商专、湘雅、修业、楚怡、明德、周南等校首先罢课，不到一个星期长沙全体专门学校，包括教会办的雅礼大学，以及中学、师范和一部分小学一致罢课了。

罢课以后，湖南学生联合会代表中专以上学校一万三千多名学生，发表驱张宣言。首先历数张敬尧摧残教育的情况：「五十万元教育经费，即尽提作军饷，不得不减成发放，初犹六折五折，渐至三折两折，最后连一折不发。六月份至十二月份，积欠七个整月，酿成教员罢课。学校驻兵两年不撤，学生久无上课课堂。学生组织联合会，交换知识，启发民智，则两度被其解散。」继述二日发生的殴打学生事件，「学生受此奇辱，又回想两年以来，有教育等于无教育，学生受尽摧残之实，张氏反得维持湖南教育之名。呼吁无门，不得已于十二月六日全体罢课，解散归家，守候湘局解决。张敬尧一日不去，学生一日不返校！」

张敬尧继续施以高压手段，于十二月十一日召集各校校长

会议,会场上军警林立,备极森严。张敬尧来临讲话说:「此次学生风潮,是新思潮的结果。学生闹新思潮,诸位职员是否亦有闻见?听说楚怡校长提倡新思想不遗余力,这真是岂有此理。」最后下令:「各校应照常开课。旧学生愿来者听便,否则另招新生,注重读经,教忠教孝。」这是湖南教育界人士最后一次听张督军训斥。张点了名的楚怡学校校长,就是湖南教育会会长兼健学会会长陈润霖。虽然健学会成员政治主张不尽一致,但在反对张敬尧的横暴统治这一点上,大家取得了共识,统一了思想。毛泽东以教员身份与何叔衡、罗宗翰等新民学会会员在教职员中积极活动。于是,以健学会成员为中心,教育界上层的驱张活动,也逐渐酝酿成熟了。长沙教育界对张敬尧高压的回答是,继学生总罢课之后,长沙七十三所公、私立学校一千二百名教职人员宣布总罢教。

在斗争中新民学会在何叔衡、毛泽东的主持下,成了驱张运动的领导核心。总罢课、总罢教实现之后,他们商量决定:由各校派出学生和教职员代表,分别组成学生驱张代表团和教职员驱张代表团,另外再组织一个湖南各界公民驱张代表团,以壮声势,扩大驱张宣传。经过商量,各校共派出代表五十四人。新民学会共派出会员二十余人参加各个代表团的工作。极富宣传鼓动能力的彭璜被派往上海;澎成持重的何叔衡带上夏曦去衡阳游说吴佩孚;毛泽东率领代表团的主体部分去北京。在代表团出发之前,派易礼容先到汉口明德大学借两间房子,作为代表团在汉口的活动基地。

据当年的新民学会会员、美籍华人李振翩教授回忆:

湖南学生联合会最后决定罢课,由各校派代表二名,赴北京请愿撤换张敬尧。联合会秘密通告各校代表,于晚间乘火车到汉口集中。我们到了汉口,在指定的旅馆集中,毛主席已在这里

等候我们。代表们到齐后便开会，讨论一切，把名称定为驱张请愿团，公推毛主席为团长，范围也扩大了，参加的不限于学生。几乎天天开会，讨论宣言内容，进行方针等等。最后决定，留二、三个代表驻在汉口，派几个代表到上海等大城市去联络并筹款，而绝大多数代表，则跟着毛主席到北京去请愿撤张。在北京的湖南同乡很多，均痛恶张敬尧。毛主席和他们联系，他们很同情并支持这个运动。（李振翩：《回忆和毛主席在一一起的时候》，载香港《七十年代》一九七七年九月号）

在武汉，毛泽东还亲自了一份「快邮代电」，电文说：

去岁张敬尧入湘以后，从饿狼之兵，奸焚劫杀；驰猛虎之政，铲刮诈捐。卖公地、卖湖田、卖矿山、垮纱厂，公家之财已去；加米捐、加监税、加纸捐、加田税，人民之膏脂全干。洎乎今日，富者贫，贫者死，困苦流离之况，令人不忍卒闻。彼张贼兄弟累资备数千万……

这个文告先声夺人，打出了「湖南各界驱张请愿团」旗帜，向全国人民揭露了张敬尧的祸湘罪行。武汉学联恰在这时在鲇鱼套车站查获为张敬尧偷运的五十包鸦片烟种子。驱张请愿团闻讯后，立即与武汉学联联系，拍成照片，在报上公布，使张敬尧丑上加丑。

十二月十八日，湖南各界驱张请愿代表团代表三十余人到了北京。他们分作两组：一组为学生请愿团，控告张敬尧纵兵侵占学校，停发教育经费，驱逐教育界名人，殴打爱国学生等款；一组为公民请愿团和教职员请愿团，控告张敬尧纵兵殃民及贪污、搜刮各款。视情况有时统一活动，有时分开活动。

二十一日，北京各校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召开慰劳湖南学生代表大会。会上，湖南学生代表揭露张敬尧在湖南的种种罪行，激起与会者无比愤慨和同情。接着，湖南学生请愿团七次向



总统府、国务院请愿，三次递交控制张敬尧摧残教育的呈文，教育部的一位次长接见了他们。然后，在京发表《罢课二次宣言》，申明来京决心是：「誓驱张氏。张氏一日不去，即全体一日不返校。代表等受同学委托，目的一日不达，即一日不返湘。议之所存，决不反顾。一切利诱威胁概不足以动我辈之心。」

毛泽东是十分重视舆论的作用的，他也深知率请愿代表团到了北京，没有别的力量可以动用，只有舆论的力呈可恃。他和同来的新民学会会友罗耻遇、张百龄，还有已在北京的陈赞周，以神奇的速度创办了「平民通讯社」。他从邵飘萍那里学到的办报知识全用上了。陈赞周正在补习法语，因在西城上课，从三眼井迁到北长街九十九号福佑寺后院居住，这里原是一座喇嘛庙，有空房子。于是他们挂起牌子就开始办公，十二月二十二日，发出了第一批稿件。办公室设在正殿里，办公桌就是一个长条香案，一架油印机是他们唯一的「现代化设备。」毛泽东和其它会友撰写了大量揭露张敬尧罪行的文章，向全国各大报馆发稿。北京《益世报》、《北京日报》、《北京惟一日报》、《京津太晤士报》、上海《申报》、汉口《大陆报》、汉口《正义报》都采用过平民通讯社的稿件，或根据平民通讯社的件写成了社论、时评。四月以后，毛泽东等离京，由罗耻遇独立主持平民通讯社，至一九二〇年底结束。公民请愿团数度到总统府、国务院请愿。但大总统徐世昌、国务总理靳云鹏拒绝接见。一九二〇年一月四日，湖南名流范源濂、郭宗熙带领他们进了国务院，国务总理靳云鹏才接见了请愿团。毛泽东作为首席代表，慷慨陈词，历数张敬尧祸湘虐民的二十条罪状，表达了三千万湖南人民驱张的坚强意志。靳云鹏打拱作揖地说：「政府对这个问题不是没有考虑到，只因湖南为军事前方，倘有调动恐怕影响大局。政府准备退一步先派一位省长到湖南来，而一时也没有办到，我对湖南人实在



抱愧之至。」郭宗熙说：「现在是责任内阁制，责任内阁不应该谈到抱愧两个字。」靳又连连拱手表示「领教」，并且说一定想办法。北京政府的底牌是：靳云鹏想调张敬尧为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由吴佩孚继任湖南督军，由于段祺瑞不同意。又想另派一个省长，让张敬尧专做督军，让出省长的职位来，但张敬尧不答应。虽然是个僵局，但僵局是总要解决的。靳云鹏是段祺瑞的亲信大将，对段有相当的影响力。他的态度表明，张敬尧的湖南督军兼省长的地位，在皖系核心领导层中已发生了动摇，这对湖南请愿团的斗争是有利的。

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三日，请愿团召集在京的湖南同乡一千多人，在湖南会馆召开驱张大会，关起了大门，强迫在场的十个湖南籍的国会议员，签发通电，要求撤换湘督张敬尧，不达目的，即全体辞职以谢湖南三千万人民。

一月二十八日，湖南各界驱张请愿代表团全体和湖南在京学生作最后一次请愿游行，游行队伍高举「代表三千万湘民请命」、「请政府速即撤惩张敬尧」和「与张偕亡」三面大旗，到新华门请愿，因总理靳云鹏不在新华门办公处，又到棉花胡同靳的私宅请愿，给北京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

湖南驱张请愿代表团带来大批揭露张敬尧罪恶的专刊和小册子，内有《湘灾纪略》、《醴陵兵燹纪要》、《实废兵灾纪实》、《张敬尧罪恶史》以及外国人写的《湘祸记》等，在京广为散发。

毛泽东在京期间还与少年中国学会发生了关系。少年中国学会由王光祈、李大钊、陈愚生、曾琦、雷实菁、孟寿椿、康白情、邓中夏、田汉、宗白华、袁同礼、徐彦之、左舜生、周佛海、周炳琳、许德珩等在一九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发起，一九一九年七月一日在北京宣武门内回回营二号陈愚生宅内召开了成立大会。其时毛泽东在长沙，但已报名参加这个组织，所以成立大会上宣布八十

四名会员名单时有毛泽东。参加这个组织后来成为著名共产党人的有李大钊、陈泽民、张闻天、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等。该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编印《少年中国》月刊。总会设在北京嵩祝寺八号。主持会务的执行部主任王光祈（一八八九年——一九三四年），字若愚，四川温江人，中国大学法律系毕业。根据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思想，他集合北京大学等校的男女学生数十人于一九二〇年初组织「工读互助团」。实行半工半读。编成三个组：第一组二十七人，地点在北京大学附近。经营素菜食堂、石印、装订及洗衣等。第二组十九人，地点在工业专门学校附近。除经营素菜食堂和洗衣外，还做简单的工艺劳动，如制浆糊、墨水等。第三组是女子组，地点在女子高等师范附近。主要从事编织和小手工艺劳动。二月份的一天，毛泽东去女子工读团看望湖南籍的同学。看后给陶斯咏写一封信，谓：「今日到女子工读团，稻田（指校址设在长沙古稻田的湖南省立女子师范）新来了四人，该团连前共八人，湖南占六人，其余一韩人，一苏人，觉得很有趣。但将来的成绩怎样？还要看他们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许终究失败《男妇组大概可说已经失败了》。」经过这次接触，毛泽东对少年中国会和工读互助团的印象不怎么样，未参加过该组织的实际活动。一九二〇年，王光祈赴德留学，研究音乐十六年，客死德国波恩。王走后，少年中国学会和工读互助团遂解体。

毛泽东接到其它各路请愿团的消息非常令人鼓舞。一九二〇年一月九日，何叔衡、夏曦率学生请愿团到衡阳求见吴佩孚，吴不便亲自接见，派秘书长接见学生代表，并且表示了同情他们的态度。十日，吴佩孚致电张敬尧，劝说维持学校，勿再干涉学生的爱国运动。

赴广州的学生请愿团,得到了军政府的支持。一月十三日,广州军政府电请北京政府,要求迅速撤换张敬尧。

学联主席彭璜率领的请愿团到了上海,得到了全国学生联合会、全国各界联合会的有力声援。全国各界联合会发表了声讨张敬尧的通电;全国学生联合会则致电张敬尧,劝他「识时务,走为上计。」在各界的支持下,赴沪湖南学生请愿团创办了「天问」周刊,这是一个专作驱张宣传的刊物,由彭璜主编,从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九日到七月十一日,共出了二十四期,不仅发行全国各地,而且发行到法国、日本、南洋,这个刊物在驱张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留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和学联骨干,组成驻省驱张团,团部设在周南女校三楼一间小房子里,由湘雅学校的张维主持;张去上海后,即由明德学校学生会会长、新民学会会员唐耀章主持。通讯联络总站设在易培基家里,保持和北京、上海驱张请愿团代表团的联系。

在省内外一致声讨的形势下,张敬尧有如热锅上的蚂蚁。一面下令开除学生代表,查办何叔衡等教育办人士「永不叙用」;一面收买叶德辉、符定一、曾广钧、廖名缙等,组织「保张团」以与「驱张团」相对抗。叶德辉等数人联名致电大总统徐世昌并通电全国,为张敬尧辩护,说什么「张督仁政迈乎汉唐,武功过于汤武。学生过激,等于土龙;元首英明,不烹走狗。」「保张团」还窜到北京组织「旅京湘事维持会」,通过安福议员,为张敬尧进行各种收买活动。对此,上海《民团日报》刊载了长篇《长沙通讯》,彻底揭发了「保张团」的种种受贿丑闻;《天问》周刊对「保张团」的始末作了系统的报道。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日,平民通讯社发出了《湖南驱张代表电读者讨论保张团》的通电,通电由「湖南公民代表毛泽东」领衔发表,电文说:

张敬尧罪大恶极，久经湘人控告，积案如山。全国人士，亦复口诛笔伐，同声攻击。叶之惟恐不达，走之惟恐不远。乃有号称旅京湘事维持会者，发布传单，以为乱真，浮词耸德，声言力戒对人问题云云。不知三年以来，湘民之困苦颠连，九死一生，家无应门之童，野有自缢之女，何一非张敬尧之所赐，张敬尧不去，湘民宁有幸理？今欲救湘，首在驱张。张去而复湘事始有整理可言。

在各种驱张请愿代表团的揭露和声讨下，叶德辉等人的「保张团」原形毕露，土崩瓦解。与湖南人民进行驱斗争相配合，广州军政府对张敬尧挖墙角的工作也在同时进行。张敬尧能在湖南做督军兼省长，全靠北洋军的武力支持。而北洋军在湘的主力，一是张自兼师长的第七师，一是吴佩孚为师长的第三师，这是张敬尧督军实座下面的两根柱子。吴佩孚自以为打下湖南地盘有功，而督军兼省长一职，段祺瑞给了张敬尧，心中早存芥蒂。只要他从衡阳一撤，张敬尧的江山就成了金鸡独立的局面。广州军政府代表与吴佩孚的代表，经过多次秘密谈判达成了协议，一九二〇年一月三十日，军政府给吴军开拔费六十万元，先付三十万，其余三十万待开拔时付清。吴与军政府相约，当第三师开拔的时候，湘军立刻行动起来接收三师的防地。

四月，驻湘直军第三师、十一师、二十师、十六旅等，由吴佩孚领衔，以全体官兵名义通电全国，指控张敬尧「害及军人的种种罪恶」。责张加重米、监捐税，使北军供给也受到影响。张敬尧已极端孤立，处在四面楚歌中了。

五月二十日，吴佩孚开始撤军。二十七日吴军由水路经过长沙时。段祺瑞致电张敬尧派兵堵截。其时又有吴军将在长沙登岸驱逐张敬尧的谣言。但是，吴佩孚无意于「战长沙」，张敬尧也没有勇气挡住吴军的去路。运送第三师的舰船经过长沙并

未停靠，二十九日经过岳州也未停靠，三十一日全师开到汉口。谭延文的三千人马按照与吴的密约，随吴军撤退而推进。根据张敬尧的命令匆忙赶到湘南接防的湖南接防暂编第二师，在师长吴新田的带领下，不战而逃。二十九日，衡阳入谭军之手。张敬尧派他的兄弟张敬汤「援衡总司令」并且面许一战如胜，即让出第七师师长一职为酬。六月三日张敬汤坐着八抬绿呢大轿出发督师，到了湘潭即不再进。五日听到一些风声，还没见谭军的影子，就连滚带爬逃回长沙，浑身沾带土像个活鬼一样。张敬尧的统治就这样崩溃了，六月十一日，张敬尧带领金家老小和搜刮的财物仓皇逃出长沙。二十六日张敬尧直接指挥和受他节制的北洋军七八万人，全部退出湖省境。张军溃退时，湘东、湘中各地的农民群众，自发地截断交通，夺取辎重，给以击落。

六月十二二日下午四时，谭军先头部队湖南警备司令李韞珩率领所部由湘潭赶到长沙。谭军总指挥赵恒惕十四日到省城。广州任命的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督军谭延文十七日进入省城，因督军署余烬未熄，在又一村讲武堂设临时总部。

易培基因策划驱张运动有功，谭延文当省长后，他当了湖南教育会会长、省图书馆馆长、第一师范校长。实职是一师校长。易培基贯彻了「五四」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在一师颇有建树。他从北京、上海、杭州以及省内，聘来十多位进步教员。毛泽东、陈昌、熊瑾玎都留校工作；外来的教师有夏丏尊、田汉、周谷城、舒新城、王鲁彦、陈启天、余家菊、沈仲九、匡互生（就是「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的匡日休，湖南实庆人）等。毛泽东在教务会议上提出三项主张——是学生自治会的代表参加教务会议，对于教学、生活管理都可提意见；二是发扬学生自治精神，发展学生个性，不开除一个学生；三是学校经济公开，让师生监督。这三项都被易培基采纳，气象一新。

毛泽东也是多项兼职,他是一师二十二班班级教师,全校国文教员,还兼任一师附小校长。他讲国文课,自选教材,把李大钊的《今》、徐特立的《一个留法老学生的自述》、鲁迅的小说、陈独秀的文章都列入教材,还从《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上选了一些章节,公开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解。每次他讲课,课堂上座无虚席,教室外面的走廊上都挤满了人,别班学生还自己出钱请教务处多印一些讲义。易培基对毛泽东的学识、才干和抱负是很看重的。他常对人说:「毛泽东将来要当平民天子。」

## 09 马列初传 赴沪请教陈独秀 黎萧争论 回信同意蔡和森

「五四」过后，陈独秀和李大钊被认为是「过激派」的首领引起了当局的注意。

出于对段祺瑞政府媚外残民的愤恨，陈独秀起草了一份《北京市民宣言》秘密印了几百份。派人在中央公园散发。在一个夏夜的晚上，他亲自出马并带上高一涵（《每周评论》的编辑）、邓初（内务部签事）去撒传单。他们登上新世界屋顶花园，见四周无人，下一层露台上正在放映电影，就把传单从上面撒下来。这时从黑暗的角落里走出一个人跟陈独秀要传单看，陈独秀实在没有秘密工作经验，就从衣袋里掏出一张来给了那个人。那人一看马上说：「就是这个。」预伏的几个暗探一涌而上把陈独秀逮捕了。陈独秀故意跳起来大呼：「暗无天日，竟敢无故捕人。」示意同来的两个人躲避。就这样陈独秀被送进京师警察厅，关了三个月，后来取保释放，被迫辞去了北大文科学长的职务，困居北池子寓所，在北京没有行动自由，外出要报告警察所。

这年冬天，李大钊策划，租了一辆骡车，接上陈独秀，二人化装成外出收账的生意人，头戴毡帽，身穿棉袍，还带了几本账册，一路顺利到了天津，买了一张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逃往上海。

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渔阳里二号租了幢房子。作为《新青



年》的编辑部，他就住在楼上，继续从事革命宣传活动。五月一日，他主编的《新青年》七卷六期出版五一劳动节纪念专号，是这个刊物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标志。

四月初，毛泽东由北京来到上海，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二十九号（今安义路六十三号），与派往上海的驱张代表彭璜等四人住在一起。

毛泽东住下来后，专程去江南造船厂看望上次来沪为自己慷慨解囊的老同学李声，了解一下产业工人的生活，据毛泽东回忆：「李声君劝我入工厂，我颇心动。」

毛泽东多次到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编辑部拜访陈独秀。据毛泽东回忆：「曾经和陈独秀讨论过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陈独秀说到准备组织产业工人工会时，毛泽东说：「我的同学李声，现在江南造船厂一做工，可以帮助陈先生做些事情。」陈独秀非常高兴地说：「你跟李君商量一下，能否搬到我这来住，联系事情方便些。」经过毛泽东的安排，李声搬进了渔阳里二号。十一月，在杨树浦组织了第一个机器工会，李声化名李中，担任上海机器工会主席

一九三六年毛泽东会见斯诺时回忆说：「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忆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着的《社会主义史》。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毛泽东成名以后,把自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间定在「一九二〇年夏天」是有深刻用心的。比起新民学会中的先进人物(以蔡和森为代表),毛泽东要表明略早于他们或与他们同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是蔡和森启发推动毛泽东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时间是在一九二〇年冬天。在本节的后面我们将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一九二〇年五月,新民学会会员陈赞周,熊甫、萧子、刘望成、欧阳玉生、张百龄,分别由北京、天津、长沙到沪,候船赴法。魏韞庵、劳君展、周肫如由湘到沪,学习法文,准备赴法。毛泽东、彭璜、李钦文因驱张活动到沪。在沪会友计十二人。在毛泽东、李钦文的提议下,在上海半淞园开一送别会,在沪会员都到了。会上毛泽东提出,学会的态度应是「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陈赞周、萧子提出,会友分散各地,长沙、上海、南洋、法国,天各一方,相互间应有一种联络通气的东西,提议马上办一会报,为非卖品。除相知师友外,不送与外人。会众均表赞成。推赞周赴法后征集在法会友文稿,润之在上海付印。此时会友已发展到七十余人。大家认为以后发展新会友务宜谨慎,否则不特于同人无益,即于新会友亦无益。议决介绍新会友宜有四条件:(一)纯洁;(二)诚恳;(三)奋斗;(四)服从真理。新会友人会要有会友五人介绍,经评议部审查认可,公函通告全体会员,以昭审慎。这次送别会,开成了讨论会。中午在雨中拍照留念。绿草碧波,望之不尽。五月十一日,陈赞周等六人登轮赴法,毛泽东等到码头送行,握手挥巾,依依而别。

三月间,彭璜等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湖南改造促成会。」随着驱张运动胜利在望的形势,毛泽东认为应在湖南改造和建设问题上大做文章。经与彭璜等商议,在民厚南里二二十九号门口挂起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牌子;在六月二十一日出版的

《天问》周刊,正式发表了《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宣言》指出:「湖南自人民国,三被兵灾,遭难最多,牺牲特大。推原论始,无非督军恶制,为之祸根。督军一日不除,湖南乱象一日不止。」提出了「废督、裁兵」的响亮口号,同时还提出地方自治、银行民办、保障人民各种自由权利等,是一个西方式的民主政治的纲领。了长沙。参加这个组织的成员新增加了许多教育界、新闻界的人士。七月六日,毛泽东起草的《对于湖南改造的主张》,用「湖南改造促成会」的名义发表在长沙的报纸上。《主张》提出:「今后要义,消极方面,莫如废督裁兵;积极方面,莫如建设民治。」谭组安(谭延文的号)、赵炎午(赵恒惕的号)诸驱张将士,劳苦功高,乡邦英俊。此后希望其注意者:第一、能遵守自决主义,不引虎入室;已入室将入室之虎,又能正式拒之而去。第二、能遵守民治主义,自认为平民第一,干净洗脱其丘八气、官僚气、绅士气;往后举措,一切以三千万平民之公意为从达。最主要者,废督裁兵,钱不浪用,教育力图普及,三千万人都有言论出版之自由,此同人最大希望也。」毛泽东这时候的政治主张属于改良主义,他对谭延文还充满幻想。

九月下旬至十月初,长沙各界、各团体都分别开会,讨论「省自治法」如何制定。谭延文也打起反对北洋军阀的「自治」旗帜,表示「服从民意」。十月四日,在长沙总商会召开了一次各界联合会。从「五四」运动到驱张运动,毛泽东在湖南已树立起威信,成为各群众团体公认的民众领袖。所以,公推毛泽东主持这次会议。毛泽东提议由革命政府召集人民制宪会议,获得了一致赞同。第二天,由龙兼公(大公报主笔)、毛泽东、朱剑帆(周南女校校长)、何叔衡、彭璜等领衔共三百七十七人联名发表「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

代表地主富人利益人的谭延文，虽以「革命」的名义代替张敬尧当了省长，但立即与官僚绅商组成的省议会达成了妥协，他提出省议会十一人、省政府十人为制宪起草员，不同意另组什么「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和民众团体的主张顶起牛来。

十月十日双十节，是辛亥革命纪念日，天下着大雨。毛泽东等组织各界群众一万余人举行游行。游行队伍前面打着两面大旗，一面上书「湖南自治」，一面上书「请政府召集人民宪法会议」。游行队伍分三路出发，沿途高呼「打倒旧势力！」「解散旧省议会！」「建设新湖南！」等口号。路过省议会时，见代表旧政权的旗犹在风雨中飘扬，有人上前把旗帜扯碎了。

这起「扯旗」事件被谭延文抓住，遂即变了脸，说这是「出轨道的行动，实应整顿。」「如果仍不觉悟，触犯刑章，政府自当依法取缔」。再不讲什么「服从民意」了。

但十一月，军内部派系冲突突然爆发。赵恒惕逼走谭延文，夺取了湖南政权。赵恒惕出任湘军总司令，原湖南民政处长林支宇任临时省长。赵恒惕接过了「湖南自治」的旗子，组织留美归来的进步人士黄士衡、唐德昌、董维键、王毓祥等起草省宪法草案，大吹大擂，欺骗人民。现实教育了毛泽东，「湖南自治」的改良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

毛泽东从上海回来，还办了两件有很大影响的事情。一是创办文化书社；一是发起成立任罗斯研究会。

七月三十一日，长沙报纸登载了毛泽东起草的《发起文化书社的缘起》。《缘起》称：「没有新文，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

这个文化书社，是毛泽东联络长沙县长姜济寰和商会会长左学廉以及一师校长易培基、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帆等社会名流，集资五百元创办的，租了潮宗街湘雅医学校的三间房子为社址，请谭延文给题写的牌匾，于九月九日开始营业。书社的经理是新民学会会员、商专学生易礼容。它经销的书有《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杜威五大讲演》、《罗素五大讲演》以及《新青年》、《新生活》杂志等新书一百六十余种，杂志四十多种，日报三种。文化书社成为湖南传播马列思想、新文化的基地。与书社发生业务往来的单位达六七十处。像上海商务印书馆、上海泰东书局、北京大学出版部、北京晨报社、北京学术讲演会、广东新青年社、武昌利众书社这些触角灵敏、思想新颖的学术出版机构，文化书社都积极挂钩，建立了联系。一九二〇年底到一九二一年初，文化书社又在平江、浏（阳）西、宝庆、衡阳、宁乡、武冈、涂浦等七处设立分社。书社一直存在到一九二七年，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被捣毁。

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发起成立俄罗斯研究会，首次会议在长沙县知事公署召开，与会二十余人。推举彭璜、毛泽东、何叔衡、包道平（新闻办人士）四人为筹备员。俄罗斯研究会的简章是：「本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新思想为宗旨。会务包括：一、研究所得后，发行俄罗斯业刊；二、派人赴俄实地调查；三、提倡留俄勤工俭学。」九月十六日，正式开成立会。会上推举了总务干事、书记干事、会务干事各一人。毛泽东任书记干事，负责记录及文书事务。同时议定，在个人读书研究的基础上，每星期六下午在潮宗街文化书社自愿集会，讨论交流心得。集中个人和集体的研究成果，发行《俄罗斯业刊》。为筹备赴俄勤工俭学事宜，派代表赴京与俄国大使馆接洽；并在

船山书社开设俄文班，从上海聘教员来长沙教授俄语。湖南青年任弼时、萧劲光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于一九二二去俄国留学的。

这一时期，英国哲学家罗素和国内知名学者张东荪、蔡元培、吴稚晖来长沙讲学。毛泽东受长沙《大公报》的委托，在这些人讲演时，以记者身份担任记录，将讲稿整理出来，供报纸发表。

毛泽东以他卓越的组织能力和宣传能力，领导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萧子升、蔡和森、罗荣熙、李和笙、张芝圃、萧子、熊甫、陈赞周、欧阳玉生、向警予、熊季光、熊叔彬、蔡咸熙等十三人（十四人之说是把蔡母葛健豪也包括在内了），于一九二〇年七月六日至十日在蒙达尼蔡和森家中集会，讨论会务，确定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会务进行的方针，但讨论到改造方法时出现了分歧。萧子升给毛泽东的信中介绍说：「和森主张组织共产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其主旨与方法多倾向于现在之俄。子升谓世界进化是无穷期的，革命也是无穷期的，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社为实行改造之方法，其意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比较和而缓，虽缓而和。」

八月十三日，蔡和森从法国蒙达尼给毛泽东来一长信。详述自己的观点，并介绍了世界运动之大势及俄罗斯革命后之详情。信中提出：

「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

「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



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故阶级战争质言之就是政治战争，就是把中产阶级那架机器打破（国会政府），而建设无产阶级那架机器——苏维埃。工厂的苏维埃、地方的苏维埃邦的以至全国的苏维埃，只有工人能参与，不容已下野的阶级参与其中，这就叫做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革命后不得不专政的理由有二：

「无政权不能集产，不能使产业社会公有。换言之，即是不能改造经济制度。」

「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阶级而是复起，革命将等于零。」

「因此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明证。所以我对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

从何着手呢？

「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

「然则这种党如何的准备组织呢？照旧组织革命机关，是不中用的。我以为要邀一些同志跑到资本家的工厂里去，跑到全国的职业机关议会机关去。去干什么？去做工，办事，当代表，做议员。我望你物色如殷柏（按即湖南省学联主席彭璜）者百人，分布全国各处，不必他往，亦不必另组机关，即以中产阶级现成的职业机关、议会机关，做革命机关。这种方法，我得之于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布党遍布全国各机关，列宁亦入了克伦斯基政府，所以十月革命一举成功。」



「我意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这事关系不小,望你注意。」

蔡和森出洋七个月,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理解、消化的程度,应该说是远远高出了毛泽东。这封信和萧子升的信,还有一封李维汉的信,飘洋过海,十一月二十六日以后才到了毛泽东的手里,使毛泽东的思想起了一个突变。

在此之前,毛泽东的思想处在进步的过程中,他办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都是他思想左倾的表现,但他还没有完成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这一天,毛泽东在萍乡写了四封信.自称是「近因积倦,游览到萍,旅中作书。」一封给罗章龙,一封给向警予,一封给李钦文,一封给欧阳玉生。这四封信可以充分说明他的政治思想仍停留在「湖南自治」的水平,还根本没有考虑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在给北京罗章龙的信中说道:「我主张湖南人不与闻外事,专把湖南一省弄好,有两个意见:一是中国太大了,各省的感情利害和民智程度又至不齐,要弄好她也无从着手。从康梁维新到孙黄革命(两者亦自有他们相当的价值当别论),都只在这大组织上用功,结果均归失败。急应改途易辙,从各省小组织下手。湖南人便应以湖南一省为全国倡。各省小组织好了,全国总组织不怕他不好。一是湖南的地理民情,均极有为,亲在全国的总组织中,既消磨特长,复阻碍进步。独立自主,可以定出一种较进步的办法(湖南宪法),内之自庄严璀璨其河山,外之与世界有觉悟的民族直接携手,共为世界的大改造。全国各省也可因此而激励进化。所以弟直主张湖南应自立为国,湖南完全自治,丝毫不受外力干涉,不要再为不中用的‘中国’所累,这实是进于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而非和有些人所谓零碎解决实则是不痛不痒的解决相同,此意前晒未尽,今再补陈于

此。」

在给法国的向警予的信中谈到「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决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开道路，另造环境一法。」另开什么样的道路，毛泽东仍是茫无头绪的。他对向警予说：「弟和殷柏等主张湖南自立为国，务与不进化之北方各省及情势不同之南方各省离异，打破空洞无组织的大中国，直接与世界有觉悟之民族携手，而知音绝少。」他当时想到的办法是湖南独为国，惜乎找不到知音者，自己感到行不通。

在给新加坡李钦文的信中说：「湖南须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好的。大伟人虽没有十分巩固，小伟人（政客）却很巩固了。我想对付他们的法子，最好是不理他们，由我们另想办法，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到不必和他们争一日的长短。」这封信说明，毛泽东谋湖南的独立、自治、改造，和当权者的地位、利益可以并存而不悖，绝无反对当权者的意思，是「不理他们」谋改造，而不是「打倒」他们谋改造。

第四封是给在法国的欧阳玉生，毛泽东说：「弟意凡事不可不注重基础，弟见好些团体，像没有经验的商店，货还没有办好，招牌早已高挂了，广告早已四出了，结果离不开失败，离不开一个‘倒’。半淞园会议，都主张本会进行应取‘潜在的态度’，弟是十二分赞成，兄也是赞成的一个，长沙同人，亦同此意。」毛泽东主张新民学会韬光养晦，潜在待时，不要「早挂招牌」、「早出广告」。毛泽东此时已有心把新民学会改造成为一个政治团体，也想到了「挂招牌」、「出广告」的意思，只是要考虑成熟再把牌子亮出来。在第一封给罗章龙的信中，毛泽东曾谈到「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集合，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

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但奉行什么主义，立什么样的旗帜，毛泽东还没有想清楚成者说他还没有拿定主意。

这四封信说明，截止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还没有改造国家的明确的路数和系统的主张，还没有决定到底应该信奉什么主义。蔡萧的海外来信，在他面前树起了两旗帜：一面上书马克思列宁主义，一面上书蒲鲁东主义，把他思想上朦胧不清的问题捅破了。

蔡和森到巴黎以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献「猛看、猛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对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发展情况，有了全面的深刻的了解。他在一九二〇年九月十六日致毛泽东的一封信中说：「我以为世界革命运动自俄革命成功以来已经转了一个大方向，这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不懂的人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以暴易暴的，不知列宁及万国共产党（按：指共产国际）已再三宣言，专政是由资本主义变到共产主义过渡时代一个必不可少的办法。」蔡和森的这一段话表明，他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已经抓到精髓。列宁说：「只有把承认阶级斗争扩展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一九一页）当毛泽东怀着崇敬的心情阅读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那本小册子的中译本的时候，蔡和森已经知道「考茨基、伯伦斯下（按：即伯恩斯坦）」是「修政派改良派」了。（一九二〇年九月十六日致毛泽东的信）这样说丝毫没有贬低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的外文水平始终没有达到能独立阅读的程度，他在国内只能看第二手的中文译本。蔡和森到了巴黎，全方位多视角的接受外界信息，直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出洋七个月，对马列主义理论的了解远远超出了毛泽东是很自然的事情。

毛泽东哪一天从萍乡回到长沙不清楚,哪一天接到蔡、萧来信也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这两件事发生在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一日之间。在这六天的时间里 - 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飞跃。他在二十月一日夜十二点写的复信中说:「我于子升、和笙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毛泽东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蔡和森的全套主张和办法。

毛泽东对比了蔡和森和萧子升的意见,发表自己的见解说:「我对子升、和笙两人的意见(用和平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升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无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但我于罗素讲演后,曾和殷柏、礼容等有极详之辩论,我对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罗素和子升、和笙主张的要点,是‘用教育的方法’,但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总而言之,现有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以资本主义教儿童,这些儿童大了又转而用资本主义教第二代的儿童。教育所以落在资本家手里,则因为资本家有议会以制定保护资本家并防止无产阶级的法律。有政府执行这些法律,以积极的实行其所保护与所禁止。有军队与警察,以消极的保障资本家的安乐与禁止无产者的要求。有银行以为其财货流通的府库。有工厂以为其生产品垄断的机关。如此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学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教育权?如此,资本家久握教育权,大鼓吹其资本主义,使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宣传,信者日见其微。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

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管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但毛泽东作出结论「走俄国人的路」是在十月革命三年以后,即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长沙大雪满城,寒光绚烂,景象簇新。毛泽东心明力定,意气风发,带着明确、的主义和健全的理论来到潮宗街文化书社。由于毛泽东的提议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要在这里连续集会三天。到会十八人一毛泽东、何叔衡、陶斯咏、易礼容、钟楚生、周文元、任培道、陈启民、易阅灰、陈章甫、彭荫柏、熊瑾玠、刘健庄、陈予博、贺延祜、李承德、邹半耕、张泉山。上午九时半会议准时开始,由何叔衡主持,毛泽东作主题报告。他提出要讨论三个重大问:

(一)新民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

(二)达到目的须有和什么方法?

(三)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

毛泽东说:「三问题有联带关系,故连带讨论。我可将巴黎会友对于上列问题讨论的结果,报告大众。」巴黎会友讨论的结果,对于(一),主张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对于(二),一部分会友主张用急进方法,一部分则主张用缓进方法;对于(三),一部分会友主张组织共产党,一部分会友主张实行工学主义及教育改造。

在三天会上,会友们都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三个问题一一表态,各抒己见。对前两个问题还进行了表决。

关于第一个问题：

主张用「改造中国及世界」为共同目的者十人：陶斯咏、易礼容、毛润之、钟楚生、周文元、任培道、易阅灰、陈章甫、彭荫柏、陈启民。

主张用「改造世界」为共同目的者五人：熊瑾玎、刘继庄、陈子博、何叔衡、贺延枯。主张用「促进社会进化」为共同目的者一人：李承德。

声明不参加表决者二人：邹半耕、张泉山。

关于第二个问题：

赞成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十二人：何叔衡、毛润之、陶斯咏、易阅灰、易礼容、陈章甫、张泉山、陈子博、钟楚生、贺延枯、彭荫柏、陈启民。

赞成德谟克拉西者二人：任培道、邹半耕。

赞成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者一人：李承德。

未决定者三人：周元、刘继庄、熊瑾玎。

关于第三个问题，即如何着手的问题，大家议了六项：（一）研究及修养；（二）组织；（三）宣传；（四）联络同志；（五）基本金；（六）基本事业。多属具体做法，遂一致通过。关于组织一项，决定‘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是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以后，跟着毛泽东走的都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新民学会实际上分化解体，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 10 十年夫妻 杨开慧无私奉献 一朝永诀 毛泽东抱恨终天

杨开慧是毛泽东的原配夫人。

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六日，杨开慧诞生在长沙县东乡的板仓。有文学修养的父亲杨昌济给她取名开慧，号霞，字云锦。母亲向振熙，是一位勤劳俭朴的妇女。哥哥杨开智，比开慧大两岁。在开慧不满三岁的时候，杨昌济怀着救世济民的抱负，远涉重洋，出国留学去了。开慧在妈妈的抚养下度过了童年。

开慧长到七岁，爸爸从国外来信，嘱咐妈妈要开慧上学读书。板仓冲女孩子还没有上学读书的，杨开慧开了风气之先。她家对门的杨公庙，办了第四十初级小学。学校破例为开慧等七个女孩子单开了一个班。开慧在杨公庙小学读了三个学期，转到离板仓五里多路的储能学校。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发生后不久，她又转到了衡粹女校。这个学校办了实业科，可以学编织、缝纫、绣花等。校长是留学日本回来的，思想进步，有时给学生讲日本的明治维新，讲广州起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讲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给学生们灌输初步的革命思想。后因衡粹女校要迁到长沙去，杨开慧又转到麻林桥附近的县立第一女子高小，一直读到毕业。

一九一二年，杨昌济从国外归来，受聘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全家于一九一三年搬到长沙城，在离一师不远天鹅塘住



了下来,后来迁到李氏芋园。杨昌济保持名士家风,特意制了一块铜牌,镌刻着「板仓杨」三个隶书字,钉在门口。杨昌济以他渊博的学识和高尚的品德吸引了学生。板仓杨寓成了学生们常来的地方。

十三岁的开慧娴静端庄,聪敏好学。来长沙后不上学了,在父亲指导下读书自学。当毛泽东、蔡和森、陈昌等来家向父亲请教时,她总是搬一条小凳坐在旁边,听他们谈论治学、做人之道,探讨历史兴衰、救国救民的道理。渐渐熟悉以后,开慧还参加毛泽东组织的登山郊游活动,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像照顾小妹妹一样照顾开慧。

一九一八年五月,杨昌济接受北京大学的聘请,出任伦理学教授。十七岁的杨开慧随全家北上来京,住在地安门豆腐池九号。不久,因授课和社会活动过频,杨昌济患肾炎和神经衰弱症,先在家调养,后因病情不见好转,住进东交民巷德国医院接受治疗。出院后又在西山卧佛寺静养。不论在家还是住院疗养,开慧都陪伴在爸爸身边,侍奉汤药,并给爸爸读书读报。每期新出版的《新青年》是必须给爸爸读的;另外还读过《红楼梦》、《玩偶之家》等中外文学名著。

一九一八年,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先去豆腐池「板仓杨寓」探望老师杨昌济先生,并在家里住了几天。杨先生和师母见到毛泽东,十分快慰,帮助他妥善地安排在京的生活。这时的杨开慧正当豆蔻年华,对于毛泽东,虽然相识多年了,但这次见面,心中却有一种异样的感情。在父母的促成下,他们相爱了。故宫、北海、香山,都留下了他们的游踪。秋天的红叶,冬天的白梅,在这一对年轻人的心目中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他们的爱情像红叶那样艳丽,像白梅那样纯洁。

一九八四年政府在修缮杨开慧的故居时,在杨家老屋的墙

缝中发现了开慧的诗文手稿七篇。其中有一篇是对自己初恋的记载：

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上了他，不过我没有希望过会同他结婚……。一直到他有许多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敢相信我有这样的幸运……。自从我完全了解了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象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去死！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个命运！

杨开慧喜书法，懂诗词，不事铅黛，志存高远，这使毛泽东非常爱慕。

一日，泽东向开慧要诗。开慧说：「我喜欢诗，但作不好，临时应酬更写不出来。去年在长沙时，因和周南女中李一纯要好，曾送他两册精装的诗韵。李一纯买了两盆菊花回赠。我曾作过一首诗答谢。」说到这里，略一沉吟，吟诵道：

高谊薄云霞，温和德行嘉。

所贻娇丽菊，今尚独开花。

月夜幽思永，楼台入幕遮。

明年秋色好，能否至吾家？

毛泽东用心听着，小声重复着，体味诗中的含意。待听完，笑着说：「霞，这诗赠给我不是很合适吗！」开慧脸色腴红，细一回味，确像一首爱情诗。如头两句：「高谊薄云霞，温和德行嘉。」润之不正好当此吗。「所贻娇丽菊，今尚独开花。」这不像是说自己尚未许人么？想到这里，脸像火烧一样，忙辩白说：「你不要曲解人家的诗，我对你说了，是给李一纯的。」毛泽东说：「我最喜欢最后两句：‘明年秋色好，能否至吾家？’」第一次

北京之行，二十五岁的毛泽东开始了自己的初恋。

一九一九年年底，毛泽东率驱张（敬尧）代表团第二次到了北京，自然住在开慧家里。一年多来，鱼雁传书，他们的关系更加亲密了。一天，开慧发现泽东晾在竹杆上的一件白衬衣破了，便取下来为他缝补。此事被妈妈看到了。作母亲的把这看作是他们「定情」的标志，因而非常高兴，告诉杨昌济和家里人说：「开慧帮毛先生补衬衣了，她还从来没补过衣服呢？」杨先生这时已沉痾在身，听到这个话脸上露出了笑容。一九二〇年一月十六日，一代学人杨昌济先生不牵在北京逝世。临终前，他给老友章士钊写信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信中说：「毛蔡二君，当代英才，望善视之。」章士钊是湖南长沙人，著名的革命党人，时任南方军政府议和代表，驻节上海。

杨昌济逝世后，由蔡元培、李肖聃、毛泽东等数十人署名的《讣告》中说：「先生操行纯洁，笃志嗜学……吾国学术不发达，积学之士寥落如晨星。先生周将嗜学终身者，因不假年，生平所志，百未逮一。」

在北京和长沙的教育界，都开了追悼会。毛泽东在京以半生半婿的身份参加了守灵。元月下旬，开慧一家扶柩南下，将杨昌济先生归葬于长沙板仓。

一九二〇年四月，毛泽东到了上海。为给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友筹措路费，他拿着杨昌济生前写好的亲笔信函访章士钊先生。章士钊展读信函，见老友临终前向他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函称「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章士钊对杨昌济的学问道德素来钦佩，见信后热情接待了毛泽东。见这个桑梓后生谈吐不凡，胸怀大志，觉得老朋友的眼光不差，遂答应尽力相助。数日后，筹集到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四十三年后，毛泽东对帮助学习英文的

章含之(章士钊的女儿)说:

「行老(注:章士钊字行严)哪里晓得他募捐来的这笔钱帮助了共产党的大忙。当时一部钱确实供一批同志去欧洲。另一部分,我们回湖南用于造反闹革命了。」

杨开慧到了长沙,得到父亲生前好友李肖聃先生的热心关照,介绍她进了兴汉门外留芳领下的福湘女中读书,和李先生的女儿李淑一住在同一间寝室,还有八个同住的同学,经李淑一介绍很快就熟悉了。这是一所教会学校。要读圣经,做祷告,唱赞美诗。校长是美国牧师的夫人林支尼。开慧一进这所学校,对校风、校规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学校也觉得这个从北京来的学生,头发太短,思想太新,怀疑她是「过激派」。李先生是这所学校的国文教员,遂跟同事们说明:「杨开慧的父亲就是湖南教育界有名的杨怀中先生,我和怀中是挚友。怀中先生过世了,对他的后代,希望教育界同仁多加照顾。」

杨开慧和李淑一因为是两代人的友谊,特别要好。一日,在留芳领下散步,开慧对好友敞开心扉,谈了她和毛泽东正在恋爱的事,介绍了毛泽东的人品、学问,以及父亲生前对毛泽东的评价。还谈到,毛泽东最近赠给她一首词,调寄《虞美人》,开慧轻轻地背诵道:

醒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怎难明,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

晓来百念皆灰烬,倦极身无凭。一勾残月向西澹,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虞美人》一词,写于为老师治丧期间。其愁和悲蕴含着毛泽东对先师的怀念,也表达了对恋人的思慕之苦。

据李淑一说,杨开慧给她看过毛泽东的手稿。上文就是根据她的记忆,或有不确之处。建国后李淑一曾致函和志泽东请

他将《虞美人》写出来，毛泽东回信说：「开慧所述那首不好，不要写了吧。有游仙一首为赠。」这就是流传甚广的那首《蝶恋花·答李淑一》。

一九二〇年七月初，毛泽东也回到了长沙。他介绍杨开慧参加省学联的宣传工作。暑假，开慧奔走于各校之间，组织各校的演讲队。讲演队举着旗帜，敲着锣鼓，活跃在街头巷尾，他们或登台讲演，或化装演出，或散发传单，庆祝驱张斗争的胜利，宣传废督裁兵，建设民治，普及教育。开慧听说长沙北门外和丰火柴公司有不少不识字的女工，便约了一个姓蒋的同学去办识字班，借了一间堂屋作教室，自己刻蜡板，编印识字课本，一个工人识字班就这样开学了。由于工人报名参加学习的十分踊跃，由十几个人发展到数百人，识字班也由一个发展到三个，由三个发展到九个，出来参加教课的同学达到二十多人。要做这些社会工作，主要在假日和晚上，同学们有时回校较晚，学校关了大门，就从后门翻墙而入。有一次一个翻墙的同学被校方抓住了，校长让开检讨会，追问学生到哪里去了。事情牵涉到带头的杨开慧，教务处主任找杨开慧谈话。

「你怎么经常外出？」教务主任提出质问。

「我有事。」开慧答。

「你是学生。」

「每次出去不都请假了吗？」

「你是来读书的，还是在外面做事的？」

「书也要读，事也要做！」

「你来校一年，不做‘礼拜’，不读《圣经》，亵渎耶稣，破坏校规，你还有什么话说？」「耶稣不是也讲自由吗！我有我的自由。」

话谈崩了。开慧在福湘女校也呆不下去了。离校后她住在

潮宗街姨妈家里。

正在这个时候,湖南知识界就女子教育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一般具有民主主义思潮的知识分子,认为要解放妇女就必须实现男女教育平等,因而主张「男校宜速开禁」,实行「男女同校」。「男女同校」理论上被认可了,但没有人开风气之先,没有女生报名进男中。杨开慧想作这个「带头羊」,她找毛泽东商量,毛泽东热情地给予支持。于是,开慧串连福湘、周南两个女校的五名女同学,冲破重重阻力,毅然进入岳云男子中学第十四班学习,成为湖南男子中学中的第一批女生。

一九二〇年冬天,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老人的积极筹办下,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了。

毛泽东从章士钊手里接过了两万块银元。那时去法国的船票是每张大洋一百元,五月份六位赴法勤工俭学会友的路费共用去六百元。九月份又有四位会友赴法国和南洋(赴南洋的船票用不了一百元,也按一百元计),用去四百元,总共开销一千元。就是说,毛泽东手里可能还有一万九千块银元,真可谓腰缠万贯。毛泽东结婚本来可以在长沙布置一个很像样的小公馆。但毛泽东是公私分明的,这笔钱是革命经费,一块钱都不动用。他和杨开慧各住学校的集体宿舍里,在长沙竟没有一个共同的家,结婚时不得不回到板仓来,开慧母亲准备给女儿买嫁妆办酒席的百十块钱,又被开慧要出来交给毛泽东作创办文化书社的经费了。所以,他们结婚,一没买嫁妆,二没坐花轿,三没办酒席。家具什物全是旧的。木路子窗下,摆着一张方桌,桌旁一把藤椅,几张方凳。旧式的木床上,挂着白夏布蚊帐,被褥枕头也都是开慧日常用的,拆洗干净摆在那里。只是窗前天井里的一株山茶,碧绿的叶片,含苞的花蕾,为新房增添了无限的生机。

毛泽东与杨开慧在板仓住了十几天,春节过后,又回到了长

沙。他们在妙高峰下陈昌的家里，接待了交往最密的几位朋友，大家每人拿出几角添菜钱，由陈昌的妻子和毛泽民的妻子一起动手，做了几个菜，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饭，表示对毛泽东、杨开慧结为伴侣的祝贺。一九二一年冬，杨开慧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毛泽东是湘区党的书记。他们在长沙小吴门外的清水塘用一师附小校长（毛泽东的公开社会身份）的名义租了几间房子。这里便成了省委机关。杨开慧成为当然的驻机关的秘密党员。开慧的母亲也住在一起。一九二二年四月，有一位叫张琼的衡阳女青年在清水塘暂住几天，目击了杨开慧和毛泽东共同生活的几个镜头，她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

开慧姐不愧是毛主席的亲爱的夫人和亲密的战友。她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美心体贴，使毛主席有更充沛的精力考虑和处理革命大事。那时，毛主席常常通宵达旦写东西，寒冬腊月也是这样。一到晚上八九点钟，开慧姐就把取暖用具给毛主席准备好；深夜一两点钟，常起来取出临睡前热在锅里的「点心」，有时候毛主席没顾上吃，她就等在旁边，待吃完后才去睡。那时候，毛主席夜里经常只睡两三个小时，清早，又出去工作。她就去整理毛主席夜里写的东西。在草稿本上，凡写「定稿」二字的，她就誊写到另一本簿子上去。那时，他们已有了孩子岸英。开慧姐在抄写文件时，常常把岸英的摇篮放在身边，一边抄，一边用脚摇摇篮。

（上海《文汇报》一九七七年十月五日）

一九二三年，在一个分别的日子里，毛泽东有《贺新郎·挥手从兹去》一首赠给杨开慧，词中写道：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鼎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汝。人有病，天知否？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



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这首临别道情的词，肝胆相照，一往情深。据专家考证，写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毛泽东离长沙去上海之际。

从一九二〇年冬至一九二七年八月，毛泽东与杨开慧共同生活了七年。生育了岸英、岸青、岸龙三个孩子。杨开慧跟随毛泽东，时而在长沙，时而在上海，时而在广州，时而在武汉，四海为家。为了照顾毛泽东，她作为贤妻良母，默默地奉了一切。

秋收起义，杨开慧与毛泽东分手以后，作为一个女革命家，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她在家乡进行了可歌可泣的地下斗争。毛泽东初上井冈山给杨开慧写过一封信，信中大意说，我在这里做买卖，赚了钱，生意兴隆，堪以告慰；并提到了自己的脚伤。发信地点是江西宽岗县××中药铺。开慧凝视着遒劲的笔迹，体味着含蓄的词句，激动万分。收到这封信后，杨开慧写了回信，但以后再也没有收到第二封信。

一九二八年十月，杨开慧写了一首怀念毛泽东的诗，题名《偶感》：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

念兹远行久，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

诗中「足疾已否痊」她收到毛泽东唯一一封来信的证明，「书信不可通」是她去信再也没有得到回信的证明。

一九二二年以后，白色恐怖日益严重。湖南省委负责人郭亮等先后被捕牺牲了。开慧的表弟和堂弟这些跟随她干革命的青年也牺牲了。与开慧关系密的杨柳坡小学女教师、杨柳坡党支部组织委员郑家益，被「铲共义勇队」抓到天王寺，用黄草纸包

着辣椒粉，对她边熏边拷打，最后熏得她眼睛都出血了，郑家益始终没有暴露中共的秘密。匪徒折磨她不能行走，第三天用箩筐抬到杨柳坡杀害了。党内的同志和乡亲们都很担心开慧的安全，劝她离开板仓，或送她到江西去。每次她都婉言谢绝了。她说：「没有润之的亲笔信，我不能擅自离开自己的战斗岗位。」

一九二九年春夏之间，开慧给堂弟杨开明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好象已经看见了死神唉！它那冷酷的面孔！说到死，本来而（于）我并不惧怕，且可以说是我喜欢的事。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呵，我有点可怜他们！而且这个情绪缠扰得我非常厉害。」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的闹了一晚。我决定把他们家的小孩们托付你们，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父长存，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且他们的叔父是有很深的爱对于他们的。但是倘若真个失掉一个母亲，或者更加一个父亲，那不是有一个叔父的爱可以抵得住的，必须得你们各方面的爱护，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生长，而不至受那狂风骤雨的侵袭！明知死亡的凶险而不避，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是对主义的忠诚，对中共的忠诚，对毛泽东的忠诚。

一九〇三年，红军两次进长沙。湖南军阀何键侦知二打长沙是朱德、毛泽东亲自带着队伍来的，把疯狂的仇恨转移到了毛泽东的亲属身上。他出了一千大洋的赏格捉拿毛泽东的妻子毛杨氏。在群众的掩护下，杨开慧躲过了几次追捕。十月二十四日，开慧的行踪被秘探发现了。「铲共义勇队」区队长范亲熙带着八十多人，于午夜包围了板仓。一阵紧急的打门声把杨开慧惊醒。她听出声音不对头，立即披衣起来，向后门走去。从后窗向外张望，见有两个黑影子在晃动。她知道敌人已经包围了这座房子。立即划根火柴烧掉了没有送出去的两份文件。这时敌人已经破门而入，冯进杨老夫人住的正房，遁问「霞姑在哪里？」

开慧见事已至此，穿上那件灰底红格子旗袍从容走了出来。范亲熙又下令把八岁的岸英也带走。杨老夫人紧紧搂着孩子说：「这八岁小孩子有什么罪？范亲熙队阳怪气地说：」带他进城去玩玩，免得霞姑心挂两头。匪徒抢走了岸英，并命令照顾孩子的孙嫂（陈玉英）也一起跟着走。

杨开慧被捕后，开始押在伪「长沙警备司令部」监狱。由阴险毒辣、富有反共经验的「清乡司令部」执法处长李琼审讯。一照面，他虚擅地说：「榜先生，让你受惊了。这次我们请你来，只问你几句话，就送你回去。」

「有这样五死大绑

请来对话的吗？」杨开慧目视捆绑自己的绳索。

「快给杨先生松绑。」然后，李琼令两个狱卒遇下。

「你是共产党吗？」正式审问开始了。

「是！杨开慧昂然回答。」

「你丈夫毛泽东现在在哪里？」

「在井冈山。」

「你们怎么联系？」

「通过你们的报纸。」

「通过哪一家报纸？」「通过国民党的报纸。看了你们的报纸，我知道他领导了秋收暴动；看了你们的报纸，我知道他带队伍上了井冈山；看了你们的报纸，我知道他指挥红军杀得你们丢盔卸甲……」

「住口！把你们地下党名单交出来！」执法处长气急败坏地嚷起来。

「这是我党的秘密，不能交给你！」杨开慧直截了当，正面与敌人交锋。

敌人为了要弄到地下党的名单，对杨开慧押杠子，十指钉竹

筏，野蛮拷打，用尽了酷刑，开慧死去活来，但坚贞不屈。

「几天后，把她转移到广清乡司令部」关押。十一月四日，因怕共产党动狱，再转到陆军监狱署。有人记得转监时押筏上写明：「最严重的政治犯，女共党杨开慧一名，附小孩一名，女工一名。」一次又一次地过堂、用刑、十天过去了，何键一无所获。

中共地下党和杨开慧亲属的营救活动也在紧张地进行着。何健迫于上海、南京许多知名人士来函来电保释杨开慧的压力，跟他的爪牙交代：只要杨开慧同意登报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就行了，其它像地下党名单什么的，既问不出来，就不必问了。并决定监狱署的欧署长和一位曾是杨昌济先生的学生的陶师长去做杨开慧的软化工作。这两个人由李琼带着来找杨开慧谈话。陶师长先说了一番恭维杨怀中先生的话，然后直截了当地说：「何主席讲了，现在保你的人很多，你何必跟毛泽东受连累呢？只要你在报上发表一个启事，公开宣布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马上就给你恢复自由。」杨开慧义正辞严地回答说：「你们要打就打，要杀就杀，要想让我与毛泽东脱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

一天，六舅妈来探监。开慧嘱托为她缝制一套内衣裤，带一点胭脂水粉来，还说要一面整容的小镜子。六舅妈心想开慧平日从不梳妆打扮，听了这异样的要求，知道她准备先「先」了，禁不住老泪长流。开慧很能克制，继续说：「不要难过，请妈妈替我和润之带好岸英、岸青、岸龙三个孩子，儿无憾。」

何健听说杨开慧不为所动，对于发表个与毛泽东脱离关系的声明，也断然拒绝了，感到实在难以下台，就悍然下令处决杨开慧。只是把砍头改为枪毙，算是给各方面求情者的面子。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四日清晨六点钟，看守长对着女牢一声长嚎：「提杨开慧！」

开慧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从容换上新做的白布内衣，外面罩上她与毛泽东分手时穿的蓝旗袍，洁白的裤子，黑色带绊的布鞋。八岁的岸英好象也懂得要与妈妈永别了，扑倒在妈妈脚下，抱着妈妈的腿嚎啕大哭。开慧把孩子搂在胸前，轻声说：「孩子，没有别的话要说。如果你将来见到爸爸，就说我没有做对不起党的事。说我非常想念他，我不能帮助他了，请他多多保重。」孙嫂哭得很厉害，说：「杨先生，你不能走啊！孩子舍不得你。」开慧作为女儿，作为妻子，作为母亲，她想到了自己的骨肉亲人，她是多么希望活在这个世界上啊！面对孩子和孙嫂，面对难友们一双双泪眼，她克制自己的悲愤，让眼泪往肚子里流，临出牢房时说：「孙嫂，你莫哭。我死了可能会放你们，你带着岸英回去，等孩子长大，你们就会好的。」又对难友们说：「同志们，别难过，只要坚持斗争，总有一天会胜利的。」

在省清乡司令部特种刑庭，执法处长进行最后一次劝说：

「你上有老母，下有孩子，年纪轻轻的，要为自己的将来着想啊！只要你答应发个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事情就算了结。」

「这些事，我有自己的主张，不用你们管。」

「你不怕死吗？」

「牺牲小我，成功大我！」……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四日，杨开慧在长沙济阳门外识字岭从容就义，时年二十九岁。

一个月后，在井冈山的毛泽东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知道了杨开慧遇难的消息。历历往事，涌上心头。这时，毛泽东已再婚了。他有一种负罪之感。提笔给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写了一封信，信中有一句话：「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并寄银元三十块作为安葬费用。

这「百身莫赎」四个字怎么解？有人解释：「意思是说，像杨开慧同志这样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一百个平庸的生命也抵不了。」这是望文生义的理解。

毛泽东古文根底很深，好用点。南朝梁国才女刘令娴与丈夫徐悱（也是个才子，官至太子舍人，晋安内史）感情甚笃，悱英年早逝，令娴作《蔡夫文》，中有「一见无期，百身何赎」之句，（见《艺文类聚》上，六八〇页，中华书局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第一版）言虽百死其身亦不足以偿所失之人。「百身何赎」又是从《诗经·秦风·黄鸟》三章「如可赎兮，人百其身！」衍化而来。据研究《诗经》的专家陈子展解释，这两句诗的意思是：「假如可以赎出啊，吾人一身百死也成。」（见《诗经直解》上，第三九一页，复旦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可见，「百死」不是让别人去死，让一百个「平庸」的人去死，是作者自己去死一百次。当然，人死只能一次，「百死」之说是文学语言，表示对死者的感情深厚而已。

## 11 毛润之言 三十年后取下天 共产党兴 四忆神州起风雷

一九一七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历史事件。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至六日，三十个国家的工人政党和组织的代表在莫斯科集会，召开世界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表《共产国际宣言》，在列宁的领导下成立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以和伯恩斯坦、考茨基的支持本国政府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沦为社会沙文主义的第二国际相区别。第三国际总部设在莫斯科。凡参加第三国际的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支部。从此，第三国际成了各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

一九二〇年二月，列宁派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中名吴延康）和杨明齐（华侨，俄共党员）到中国。他们的使命是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帮助中国建党。经北京大学俄籍教授伯伟烈介绍，他们最先拜访了李大钊；又由李大钊，到上海拜访了陈独秀。

据周佛海回忆，一九二〇年夏天，他从日本回到上海。「有一天我和张东荪、沉雁冰，支环龙路渔阳里二号去访仲甫（陈独秀字仲甫）。当时有第三国际远东代表俄人魏金斯基在座。魏大意说：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潮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有社会民主主义，有基尔特社会



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势。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谈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革命。他的结论,就是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扶桑笈影溯当年》)

这次谈话之后,据李达回忆:「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沉率庐、戴季陶等人就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孙中山知道了这件事,就骂了戴季陶一顿,戴季陶就没有参加了。当时在上海参加发起的人有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沈玄芦、李达等。当时还起草一个党章草案,由李汉俊用两张八行信纸写成,约有六、七条,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用下列的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一、劳工专政;二、生产合作。我对于「生产合作」一项表示异议,陈独秀说,等起草党纲时再改。

「这个组织发起后,由陈独秀、李汉俊找关系,当时在全国各地发起组织共产党的有:在北京由李大钊、张太雷、邓中夏、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李梅羹等人;在武汉由陈潭秋、董必武、包惠僧等人(李汉俊本人也去到武汉);在广东由谭平山、陈公博、陈达材等人;在济南由王尽英、邓恩铭等人;在东京由施存统、周佛海等人;在湖南由毛泽东同志负责另函约巴黎的朋友在巴黎组织。邵力子、沉雁冰是在党发起以后加入的(以后都又退出了)。截至一九二一年六月止,共有八个中国共产党小组,而巴黎小组与国内各小组当时联系很欠缺。

党的上海发起组,推陈独秀做书。另外还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因为当时有许多青年离开学校和家庭来到上海找《新青年》社想办法,所以上海共产党组织就把他们组织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的团部设在环龙路新渔阳里六号,两层两底的房子里,挂了外国语学校」的招牌,团员有二十余人,由魏金斯基夫人教授俄文,团务由俞秀松主持。这s·Y

的组织,除上海外,北京、武汉、长沙也组织了。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

一九二〇年冬,毛泽东在长沙进行了建团活动。第一师范学生张文亮留下的一本日记,有如下之记载:

十一月十七日。接泽东一信,送来青年团团章十份,宗旨在研究并实行社会改造。约我星期日上午会他,并托我代觅同志。

十一月二十一日。会见泽东(在通俗馆),云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并嘱青年团此时宜注意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

十二月二日。泽东来时,他说,青年团等伸甫来再开成立会,可分两步进行:一、研究;二、实行。并嘱我多找真同志。

十二月十五日。接泽东覆信:「师范素无校风,你应努力结些同志作中坚分子,造成一个很好的校风。」「青年团你可努力在校制造团员,尽可能于本学期开一次会。」

十二月十六日。泽东来此。青年团将于下周开成立会。

十二月二十七日。泽东送来《共产党》九本。

至一九二一年一月三日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会友彭艺柏发言:「社会主义青年团,颇有精神,可资提挈。」易阅灰发言:「社会主义青年团可资取法。」可见团的组织已经成立。据此可以肯定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毛泽东在湖南投有建党,根据陈独秀的指示,他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到底发展了多少团员,没有确切的数字和名单。

一九二一年六月,列宁委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民族殖民地委员会秘书马林(荷兰人)为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他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一同来到中国。他们到上海后,首先与共产党的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李达会晤。书记陈

独秀应孙中山之邀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到广州做教育厅长去了。李达报告了上海及其它各地组党的准备情况。国际代表认为组党时机已经成熟,建议及早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李达分别与在广州盼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商量,确定于近期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达担负了「一大」的筹备工作。他代表党的发起组,分别写信通知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以及日本留学生中的共产主义小组,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毛泽东接到了李达的信,决定自己和何叔衡作为湖南代表赴沪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但他和何督衡是分途赴会的。

据萧子升回忆,那时他因事回国,在离开长沙北上前,毛泽东对他说:「千万请严守秘密。我要告诉你,北京、广东、上海已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有十多个代表预备在上海集合,召开一个秘密会议。这个会议的目的是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我是长沙代表,我十分希望你和我一起赴会。」

萧子升说:「我们可以同船到上海,但我不参加你们的会议。」

毛泽东想拉他的挚友走共同的政治道路,已经在长沙交谈过多少个日夜了。现在,要尽最后的努力,就劝说道:「去吧!你到那里去,跟那些同道见见面,听听他们的意见,同他们谈谈吧。」

萧子升说:「有什么好谈的?……我对你说吧,我不预备参与成立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说:「如果我们戮力以赴共产党在三十年至五十年的时间,也许便能统治中国。」

「这完全要看你们怎么进行了。我亦相信,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斗争,共产党有可能统治中国。但这对中国人没有好处,共产党的统治也不会长久。」萧子升坚持无政府主义观点。

「但是,如果我们想法子成为中国的统治者,你不以为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吗?」毛泽东问道。

「不,我不这样想。我最好引老子的话来答你:‘治大国若烹小鱼’。」

对于萧子升的清高和狂妄,毛泽东纵声大笑。

这天下午,他们一起上船,由西门出长沙。二人住在同一客舱里,毛泽东在下铺,萧子升住上铺,仍在不停地辩论着。客船穿越洞庭湖,进入长江水道。他们一觉醒来,快到汉口了。道不同不相为谋。萧子升在汉口上岸,毛泽东继续航行前往上海,从此,他们分道走了。

到了上海,毛泽东按照通知的地点,找到法租界蒲柏路博文分校(今太仓路一百二十七号),这是代表们住宿的地方。李达的夫人王会悟热情接待了他。这位为中共的创立立了功的女性怀着歉意解释说:「学生们放假了,我们借住学校的教室,没有床铺……」毛泽东看了一眼铺在地板上的庐席,风趣地说:「很好,凉快!」出席会议的代表,除已在上海的以外,多数人都在这里下榻。只有陈公博带着他新婚的妻子住在大东旅社。

关于中共「一大」召开的日期,因为当时处于地下状态,没有留下任何文字纪录。一九四一年,中共成立二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确定把七月份的月首,即七月一日,作为中共生日,每年进行例行的纪念活动;真正开会的日子并不是这一天。八十年代初,中共党史专家学者经过多方面的研究考证,确定中共「一大」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开幕,三十一日闭幕的。参加会议的代表共十三人,他们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

正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以及陈独秀的代表包惠僧。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参加了大会。关于重要问题争论，许多当事者发表过文章或谈话，但人言言殊，有许多相互矛盾之处。本节主要根据陈潭秋一九三六年发表在《共产国际》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上的一篇文章写成。陈文是与会代表最早系统地回忆「一大」的文章，他名节无亏，不需为自己辩解什么；他写此文时，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尚未确立，张国焘也还没有投降国民党，因此不需抬谁贬谁，叙事客观公正。

据陈潭秋回忆：「七月底大会闭幕了，大会的组织非常简单，只推选张国焘同志为大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与周佛海任记录。就在博文女校楼上举行闭幕式。正式会议是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三号李汉俊家中举行。（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是辛亥革命时革命军总司令黄兴的参谋长，属于社会名流，这所房子是李书城的公馆。）大会进行了四天，讨论的问题是：当时政治形势，党的基本任务，党的章程，以及发展组织问题。在这些问题的讨论中间，对于党的基本任务与组织原则曾经发生过严重的争论。一方耐是以李汉俊为首的‘公开马克思主义派’。他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太幼稚，不懂马克思主义，需要长期的宣传教育工作，因此，不赞成组织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并且不主张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而主张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再来公开的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所以他不主张立即进行职工会的组织，而要集中力量做学生运动与文化教育工作，首先把知识分子组织好，施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等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了普遍的影响，然后由这些知识分子再组织工人，教育工人。因此他不赞成组织严密、战斗的工人政党，而主张团结先进的知识分子，公

开建立广泛的和平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党。基于同样的观点，他提出党员的条件是不论成份，学生也好，大学教授也好，只要他信仰马克思主义，了解马克思主义与直传马克思主义的即可入党，至于是否实际参加党的一定组织担负党的一定工作，他认为是不关重要的。当时李达与陈公博拥护李汉俊的观点。另一方面是以刘仁静为首的极左派。他主张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直接斗争的目标，反对参加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反对任何合法运动，认为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一般应拒绝其入党。包惠僧赞成刘仁静的意见。大会大多数代表，严厉批评了两方面的成熟意见，最后在原则上通过一个基本立场，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党的基本任务，但在过渡阶段的斗争策略上，不但不拒绝而且应当积极组织无产阶级来参加和领导资产阶级性的民主运动。决定建立严密的战斗的工人政党，并以职工运动为中心工作，但在一定的有利于无产阶级发展的条件下，应当利用合法运动，至于党的组织与党员入党的条件，则决定采取经过历史事变试验过的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组织经验。反对孟什维克主义式的原则。这一原则的通过，已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初步基础。」

七月三十日晚，继续举行会议。王会悟在门口「望风」。这次会议同前几次会议一样，于晚上八点开始。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准时来到会场，其它与会人员，除周佛海因病未到外，都参加了。会议进行期间，突然有一陌生男子闯入，王会悟问他找谁？他匆匆一瞥，说：「找各界联合会的王会长，对不起，弄错了。」又匆匆退出。王会悟立即向大会主席报告。李汉俊介绍说，在他家附确有上海各界联合会会所，但该会没有会长，也没有姓王的人。马林富有地下工作经验，他机警地从座位上站起来，以手声桌说：「此人可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所有的人分头离开。」说



完后，他同尼克尔斯基先走，各代表随之散去。李汉俊说他是屋主不能离去，陈公博留下与他作伴，果然，十分钟后，法国巡捕房就开来了抓人的警备车，巡捕带着十几个警探来到这所房子进行搜查。巡捕问李汉俊和陈公博为什么开会？他俩说，大家都是北大学生，因为要出一种杂志和业书，所以开会商议。巡捕又问为什么有两个外国人？回答说这两个人是北大外籍教授，请他们来指导。巡捕看书架上全是社会主义的书籍，把李汉俊教训了一顿，说不应该看这些书。问了一阵也就走了。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一大」会议不宜在上海租界内继续举行。部分代表聚集在渔阳里二号（陈独秀、李达的寓所）商讨转移会议地址时，王会悟非常热心地提出，如果在上海找不到适当的地点，可以到她的家乡去。王会悟娘家在浙江乌镇，位于嘉兴南湖之畔。从上海乘火车只需一个多小时。王会悟说：「那里风景优美，可以雇一只大书舫，代表们一面游湖，一面开会。」代表们对她的提议极表赞成，认为这是万无一失的好办法。李达叫王会悟当晚就在上海北站了解到嘉兴火车的班次。第二天黎明，王会悟搭头班火车先赴嘉兴，在鸳湖旅社租了房间，作为代表住宿之处，又托旅社代雇一艘中等书舫，办了一桌酒席。她在那里等着。代表们乘第二班车前往。只有陈公博没有去，他带着新婚妻子逛西湖去了。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在这样一行人里抛头露面有许多不便，所以没有去。七月三十·日上午十点，代表们抵达嘉兴。王会悟早在车站等候，把代表们引到湖边，预雇的书舫停泊那里，代表们登上书舫，把船开到江心，就宣布继续开会。书舫十四米长，二米八宽。两侧有玻璃窗，前舱搭有凉棚，后舱设有床榻，中舱是一个客堂，客堂中间放一张方桌，两旁摆着靠椅、茶几。代表们开会时，船上备了一桌酒席，摆开一副麻将牌。王会悟装作「歌女」在船头望风放哨。事先约定，她一敲



舱板,大家就得打麻将。王会悟见有别的游船靠近,就哼起嘉兴小调,手指敲打舱门打节拍,于是中舱里立即传出哗啦哗啦的洗牌声。不久,小雨霏霏,游客渐衡,大会得以顺利进行,直至夜晚十一点大会闭幕。

就在这条船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纲领写道》:

1、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

2、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  
消灭阶级;

3、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

4、联合第三国际。

在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奋斗目标的第一个决议》中,强调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工人运动:「我党主要的目的,在组织各种产业工会。任何地区之内,如该处有一种工业以上,即应组织一个适合该地区情形之工厂工会。党应以阶级斗争的精神灌输于各工会。如果各工会所发动的政治斗争与我党党纲不符合时,我党应避免沦为其它政党之傀儡。至于现存的同业公会及技术工会,我党得派遣党员参加该等组织,以作改组该等组织之第一步。」

据陈潭秋回忆:「在讨论到对孙中山的态度与关系问题时,曾发生过小的争论。包惠僧认为我们与孙中山是代表两个敌对的阶级,没有妥协的可能,他说我们对孙中山,应当与对北洋军阀一样,甚至还要更严厉些,因为他在群众中有欺骗作用。他的意见,被大会打击以后,当时通过下面原则:对孙中山主义,采取批评态度,而对于某些进步的运动,则采取

党外合作的形式来援助他。这一原则的决定,可以说对于以后国共两党的合作,发展广大的反帝反北洋军阀的运动,种下了一种根基。」

最后选举了中央局作为党中央的领导机构,陈独秀、张国焘、李达当选为中央局委员。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

随着岁月的流逝,神州大地几度沧桑巨变。参加中共「一大」的三十名代表,不断发生分化,各自走完了自己的政治路程,达于生命的终点。

李汉俊(一八九〇—一九二七),湖北潜江人。早年留学日本。在筹建中共的期间,一九二〇年十一月陈独秀应孙中山之邀去广东任教育厅长,把上海发起组书记的职务交给李汉俊担任,《新青年》也交他和陈望道主编。当时中共的活动经费每月需大洋二百元。李汉俊给陈独秀写信,提议由《新青年》书社支付中共活动经费,陈不许。按约定,李汉俊每编一期《新青年》,得编辑费一百元。后因李汉俊忙于党务未按月编出,该社即遵陈令不付给李编辑费。李对陈非常不满。一九二一年二月,陈独秀起草一个党章寄到上海,主张采中央集权制,李阅后大为反感,表示决不拥护陈独秀个人独裁;他又起草一个党章,提出地方分权,中央是个联络机关,寄给陈独秀,陈阅后大发雷霆,说上海的党员反对他。二人之间裂痕愈来愈深。后来李汉俊代理书记的职务也不做了,交给李达。开过「一大」后不久,李汉俊就宣布脱离共产党到武汉去了。曾任武汉高等师学校教授、汉口市督政办公署总工程师。一九二二年先后任北京国立中俄大学教授、武汉大学教授。次年,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委员、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大革命后期,因宁汉对立,蒋介石令桂系胡宗铎、陶钧部占领武汉。李汉俊仍以共产党

的罪名被逮捕和杀害。

李达(一八九〇—一九六六),字鹤鸣,湖南零陵人。早年留学日本。「一大」被选为宣传主任,编辑《共产党》月刊,组织翻译出版马克思列宁著作。一九二三年夏,为国共合作问题与陈独秀发生意见分歧。陈独秀主张共产党全部加入国民党;李达主张党外合作,只选一些政治上强有力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工作,共产党保持独立性。因此争吵起来,各不相让,陈独秀拍桌子,摔茶杯,对李达说:「你违反党的主张,我有权开除你。」李达也不示弱说:「为保住无产者的革命政党,被开除不要紧,我也并不重视你这个草莽英雄!」从此,李达就不和陈独秀往来了,连第三次中共代表大会也拒绝出席,遂致脱离中共。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兼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总教官。国共分裂后,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任大学教授,曾任教于上海法政学院、暨南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中国大学、广西大学、一九三三年发表论着《社会学大纲》,实际是宣传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新中国成立前夕,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文革」初期受冲击致死。

包惠僧(一八九四—一九七九)湖北黄冈人。「一大」后在上海参加编辑《劳动周刊》,同年十月。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少支部主任。一九二二年任中共北京区委员兼秘书,一九二三年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长。一九二五年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第一师第一团党代表,教导师党代表。一九二六年任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政治教官,战时政治训练班主任,后到武汉任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大革命失败后脱离共产党,后入南京国民政府任职。一九四九年从澳门回到北京,任国务院参事。

刘仁静(一九〇二—一九八六)湖北应城人。「一大」后回

北京大学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九二二年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三年回国，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一九二六年去莫斯科列宁主义学院学习，介入苏共内部斗争，参加托洛茨基派。一九二九离开苏联专程去土耳其拜谒托洛茨基，晤谈一个多月。临行，托洛茨基把他为中国反对派写的政治纲要

《中国的政治状况和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交给刘仁静带回。刘到上海后，将托氏起草的政治纲领和一些文件，通过彭述之转交给陈独秀。陈独秀一九二七年「五大」被撤销总书记后，与共产国际和斯大要派严重对立。托洛茨基认为中国大革命失败，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要负主要责任。陈独秀及其追随者认为在中圈问题上，托洛茨基比斯大林正确，成为托陈结合的政治思想基础。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将陈独秀等开除出党，同年十二月十五日陈独秀联合八十一人签名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从此，在中国出现了所谓「托陈取消派」。一九三一年五月，托派四个小组织在上海提篮桥召开统一大会，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刘仁静对「托陈取消派」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这一政派既反对国民党，又反对共产党，加上内部派系复杂，在中国没有搞出什么各堂来。刘仁静于一九三五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一九三七年出狱后从事文字生涯，历任《正报》、《前线日报》、《时事新报晚刊》主笔，国民党政治研究室研究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北京师范大学、人民出版社从事教学和翻译工作。

陈公博(一八九〇—一九四六)广东南海人。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广州和谭平山创办《群报》。参加中共「一大」后回广东，因附逆陈炯明反对孙中山，一九二三年被中共中央开除党

籍，一九二五年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实业部长等职。因对蒋介石独揽大权不满，同汪精卫、顾孟余等于一九二八年底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成为国民党改组派首领之一。日本侵入中国后，追随汪精卫投敌，任汪伪政府立法长。一九四四年汪死后，继汪任伪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抗战胜利后逃亡日本，后被逮捕归案，一九四六年被处死。

周佛海(一八九七—一九四八)湖南沅陵人。「一大」后回日本求学。一九二四年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民群训练部部长、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日本侵入中国，一九三八年底随汪精卫投敌，出任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上海市市长等职。日本投降后被捕，一九四八病死南京狱中。

张国焘(一八七九—一九七九)，江西萍张乡人。「五四」运动时任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一九二〇年九月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后任中央局组织主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和《劳动周刊》编辑主任。一九二二年去苏联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任中共代表团团长。一九二四年五月在北京被曹锟政府逮捕，供出组织和同志。后因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直系曹锟政府倒台，张国焘被营救出狱。因他隐瞒了变节事，在共产党内继续受到信任和重用。中共「四大」、「五大」均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二七年七月陈独秀被撤销领导职务后，张国焘被推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人。中共「六大」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留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一九三一年春回国，任中共鄂豫皖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一九三五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四川懋功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任红军总

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反对中共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坚持南下，分裂党和红军，另立「中央」，遭中央谴责，内部反对，国际也不承认。又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一九三六年七月接受中共中央任命，就任中共西北局书记。次年八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在此期间，中共中央曾召开延安会议，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反党行为作了系统的批判，作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但他拒不悔改，于一九三八年四月逃离延安前往武汉，后投入国民党营生，在戴笠的军统局当了特务，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一九四九年后寓居海外。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日客死加拿大多伦多。

董必武(一八八六一—一九七五)，字用威，湖北黄安人。一九一一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一九一四年在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中央「一大」后，任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领导筹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一九二八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三二年回国，在瑞金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华苏维埃政府最高法院院长。一九三四年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央党校校长，代理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战胜利后，是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代表之一。一九四五年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一九四八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经，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自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当选为历届政治局委员，十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陈潭秋(一八九六一—一九四三)，湖北黄冈人。原为武汉中学英文教员。中共「一大」后，负责武汉党组织的工作，组织武



汉各界群众支持京汉铁路大罢工。一九二四年后历任中共武汉地委书记、湖北区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江西省委书、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江苏省委秘书长、中共中央驻顺直省委代表、满洲省委书记、福建省委书记。一九三四年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工作。一九三九年回国，化名徐杰，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新疆办事处主任。一九四二年九月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一九四三年九月，在迪化(乌鲁木齐)被秘密杀害。

王尽美(一八九八—一九二五)，山东莒县人。山东省立第一师范毕业。中央「一大」后任中央山东区支部、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一九二二年一月赴莫斯科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六月回国，参加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从事工人运动，任劳动组合书记部济南分部主任，创办《山东劳动周刊》，并在山海关、秦皇岛等地领导京奉铁路工人、秦皇岛厂头工人和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取得了胜利。一九二三年负责山东省的工作。一九二四年去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回山东从事统一战线工作。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九日在青岛病逝。

邓恩铭(一九〇—一九三一)贵州荔波人。因就读于山东济南省立第一中学，与王尽美等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并作为山东代表出席中共「一大」。会后回山东建立中共山东支部，从事工人运动。一九二二年一月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在淄博矿区领导工人运动。次年去青岛，一九二四年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一九二五年领导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和青岛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同年任中共山东地区委员会书记，领导全省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统战工作。十一月被捕入狱，因病被保释。一九二六年夏回青岛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再次被捕，出狱后去武汉，又被派回任中共山东省



委书记兼市委书记。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因叛徒告密，在济南被捕。曾两次组织越狱斗争。一九三一年四月五日就义。

以上十一人再加上第六回介绍过的何督衡和本书传主毛泽东，就是这样十三个人，建立了使中国改天换地的中国共产党。在历史的大潮中，鱼龙混杂沙俱下的情况是不可避免的。十三个人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学者型的人物，像李汉俊、李达、包惠僧、刘仁静等，他们把参加中共像参加一个同仁刊物的编辑部一样，合则留，不合则去（当然，细分起来四人情况又各有不同）。一种是政客型的人物，像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等，他们没有真正的信仰，一切主义的标榜都是获取名利的工具，当共产党、当国民党、当汉奸，角色转变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困难和勉强。一种是真正的革命家，像毛泽东、何督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等，他们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些人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主流。

## 12 回湘建党 面向工农寻志士 自修大学 掩护革命育英才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参加者多是知识分子。党内有一部分人主张把党建设成为知识分子的学述团体。毛泽东不以为然。他认为如果知识分子只是坐而论道，脱离广大了农群众，对社会是不会发生什么重大影响的，所谓改造社会，改造世界只是空话。在建党初期，毛泽东的贡献不是理论上的，在这方面他不如那些精通外文学贯中西留学欧美日本的大知识分子；

是他们把马克思、列宁的学说翻译介绍过来。毛泽东的贡献在于坚持了知识分子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方向，开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走向胜利的道路。

一九二一年八月，毛泽东与何叔衡一起、带着福圣的使命与必胜的信念，回湖南建党。这时候，由于毛泽东的领导和「五四」运动前后实际革命斗争的锻炼，在思想上、组织上，特别是干部方面，湖南已经有了良好的建党基础。毛泽东已在湖南培养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其中有已相当数量的职业革命家。

关于湖南建党的结过，据易礼容回忆：「毛润之参加‘一大’后，八月底九月初回到长沙。他回来后，就跑到潮宗街文化书社找我。当时因为屋里的人很多，谈话不方便，把我从文化书社拉出来在文化书社的对面一个竹篱笆的旁边，找我谈话。他说要成立共产党。过了几天，他找了我与何叔衡，到现在的清水塘后

面的协操坪(注:协操坪的来历是,‘协’相当于‘旅’;清末附近驻扎一协军队,在这里操练、检阅),这个协操坪很大,有几亩地,中间有一个横土堆子。当时我们怕做敌人发现,没有正式坐在那里开会,一边走着,一边谈,这样,我们三个人在那里成立党。有的材料说湖南有个三人小组,这是实实在在的,就是我们三个人。不过那时不叫三人小组。」这一天是阳历的十月十日,那一年又是民国十年,恰好三个「十」,所以被称为「三十节」。

十一月,根据中共中央局的通知,中共湘区支部成立,毛泽东任书记。建党以后,毛泽东首先在长沙发展组织。新民学会中的左翼,和青年团中优秀分子如彭璜、陈昌、陈子博、郭亮、张昆弟、夏曦等,第一批入党。在第一师范、第一中学、商业专科学校、甲种工业学校又发展了一批党员。

一九二二年春,毛泽东到衡阻去做发展党的工作。四月二十九日,一叶扁舟从长沙西门驶向下游,至衡阳来雁塔对岸芳草如茵处停靠岸边。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的英文教员张秋人陪同毛泽东从船上下来。第二天,应三师师生的要求,毛泽东在风雨操场发表讲演。上千名师生集合在操场上。毛泽东着蓝布长衫、从容登上讲台,首先在黑板上写了「社会主义」四个字,这是他今天讲演的题目,接着说:

许多青年同学对社会的现状不满,希望在改造社会方面做些事情,这是非常好的,但是要改造社会必须要有一种正确的远大的理想,有了这种理想然后才能够坚定地为实现这个理想奋斗,才能够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最好最正确的理想是什么呢?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理想。

接着他分别介绍了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和主张,指出了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种种谬误,然后他十分明确而肯定地指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才是科学

社会主义,实现了这种社会主义理想,才能够消灭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我们青年人应该选择改造社会的正确的理想,并且为实现这种理想而奋斗。」他每讲到一些新鲜的政治术语时,都用粉笔一条一条写出来,使人一目了然。

最后他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的现状,说:

你看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是何等的反动。他们现在是协调着步骤来侵略中国。他们的步骤以前是不协调的,经华盛顿会议一番商量便协调了。虽然他们的协调终究是要破坏的,但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他们为补偿前次大战的丢失及蓄养下次大战的精力,是断然要取协调主义的。

美国的门户开放主义居然能得到在中国拥有势力范围的英法的通过,就是明显的证据。中国的分裂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是不科的;但由民主派统一中国,较之民主派和军阀混乱于中国,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更不利;只有由反动派完全霸占中国于他们最有利。所以帝国主义必然要支持中国的军阀打内战。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打倒军阀。共产党要暂时放弃最急进的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与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联合起来。革命的民主派主体是国民党,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进步党,进步党散了,衍化成研究系。为了推倒共同的敌人,共产党要和国民党、研究系合作,结成一支大民主派,推翻军阀的统治。民主派战胜军阀派,这是中国革命第一步的任务。然后,才能逐步改造中国社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毛泽东的讲演历时约两小时,全场鸦雀无声。这一次讲演,已大体上轮廓分明地指出了中共革命的步骤,第一步,民主派联合起来打倒军阀,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任务;第二步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对于三师同学来说,这一堂课是大革命前夕的启蒙。许多人在这次讲话的指引

下走上了革命道路。有的参加工人运动(安源、水口山),有的参加农民运动(湘南各地),有的参加了北伐军,直到后来参加红军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其杰出代表人物蒋先云、夏明翰、黄静源、谢唯俊、张际春等。

其中蒋先云宣传奇色彩,他受到了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个人的器重。蒋先云是湖南新田人,一九〇二年生。一九二一年在衡阳三师经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然后被派到安源、水口山从事工人运动。一九二四年又经毛泽东推荐,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黄埔军官学校,作为校长的蒋介石专门接见了。入校不久,他组织了青年军人联合会,成为很有影响的左派学生领袖,与右翼学生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相抗衡。在平定商团叛和东征讨伐陈炯明的作战中,以作战勇敢,富有献身精神,进一步引起蒋介石的重视,让蒋先云当了他的秘书。一九二五年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在黄埔宣布军队里不能有跨党分子,退出共产党便可以留在军队里。要跨党分子或者退出共产党,或者退出国民党。讲完话便盯着蒋先云。希望他作为校长秘书带头退出共产党。岂料蒋先云不动声色,平静地、但是坚决地说:「我是共产党员,但我不退,我退出国民党!」李默庵举手发言:「我退出共产党,保留国民党党籍。」结果,跟着蒋先云退出国民党的二百五十多人,跟着李默庵退出共产党的三十九人,蒋介石看中蒋先云是个人才,继续留他在身边工作,又个别动员他退出共产党,只要蒋先云答应这个条件;即发表他当黄埔军校的中将教育长。但蒋先云不为所动,视共产党员的党籍高于中将军衔

他的回答是:「别的可以牺牲,唯共产党的党籍不能牺牲。」北伐开始后,蒋先云继续在总司令部当秘书。到了武汉,才脱离蒋介石,任湖北省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总队长。二期北伐始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六师第七十七团团长,一九二七年

五月二十九日在河南与奉军作战中英勇献身。

从一九二一年冬至一九二二年上半年，毛泽东在衡阳、平江、安源、岳州、常德等地发展中共党员，建立了省下面的分支机构。至一九二二年七月，全省党约有三十名，根据中共中央通，中共湘区执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委员长，委员有毛泽东、何督衡、易礼容、郭亮、李立三、陈子博、李维汉。下面有六个支部：中共长沙地方委员会，以谭竹影为书记；中共衡阳支部，

以张秋人为书记；中共安源路矿支部，以李立三为书；省工团联合会支部，以郭亮为书记；中共水口山路矿支部，以蒋先云为书记；中共长沙泥木工会支部，以任树德为书记。为了工作的需要，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二十二号租了一所房子，作为中共省委的机关。毛泽东以一师附小校长的身份，携家眷住在这里。这里地处城郊，很不引人注目，比较隐蔽、安全。省委的会议大都是在这里开的，来往交通员也在这里住宿。从中共建党之日起，毛泽东就很重视党的会议制度和党的纪律。中共中央的文件来了，他认真研究传达。省委的文件和向中央的报告，大都是由他起草的。他常同各地地方组织的负责同志通信，通报情况和布置工作。

毛泽东强调中共必须建立在人民群众之中，保持同广大工人和农民的密切联系。先进分子必然是少数，要依靠先进分子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他提出：小组，大运动。精于有力的党组织同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相结合。才能产生震撼社会的巨大力量。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为了统一领导全国工人运动，成立了公开从事工人运动的总机关场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毛泽东被任命为湖南分部主任。他从上海回到长沙，一手抓党的建设，一手抓工人运动。派党员深入工厂、矿山；发动工人运动，又

从工人运动中发现先进分子吸收入党,使党的发展和工人运动的发展相得益彰。

但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相结合,不是一件简单的、一厢情愿的事情。知识分子在工农心目中是「长衫先生」,是另一个阶级的人如何取得工人、农民的信任是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毛泽东在这方面身体力行,为其它知识分子作出了榜样。为了和工人接近,他脱掉长衫,赤脚草鞋,戴草帽,穿粗布短褂。他在长沙北站茶馆中,同一些铁路工人、搬运工人一连许多天一起喝茶、谈心,终于交到了朋友。他交到的第一个铁路工人朋友是广东人陈地广,陈在机务段作机修工,技术熟练,在工人中有威信,成为毛泽东联系铁路工人的桥梁。毛泽东生在农家,长在农村,熟悉群众的语言,很容和群众打成一片。他要求去做工人运动的党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使自己的语言大众化。只是穿短褂,说粗话,是不是就算工农打成一片了呢?不。这只是接近人民群众的第一步。毛泽东认为,有了这一步之后,还必须在思想感情和阶级立场上来一个变化,和工人农民同呼吸,共命运,想他们所想,急他们所急,真心实意地代表他们的利益,为他们的利益,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只有这样,群众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跟着你走。后来他总结自己的经验深刻地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本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分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毛泽东:《五四运动》)

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办过工人夜校。他把这一经验运用到工人运动中。一九二一年下半年至一九二二年,他派出许多党员、团员,在安源、粤汉铁路、水口山和长沙的产业工人中,在泥木、制笔业、人力车等行业中,创办了许多所工人夜校。工人最初不免有些怀疑和犹豫,不大肯来。他们就先办工人子弟的



日班。工人子弟上不起学，交不出学费。学校不要学费，发给课本，这样首先把工人子弟吸引来了。通过工人子弟，进一步联系他们的家长。等日班巩固了，二人夜校就好办了。起初，租用校舍、油印课本、纸张笔墨等经费没有着落，派出去的党员、团员找毛泽东想办法，这时候，毛泽东动用章士钊给筹集的那一笔钱。后来工人运动开展起来了，这些经费就由工会筹划解决了。

夜校办起来了。毛泽东不满意那些旧式课本，「人手足刀尺」，只教识字，没有思想内容。他要把教工人识字和对工人进行政治启蒙教育结合起来。主持平民教育的李六如，湖南平江人，早年留学日本，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一九二一年毛泽东发展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根据毛泽东的授意，他编了一套《平民读本》，不到一年，发行四版，印数达几万册。这套读本解决了工人夜校的教材问题。它的特点是由浅入深，文字通俗，每课由几十个字到三四百字。内容：全面从日常生活、科普知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都有。如第一册《衣食住的由来》一课，这样说道：「人们的衣、食、住，无一样不是由劳工们创造出来的。但是，这些耕田作工的同胞，反倒没有好衣穿，没有饱饭吃，没有房子住，真是太不平等呵！」第二册的《分工互助》一课说。人类社会生活应该是「大家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切不可像那些吃百姓的官僚、军阀、资本家，坐得人家现成的东西。」第三册《约朋友组织劳工联合会的信》这样说道：「世界上最辛苦的，莫过于我们农工，虽拼命的创造一些东西出来，却自己享受不到一点，简直替人家作一生牛马罢了。如果大家不赶快觉悟，团结起来，恐怕埋在十八重地狱底下，永没有翻身日子。」第四册介绍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人民当家作主等等。这样的课本，加上夜校老师的阐发讲解，很快地提高了工人的阶级觉悟。把办人夜校作为开展工人运动的突破口，收到了立竿见影

的效果。毛泽东派李能至、刘少奇、毛泽民到安源，蒋先云、毛泽覃到水口山，郭亮到粤汉铁路，易礼容到泥木业，夏曦、夏明翰到印刷业，陈广博到织造业，张汉藩到缝纫业。人力车工人因分散劳动，没有集体观念，很难组织。毛泽东就亲自到人力车工人夜校去当教师。第一堂课他在黑板上写了「二人」二字，然后说：「很多任务人只怨命苦，一世出不得头。其实，世上只有工人最有出息，最伟大。大家不是常讲‘天’最大吗？‘工人’两个字连在一起就是‘天’字，工人力量大如天呀？」使人力车工人认识副组织起来，联合起来的道理，然后，派刚从法国回来的罗学瓚到人力车工会去工作。几个月的功夫，湖南的产业工人和职业工人都组织起来了。这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从一开始就深入下层，得到锻炼和改造。通过他们，在工人中发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发展了一批党员，锻炼出了朱少连（路局行车部总司机）、刘东轩（水口山机械工人）、杨福涛（泥木工人）、朱有富（泥木工人）等一批优秀的工人领袖。依靠这批工人成份的党员和工运领袖，各地区各行业的工人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朱少连，湖南衡阳人，一九二二年入党。曾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一九二七年参加秋收起义，后被毛泽东留安源坚持斗争，一九二九年初，国民党军派重兵到安源进行镇压，朱少连等一百多人都牺牲了。刘东轩是一九二八在祁阳负责地方党的工作时被捕牺牲的。杨福涛是一九二八年牺牲的，时任中共衡阳特委书记。朱有富是一九二七年牺牲的，时任中共长沙县委书记。

毛泽东在工人运动中建党的同时，在学生运动中着重于建团。据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他写给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施复亮的一份报告中说，湖南团的组织由他兼任书记，组织部主任李隆郅（即李立三），宣传部主任罗君强。衡阳、常德建立了团

委，萍乡、醴陵团委正在筹建中。至一九二四年三月，长沙、安源、岳州、常德、衡阳、衡山、耒阳、水口山、新河、铜官、平江、新宁等地，都建立了团的地方组织。团员为七百九十人。

为了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培养党团干部，毛泽东还创办了一所新型的学校，自修大学。长沙有个船山学社，是民国初年一些旧式文人学士为弘扬王船山的学术思想而设立的。在赵恒惕党政时期，每月发给船山学社四百元经费。何叔衡是该社社员，与社长是朋友。经何叔衡出面交涉，取得社长的同意，毛泽东就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于一九二一年八月十六日创办了自修大学。熊瑾玎帮助他主持教务工作。

自修大学创立宣言说：「书院和官式大学，将学术看得太神秘了，认为只有少数特殊人可以求学，多数平民则为天然的不能参与。从此学术为少数学阀所专，与平民社会隔离愈远，酿成一种知识阶级奴使平民教育的怪剧。书院非赤贫的人所能入，官式大学更非阔家不可，欲在官式大学里毕一个业，非千余元乃至两千元不可，无钱的人之于大学，乃真是‘野猫想吃天鹅肉了’。自修大学力矫这些弊病，看学问如粗茶淡饭，肚子饿了，拿起来就吃，打破学术秘密，务使公开，每人都可取得一份。自修大学在现在这‘金钱就是生命’的时代，固不能使所谓‘无产阶级’的人，人人都有机会得到一份高深学问，但心里则务必使他趋向‘不须多钱可以求学’的路上去，自修大学的学生可以到学校里来研究，也可以就在自己的家里研究，也可以就在各种店铺里、团体里和公事的机关里研究。」

自修大学明确提出了改造和革新社会的任务。在《创立宣言》中说：「自修大学学生不但修学，还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煎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作准备。」在《入学须知》中提出：「我们求学不是没有目的的，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

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我们不愿意我们同学中有一个少爷或小姐,也不愿意有一个麻木或糊涂人,因此对一个新同学入校,取比较慎重的态度。每个同学入校,我们要明白他下列几项:(一)以前进过什么学校?做过什么事?家庭 and 个人的经济情况怎样?(二)要研究哪几科?为什么要研究这几科?(三)以前学过什么学科?(四)愿来研究几个学期,以后再作什么办法(打算)?(五)对于人生观的主张。(六)对于社会的批评。凡要入学的,须将上列六项用通信方法详细写出,寄交本校学生会总书记转交校长评阅,再行当面接洽决定。」这所特殊的学校不是地主、富人的弟子进入仁途的阶梯;也不是一般平民子弟学习职业技艺的场所,它是一所革命学校,它培养的学生要以「改造现社会」为已任。曲高而和寡。开始很不为一般人所理解,湖南教育界称为「怪帮」。投考这所学校的学生来自十三个县,约一百来人,来者多是革命志士。夏明翰可以作为该校学生的杰出代表。夏明翰原是衡阳第三甲种工业学校的学生。在「五四」运动抵制和焚毁日货的斗争中,在声援长沙人民驱逐张敬尧的斗争中,夏明翰成为衡阳学生界的领袖,曾同驻防衡阳的吴佩孚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在家里,他敢于把吴佩孚送给他祖父夏时济的亲笔条幅撕毁,把祖父收藏的日货翻出来烧掉,气的祖父把他关起来。他在一个晚上破窗而逃,与封建家庭彻底决裂,跑到长沙投考自修大学,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彼此成为职业革命家。他在长沙从事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都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一九二七年初,他在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员,并在全国农民协会兼任秘书长。中共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后,参加了湖南新省委,协助毛泽东组织秋收起义。同年十二月,任平江特委书记,在济阳、平江先后组织了工农暴动队,一九二八年二月任

湖北省委委员。二月七日，由于叛徒告密被捕，二月九日英勇就义。他临刑前作的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成了共产党人的正气歌。

一九二二年九月间，自修大学附设补习班，专门培养程度较低的青年干部和农民运动干部。毛泽东根据湖南情况编写了农运教材《告中国农民》，并亲自讲授，他列举数字和事例，分析了湖南农村各阶级的社会经济情况，说明地主兼并土地的经过和农民日益破产的原因，提出农民只有起来斗争，从地方手中夺回土地，才有活路。何叔衡、李维汉、夏曦、姜萝周、夏明翰、罗学瓚等，都担任过补习班的教员。补习学校招来的学生中，有知识青年，也有青年工人，人数最多时达二百人以上。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毛泽东邀请李达到长沙担任湖南自修大学的校长。李达到任后，亲自给学员讲授唯物史观，剩价值理论，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发展史。大大提高了学员的马列主义水平。

一九二三年春，毛泽东和李达商量，以自修大学的名义，创办《新时代》月刊，由李达任主编，李达欣然同意。四月十五日，《新时代》创刊号出版。《发刊词》说：「本刊出世的使命实在非常重要。将来，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它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等问题，本刊必有一种根本的研究和具体的主张贡献出来，目的借此引起许多志同道合的人们从事这种社会改造的事业和研究。」在《新时代》创刊号上，毛泽东发表了《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提出了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毛泽东写道：

「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

的共产党是和国民党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进步党,进步党散了,目前的嫡派只有研究系,胡适、黄炎培等新与的知识阶级派和聂云台、穆藕初等新与的商人派也属于这派。反动派的范围最广、包括直奉皖三派(目前奉皖虽和国民党合作,但这是不能久的,他们终之是最反动的东西)。」

毛泽东预言:「以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将成为下式:一方是激进的共产党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倒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成为一个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动的军阀派。中国政治的结局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但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一个时期内,中国必仍然是军阀的天下。」

这篇文章标志着毛泽东作为政治家、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成熟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的历史演变,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言。

一九二三年四月至七月,《新时代》共出四期,每期印两千份。这是湖南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出版物,在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十一月,湖南省长赵恒惕以「自修大学所倡学说不正,有关治安」的罪名,下令取缔自修大学。但中共湖南省委早有应变措施,筹办了一所普通中学湘江学校,于十一月二十四日正式开课,原在自修大学学习的二百多名学生,大部转到了这所学校。



## 13 访贫问苦 毛泽东深入矿井 有胆有识 李能至唤起劳工

安源煤矿在江西省萍乡县，是一八九六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洋务派官僚盛宣怀创办的。一八九九年向德国借款，购买机器，聘用技术人员，矿务为德国人操纵。一九〇四年转向日本借款。实权又落入日人之手。安源煤矿产煤两千吨，供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作燃料之用；一九〇八年与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合并联营，组成汉冶萍煤矿公司。

安源煤矿邻近湖南，且有株（州）萍（乡）铁路与汉铁路联结，因此历来在政治上、经济上同湖南关系密切。在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上做工的工人，湖南籍占很大比重。安源矿有工人一万二千五百人，株萍路有员工四千五百人，是一个产业工人集中的地方。

据一九二三年八月十日刘少奇、朱少连合着《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记载：一九二一年「十月中函书记部，请求派人到安源帮助并指导一切。书记部当即特派毛润之、李能至、宋友生与张理全四人到安源考察情形，开始活动。」毛泽东一行四人在安源考察了一个星期。西平巷掌子面工人最集中，环境最恶劣。毛泽东向陪同带路的工人周镜泉说，就从西平巷看起。他们一行下了矿井，来到西巷，见掌子面通风，排气严重不良，一面热得出不来气，烫得脚起泡，工人们叫他「火焰山」；一头淋水似



雨，积水成河，工人们称之为「水牢」。只见工人们使用粗笨原始的工具，有的倒向在地上挖煤，有的拖着沉重的煤筐爬来爬去。口渴了，喝一口煤黑水；热的受不了，就到积水坑里泡一泡。矿工没有工服，没有柳条帽，只在头上围条布汗巾，赤身体地干活。这条布汗巾都是工人自备的，在井下围在头上当矿工帽，出井时围在腰际当遮羞布。

出了西平巷，毛泽东等又到了东平巷。

「你们为什么这样苦？」毛泽东问矿工。

「是命苦哇。」一个老工人叹口气回答。

毛泽东说：「我们工人受苦不是命里注定的，而是帝国主义和资本剥削压迫的结果。」

「什么是帝国主义呢？」有的工人不明白。

「帝国主义就是洋财东。我们矿上来过德国人，来过日本人，这些就是洋财东。是我们工人养肥了洋财东和中国的资本家，而不是他们养活了我们，是他们把我们创造的财富剥削去了。」

毛泽东极善于向劳动者作深入浅出的宣传：「煤是资本家挖的吗？火车是他们开的吗？不是。是我们工人！我们出了力，流了汗，创造了财富，自己却一无所有，吃不饱，穿不暖。而资本家呢？从来不下井劳动，却吃的饱饱的，穿的暖暖的，住的是高楼大厦，还骑在我们头上作成作福。这就是剥削，这就是压迫，这就是极不合理的制度。」

这些崭新的议论使工人们大开脑筋。过去都是说资本家养活了工人，老板赏给口饭吃，如今这位毛先生把这个「老皇历」给翻过来了。

毛泽东等从早晨八点钟下井，直到下午两点才出来。出井后，又到洗煤台、修理处、翻砂房、水泵房等地考察。看完生产各

部门,又来到矿工生活区。矿工宿舍分四个区,共有房屋百余间。每间约丈余宽,两丈余深,三层床铺。每室定额四十八人,因房屋过少,有住至五十人以上者。毛泽东还爬上一个三层铺位,见床上臭虫出没,被褥油黑。室内地面潮湿,空气污浊。

据一位老工人回忆:「这天下午,天气燥热,毛泽东同志又来到锅炉房。这儿没有凳子,一个工人搬来个木头墩子,正要用汗巾去挖上面的炉灰,毛泽东一把拉住说:‘不用擦。你们坐得,我也坐得。说着就坐下与司炉工交谈。当一个工人去撬火加煤时,毛泽东同志也起身走到炉前,接过撬火铁棍,亲自帮助劳作。工人说:‘毛先生,温度太高,你歇着吧。’毛泽东同志笑了笑说:‘你们成天在这里干活,我试一回还不行吗!’」到了吃晚饭的时间,毛泽东等与矿工们一起吃的霉米饭。

就这样,毛泽东等在矿上住了一个星期,深入到各个角落访贫问苦。交了许多任务人朋友。矿上的管理体制是封建把头包工制。工人每天劳动地下二甚至十四、五个小时,矿局付给工资每人合银元两角七、八分,折合铜元五十六至五十八枚,经工头之手发到工人手里只有二十六、七枚铜元,工头苛扣在三十枚铜元以上。工头还采取吃空头的办法,向矿局领五十人工资,只雇用三十人做工。用延长工时提高劳动强度的办法,让三十个人做五十个人的活。总监工王鸿卿,每月可得银元两千块,

一个小工头月收入也在七、八百块银元以上。一个小工头的月工资比一个采煤工高出一百八十倍以上。矿工中流传一道歌谣:

包工剥削工人钱,花天酒地似神仙;三妻四妾置地产,都是工人血汗钱。

形容矿工生活的歌谣是:

来到安源三五年,萍矿做工苦难言;家中父母倚闾望,回家

没得路费钱。

除开残酷地剥削工人之外，矿长、总监工，大小工头，对工人可以任意辱骂、殴打、罚工钱、关禁闭直至开除。由于矿井内根本没有什么安全设施，常发生塌方、穿水、起火等事故、死人的事情时有发生。前两年东平巷瓦斯爆炸，矿局为了保矿，不顾工人死活，封闭井口，把九十多矿工关在井下活活闷死。死一个人，矿上只发给十六块钱的安葬费。安源煤矿的工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毛泽东发现，这里充满了人间苦难和阶级仇恨，简直是布满了干柴，只要有一点火星，就会燃起熊熊烈火。他遇有机会就和工人们交谈，号召工人们团结起来，同资本家和封建把头作斗争，才能不受压迫，改善待遇，创立一个新世界。他指着地下一粒小石子对工人说：「这一头石子好比我们一个工人，老板、工头可以把它踢来踢去。如果许多小石子掺上沙子和石灰，结成坚实的一大团，大老板就搬不动了。我们安源一万七千名路矿工人团结起来，就像一座大山，资本家不但搬不动，倒下来还会把他们砸扁、砸死」考察以后，确定李能至留安源开辟工作。这个李能至，就是李立三，那是一九二四年他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以后改的名字。

为了争取合法，李能至以留洋学和一而热心于平民教育的身份，拜访了萍乡县知事。他打听到萍乡县知事范子宣是举人出身，喜欢诗词书画，县署文均用四六体古文，为人清高。为迎合县太爷的胃口，李能至用四六文写成一篇文章请求准予开办平民学校的呈文送了上去。

过了几天，县知事派人来请李能至到衙署叙话。李西装革履，胸前还挂着几枚法国证章，显示留洋的学历，知道知县清高，未带礼物，昂然入见。范子宣见是位留洋生，很客气，分实主落坐，亲手递过水的烟袋，然后捋捋山羊胡发，问道：「足下祖上何

郡邑？」

李能至吸了两口水烟，端着烟袋不慌不忙，背了一首诗：

绿江绿水绿悠悠，三刀石下状元洲，玛瑙潭前龙现爪，江湾文笔点春秋。

绿江，湘江支流，环醴陵城流过；三刀石是醴陵城郊一山峰；玛瑙潭是醴陵一深潭；「江湾文笔」的典故是醴陵江湾有文峰实塔。这四句诗的意思，要括起来就是回答：「我是醴陵人。」

范子宣本骚人墨客，一见李能至谈吐不凡，心中甚是喜欢，颌首表示领会，说：「醴陵，历史名城，历史名城！」

叙谈一阵，范子宣提出要对弈，李能至只好奉陪。摆开象棋下了两盘，一平。李能至待要收局，范县令坚持再下一盘。弈至中局，不相上下。李略有些主动。范子宣走了一步遇避棋，口中自言自语：「让人非是弱，余地必须留。」

李能至机警过人，当然听出了县令的弦外之意。这盘棋本来打算输给他的，只是要输得自然，不显出「让」来。县太爷提醒后，李能至在对方不知不觉中，将凌厉的攻势减弱，最后以一比二输给了县太爷。

收起棋盘，范知县又把一幅字画拿出来，说是郑板桥的墨竹，请李先生鉴赏。李能至父亲是个秀才，从小受熏陶，对金石书画有些知识。他仔细观赏有顷，说：「大人，依晚生看来，此画非真品，乃名手临摹也。」

「何以见得？」

李能至指着画角一方阴文小篆圃间说：「大凡仿制品，纰漏多出在印章上。据晚生所知，板桥先生一向自制印泥，朱砂均匀，份量哪有如此之重？」

「李先生学贯中西，博学多闻，难得！难得！请到书房看真迹。」原来范县令拿出的这幅画，确是前两件请人临摹的。李能

至能辨真伪,把个范县令佩服得五体投地。

萍乡小城,除了矿工外,就是虽富有但缺少文化修养的商人、乡绅。范知县很少能找到一个谈得来的人。这次与李能至会面,好象遇到了知己,心情非常愉快。从书房出来,主动提出备案呈文事,说:「君之杰作,文笔酣畅,功夫至深,读来实在令人兴奋。」

「过奖了。办平民学校之事,还请大人多多关照。」李能至见时机已到,忙转入正题。

「好说,好说。难得足下一片好心。那些炭古老,就知道狂嫖滥赌,此等恶习,岂可任其自流,办学校,学文化,讲文明,好事,好事。」

李能至说:「大人若能再出个告示,晓论各界,岂不更显大人励精图治,教化有方。」

「足下高见,正合鄙意。」范知县立即叫来司书,摘引李能至呈文中的若干句子,写成一个告示,盖上原红大印。

李能至目的全部达到,非常高兴,起身向范县令告辞。

回到矿区,李能至租了五福巷王守愚的一间楼房,作为校舍,将县府的告示贴在门首,墙上挂起了平民学校的牌子。

最初入学的是三四十个矿工子弟。然后,通过访问家长,才向工人们提出在平民学校附设工人补习班,晚上上课。工人补习班开学时只有十几个人,逐渐增加到四五十人。毛泽东又派蔡增准来原助李能至开展工作。二人分工,由蔡教工人子弟班,李教工人夜学。

国文第一课是:「一人两只手,两手十个指。」李能至教会大家认读,就说:「我们做工的,做田的,两只手一年到头忙不赢,累死累活做不停,种出谷米,挖出煤炭,我们反倒没吃没穿。财主、资本家也是两只手,可是从来不劳动,吃的是山珍海味,住的

是高楼大厦。同样两只手，为什么有的白，有的黑？有的忙穷，有的间富？」他利用工人夜学这个讲坛，对工人进行最初的阶级启蒙教育。

李能至逐渐打开了局面，在他周围团结了一批工人积极分子。

一九二二年二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李能至将朱少连、朱锦堂等六名积极分子叫到五福巷楼上，向他们宣布：「上级党组织已批准你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然后在墙上贴了一张镰刀斧头红旗，他带领六名新党员庄严宣誓：「加入本党，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命令，严守秘密，永不叛党。」随后成立了中国产业工人第一个党支部，李能至当选为支部书记。从此，党支部成了工人运动的领导核心。工人党员加紧工作，秘密串连，酝酿成立工会。李能至在工人中的威信逐步树立起来了。歌谣《劳工记》说：

直到一九二一年，忽然雾散见青天；  
有个能人李能至，打从湖南来安源；  
提议要给办工会，劳动工界结成团。

一九二二年三月十六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筹备会成立，李能至为筹备主任，又选了四名筹备干事。「工人俱乐部」的名字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定下来的。

四月一日，召开第二次筹备会。讨论起草向政府申请立案的呈文。会上周怀德说：「矿长李寿铨与副矿长舒修泰正在闹纠纷。李寿铨老了，舒修泰是日本顾部的红人，一心想当正矿长，拉拢职员和工头们支持他。」李能至认为这一矛盾可以利用。朱少连说：「姓舒的和县知事还沾点亲，我们要上衙门递呈文，可找他帮助疏通。」第二天李能至就和朱少连一起去记舒修泰。寒暄过后，李能至说：「办俱乐部是让工人有个正当娱乐的

地方,对矿上也有利,希望舒矿长鼎力维持,工友们不胜感激。」舒修泰正想拉拢工人,看了李能至递上的呈文,高兴地说:「办俱乐部的宗旨正大光明,我一定维持。」并答应由他出面向县政府递送呈文。因为矿上支持,县署自无异议,很快就批下来了,并贴出告示,保护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四月十六日,李能至主持召开第三次筹备会。这时,报名参加工人俱乐部的已达三百余人。选举李能至为主任,朱少连为副主任,增选干事七八。办公地点设在牛角坡五十二号,原湖北同乡会会馆内,这时,毛泽东又派蒋先云、黄静源、毛泽民来安源工作,大大加强了俱乐部的领导力量。

五月一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李能至在大会上讲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来历,讲了安源工人的痛苦生活和组织团体的重要。朱少连宣了工人俱乐部章程。会后组织工人冒雨进行了游行。

不知是谁,在发往长沙的火车上贴上两条标语:一条是「打倒资本家!」一条是「共产党万岁!」这件事引起了路矿当局和官方的注意。毛泽东知道后,立即赶到了安源,嘱咐李能至说:「工作要大胆,又要稳重。好象砌房子,要把地基打好。我在长沙看见你们在火车箱上的标语:‘打倒资家!共产党万岁!’现在喊这些口号妥当吗?敌人看了,向你要共产党怎么办?要杀头的呀!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要讲究斗争策略,不然就要吃亏。」又说:「看你眼窝都陷进去了,工作多也要注意休息。要放手让工人中的党员多做工作,这对他们也是个锻炼。」李能至频频点头。送走毛泽东,立即召开俱乐部干事会,传达省委毛泽东的指示。大家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意见,认为要突出经济斗争,隐蔽政治色彩。朱少连提广义

办个消费合作社,在经济上帮助工友解决一点困难。李能



至说,这个主意好。以参加俱乐部可以买便宜货为口号,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参加俱乐部。

经过几天的筹备,由参加工人俱乐部的工人每人凑集五角钱作为股本,由铁路工友到外地采办货物,安源工人消费合作社开始营业了。合作社经营米、粮、油、盐、布疋鞋抹,还兼售进步书报。由善于理财的毛泽民担任经理。由于进货不花运费,价格比私人商号低廉,大受矿工及其家属的欢迎。消费合作还办理兑换银元的业务。原来矿局给工人发薪时,只发给矿票,不发银元。矿票只限矿区使用,不能到矿区以外流通。矿工要把钱寄回家去,须到矿区钱庄去换现洋。钱庄贴现率是百分之十五,即是说,十元矿票,只能换八块半银元,工人吃亏很大。消费合作宣布:不收贴水,十元兑现。工人们奔走相告,很快传遍了矿山。各商号和钱庄见消费合作社断了他们的财路,依仗他们财力雄厚,就派人来消费合作社抢购物品,挤兑现洋,要把消费合作社买空挤垮。俱乐部干事会开会决定,凡参加俱乐部者毕发购货证,抵制奸商的破坏。但未入俱乐部的工人也得不到购货证。因此,加入俱乐部的工人与日俱增,工人俱乐都出现了大发展的局面。

七月,汉阳铁厂工人罢工五天,取得了增加正资和改良待遇的胜利。消息传来,对安源工人是个很大的鼓舞。大家希望安源工人俱乐部能像汉阳铁路工人俱乐部那样「硬棒」,领导大家展开斗争。

九月初,李能至去长沙找毛泽东研究组织安源罢工的问题。不巧,没见到毛泽东。他就到文化书易礼容那里住下来。易礼容兼任长沙泥木工会的秘书。九月五日,六千多名泥木工人在仓后街湘乡中学操场上,举长长长沙泥木工会成立大会。易礼容邀请李能至参加大会并发表演说。第二天,李能至回安源途经

醴陵下车回家探望。

九月九日，俱乐部的易友文从安源来到李家，说：「毛先生到了安源，这是给你的信。」李能至当即把信拆开，一看是这样几行字：「我到安源，恰你不在。安源罢工条件已经成熟，望接情后连回，领导工人罢工。」

「润之哪天到安源；现在哪里？」李能至问。

「前天去的，昨天开了党支部会。今天和我一起出来，回长沙了。」易友文回答。

「毛先生都说了些什么？」

「党员会上，蒋先云汇报了最近的斗争情况。副矿长舒修泰找到俱乐部，要收买我们，说每月发给一笔钱，叫我们动戒工人安心生产，被蒋先云给顶回去了。后来他们又威胁蒋先云、朱少连，说若不从速离开安源，必有杀身之祸。老蒋、老朱拍胸脯说：‘我们秉正大光明之宗，作正大光明之事。死也不怕。’李主任你千万小心，总监工王三胡子说，要砍掉你的脑袋。他心毒手辣，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毛先生听了汇报后，表扬党员们立场坚定，说共产党员就是要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带领群众进行义无反顾的斗争。我们不明白，‘义无反顾’是什么意思，他还解给我们听。」易友文尽他所知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向李能至作了汇报。二天当天下午坐两点钟的火车回到了安源。

罢工的各项准备工作在紧张秘密地进行着。

黑社会洪帮组织在矿上有很大的势力。工人中有他们的组织。洪帮头子章龙是矿上的顾问。鸦片馆、妓院、赌场都是洪帮控制的。为了避免黑社会势力破坏罢工斗争，罢工前，李能至叫两个人入了党的洪门弟兄引荐去见洪帮头子章龙，还带去了一些礼物。

李能至开门见山地说：「我们组织罢工，是为了给穷哥们谋

利益,希望洪门大哥讲义气,多帮忙。」

章在经见工人俱乐部李主任亲自带礼物来见,认为是看得起他,很高兴地说:「李主任,有什么事用得着我,我一定帮忙。」

李能至说:「罢工期间,我们有三条要求,第一,鸦片馆、妓院关门;第二,街上的赌摊收起来;第三,不发生抢劫案。」

章龙说:「第一条我包了,第二条我包了,第三条我也包了。」他说一条拍一下胸脯,连拍三下全包了。

这时矿局扬言要调军队来,工人俱乐部必须立即解散。李能至领导着工人俱乐部,针锋相对,于九月十一提出三项条件,限路矿两局两天内答复,否则将以罢工对待。

一、路矿两局须呈请官厅保护工人俱乐部;

二、每月发给工人俱乐部补助费二百元;

三、从前积欠工人工钱七日内发清。

九月十一日晚上,刘少奇受毛泽东的派遣来到安源,参予对安源大罢工的领导。

九月十二日,李能至和刘少奇商量后,决定召开党支部会议,作罢工的最后决策。晚上,三十多名党员济济一堂。李能至主持会议,他首先介绍刘少奇和大家见面。说:「少奇同志参予领导了粤汉路工人大罢工,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他还带来了省委毛润之同志的信,现在给大家念一下。」

刘少奇高声朗读,

「望你们在罢工中,紧密地团结,勇敢地斗争,要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面动人的口号,争取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罢工就更有胜利把握。」

刘少奇继续说:「根据润之同志的意见,我看我们的罢工条件要从实际出发,提得合情合理,不可过分。罢工宣言也要多讲些工人苦楚,少讲些与政治军事有关的话语。」

会上,党员们发言很踊跃,经刘少奇记录归纳,形成了十七条,作为与当局谈判复工的条件。又进行分工,决定成立罢工总指挥部,下设工人纠察队、侦探队、宣传组、保卫组、联络组等。大家推举李能至为罢工总指挥。鉴于传言矿局出六百块银元收买流氓刺杀李主任,大家提议李能至不要过多露面,由新到的刘少奇担任俱乐部的全权代表。

最后李能至说:「复工条件提得合情合理,使资本家无空子可钻。罢工宣言就讲当局数月不发工资,我们要活命,我们要吃饭,迫不得已而罢工。这样社会各界就会同情和支持我们。要是讲些政治革命,阶级压迫,军阀欺凌,有些社会人士就怕了,我们就会失去舆论同情和支持,还容易给敌人的镇压提供借口。润之批评我冲锋陷阵有余,运筹帷幄不足,这回要吸取教训,再不能葬送了。关于罢工的口号,润之强调要‘哀而动人’,我想了一下,‘先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大家看这个口号怎么样?」与会同志听了一致认为好,就这样决定了。

十三日上午,朱少连来找李能至,说矿长和路局局长在车务处等候,有要事商量。

李能至来到车务处,矿长李寿铨,路局副局长李毅环连连让坐,十分客气。

李寿铨说:「李主任来,就为商量工人三项要求的事。我们现在的答复是:一、两局已呈请县署批示保护贵部;二、俱乐部常月费,候报总公司批准后实行;三、积欠工人薪饷,确因财政困难,难以在月内如数还清,先行发放上月饷银。请转告众工友,理解两局一片诚意,安心上工,切莫闹事。」

李能至敛容正色道:「你们视一万三千多任务人的要求为儿戏,实际上一条也没答应,企图蒙哄俱乐部。到今日下午四点,县署保护俱乐部的告示不到,欠饷不发,明日凌晨即罢工。」

正说到这里，外面人声嘈杂，包围了车务处。原来是有人传说路矿当局扣了李主任，要送到萍乡去，专车已经开动。其时恰有一辆专车去萍乡，工人们有的爬上车头，有的卧轨，不让专车开动，同时将车务处团团包围，高喊：「快放出李主任。」「谁敢动李主任一根毫毛，我们就把路矿两局砸个粉碎！」

路局副局长李毅环见此情景，怕闹出事来，结结巴巴地说：「有事好商量，请李主任回去吧。」

十三日夜十二点正，一声汽笛长鸣，这是俱乐部发出的罢工命令。当夜开赴株州的车次停驶，拆除了火车头上的重要部件；十四日凌晨三点，切断电源，使运煤电车停开。各矿井入口处，用煤桶、树枝堵塞，派人把守，只许出，不许进，树立大旗一面，上书「罢工」二字。为了保护矿井不被水淹和井下通风，保证安源全市照明和群众用水，电机厂、抽水机、打风机三处照常上班，维持运转。十四日晨，人们走出家一看，全矿区张贴了最醒目的大标语：先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整个矿区沸了！工人们串街走巷，争看罢工宣言和十七项条件。宣言中说道：

各界的父老兄弟姐妹们呵：

我们时时受人家的打骂，是何等的丧失人格呵！请你们看看：我们的工作何等的苦呵！我们的工钱何等的少呵！我们所受的压迫已经到了极点。所以我们要求改良待遇、增加工资、组织团体俱乐部。

现在我们的团体被人造谣破坏，我们的工钱被当局积欠不发，我们已再三向当局要求，迄今没有圆满答复。社会上简直没有说话的地方呵！

我们要命！我们要吃饭！现在我们饿着了！我们的命要不成了！我们于死中求活，迫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手段。我们要

求的条件下面另附。

我们要求的条件是极正常的,我们死也要达到目的。我们不做工,不过是死!我们照从前一样做工,做人家的牛马,比死还要痛苦些。我们誓以死力对待,大家严守秩序,坚持到底 各界的父老兄弟姐妹们呵!我们罢工是受压迫太重,完全出于自动,与政治、军事问题不发生关系。请你们一致支持。我们两万多人饿着肚子在这里等着呵!

(原载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日长沙《大公报》)

大罢工以后,李能至派人将十七条送至路矿两局;同时呈文萍乡县署及赣西镇守使署,说明罢工原委。并向路矿两局和官厅送去信息:「如欲调商,请即派正式代表由商会介绍与俱乐部代表接洽。」

面对汹涌的工潮,路矿当局大起恐慌。煤矿总监

由王鸿卿召集全体工头,密谋破坏罢工的办法,议定由各工头串连工人中的亲友,下井不干活,照开工资。少数工友耐于情面和金钱诱惑,跃跃欲试。但俱乐部派出的纠察队到处巡察,布告四方:「候俱乐部通告方准开工。」不听劝阻者即以武力对待。一些准备下井的工人一见纠察队,大都走掉了。几个工头带着剩下的人,推倒障碍物进了巷道。纠察队员上前劝阻,竟被他们打伤。李能至和纠察队长周怀德闻讯赶到,再做说服工作,又回一些人。李能至说:「如果不听劝阻,强行入窿,一律不准外出,叫你们在里面饿肚皮。」说罢派纠察队员把守井口,工头们一伸头,外面就一棒子打下去。饿了他们二十四小时。到十五日午,周怀德才来到井口下令把几个工人放出来。

总监工王鸿卿急红了眼,派他的几个贴身保镖去刺杀李能至。他说:「蛇无头不行,当前必须把这个姓李的除掉。事成之后,想当官的连升三级;没钱用的,党银洋六百;要女人的,安源

女子任凭挑。」几个保镖去后，王鸿卿又打电话给矿局总公事房，叫文书写悬赏令。

捉拿李能至，死的活的都行。正好接电话的是参加了俱乐部的李桂和。他趁人不注意，悄悄跑到俱乐部向刘少奇报告。

刘少奇和蒋先云等一商量，立即决定叫李能至转移，避避风头。俱乐部勤杂工易友德把李能至带到三合桥泥水匠老黄家里藏起来。矿上纠察队也放出风声：「哪个害了李主任，定叫他碎尸万段，断子绝孙！」

路矿当局黔驴技穷，将安源划为特别戒严区，设立戒严司令部。

总监工王鸿卿狐假虎威，领着军队占据了工人俱乐部。工人见俱乐部被占，即准备拼命，几百人冒死冲入，俱乐部是一座有前后门的房子，工人不要命地往里冲，硬把军队由后挤出去了。宣传组向士兵展开宣传，说明矿工的痛苦和罢工的原因。这种宣传收到了一定效果，许多士兵转而同情工人。有的说：「我们都是外乡人，谁愿意来管你们的事，我们是王老爷一天两块钱请来的呀！」

军队镇摄不住。十六日，路矿当局请俱乐部派代表到戒严司令部商量解决办法。按照分工，刘少奇挺身而出。对于刘少奇去戒严司令部谈判，大家很不放心，怕代表被害。刘少奇说：「我们提出了条件，不去接头怎么能实现。如果不去，他们会说我们没诚意，不想解决问题。我还是要去，我为大家办事，死了也光荣。」

刘少奇以义无反顾的决心，穿上蓝布工字服，化装成工人，昂然进入戒严司令部。

「你就是工人代表？」戒严司令李鸿程打量着进来的青年人。



「我就是。」刘少奇平静地回答。

「为什么罢工？」

「积欠工资太多，工友们和我们的父母妻儿活不下去了。」

「事情要慢慢解决，你回去先下令复工，如果坚持作乱，先把你这个代表正法。」

刘少奇毫无惧色，坚定地说：「不答应条件，工人们要拼命的，你把我砍成肉泥，也解决不了问题。」

这时候，几千工人包围了戒严司令部，人声如潮：「要我们代表出来讲话！」工人们怕刘少奇有危险，要看看刘少奇。这种地动山摇的群众威势，大长了谈判代表的威风。

矿长李寿铨见此情形，知道来硬的不行，就用缓和的口吻说：「工人摊出的条件可以进一步商量，请代表暂回。」

十七日晚，在陈盛芳家里开始了正式谈判。陈盛芳是安源有名的砌匠，建筑行业的把头。家在安源中窖坡，门口一对石狮子，房子雕梁书栋，很讲究。陈盛芳和商会会长谢岗舫是作为调停人，路局代表是副局长李毅环，矿局代表是文牍课长舒季缓，工人俱乐部代表是李能至。在谈判中，两造争执，中人调停，皆舌敝唇焦。李能至在坚持工人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同意将十条要求合并为十三条：路矿两局代表也作了些让步。直至十八日凌晨两点，才达成十条协定草案。

十八日上午九时，在路局机务处，李毅环、舒季缓、李能至分别代表路、矿、俱乐部三方，在十三条复工协定上正式签字。十三条内容如下：

一、俱乐部改为工会，路矿两局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向两局交涉之权。

二、以后两局开除工人应征得工会同意。

三、从本月起，两局每月例假仍用大礼拜（即双周一礼拜

日),惟加发工资。

四、以后工人例假、病假、婚假、丧假,两局须照发工资。

五、每年十二月发双薪。

六、工人因工受伤不能工作者,两局须抚养终身,照发工人工资。

七、两局从前积欠工人各饷,矿局分五个月发清,路局即日发清。

八、罢工时间工资由两局照发。

九、每月两局须各津贴二百元为工会经常费,本月起实行。

十、以后两局职员不能随意欧打工人。

十一、窿工(按:下矿井采掘的工人)全体工资分别增加,并改用洋元(按:即废除矿票)十二、添补窿工工头,须在窿内管班大工中照资格深浅提升,不得由监工私行录用。

十三、路矿工人每日工资在四角以下者,须增加一角。

十八日下午,俱乐部召开万人庆祝大会。李能至登台宣布了十三条协定,并发表演讲。随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工人万岁!」「工人俱乐部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旗帜遮天,爆竹震地。

只有路矿两局的公事房死一般的沉寂。监工、职员和把头们伫立窗前,望着人山人海的队伍,咬牙切齿。「炭古老也配称万岁,真是翻了天。」

## 14 省宪初颁 黄庞人头落地 工潮再起 润之威信提高

一九二三年一月，长沙第一纱厂工人为要求年终奖金，全体罢工。华实公司贿赂赵恒惕大洋五万元，要他加害罢工的领导者黄爱、庞人铨，扑灭工潮。一月十六日深夜，黄爱、庞人铨在劳工会协商调停罢工问题后，赵恒惕派来军队，将二人捕去，未经审问，于十七日即

押往浏阳门外斩首。这一天正下着大雪，鲜血染红了大地。在十八日长沙《大公报》上，官方加诸死者的罪名是：

黄爱、庞人铨倡无政府主义，假劳工会名义，煽惑人心；近复秘密收买枪支，勾结匪徒，趁冬防吃紧，希图扰乱治安。

同时下令查封劳工会和该会出版的《劳工周刊》，钳制舆论，不准报纸刊登有关黄庞被杀的消息。

黄爱，湖南荆德人。一九一九在天津读书时，曾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两次坐牢。一九二〇年初回到湖南。庞人铨，湖南湘潭人，曾参加过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在驱张运动中，庞对毛泽东就很信服。毛泽东鼓励黄庞做工人运动。黄庞二人是湖南二人运动的先驱。在他们被杀前两个月，毛泽东发展他们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黄庞被杀事件发生在赵恒惕公布省宪法的第十六天（湖南省宪法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公布生效）。作为省长兼督军的赵

恒惕，正打着「省自治」的民主旗号向全国招摇撞骗。他想一只手搞假民主，一只手采取高压手段，把正在萌动的民主浪潮压下去，尤其是把刚刚兴起的工人运动压下去。

在黄、庞被杀前，当局对毛泽东也很注意，有各种欲加迫害的传言。经家人和嗣志的再三劝说，毛泽东暂避到东乡板仓岳家。毛泽东得知黄、庞被砍了头的消息，极为愤激，不顾一切劝阻，决定马上进城。他说：「于革命，怕死还行吗？」的确，这时候敢于出头，是要有不怕死的勇气的。正当工人们群龙无首，跑到劳工会痛哭，自发地冲击各衙门的时候，毛泽东来了。他组织领导工人们在船山学社召开了两次隆重的黄龙追悼会，并出版了纪念特刊。鉴于赵恒惕在湖南实行严密的新闻封锁政策，富有斗争经验的毛泽东，将李能至从安源调来，让他到常德动员黄爱的六十多岁的父亲，同去上海，向全国舆论界揭发控诉赵恒惕的暴行。李与黄父到上海后，以湖南工界名义通电全国，

将赵恒惕屠杀黄庞的经过详情，在上海、广州、北京各地报纸上披露出来。后来毛泽东亲自到了上海，在上海组织并主持了黄庞烈士追悼会，动员各界名流打电报抗议赵恒惕的暴行。因忙于反赵斗争，耽误了参加第二次中共代表大会。毛泽东领导的揭露和挟击赵恒惕的宣传运动，使得赵恒惕在全国刚刚建立起来的一点假声扫地以尽。毛泽东这种不怕死的斗争精神，硬是把赵恒惕的凶残狂暴的气焰压下去了。

从此，独立的劳工会解体，工人运动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领导下，勃然而兴，在长沙掀起了更大的工潮。

一九二二年六月，长沙缝纫工人最先举行罢工，获得了胜利，工资增加到每天两角八分。一九二三年八月，分散在大小一百一十多个厂子的一千五百名织造业工人，罢工十三天，挫败了资方五十二个厂家同盟的对抗，取得了工资一律以银洋计算的

胜利。

一九二二年十月，长沙城五百多名理发工人罢工，坚持二十多天，迫使资方让步，由劳三资七分成改为劳四资六分成；迫使长沙县政府让步，给工人自己开业的七家新店启封。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长沙制笔业工人全体罢工，坚持四十天，最后店主内部起了分化，和笔业工人谈判，答应了增加了工资，不准任意开除工人等六项条件。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离长六十里的钢官陶业工人三千多人抗议长沙县政府增税和封闭工人自办的陶业旅馆。毛泽东依据省宪法的条文为陶业工人起草了给县政府的呈文，县知事周瀛干见论证周详，知有高人指点，批上「励行自治，应予照准」了案。

在长沙影响最大的是一九二二年九、十月间，毛泽东直接领导的建筑业工人（当时称泥木工）的罢工斗争。四千多建筑工人坚持了二十多天的罢工斗争，获得了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的胜利。

一九一九年张敬尧政府规定建筑工人每天的工钱是铜元四十二枚，当时折合银元三角，而且规定「永不再有加增」。因湖南官钱局发的铜元票贬值，到一九二二年时，四十二枚只折合银元两角了，工人的实际工资低了三分之一。这年夏天，建筑工人要求正式工人增至三角四分，未出师的徒工增至二角六分。长沙绅商群起反对，县知事支持绅商，贴出告示，不准泥水行工人加价，说增加工资的要求是「蔑视官厅定案」，就是说，张敬尧时期规定的「永不再有加增」继续有效，不得「蔑视」。

针对长沙县的告示，毛泽东和李能至研究，先要动员舆论，抓件「省宪」驳倒长沙县的「告示」。于是由李能至在长沙《大公报》发表《我要替泥木工人说几句公道话》的文章，文中说道：

张敬尧已经跑了几年,《省宪》已经完全公布,还要拿张敬尧的话来做法律,岂不好笑?将来银元如民国五、六一样,每元换到十千零(即每块银换一万文。「文」是分币,十文等于铜元一枚。铜元竟换银元却不是十进位,因时而异,如一九二一年一块银元兑换铜元一百四十元,一九二二年一块银兑换铜元二百一十元。)你们也强制他们遵守张敬尧的法律,只许收四十枚一天,那么长沙城里六千多泥木工人,只好活活地饿死?并且你们加房租,宪章奉到了何人的命令?若说没有奉到命令,为什么硬要拿已经跑路的省长的话来束缚工人?《省宪》上明明规定人民营业自由,你们嫌他们工价太贵,莫请他们做工便了,为什么要强制他们不许加工价?

开始鲁班庙(建筑工人的行会组织)的把头祁寿松,甘子宪出面交涉。要每个工人摊五角钱「交涉费」,请长沙县官员、士绅、团总大吃酒席,长沙县只允许以后按现有工资(铜元四十枚)折成银元计算,即是说按银元两角,不再贬值,一文钱也没给增。当祁、甘要大家再摊「交涉费」由他们去交涉时,工人们一气之下把这些封建把头赶跑了。

这时毛泽东在建筑工人中培养的工人领袖任树德已经入党。他及时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又约集积极分子到船山学社开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先把自己的工会组织起来。以十人团为基础,到九月份发展到一百零八团,即是说会员达一千零八十人。毛泽东亲自为他们草拟章程十八条,章程第九条规定:「本会特聘请秘书办理本会一切事宜。」毛泽东把易礼容派去作秘书,常驻工会工作。九月五日长沙泥木工会在仓后街湘乡中学召开成立大会。到会十人团代七十多人,来实二十多人。第二天长沙报纸报道了这件事,并刊登了任树德的讲话:

我们为什么来组织团体?因为我们工人是生产者,是创造

世界的人，应该是世界的主宰，但还为旧社会一般人所贱。因此，我们要解放我们，不可假于他人，非自己团结起来解放自己不可。长沙的工会很多，但是假工会，非由真正工人所组织。我们要组织一真正工会，不是拿斧子拿瓦刀的工人不能加入，必须如此，会员方有共同的利益，一致奋斗下去。

会议选举任树德、张汉藩、舒玉林、仇寿松、杨福涛、朱有富、袁福清等四十一人为委员，下设总务、文版、会计、庶务、交际五股，任树德为总务股主任。会址设在实南街鲁班庙新庙。

工会成立后，印了大量定要改革价为三角四分的传单在全城散发。

十月五日，任树德等工会主要领导人到清水塘毛泽东住处开会，周密分析了形势和主观力量，毛泽东认为罢工时机成熟了。当晚出了罢工决议：

- 一、宣布于十月六日全体罢工；
- 二、推定罢工的纠察员，负维持秩序之责；
- 三、通电全国，求中公道；
- 四、发散传单于城乡内外，述明真相；
- 五、向省议会请愿；
- 六、非达到圆满结束决不中止。

第二天，和沙各报都登载了泥木工人的罢工宣言，宣言哀而动人，并无过高要求和过激口号罢工震动了全长沙城，一切公私房屋的修建都停止了。连省长公署、第一师司令部、外交署等单位庆祝「双十节」的牌楼也扎不成了。罢工第二天，泥木工人的纠察员整队游行，高举「坚持罢工」、「请求各界援助」的旗帜，通告全市泥木工人，遵守工会统一命令，不要自由行动，并劝告三泰街、藩城堤一带木货铺的学徒，不要私自做工。为了防止各处请外帮的泥木工人做工，工会又与湖北、江西、江苏各帮联络，取



得他们的同盟互助。

由于正与土木的公私单位担心天气转冷下雨，军、警、学、商教会、居民纷纷致函泥木工会，承认三角四分工价，希望泥木工人早日复工。工会除给省政府面子，派出挂特别符号的十人去扎「双十节」牌楼以不影响度典外，给各界一一复信，说长沙县一天不收回成命，一天不开工。于是各界转向长沙县署施加压力。

罢工第十一天，各机关、学校、公私住宅来函催请复工的就更多了，都一律承认三角四分的工价。于是泥木工会向长沙县署发出警告：如果到十七日尚不收回成命，决定十九日举行游行请愿大会。

长沙县署死要面子，维护官厅专严，派出官绅「调停」，答应给每天三角钱工价。

十月二十一日下午，两千多建筑工人在教育会坪开大会，征求大家意见，如何对付长沙县署。大家表示「得三角四分，坚决不做」。议决二十三日向长沙县署请愿，誓必达到三角四分的目的。当日发出一个出自毛泽东手笔的快邮代电给长沙县知事周瀛翰：

「罢工已久，衣食无出，饥寒交迫，众志成城。请与贵知事约：从今日下午十日起，至明日下午九时止，二十小时内，请贵知事用书面明白承认工等仅够衣食之每日三角四分工价之要求。否则工等定于二十三日，推举代表一千人，前来贵署与贵知事面质理由，若犹不决，则定于二十四日全体四千余人齐到贵署请发衣食，以卸饥寒。」代电最后声明：「二十三日之代表到署，及二十四日之作体到署，均是文明举动，严守工人自治、劳动神圣之本职，一切由纠察员负责，不烦贵知事援引袁皇帝颁布之《治安警察法》，孜孜为秩序之虑。」

毛泽东与「当权派」斗争，确实工心计，点子多，这封快邮代电把长沙县知事搞得如坐针毡。

十月二十二日长沙县署贴出布告，禁止请愿，否则依法严办，并且将任树德等十六个工人领袖名字写上，指明工人中有「暴徒」。有人怕再发生黄庞流血事件，有些动摇，不赞成请愿。毛泽东连夜找任树德、张汉藩、仇寿松来谈，说明现在主客观形势与年初时已迥不相同：一方面，工人有了组织，力量强大；长沙和全国各大城市都在发生罢工运动，有全长沙和全国工人阶级作后盾；同时社会各界也都同情我们。另一方面，长沙县公署很孤立；这件事与赵恒惕直接利害关系不大，赵不会为维护长沙县而动武。因此，要决心坚持到底，完全有胜利把握；同时要大家准备万一发生特殊事变的应变措施，并说：请愿时我要亲自到场，外面援助有专人管。几个工人领袖听毛泽东说请愿时要亲自到场，顿时有了主心骨，决心要带领大家干到底。

十月二十三日上午八点，四千多泥木工人在教育会坪集合，由任树德进行动员，他用自己的语言传达了毛泽东对形势的分析，最后坚决地提出：非达到三角四分，决不出县衙门。并通过任树德、仇寿松、张汉藩、朱有富、舒玉林、袁福清、杨福涛等十六人为请愿代表。工会秘书、共产党员易礼容为首席代表。这时天下了雨，但全体工人情绪饱满，九点正，请愿队伍浩浩荡荡出发，队伍前头打着横幅：「泥木工人请愿大会」，另一面旗子上写着：「硬要三角四分，不达目的不出衙门。」沿途大呼口号：「硬要三角四分，不达目的不上工。」这样声势浩大的工人请愿，在长沙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毛泽东穿上对襟工人装，走在工人队伍中间。

请愿队伍到了长沙署后，正门有一排兵守卫，不准工人进去。于是全体工人齐集在县署的前坪，头门派总纠察八人，纠察

员四十人把守，不准闲人出进。任树德等十六个代表分两批人见县知事周瀛干。周会见第一批代表时，态度强硬，说：

「公团开会议议定为三角，未便增加。」并武断地说：「你们工钱够吃。」代表们就跟他算细帐，周又被算输了，这时外面群众高呼口号，周借故转入内堂，不出来了。第一批代表出来报告交涉无结果，于是第二批代表又进去了。周瀛平硬着头皮不出来见代表。这时毛泽东跳上花坛对工人们说：「如果再等一会仍无消息，我们大家就一齐往里冲，找周瀛干去说理。」说完就领着大家喊口号：「硬要三角四分！」「不达目的不出衙门！」过了一阵，仍无动静，工人们喊着口号一齐往里冲。守卫的士用刺刀对准工人，被工人夺下两支枪。这时衙门里出来一个低级官员，故意责骂士兵不该拿刺刀对人。工人也趁势说：「不为难当兵的。」把枪交还了。这时：官员举起「大令」（「大令」本是县官的尊称；后制作一种筏子，摆在大堂，也叫「大令」，象征县官的权威。衙役捕人，手持「大令」，如同县官亲到口里喊着：「看，这是什么？你们造反吗，再这样我就不客气了。」工人代表上前和他说明理：「我们赤手空拳要饭吃，为何拿大令吓人，看谁不称道理。」大家听从代表的意见，一齐蹲下来，等候谈判结果。

由于周瀛干连连告急，赵恒惕派来一连兵，将工人团团包围起来。这时毛泽东插在队伍里面，领导工人喊口号，他带了个口哨，他吹一声，工人们喊一声，群威威胆，坚持斗争。少数动摇的工人见毛先生跟大家在一起，又坚定起来了。

天快黑了。大家一天没吃饭，由工会买了几箩筐发面饼每人发给两个充饥。造币厂、电灯公司和缝纫、织造、理发等行业纷纷派代表送来茶水食品，有的还送来灯龙、油布，给请愿工人作露宿之用。请愿工人的劲头更足了。

第二批代表坐在县知事会客厅里，逼迫周瀛干接受条件。

周借故去打电话给赵恒惕，说将为首的工人代表抓起来就地正法，请愿工人就会吓散的。果如毛泽东所分析的，赵恒惕没有答应抓人、杀人。

晚上八点钟，赵恒惕一参谋来「调停」。他来到前坪问工人们的意见，大家一齐高呼：「硬要三角四分，不达目的不上工！」参谋说：「省长答应三天内解决，你们暂且回去吧。」工人齐声呼喊：「得三角四分不出衙门！」这样，几千工人在外面，代表在里面，坚持到半夜。后来政务厅长吴景鸿打来电话，指定要请工人代表讲话，说：「第二天下午两点召集公团会议，请工人代表出席无论如何总有结果。」毛泽东和代表们商量，同意了这个办法。全体工人整队撤出，分头到鲁班庙和吕祖殿歇宿。这时已是十月二十四早晨三点了。

十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时，全体工人到教育会坪开会，决定如公团会议仍无结果，再向省长公署请愿。下午二时，任树德、张汉藩、仇寿松、朱有富、杨福涛等十二个代表去政务厅参加八团会议。因长沙县署昨天向赵恒惕建议逮捕首席代表，为不使政府当局把目标盯在一个人身上，毛泽东叫易礼容回避，由他亲任首席代表，与政务厅长吴景鸿对话。

有人说毛泽东只是在背后出谋划策，叫别人去冒危险，观之于此次斗争，完全不是。当二十三日请愿工人被一连荷枪实弹的士兵包围的时候，他钻入核心，稳定大家的情绪；当统治者要逮捕首席代表「就地正法」的时候，他敢于出来当首席代表。当然毛泽东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但他也知道何时该冒风险。

在谈判时，毛泽东手里拿着《省宪法》、援引第十六条：「人民对于政府，有上书请愿及请求抚恤灾难之权。」批驳了说这次请愿活动是「造反」，是「暴乱」，「藐视官厅」，「大闹公堂」等诬蔑。吴景鸿问：「先生贵姓，是不是工人？」毛泽东答：「先生问我

的资格,我就是工人代表,如果要审查履历,最好改日再谈。今我以泥木工人代表的资格,要求政府解决工资问题。」吴景鸿说:「工价涨到三角四分一天,各公团都认可了,政府也同意。只是要限定在这个数上工人不得再随意加价。」毛泽东说:「根据《省宪法》关于‘营业自由’的条款,商界百物都根据市场供求,有涨有落,价钱并不定在一个数上,泥木工人工资,也属营业自由,不能定死。将来如柴米油盐都涨价,工人要加工钱亦属正常,且要与雇主商量,邀如买卖之间的关系一样,政府不应干涉。」这时一工人代表说:「如果营业自由,乡下人可以自由进城做工,这就破坏了行规。」吴景鸿抓住这一句说,借口工人内部意见不一,有人操纵工会。毛泽东便要吴派人去问问几千名工人的意见。当政务厅官员提着灯笼到教育会坪时,工人蹲坐在地,秩序良好,一致要求营业自由,并无任何分歧。回来当着工人代表的面报告吴景鸿,吴只好同意,但要由泥木两行具一呈文,请求营业自由,经政府批准。毛泽东当场将代表与吴的对话记下,由吴过目认可。于是有的代表带着谈话记录往教育会坪向工人报告谈判结果;有的代表当场写呈文。

第二天长沙报纸登载《谈话纪录》如下:

泥木两行工人,要求将工价增加至三角四分,不承认长沙县知事阴历八月十四之布告而罢工争执一案,既据该业代表声称,此事本为劳工与雇主之自由契约关系,应由双方自由协定,非有强迫行为(此句系吴厅长添的),官署不必过问。本厅长代表省长允照上述主张办理,望以此意通告各工友。例文句在省长公署政务处,当吴厅长景鸿记录。

十月二十五日上午,仍由毛泽东率代表至政务厅,催吴景鸿将呈文批准。当吴景鸿最后盖印时,毛泽东发现批文中「其工价尤应随进协定,不得由该工人等一面加以限制」等语,毛泽东

坚决不同意这一句，外面两万开庆祝会的人又在等着，吴景鸿只好同意删掉那句话。至此，坚持二十一天的长沙泥木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与此连带的，并争得了营业自由，以后可以随行就市，调整价。

中午，全体泥木工人，以及第一纱厂、黑铅炼厂、电灯公司、粤汉铁路、理发、笔业、缝纫、漆业、印刷等有组织的工人群众两万人齐集教育会坪，召开庆祝泥木工人罢工胜利大会，并照像留念。

这场罢工斗争，可以说是毛泽东一手导演的。共产党和毛泽东在群众中的威信大大提高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湖南的工人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一九二二年十月，全省已正式成立了十四个工会，这些工会是：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水口山铅锌矿工人俱乐部、粤汉铁路的岳州工人俱乐部和长沙新河工人俱乐部，以及长沙的泥木工会、机械工会、人力车工会、铅印活版工会、石印工会、理发工会、缝纫工会、笔业工会、织造工会、靴鞋技师工会，加入人会的有组织的工人在四万人左右。除靴鞋技工工会外，其余十三个工会都经过严峻的罢工斗争，而且取得了胜利。在罢工斗争过程中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工人干部，涌现了大量的工人积极分子，在许多任务会内发展了中共党员，除在安源、汉铁路、水口山、人力车等少数工会中，仍由中共湖南省委派去的党员负主要责任外，多数工会的负责人已经是工人中发展的新党员了。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一日，粤汉铁路总工会在长沙新河总站开成立大会。这个大会是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全省各工会都派了代表参加。在粤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开完之后，株萍路的工人代表提出成立全省工团联合的建议，各工会代表都一致赞同这个意见。于是召开了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代表会议，



参加的单位有粤汉铁路总工会，粤汉路岳州、长沙工会，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长沙的泥木、理发、人力车、缝纫、笔业等工会的代表。毛泽东以粤汉铁路总工会代表的资格出席了这个会议，其它各工会的代表有粤汉路岳（州）长（沙）工会负责人郭亮，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负责人朱少连，泥木工会负责人任树德，颖纫工会负责人张树藩等。大家推举毛泽东为会议主席。会议正式宣布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简章，规定「凡产业工会及职业工会均有加入本联合会之资格。」在十一月五日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全省工团联合会干事局总干事，郭亮为副总干事，任树德、罗学瓚（人力车工会负责）、朱少连等为各部门负责人。同时发表宣言通告全国：湖南全省工人的统一组织，全省工团联合会正式成立。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后，湖南劳动组合书记部便不存在了。「劳动组合」是个日本名词，「书记部」是俄国名词。中共「一大」时把两者合起来，成为劳工运动组织的名称。这件事情也反映了当时中共生吞活剥的教条主义倾向。然而工人们对这个陌生的名称不认同，毛泽东把它改成了全省工团联合会，一下子就叫响了。工团联合会的会址设在长沙宝南街八号。从此湖南工人运动有了自己的公开司令部。

工团联合会虽然已大张旗鼓地进行活动，但仍处于非法状态，没有到省政府立案。毛泽东认为必须力争主动，有正面向赵恒惕政府及赵本人作一次说理斗争的必要，以鼓舞工人的斗志和争取省工团联合会的合法。于是毛泽东以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的身份，率领各工会代表郭亮、任树德、罗学瓚、张汉藩、仇寿松等二十三人，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一日会见了长沙县知事周瀛干，警察厅长石成全，十二日会见了政务厅长吴景鸿，十三日会见了省长赵恒惕。毛泽东为这次斗争制定的策略是：第一，不提过高的要求，不使当局过于难堪下不了台；第二，抓住



## 赵恒惕的省宪

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据十二月十五日长沙各报刊载工团联合会发稿的,各工团代表与赵省长、吴政务厅长、石警察厅长、周长沙知事交涉的实在情形一文,工团联合会共提出十项交涉事项,前三项颇引人注意,后七项是理发、人力车业等个体问题。

第一项,请政府表明对工界的态度。这问题提的就很有弹性。毛泽东从正面提出问题,赵、吴、石、周四人也只能是从正面回答,谓:「政府对工人全采保护主义,并无镇压之意,近来各处罢工起时,政府并未干涉,即是明证。」赵省长、吴政务厅长并谓,政府虽听到许多传说,如总同盟罢工之类,亦以谣言置之,并未用何种压迫办法。当谈到杀害黄、庞时,赵恒恂辩解说是「迫不得已」,并给黄、庞加上了「收买枪支,勾结土匪」的罪名,强调镇压「系对黄、庞个人,并非对工界」。毛泽东对这个敏感问题采取各唱各调的对策、当场予以反驳说:「所谓黄、庞收买枪支,勾结土匪,及连动造币厂罢工,都不是事实,下面报告一定都说这是事实,说这不是事实的,恐怕省长今天才听到。工人方面被杀一两个人,封闭一两个工会,固然是损失,但并不因此停止他们必需的活动。而政府方面,受通国之责难,名誉上法律上的损失真不可胜计。即此亦足以证明政府与工人隔阂之不好。」

第二项,集会结社问题。毛泽东手里拿着《省宪法》,指着条文说:「关于结社,官厅常有不允许之事,总说先要立案,才可结社。不知《省宪法》第十二条:‘人民在不抵触刑事法典之范围内有自由结社、及不携带武器和平集会之权,不受何种特别法令之限制’;并无规定要经官厅准许才可结社。若须准许才可结社,则许可与否官厅大可自由,《省宪法》第十二条就根本取消了。」「集会亦然。近来集会常有暗探到场,各方阻扰,或竟用

武装警察勒令解散。不知人民不携带武器之集会《省宪法》规定有完全自由，断不宜随意干涉。」赵、吴、石、周四人只好承认：「宪法完全有效」，「只要人民是守法的，政府当然不干涉。」这里人民行为是否守法的问题，政府的理解与人民的理解往往不同。因此，在政务厅毛泽东与吴景鸿展开了辩论。毛泽东说：「从前政府常有干涉集会结社及言论出版之理由，常以某种集会结社或言论出版之意思将会侵犯刑事法典为词，与法律本意不合；若政府在人民未有行为以前，只根据其用意（并且是揣测的）就去干涉，那就几无事不可指为「将会」侵犯刑事法典，无事不可干涉了。」吴景鸿说：「法律本有动机与行为主义两派，现在法律确是采为行为主义，但如果动机确会有某种犯法行为发现时，亦不得干涉。」毛泽东抓住吴厅长承认「现在法律确是采行为主义」，强调说：人民如无直接远犯法律之行为，实不应干涉。并举英、法不禁人民佩带手枪，必有放枪杀人之事发现时，才去干涉为证。使得吴景鸿无词以对。

第三项，表明工界态度。首由毛泽东作系统发言，他说：「工人所希望的是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确于工人有利；但中国目前尚难做到。目前政治，自然以民治主义为原则。至官厅文告，常有工人盛倡无政府主义之语，全达事实；工人并不信仰无政府主义，因无政府主义于工人殊不利也。近来工人为解决自身痛苦，常有种种运动，即所谓劳工运动，但均不出增加工钱、减少时间及改良待遇三事。」毛泽东不失原则，公开声明工人拥护社会主义，但接着又不承认「中国目前难以做到」，并回到《省宪法》上来：「目前政治自然以民治主义为原则，」简直是滴水不漏；又把工人运动的目标限制在「增加工钱、减少时间及改良待遇三事」，当局无可挑剔，几位政府要员表示：「工人采取这种态度极为得当。」

这次对话,迫使赵恒惕承认了工团联合会的合法地位,几项具体要求也都得到了有利于工人的解决。从而大大鼓舞了工人的斗志,大大提高了工团联合会的威信。毛泽东在湖南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赵恒惕亲自与毛泽东对话后,对他的亲信左右说:「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便不能立足了。」

一九二三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二七」大惨案。在汉口江岸,湖北督军萧耀南根据吴佩孚的命令,枪杀和平示威游行的铁路工人四十余人,受伤者有数百人。惨案发生后,湖南工团联合会号召工人阶级起而援助,发宣言,开追悼会,展览死者血衣,募捐,并在长沙组织了两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在全国工人运动走向低潮的时候,湖南的工人运动继续高涨。长沙造币厂、黑铅炼厂、第一纱厂的工人俱乐部,先后成立了。随后,茶居(茶馆业工人)工会、电灯工会、粪码头工会、箩码头(搬河运工人)工会、店员工会、油漆匠工会、铜匠工会、划夫工会、邮务工会、石碾谷工会、水夫(即河水卖的)工会、洋务(在外国洋行工作的职工)工会、新化锡矿山工会和湘潭锰矿工会,相继成立。参加工团联合会的组织已达三十多个。给湖南统治者以极大的震动。

湖北督军对工人运动的镇压给赵恒惕壮了胆。他秘密下达了逮捕毛泽东的命令。一九二三年的一天夜里,一个在省政府工作的秘密党员,匆匆赶到清水塘通知毛泽东迅速转移,赵恒惕派来抓他的警察已出发在途。赵恒惕没有捉到这个最危险的人物,于是在要道关卡,张贴布告,悬赏通缉「过激派」毛泽东。毛泽东在群众的掩护下,从容安排了工作,半个月后。才离开湖南,只身前往上海。毛泽东离开后,由郭亮继任工团联合会总干事,继续领导湖南的工人运动。

## 15 竟存背叛 中山蒙难来上海 国共合作 诸贤集会聚羊城

一九二三年四月下旬,毛泽东来到上海,参加了国共合作的筹备工作。从此登上了全国性的政治舞台。

关于国民党与共产党第一次合作的来龙去脉,要从孙中山「护法」谈起。

一九一七年六月,安徽督军张动带领五千辫子兵进京,废除约法,解散国会,捧出废帝溥仪做了十二天皇帝。皖系军阀段祺瑞在天津马厂誓师,粉碎了复辟政变,控制了北京政权,成立临时参议院代替被解散的国会。这意味着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失去了国会中的多数党地位(一九一三年初,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选举产生的国会参众两院,国民党占三百九十二席,共和、民主、统一三党联合起来仅占二百二十三席)。孙中山强调法统的连续性,解散国会违背约法,联合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四川西徇五省,树起了护法旗帜,以和北洋派相抗衡。

一九一七年八月,追随孙中山到广州的国会议员一百一十余人,以不足法定人数举行非常会议,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海陆军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大元帅下设两个元帅,用以交换西南两大军阀对军政府的支持,这一安排充分表现了孙中山及国民党的软弱性,九月十日孙中山宣誓就职。但云南督军唐继尧通电不就元帅。两广巡阅使陆荣廷致电非常

国会反对另组政府。广东督军陈炳公开声明拒付军政府和非常国会的经费开支。孙中山从广东省长朱庆润手里接管「省长亲军」二十营(约五千人)作为起家的武装力量,任命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字竞存,广东海丰人,老同盟会员,孙中山视为股肱。为扩充实力,孙中山令军政府派人到各县招收民军。陆荣廷委任的广东代理督军莫荣新接到各县报告,并不直接向军政府提出交涉,通令各县指证这些招兵人员为土匪,一律就地枪决。单是增城一县就有六十七个招兵人员被杀。十二月又有两个招兵人员在广州被捕,孙中山亲笔写信给莫荣新保释,莫连信都不回就把这两个人枪毙了。这一事件使孙中山忍无可忍,决定不顾一切和桂系硬拼一下。一九一八年一月三日,孙中山密令海军、滇军和地方派军人举行一次军事突变,推翻桂系在广东的统治。海军豫章、同安两舰奉命后炮击观音山督军署,但滇军和地方派军人作壁上观,没有配合行动。莫荣新下令熄灭灯火,不许还击,事态没有扩大。

桂系需要护法的旗帜,以独立于北京政府管连之外,所以没有用武力阻护法军政府的成立,也不愿用武力推翻军政府。他们要排除孙中山,使军政府成为自己手中的工具。五月四日,在桂系的策动下,非常国会以九十七票对二十七票通过了《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修正集决定以总裁的合议制代替大元帅的一长制,等于撤了孙中山的军政府首揆职务。第二天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二十日选出唐绍仪、唐继尧、陆荣廷、伍延芳、孙中山、林保悻、岑春煊七人为军政府总裁,后又推举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岑春煊是广西西林人,清朝旧臣,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率兵护送慈禧太后和皇帝到西安避难,后历任四川、两广、去贵总督,多次镇人民的反清斗争。这样一个人当了护法军政府首脑,说明军政府已完全变质。孙中山辞职后离广州去上海。

一九二〇年七月，孙中山命陈炯明率粤军回粤，讨伐桂系。这时粤军已由二十个营发展到五百零八营，编为两个军，总司令陈明兼第一军军长，详崇智任第二军军长。粤军以风卷残云的姿态驱逐桂系，收复广东。十月二十四日，岑春煊宣布撤销军政府。十一月二十九日，孙中山由上海抵广州，恢复军政府。任命陈明为军政府陆军总长、内务总长、广东省长兼广东总司令。陈炯明这时羽毛丰满，滋长了个人野心，要和湖南的赵恒惕搞「联省自治」，并不希望恢复军政府。

孙中山继续高扬护法的旗帜。鉴于北方非法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已丧失中央政府资格，为承继法统，一九二一年四月，国会非常会议决议，取消军政府，成立中华民国政府，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陈炯明竟出面反对孙中山就职。当孙中山命参议罗翼群劝告陈炯明给以支持时，陈说：「我已商之各将领，皆谓中山先生必欲就任在总统，亦不过一时的广东总统而已。万一北京政府及邻省借词出师击讨，我等实难负战守之责。」罗回禀后，孙中山说：「我被选为大总统，举国皆知。只要我一出师，长江及华北军民甚多欢迎归附者，北洋军阀决无力来犯粤省，桂军残部怨于侵粤之败，哪还敢再来谋粤，请竟存放心。我必须于本月内就职并速行北伐。成功自不用说，万一事败，则我出走，粤省任由竟存去和人家妥协，我可不错。这样好吧！」罗将孙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陈炯明。陈无法再加阻挠，对罗说：「中山先生必要做广东总统，请其于五月五了就职如何？盖距国会选出之期亦尚未逾一个月。中华民国国庆为双十，今孙总统就职为双五，亦是恰好之纪念日也。」罗翼群再报孙中山，孙微笑说：「我是广东总统，竟东是广东皇帝，皇帝开了金口，我遵命就是。」遂于五月五日宣誓就职。阅兵时仅粤军第一师参加，邓铿师长陪同检阅，陆军总长兼广东总司令陈炯明借故未到。



孙中山深感在广州受制于陈炯明，不能有所作为。遂向陈炯明提出，亲自带兵假道湖南北伐，将广东地盘让给陈；但北伐军的军费须由广东筹措。陈又表示反对，说北伐可能促使直奉两系联合起来对付南方，并与赵恒惕勾结，由赵出面反对北伐军假道湖南。孙中山的北伐大计遂不得行。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六日，孙中山在桂林设大本营，联络支持自己的部队四万余人，任命朱培德为北伐军滇军总司令，谷正伦为北伐军黔军总司令，彭程万为北伐军赣军总司令，李烈钧为大本营参谋长，湖汉民为文官长，相约与奉军同时出兵，南北来击，讨伐直系曹錕、吴佩孚。由财政次长廖仲恺和粤军参谋长邓铿筹措军费作为后勤保障。不料，三月二十三日，邓铿在广州被刺身亡。孙中山在桂林大本营接到这个凶耗，非常震惊。二十六日召开紧急会议，诸将领一致认为后方如无接济，前方无法作战。孙中山的北伐计划再次搁浅，督师回粤。为排除陈炯明的阻力，四月二十一日，孙以大总统名义下令免除陈炯明的内务处长、广东省长兼广东总司令的职务，专任陆军总长参加北伐。陈炯明电辞本兼各职，回到惠州。指使叶举等粤军将领坚决要求恢复陈炯明的广东总司令职务。孙中山答应陈炯明可以用陆军总长名义执行总司令职权，并指定肇庆、陈春、罗定、高明、雷州、钦州、廉州及梧州为「陈家军」防地，派叶举为粤桂迎防督办以统率之。陈炯明同意并保证叶举等举有越轨行动。孙中山任命伍延芳为广东省长，魏邦平为广州卫戍总司令。然后，令北伐军集中韶关、南雄、仁化，改道江西北伐。

五月六日，孙中山亲赴韶关督师，八日下总攻击令，北伐军分三路攻入江西。从五月中旬到下旬，北伐军以破竹之势先后占领南安、新城、崇义、信丰、虔南、龙南等县。正当北伐军向前推进的时候，叶举达令于五月十八日率第二师开进广州。二十



二日通电逼孙恢复陈炯明的广东总司令职务。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也列了名；并指名攻击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等请孙罢黜。孙中山再作让步，于二十七日令：「陈炯明以陆军总长办理两广军务，所有两广军队，悉归节制调遣。」但陈炯明已暗通直系曹吴，接受「两广巡阅使」的委任，并与江西督军陈光远电文往还，相约夹击北伐军，定要恢复陈的广东总司令职务只是寻找闹事的一个借口。为了挽救北伐大业，孙中山令前方继续作战，六月一日只带卫队回到广州进行安抚。叶举拒绝与孙见面。十五日孙中山派往惠州迎接陈炯明的廖仲恺在石龙被扣，是日晚间，叶举等发出通电逼孙下野，指挥第二师四千余人，发动军事政变，围攻总统府，炮击孙中山在观音山住所粤秀楼，卫士死伤枕籍，总统府遂成灰烬。十六日，孙中山间道出走，避登泊于长堤天字码头的实警舰。当天下午，孙夫人宋庆龄亦脱险。十七日，孙中山转登永丰舰，命令「由舰队先发炮，攻击在省叛军，以示正义之不屈，政府之威犹在。」十九日，电令李烈钧、许崇智等人赣北伐挈迅速班师回粤讨逆。这时北伐军前锋已进入吉安，江西督军陈光远逃离江西。由于陈炯明在后方犯上作乱，北伐大业半途中止。

八月十四日，孙中山经香港抵达上海。发表宣言，揭露陈炯明叛乱经过。这时候的孙中山，简直是四面楚歌。北京的舆论高唱孙中山与徐世昌南北两总统同时下野的调子。直系军阀吴佩孚和西南各省的联省自治派，或明或暗支持陈炯明。国民党内背离孙中山的人也不少，尤其是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王龙惠等四十九人联名通电请孙下野，给他的打击更大。孙中山痛定思痛，认识到不依靠人民群众，不依靠真正的革命力量，单纯地利用一个军阀去打倒另一个军阀，利用南方军阀打倒北方军阀，是不可能取得革命成功的。最使他痛心的是他自己培养

的干部陈炯明,如今变成了要置他于死地的新军阀。他所创造的国民党已经腐败,担负不起统一中国、再造共和的任务。他要寻找新的革命力量,走新的革命道路。

八月二十三日,孙中山在莫利哀路寓所会见了一个不寻常的客人共产党人李大钊。这次会晤使他非常兴奋,二人就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畅谈不倦,几乎忘食。

二十五日,国际代表马林会晤孙中山。告以共产国际于七月十八日开会决定,令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以开辟中国的新局面。孙中山乃决心实行联俄联共的政策,表示愿意与苏俄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二十九、三十两日,根据马林提议,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全会,讨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出席;张太雷以翻译身份参加会议。马林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七月决议和八月指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统一战线。全会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

九月四日,孙中山召集在上海的各省国民党负责人五十三人讨论改组国民党的问题,马林、陈独秀、张太雷应邀参加。孙中山宣布了他的联俄联共政策、大量吸收新鲜血液、振兴国民党。马林也在会上讲了话。

几天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等第一批共产党员,由孙中山亲自主盟,加入了国民党。

十一月十五日,孙中山又召集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国民党改组方案。十二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再次开会,讨论国民党改组宣言,审查党纲、党章。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孙中山会晤苏联代表越飞,公布《孙文越飞宣言》,向中国和世界宣告,走联俄联共的道路。

一九二三年初，奉孙中山密令，驻留广西的滇军杨希闵部、桂军刘震寰部及部分脱离陈炯明控制的粤军，共约三万余人，在梧州举行白马会盟，揭起读者讨论贼军的旗帜。由于粤军内部起了分化，陈炯明未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就失败了。一月十五日陈炯明通电下野。二月二十一日，孙中山由上海回到广州。在农业试验场成立大元帅府，改称大元帅，不再回任总统。在这样的历史背颞下，毛泽东于一九二三年四月下旬来到上海。会见陈独秀以后，得知中共中央与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关于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各项工作，正在顺利进行之中，命他参加设在环龙路四十四号的筹备国民党改组的办事处工作。他是在宣传部，一起共事的有邵力子、叶楚伦、茅祖权等。就在这时候，毛泽东参加了国民党。

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统一全党的思想，推进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的合作，建立统一战线，开展革命的新局面。中共「三大」于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在广州东山恤孤院街三十一号（今恤孤院路三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毛泽东、瞿秋白、张太雷、陈潭秋、谭平山等三十余人。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十九人。代表全国党员四百二十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参加了大会。大会由陈独秀主持，并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代表大会作工作报告。着重说明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依据和过程，总结了「二大」以来的工作，对于工运、妇女、组织和宣传等方面的工作情况及经验教训作了说明。报告还检讨了中央和各地区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表扬了湖南地区的工作，指出：「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大会听取了马林关于国际形势与国际工人运动的报告，瞿秋白

关于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的报告，陈潭秋关于京汉铁路「二七」惨案的报告，孙云鹏关于「二七」惨案被捕工人救济工作的报告。

各地区代表还作了关于本地区的工作报告。毛泽东在报告湖南工作时谈到了农民问题。据张国焘回忆：「他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样的局面。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弟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由于毛泽东对农民问题发表了卓越的见解，他被推举为《农民问题决议案》的起草人。

大会讨论持续了几天。关于共产党员是否全体加入国民党和产业工人是否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出现了不同的意见。陈独秀、瞿秋白主张，共产党员应全体加入国民党进行国民革命，「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将来国民革命成功了，党的独立是不成问题的。他们还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非常幼稚，共产党又不能公开，只有吸引大量工人参加国民党，才能做好工人运动，壮大国民革命的势力。张国焘、蔡和森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认为这样就会丧失党的独立性。他们也反对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认为产业工人是共产党的基础，不能把工人运动送给国民党，削弱自己。国际代表马林支持陈、瞿意见（或者说陈、瞿意见体现了共产国际的意图），大大加重了这种意见的分量。讨论的结果，否定了张国焘、蔡和森的意见，通过了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

的决议》以及《劳动运动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青年运动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王荷波、朱少连、谭平山、项英、罗章龙为中央执委员；推举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谭平山五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在中共「三大」，毛泽东的地位大大上升了。九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相当于中央委员会，毛泽东是委员之一；五人组成的中央局相当于政治局，毛泽东是委员之一；最后他又被委任为协助委员长处理中日常工作的秘书，相当于中央秘书长的角色。

中共「三大」后，中央机构于七月初由广州迁回上海。这时，大多数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先后加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形成的强大推动力。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受国民党本部派遣，赴长沙发展组织。九月二十八日，他给总务部部长彭素民、副部长林伯渠写信报告工作情况，其中谈到「关于本党（按：指国民党）在湘发展，难在军事时代仍应努力进行，昨与夏希（按：即夏曦）同志（夏希极能做事，在学生界有力量）商议分三步办法：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组织常德州及其它可能的支部；第三步再组织湖南总支部。关于长沙支部，现决定即日租定房子成立筹备机关（秘密的），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然后开成立会推出候补支部长，呈请本部委任。惟经费极困，机关即立，每月至少须一百元内外，现在正邀集热心同志设法捐集应用。在沪（注：应为‘在湘’）时请本部委我以筹备员名义（夏希为筹备主任）以便与各方面接头，请早日寄到为荷！」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三大」的决议，十一月下旬在上

海召开了三届一中全会。会议听取了中央局和各地区的工作报告,主要就如何开展国民运动及在国民党内开展工作问题作了部署。会议决定在「国民党有组织地方,如广东,上海、四川、山东等处,同志们一并加入」;「国民党无组织之地方,最重要的如哈尔滨、奉天、北京、天津、南京、安徽、湖北、浙江、福建等处,同志们为之创设」。毛泽东去湖南就建设国民党地方组织和选举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问题进行工作,未出席三届一中全会。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第十三号通告》,要求全体党员积极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工作,争取做到每省有一名共产党员当选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帮助下,孙中山加快了改组国民党的实际步骤。一九二三年八月十六日,孙中山派出由蒋介石、张太雷、沉定一、王登云等人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联,具体考察苏联的政治、党务、红军等组织情况。参观苏军的军事院校,并洽谈苏联援助问题。

十月六日,第三国际驻华代表、苏联驻广东革命政府代表鲍罗廷偕妻子范娅来到广州,孙中山聘为国民党特别顾问。鲍罗廷是犹太人。一八八四年七月九日生于俄国西部维切布斯克省,原名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格鲁森贝格,三岁随父母移居拉脱维亚。青年时做过船工。一九〇三年他参加了列宁领导的社会民主工党,是个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与列宁和斯大林都很熟悉。一九一九年出席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任国际代表被派往美国、墨西哥等地活动。出使中国是他一生事业的光辉顶点。

十月十九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李大钊、汪精卫、张继、戴季陶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负责办理改组事宜。二十五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举行,参加者一百余人,廖仲恺主持。



二十八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在廖仲恺主持下，至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九日五十天内，开会二十八，认真地讨论和筹划改组国民党和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原则和具体问题。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至三十日，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孙中山亲自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最多时一百七十五名，最少时一百三十名。其中共产党员代表，除孙中山指定的陈独秀（未出席），于树德、李大钊、谭平山、沉定一、詹大悲、谢晋外，还有各地推举的代表林祖涵（林柏渠）、罗迈（李维汉，未出席）、夏曦、袁达时、于方舟、张国焘、瞿秋白、赵干、毛泽东、胡公冕、宣中华、廖于五、朱季恂、韩麟符、王尽美、刘芳（刘伯垂）、李能邨（李立三）、陈镜湖、李永声（李锡九）等二十余人。大会主席团由孙中山指定林森、汪光铭（精卫）、谢持、胡汉民、李守党（大钊）五人担任。二十三日大会通过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个宣言是由罗延起草，瞿秋白翻译，汪精卫润色的。宣言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一月二十五日，从苏联代表处获悉列宁逝世，休会三日，以志哀悼，广州机关下半旗三日致哀。

二十八日上午讨论《国民党章程》时，广州特别区代表方瑞麟提议增加「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文。这显然是限制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必须脱离共产党，不能做「跨党分子」。李大钊代表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作了严正发言，他说：「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着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的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以说我们是跨党，不能说党内有党。」



因为第三国际是一个世界的组织，中国共产主义的团体是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支部，所以我们可以说一个一个的加入本党，不能把一个世界的组织纳入一个国民党的组织。」「我们加入本党的时候，自己先从理论上事实上作过详密的研究。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帝国大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不过我们既然参加了本党，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党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纪律。」

李大刘的发言，受到与会代表的欢迎。这时执行主席胡汉民说：「现听大家的议论，实际上没有什么争执，不过讨论之焦点，在怕违反本党党义和违反党德党章；但此种顾虑，只要在纪律上规定即可。现在纪律上已经有专章，似不必再在章程上用明文规定何种取缔条文，惟申明纪律可也。」当胡汉民把话说完回到主席座位上时，毛泽东（他是十九人组成的党章审查委员会委员）即席大年声说：「主席！主席！三九号发言，本席主张本案停止讨论，即刻付表决。」毛泽东语毕，胡汉民即宣布：「现在付表决」，结果大多数代表举手赞成通过。至此，联共案遂被大会通过，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以允许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的「党内合作」的形式被大会确定而实现了。最后选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二十五人，其中有共产党员谭平山、李大刘、于树德三人；候补执行委员十七人，其中有共产党员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翻焘、沉定一七人。三十日，大会闭幕后，中央执、监委员及候补委员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由孙中山主持，议决中央执行员会设于广州，并分设执行部于北京、上海、汉口、四川、哈尔滨五地；将中央执、监委员及候补委员分配于中央及各执行部，指挥、监督党务的进行。中共党员分配在广州国民党中央总部的有谭平山、林祖涵；在北

京执行部的有李大川、张国焘、于树德、于方舟，韩麟符；在上海执行部有毛泽东、沉定一、瞿秋白。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工人部、农民部、青年部、妇女部、调查部、军事部。中共党员在各部任职的有组织部长谭平山，秘书杨匏安；工人部秘书冯菊波；农民部部长林祖涵，秘书彭湃。三月一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决定派遣各省临时执行委员会筹备员，分赴各省建立组织，其中中共党员有湖南夏曦，直隶于方舟，山西韩麟书，湖北刘芳，江苏张曙时，浙江沉定一，热河韩麟符，江西赵干、邓鹤鸣。由于国共两党通力合作，发动人民大众投身国民革命，大大加强了革命力量，开创了革命运动的新局面。

一九二四年三月，毛泽东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由广州回到了上海。据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的《上海执行部第一次至第四次执委会记录》。上海执行部组成人员如下：常务委员：胡汉民、叶楚伦、汪精卫。下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工人农民部、青年妇女都和调查部。秘书处分文书科和会计庶务科，文书科主任为邵元仲，邵来到任前由毛泽东代理；组织部部长胡汉民，秘书毛泽东；宣传部部长汪精卫，秘书恽代英；工人农民部部长于右任，秘书邵力子；青年妇女部部长叶楚伦，秘书何世桢；调查部部长茅祖权。秘书孙镜。毛泽东是组织部秘书兼代文书科主任。张国焘回忆「上海执行部预定由胡汉民、汪精卫主持，毛泽东以秘书的名义担任该部的实际工作。」是符合当时情况的。端午节前，杨开慧带着两个孩子和母亲来到上海。毛泽东在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甲秀寻找了房子，这是一座木质结构的两层小楼，他们在这里住下了。

一九二四年五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中共在上

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二十人。毛泽东引人注目的没有出席,选举时他失去了在中共中央的一切职务。毛泽东因太热衷于国共合作的事业而受到党内同志的非难。心情的郁闷加上工作的劳累,毛泽东病倒了。

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毛泽东以养病为名,携全家从上海回到了韶山。毛泽东的归来,惊动了四邻和乡亲,他们一家居住的上层场顿时热闹起来。男人们把毛泽东当作见多识广、在外面做了官的大人物来参拜,妇女们主要想一睹毛先生的「堂客」的风采。杨开慧因为常年和毛泽东一起生活,不仅能听懂韶山话,而且能用韶山话和妇女们交谈,这一下很快就和群众打成一片了。休息了几天之后,毛泽东跟杨开慧商定,借春节农闲的机会,以走亲戚为名,访贫问苦。

有一天,他们来到毛景全家里。毛景全的妻子向杨开慧诉说这得紧。杨开慧问他受穷的原因时,这位农妇说:「不怪天,不怪地,只怪自己的生辰八字不好。」杨开慧说:「不是生辰八字不好,是你们在受压迫,受剥削。」她见对方不大懂这活的意思,就问他家交多少租?然后给他家算了一笔账,说:「你们辛辛苦苦,累死累活忙一年,打一石谷,要交七斗租,为的是什么呢?剩下的三斗谷,留下种子,自己还能剩多少?」说得毛景全夫妇心里火辣辣的。接着,毛泽东说:「为什么我们只知道给财东当年做马,只知道忍饥挨饿,却没想到要把地方恶霸打倒呢?」毛景全认为这个想法太大胆了,摇着手说:「农民心不齐,做不到。」毛泽东从地上拾起一根竹片,比划着说:「一根竹片容易断,一把竹片折不弯。只要贫苦农民团结起来,什么军阀、土豪、洋财东,统统都能打倒。」毛泽东把帝国主义称为「洋财东」,农民对这个名词一下子就理解了。毛泽东串一家一说一家,走到哪里说到哪里,那些极通俗易懂的话语,很快在贫苦农中传开了。三月

初，毛泽东在韶山小学教员庞叔侃、李耿侯的支持下，办起了一所农民夜校，作为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的场所。校址就设在毛氏宗祠。杨开慧也参加了夜校的工作。因为有女先生上课，吸引了不少妇女前来听课。后来又在毛震公祠、李家祠堂和杨家庄小学等地，办起了类似的农民夜校。杨开慧讲过的一课书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一到课堂，在黑板上写了‘人’、‘农民’三个字。然后说：「今天晚上学认第一个字：‘人’。我们是什么人？‘农民’。人字两边分。地主是人，农民也是人，为什么种田的人没有饭吃，织布的人没有衣穿，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却落得两手空空？为什么

那些地主老财有手不劳动，吃的是鱼是肉，穿的是绫罗绸缎？没有农民的苦，但没有地方的富；没有农民的忙，就没有地方的粮。」这样，把认字学文化和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很自然地结合起来了。她接着说：「从前的人都说，是地主给了我们地，财东给了我们钱，是他们养活了我们。现在我们明白，是农民养活了地主老财。我们只有一条路，用自己的两只手，去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打倒洋财东，才能解放我们自己。」

毛泽东便一团烈火，他走到哪里、哪里就会燃烧起来。不到半年的时间，韶山周围二十多个乡都成立了农民协会。他还在韶山建立了第一个共产党支部。由在安源八党的毛福轩任支部书记，把庞叔侃、李耿侯、钟志申、毛新枚介绍入党。毛泽东亲自副带领他们在毛家老屋的楼上举行宣誓仪式。仪式很郑重，墙上挂了镰刀斧头红旗，挂上从一本书的土封面上剪下来的马克思的半身像。毛泽东深知，让农民放弃对财神、灶王、祖先牌位的崇拜，必须有新的崇拜对象填补他们心灵的空白。农民没有条件研读《资本论》，但要让他们知道，他们造反的理论是遵循这位马克思的学说。

那年大旱,两个月没下雨。水塘干涸,树草柘焦。七月里,有些人拖家带口,挑着破烂的行李,外出逃荒了。一方面是农民断粮,一方面是地方囤积谷米,放高利贷。上七都团总成胥生勾结其它地主把一批谷子运到了银田寺,准备从那里下河,偷偷运到湘潭去卖高价。银田寺农会反民这个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认为,党支部和农会如果不能解决眼前的灾荒,就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如果能领导群众战胜灾荒,不仅能巩固已经建立的组织,还能为下一步的斗争打下坚实的基础。地主老财囤积谷米,农民在饿肚子,我们可以发动农民反对囤积,要求平分。土豪劣绅要偷运粮食出去卖高价。我们可以组织群众阻止偷运。农民要吃饭,公公道道出钱买米。不算犯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天夜里,银田寺农会组织一百多个农民,点起火把,带着扁担箩筐,将成胥生准备运走的谷子全部扣下了。第二天,钟志申和庞叔侃去找成胥生,斩钉截铁地说:「谷子被农会扣下了。要钱就是六十文一升,不平分就让农民挑走,一个钱也不给。」成胥生见农民来势不善,只好让步,答应平分,国防局长威风扫地,农会的威信大为提高。

毛泽东在韶山地区的活动,唤起了这里的农民,也惊醒了这里的地主。团防局很快把韶山发生的事情报到了长沙。省长赵恒惕是湖南最大的地主,他家占有的土地达一百万亩,闻讯后立即下令湘潭国防总局逮捕毛泽东。因情况紧急,毛泽东只好抛下妻儿老小,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化装成看病的「郎中」,只身逃亡。

## 16 中山辞世 几名右派倡反共 润之来粤 一支铁笔扫妖氛

一九二五年九月毛泽东从长沙出发，十月初到达广州。由于和汪精卫的友谊，毛泽东一到广州就被分配到汪兼部长的中央宣传部。五日，就任代部长，主持宣传部工作。年底，杨开慧和母亲一起，带着两个孩子来到毛泽东身边，住在东山庙前西街三十八号。

从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一大」，至今才一年多的时间，广州气象一新，果如中山先生所期望的，出现了革命的新局面。

一九二四年五月，孙中山创办了黄埔军官学校。委任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从法国归来的共产党人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苏联派来的切列藩诺夫为军事顾问。这个学校的组织和训都是取法于苏联红军的。一九二四年九月下旬，苏联货轮「活罗夫斯基」号装载着第一号比苏联援助的武器，包括大批步枪、机枪和大炮，抵达广州。一九二四年年底，以黄埔学生为骨干成立了两个教导团，到一九二五年八月便扩大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黄埔军校第一期至第四期毕业学员四千九百八十一人，成为创建革命新军的领导骨干。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后来的北伐战争中，建树了卓著的功勋。

首先是镇压商团的叛乱。商团头目陈廉伯，是广东商会主席、汇丰银行买办，拥有十家银行、三个保险公司、几座丝厂、几



家当铺,还有大片土地和整条街的房产。他惊恐广州的赤化,在港英当局支持下,于一九二四年八月中旬建立「广东省商团军」。这支武装共有八千余人,向法订购长短枪九千八百四十一支,各式子弹三百万发。当运送军火的挪威商船「哈佛号」抵广州时,孙中山下令蒋介石将「哈佛号」扣留,全部军火封存于黄埔军校。陈廉伯指全然才代表千余人多次到广州革命政府请愿,遂即组织全省罢市,抗捐,拒收广州革命政府银行发行的纸币。孙中山下令黄埔军校学生大队开入市区,维持社会治安,限令全市复业;并令广东省长廖仲恺通缉首恶分子陈廉伯等。九月初,英国政府出面干涉,支持商团,威胁广州革命政府,孙中山发表了《为商团事件对外宣言》、《致英国麦克唐纳尔政府抗议电》,抗议英国政府「赞助反革命」和「干涉中国内政」的罪行。

九月中旬,真奉第二次战争爆发。孙中山早已决定联合奉皖各系讨伐直系曹吴,遂韶关部署北代,派胡汉民代理大元帅兼广东省长,调廖仲恺为财政部长兼军需总监。十月十四日,胡汉民奉孙中山命令解散商团军。商团军抗命不遵。黄埔学生大队同粤军张民达师、吴铁城的警察部队奉命出击。商团军据守广州西关顽抗。十五日晨政府军分头夹攻。经五小时激战,黄埔学生军以火攻焚毁商团设于广州西关的街防木栏及堡垒,平叛部队占领西关,商团叛乱迅被扑灭。十九日,迁往佛山的商团总部被政府军解散。至此,商团叛乱被彻底平定。

一九二五年一月中旬,广东革命政府发表了东征宣言。由蒋介石统率黄埔军校教导团和粤军、滇军、桂军组成东征联军,讨伐陈炯明叛军。以燕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的黄埔军校两个教导团,成为东征军的先锋和主办,在作战中得到共产党人彭湃领导的东江农民军的有力配合,从二月上旬到三月下旬,东征军所向无敌地先后击溃了陈军左翼主力洪兆麟部和右翼主



力林虎部，逼使陈炯明率领导残部退往闽南，林虎率领残部退往赣南。第一次东征胜利结束。

这时北方的直奉战争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窃踞总统的直系首领曹锟派吴佩孚为总司令率部到山海关大战张作霖的奉军。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战事正酣时，直系大将、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联合陕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孙岳联名发出主持和平的漾电，随即率师回京，接管了北京政府。十月二十日，组织中华民国国民军，推冯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并决定拥戴皖系首领段祺瑞为国民军大元帅来打通反直同盟的关系。段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宣誓就任中华民国总执政，这个总执政主持国务会议，事实上是部统兼总理。孙中山的广州政府是反直同盟的一员，曹锟下台后，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先后邀请他北上讨论时局善后问题。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孙中山偕宋庆龄、汪精卫、戴季陶、李烈钧、孙科等北上。十二月四日抵天津，受到两万群众的盛大欢迎，当晚肝癌病发。十八日，在病榻接见段祺瑞的代表叶恭绰、许世英，主张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反对恂渭「善后会议」当孙中山谈到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时，叶恭绰说段执政主张「外崇国信」。孙愤愤然地说：「我在外专要废隐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十二月三十一日，孙中山扶病由津入京，受到北京各界群众十万人热烈欢迎，发表书面谈话谓：「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利，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入协和医院施行手术。二月十八日移居铁狮子胡同顾维钧宅弟，聘中医治疗。后病势转重，自知不起，二月二十四日中授遗瞩曰：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着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延至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与世长辞，终年五十九岁。中山一世，两袖清风，其家事嘱咐谓：「余因尽瘁国事，不治产业。其所遗之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

孙中山死后，段祺瑞认为广州政府群龙无首，北洋派统一全国有望，派人拉拢站在孙中山旗帜下的驻粤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和驻粤桂军总司令刘震寰。六月五日，杨刘所部公然叛乱，攻打广州革命政府。蒋介石率领东征军迅速回师，平息了滇桂军的叛乱。讨平杨刘之后，广州国民政府于七月一日正式成立。段祺瑞的希望落空，南北两政府同时并存的面貌无所改变。孙中山是国民党的擎天柱。他在世的时候，以他超人的才智和威望，领袖群伦。国民党内各派系都能各安其位。即使出现一些不那么「安分守己」的分子，由于领袖的威望较重，比较容易解决。他离开岗位以后，国民党内必然会出现新的排列组合，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成立的广州国民政府，以集体领导的合议制代替了一长制的大元帅府，推举汪精卫、许崇智、谭延文、胡汉民、廖仲恺为党务委员；以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作为第一号人物填补孙中山留下的空缺。新的领导核心还没形成。八月二十日发生了刺杀左派领袖廖仲恺的案子。事后查明，参与这个政治谋的人，有的是跟胡汉民多年的老部下，有的是粤军总司令许崇智部

下的现役军人。于是，胡汉民害出洋游历，许崇智交出军权到上海作了寓公。负责调查廖案的蒋介石接管了广州国民政府的军警大权，一跃而成为左右政局的人物。

九月十五日，陈炯明部将刘志陆带兵再犯东江。十月六日以蒋介石为总指挥、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罗加觉夫为总顾问的国民革命军东征军三万多人，誓师进行第二次东征。经过一个月的奋战，攻克惠州，并在东江各地讨平陈部叛军，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谢持、邹鲁、居正、石青阳、覃振、戴季陶、沉定一、邵元冲、叶楚伦等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反苏反共和分裂国民党的决议，通电停止广州国民党中央执委的职权，在上海另立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弹劾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并开除其党籍六个月及中央执行委员职务，解除鲍罗延的顾问职务；开除共产党员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祖涵、毛泽东、韩麟符、于方舟、瞿秋白、张国焘等人的国民党党籍。从此，国民党内出现了「西山会议派」这样一个政治派别。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广州国民党中央执委召开一届四中全会，毛泽东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指出谢持、邹鲁、居正、石青阳等以个人名义在北京西山召开的所谓中央全地是非法的，所通过的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之党籍等决议是分裂革命的反动行为。决定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来处理这一问题。「西山会议派」控制的上海《民国日报》由叶楚伦任总编辑，西山会议的各项通电，都是由这家报纸发表，公诸于世的。为了与《民国日报》作斗争，毛泽东提议并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于十二月五日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创办了《政治周报》，由毛泽东亲任主编，发行四万份；「目的在打破北方及长江

的反革命宣传。」

毛泽东在十二月二十日出版的《政治周报》第三期,以「子任」的笔名发表《上海〈民国日报〉反动的原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处置》一文,文中写道:

国民党右派叶楚伦等主持的上海《民国日报》,从十一月二十{三}日起,即从登北京右派会议的通电之日起,已经宣告做了反动派的机关,宣告脱离了革命的国民党,宣告与帝国主义军阀从此妥协,宣告做了帝国主义军阀宣传机关之一种。

文章最后公布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各地方党部、各报馆的「寒」电(十二月十四日电):「上海《民国日报》,近为反动分子所盘踞,议论荒谬,大悖党义,已派员查办。谨闻」这就把《民国日报》作为国民党机关报的合法地位彻底否定了。

在另一篇题为《北京右派会议与帝国主义》的文章中,毛泽东写道:

帝国主义痛恶左派国民党的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做了全国反帝运动的总指挥,使一切帝国主义栗栗危惧,北京右派会议议决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帝国主义痛恶国民党政治委员会能集中权力指挥省港罢工和扫除其种种有用的工具;杨希闵、刘震寰……,北京右派会议议决取消政治委员会;帝国主义痛恶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能领导国民革命与帝国主义作殊死战,北京右派会议议决开除汪精卫的党籍;帝国主义痛恶苏俄帮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雇用俄顾问增加了攻击帝国主义的力量。北京右派会议议决辞退俄顾问鲍罗廷;帝国主义痛恶国民党容纳共产党分子,增加一支反帝国主义的生力军,北京右派会议议决开除李大钊、谭平山等的党籍。观此,我们可以知道北京右派会议替帝国主义做了些什么工作。

最有价值的一篇文献,是发表在《政治周报》第四期的《国

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透辟地分析了国民党的阶级构成，对于研究和了解中国国民党极有帮助。毛泽东指出：

在辛亥年参加革命的人，现在只剩下了少数革命意志强固的远主张革命大多数都因为畏惧现在革命把革命事业放弃了，或者跑向反革命队伍里同着现在的国民党作对。因此，老右派、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笋脱壳，纷纷分裂。

我们要完全明白这分裂的原因，还要看从与中会以来本党党员的社会阶级的属性。我们知道，领袖农村无产阶级向满清贵族及地主阶级作农民革命的洪秀全，乃孙中山先生最初革命思想的渊泉；与中会的组织，完全是收集游民无产阶级的会党；同盟会的组织，一部分是海外华侨工人，一部分是内地的会党，另一部分则为小地主子弟出身的留学生，小地主出身的内地学生，及自耕农出身的内地学生，总之，同盟会的成份，乃无产阶级（会党）、半无产阶级（侨工）、小资产阶级（一部分内地学生）、中产阶级（留学生及一部分内地学生）这四个阶级的集合体。此时领袖中国大地主阶级的康有为保皇党，与领袖中国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孙中山派同盟会，成为对抗。辛亥革命初成，同盟会中代表小地主的一派即不赞成孙先生「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见之于实行，结果解散了革命的同盟会，改组不断革命的国民党，并合了许多代表小地主阶级利益的政团，使小地主阶级在国民党中成了绝对多数的支配者。虽然此时与代表大地主阶级的进步党（进步党为清末资议局化身，谘议局及各省大地主机关，与现今各省省议会之为大地主机关完全一样）还是立于对抗地位，但革命性几乎没有了。孙先生因此大愤，决志改组中华革命党，毅然提出「革命」二字做了党的名称，不惜与小地主阶级的领袖黄兴等分裂，以保持革命的正

统。黄与一派小地主领袖们为了怕革命不肯加入中华革命党脱离了孙先生之后，另外成立了欧事研究会，不久加以扩张，招引许多大小地主加入，成立了政学会，我们只要看政学会中人几乎无一个不是地主阶级，即可知道他们何以必须脱离孙先生；何以必须放弃革命；何以渐渐与代表大地主阶级进步党蜕化而成的研究系相视莫逆；何以到近年竟组成了联治派（联治派乃南方各省地主阶级近四年来欲组织而未成形的政党）拥护赵恒惕、陈炯明、唐继尧、熊克武（注：四川军阀）把持西南各省的政权，以省议会、县议会及国防局的武装为其工具，向农村中自耕农、佃农、雇农，都市中工人、学生、小商施行极大的压迫，完全站入反革命地位。中华革命党改成中国国民党时，又加入一批中产阶级的非革命派，此时而且有一部分代表买办阶级的分子混了进来，他们站在党的支配地位，孙先生及少数革命派领袖拿了仍不能革命，乃于去年一月毅然召集第一次党的全国大会，明白决定拥护工农阶级的利益，从工农阶级中扩张国民党的组织，并且容纳共产派分子入党。当去年一月孙先生在广州长堤亚洲酒店宴招全国大会代表时，茅祖权起持异议，反对容纳共产分子。孙先生起立作长篇之演说，谓二十年以来，党员总是阻挠革命，总是丢掉民生主义；跟随我的很多，但总是想打他自己的主意，真正跟我来革命的，如汪精卫先生一样的人不出二十个。今日还要阻挠我容纳革命的青年！到了第一次全国大会的人，都听见孙先生的话。然而此举首先得罪了工表买办阶级的领袖们，冯自由党马素等首先与帝国主义军阀勾结，脱离了国民党另外组织「同志俱乐部」。国民党左派两年来在广东的工作，为了拥护工人的团结与罢工，得罪了帝国主义买办阶级；为了拥护农民的团结与减租，得罪了地主阶级；为了保持革命根据地，用严厉手段地付反动派，得罪了帝国主义工具买办地主阶级地代表魏邦



平、陈炯明、熊克武一班人，于是以激动了一班新右派，他们已在北京开会，图谋脱离左派领袖的国民党另外组织右派的国民党。惟开在北京的会议中，代表小地主及华资工商资产阶级的一派，与代表买办阶级的一派意见不合，前一派有会议未终即离京南下之说。我们觉得这种现象也是必然的。

毛泽东分析了全国人口构成，分析了革命对象、革命力量和中间力量各占的比重，以数目的精确作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在人数上说，四万万人中买办、大地主、官僚、军阀等大资产阶级至多每四百个人里头有一个（四百分之一），计一百万人。小地主、国货工商业家等中产阶级，大约每百个里共有一个（百分之一），即四百万人。此外的数目都属其余的阶级；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等小资产阶级约占一万万五千万；半自耕农、佃农、手工业人、店员、小贩等半无产阶级人数最多约占二万万；产业工人、都市苦力、雇农、游民等完全的无产阶级约占四千五百万。依此分析，则中国为了救苦。为了自求解放的革命民众有多少呢？有三万万九千五百万，占百分之九十八点七五。其敌人有多少呢？有一百万，占百分之零点二五。中间派有多少呢？有四百万，占百分之一。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断定：代表中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之分裂，并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并不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

为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二日成立审查代表资格委员会，邓泽如、林祖涵、谭平山、毛泽东、林森等五人为委员。

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至二十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东省议会大礼堂召开。到会代表最多时二百五十三人，最少时一百二十六人，其中约有五分之三是「跨党分子。」宋庆龄、汪精卫、谭延文、邓泽如、谭平山、丁维汾等组成主席团，吴玉



章为大会秘书长。大会决议接受孙中山遗嘱,继续坚持「联俄联共、联工、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和《处分远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对谢持、邹鲁「永远开除党籍」;对居正、石青阳给予「除名处分」;对石瑛、覃振、傅汝霖、陆定一、茅祖权、叶楚伦、邵元冲、张继、张知本等给予「警告处分」,并责令邵元冲停止伪中央党部的工作,叶楚伦停职交出《民国日报》。在讨论对覃振等人的处分时,原案主张加以警告,限于一月内声明脱离同志俱乐部,且须致函中央党部的告,否则除名。毛泽东发言说:「本席主张改为两月。因一则交通不便,一个月消息来往实不够;二则又使他们知道决议案慎重的真意;三则我们还是希望他们再走回革命之路的。」主席提议将毛泽东修正案付表决,获通过。

在一月八日下午的全体会议上,毛泽东报告中央宣传部两年来的工作;九日,被任命为宣传报告审查委员会成员。

在讨论国民党容纳共产党问题时,有一个姓袁的代表提出:(一)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须声明自己是共产党;(二)共产党员要将在国民党内的活公开;(三)中国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时,要得到该地党部之许可。毛泽东对这一提案发言说:「袁同志提出这个问题,很可讨论。张同志(注:张国焘)所说的是事实,也要注意的。而且这三种条件,我们也都是不怕的。先就第一点说,与俄国共产党执政可以公开活动情形不同。在中国共产党一日不能取得法律地位,是不能不秘密的,如在上海等地,也要声明,便马上要受枪毙了。就第(二)点说,和第(一)点也相同。在共产党的友党中国国民党的劳力之下公开是可以。但在他处,也要公开,马上要给人家解散、消灭,这便足以使国民革命中一部分力量,受一个重大打击,也于国民革命前途是不利的。就第(三)点说,无论何党,党员出党入党应有绝对自由,实不必

有若何的限制。」毛泽东发言后，袁代表收回了提案。

一月十六日下午选举，毛泽东以一百七十三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引人注目的是，蒋介石作为国民党内的一颗新星升起来了。「一大」时蒋氏还名不见经传。「二大」进行时，蒋介石从潮汕军次回广州参加了大会。一人会场，有人提议：「蒋总指挥劳苦功高，大家应向他起立致敬。」这次大会上人作为左派的代表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他得的票数为二百四十八票，比得票最多的汪精卫仅少一票。

国民党「二大」是左派的胜利。会议选出的中央执监委员中，共产党员占七人，国民党左派占五人。在随后建立的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中，都由共产党员担任领导工作。宣传部长原为汪精卫，二月五经汪提名由毛泽东代理部长。一军、二军、三军、四军、六军的政治部主任都由共产党员担任。一军三个师的党代表有两个是共产党，九个团的党代表中有七个是共产党员。广州的群众团体基本掌握在共产党手中，有组织的工人队伍有十余万，其中工人武装纠察队二千余人；农会会员约六十万人，其中农民自卫军三万余人。

「西山会议派」并不甘心。一手策划了中山舰事件。即所谓「三·二〇」事变。

中山舰事件是国民党历史上的秘案之一。几十年来，烟雾云诡，扑朔迷离。拥蒋的人说是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受了共产党的指使，「阴谋异动」，加害于蒋；反蒋的人说是蒋介石翻云覆雨，策划阴谋，下令调动中山舰，又故作惊骇不认账，反诬李之龙和共产党有阴谋。现在看来，两种结论都不能成立。

一九三〇年北平扩大会议之后，西山会议派的要角邹鲁和陈公博同往石家庄，在车厅里，邹鲁把策划事变的真相告诉了陈公博。邹鲁说：

自从展堂(按:胡汉民字)出亡莫斯科之后,大家都感觉没有办法。怎样能拆散广州的局面,只有使共产党和蒋分家。我们在外边想办法,伍梯云(按伍朝极字梯云,时任国府委员兼广州市政委员会委员长)在广州里头想办法。

有一天梯云请俄国领事食饭,跟着第二天便请蒋介石的左右食饭。席间梯云不经意地说:昨夜我请俄国领事食饭,他告诉我蒋先生将于最近期内往莫斯科,你们知道蒋先生不打算什么时候起程呢?这一句话,介石的左右自然报告介石了。介石是最多疑的,但既不能找梯云去问,更不能找俄国领事去问,于是只好怀疑,怀疑到极点,以为共产党要干他,或者汪精卫要赶他。一次介石便向精卫刺探了,说他于统一东江南路之后,极端疲乏,想作短期的休息,但上海不好去,倒不如往莫斯科,一者可以和俄国当局接头,二者可以多得些军事知识。精卫是一个老实人,在第一次刺探时苦苦留他,以为在军事时期他不好远去。禁不住第二次的刺探,介石说明在整军时期,人留粤与否无关重要,倒不如趁此时机,稍作休息,可以恢复精神。他的言语态度当然像很虔诚,到底是书呆子的精卫终于答应了。

蒋介石见精卫答应了,遂确信他的判断不差,他更提出第三步刺探,希望陈璧君和曾仲鸣陪他出国,你知道陈璧君是一个好事之徒,听见有莫斯科可去,哪有不答应之理。以为俄国那时还冷,于是制皮大衣呀,办行李呀,忙得不可开交。衣服制备之后,便天天催介石走。

介石原来是无意去的,所谓到莫斯科完全是刺探的,现在璧君天天催他动身,于是遂确信精卫要赶他。碰巧俄国有一条船来(按:这条船满载苏联援助广州政府北伐的军火)。并且请介石参观,听说当日介石要拉精卫同去,而精卫因已参观过,没有答应,于是介石更以为这条船是预备在他参观时扣留他直送莫

斯科的了。因此之入，介石遂决定反共反汪，这是三月二十之变的真相。其初只是梯云的小把戏，自己也没有什么把握，不料后来一倒求一得二，不止反共，而且也赶了汪，这是当时大家所没有预料到的。

（陈公博：《苦笑录》第五六一五七页）

伍朝枢与黄埔军校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有密切联系。他设计这个「小把戏」孙文主义学会进行了密切的配合。三月十七日早晨，孙文主义学会骨干分子、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柏龄向所部连以上军官宣布：「共产党要制造叛乱，阴谋策动海军局武装政变，全师要枕戈待旦。」三月十八日，孙文主义学会另一骨干分子海军军官学校副校长欧阳格打电话给黄埔军校主省办事处的副官欧阳钟（欧阳格的侄子），叫他用办事处的名义向海军局要一只得力兵舰开往黄埔厅用，就说是校长要的。十九日上午海军局长李之龙亲率中山舰在东堤起锚后，王柏龄、欧阳格等人就向蒋介石密报说：「海军李之龙异动，已出动中山舰要逮捕校长，夺取军火。」蒋闻报，认为多日来疑虑的事情得到了证实，于是，先下手为强，令王柏龄的第二师逮捕李之龙，包围东山苏联顾问的住所，蒋一大批共产党员排挤出黄埔学校和第一军，演成了震惊中外的「三·二〇」事变。

三月十九日深夜十一时半光景，宣传部图书馆工友慌慌张张地来到庙前西街三十八号毛泽东住所报告紧急情况。当时，杨开慧在楼上给孩子喂奶后早已睡下了。毛泽东和秘书沉雁冰在楼下正在谈论广州形势。毛泽东说：「鲍罗廷回去了，加伦将军也回去了，代理苏联军事顾问团团团长季山嘉对广州各军情况不了解。」正说到这里。那位工友来了，见了毛泽东，就用广东腔的半生不熟的官话报告，海军局长李之龙被捕了。李之龙新婚不久，被王柏龄部下的士兵从床上拉下，打了一顿，然后带走

了。毛泽东听罢，吩咐那个工人去找陈延年来。陈延年是陈独秀的大儿子。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中央局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决定，由谭平山、周恩来、罗亦农、陈延年、鲍罗廷五人组成临时委员会，代表中共中央指导广东的一切实际工作。这个组织并没有经常性的会议，实际由鲍罗廷、陈延年决定了一切。过了一会儿，工友回来了，说街上已戒严，没见到陈延年，只见到了他的秘书，据秘书说，陈延年到苏联顾问团季山嘉那里去了。毛泽东叫工友回去休息，默然沉思有顷，说：「雁冰，我要到苏联军事顾问团去一趟。」沉雁冰说：「路上已戒严，怕不安全，我陪你去。」

毛点头同意二人一起出门。这里距顾问团驻地不过一箭之遥，路上没有遇到麻烦，到了东山顾问团驻地，见布满岗哨。毛泽东昂然而至，对两个门卫说：「我是毛泽东，中央委员、宣传部长。」又回过头指指沉雁冰：「这是我的秘书。」

门卫点头陪笑说：「请进去。」

毛泽东到客厅，见季山嘉正和陈延年谈话。

陈延年说：「蒋介石不仅逮捕了李之龙，还把第军中的共产党员统统逮捕，关在一间屋子里，扬言第一军不要共产党员。」

季山嘉说：「蒋介石还要赶走苏联军事顾问团。」

毛泽东说：「蒋介石本来是陈其美的部下，虽然在日本学过一点军事，却在上海进交易所当经纪人搞投机，当时戴季陶和蒋介石是一伙，穿的是连裆裤子。蒋介石此番也是投机。我们示弱，他就得步进步；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我们应当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

驻防肇庆的是叶挺的独立团。目前就广州一隅而言，蒋介石的武力占优势，他有王柏龄一个师的兵力，再加上吴铁城手下的武装警察，就有一个师和一个营了。然而就两广而言，蒋介石

这点兵力就居于劣势。第一军士兵和中下级军官都是要革命的，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一旦暴露，第一军就会反对他。况且，第二军谭延文，第三军朱培德，第四军李济深，第五军李福林，都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李济深与蒋介石有宿怨。「二大」以后的新中央执委会，又升蒋介石为军事总监，平空在各军之上又来一个人管制他们，他们更加不服气。因此，我们可以争取他们，至少可以使他们中立。中央执、监委到了肇庆以后，就开会通电讨蒋，指责他违犯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广西的军事首领李宗仁本来和蒋有矛盾，加上李济深，这两股力量很大，可能为我所用。摆好这阵势对付蒋，蒋但无能为力。

陈延年一边翻译给季山嘉听，一边频频点头赞成毛泽东的意见。

季山嘉听完毛泽东的话，连连摇头说：「真要打仗，肇庆一地的财力要支付一个独立团的费用，必然不够；而广州的税收比肇庆多十倍。即使其它各军都袖手旁观，蒋介石有一个师的兵力加上吴铁城的武装警察，对付独立团就绰绰有余。况且独立团只有手头的弹药，无法补充，而蒋介石则收到刚从苏联运来的大批弹药。就这点而言，独立团不能坚持到一个星期。」

季山嘉是个军事顾问，完全不懂政治，特别不懂中国的政治。他完全没有看到当时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联合起来对付蒋介石，在政治上占有巨大的优势，以及这种巨大的政治优势所必然会带来的军事上的巨大优势。他从单纯军事观点看问题，没有强硬对蒋的决心；陈延年也就动摇了。毛泽东跟他们争论到半夜，无结果而散。

第二天，毛泽东又找到周恩来，一起到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中，周李一致赞同毛泽东的主张。李富春还介绍说：「蒋介石曾找第二军军长谭延文第三军军长朱培德谈判，提出把共产



党和苏联顾问全部赶出军队的具体计划，谭、朱二军长明确表示反地。」毛、周、李三人又共同向陈延年、季山嘉提出对蒋介石进行反击的意见。季山嘉表示要请示莫斯科。

这时候，斯大林派出的由联共中央委员、长期担任红军政治部主任的布勃诺夫率领的一个视察团正在广州考察。成员有联共中央委员、远东地区区委书记库比亚克，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列布什以及联共中央委员、红军高级指挥员隆格瓦。事变当晚，他们也被「保护」起来了。他们来华的任务是考察华北和华南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并视察在广东和西北冯玉禅部队中苏联顾问的工作情况。三月二十二日布勃诺夫会见蒋介石。蒋解释误会，连连道歉，委婉说明他的行动是纯粹针对个人的，并不是反对苏联。如果苏联政府能把冒犯过来的军事顾问季山嘉（古比雪夫）、罗加乔夫和政治顾问拉兹贡调回，让鲍罗廷和加伦（布留赫尔）返回广州，一切都会好起来。

三月二十四日，布勃诺夫召集顾问团会议，指示顾问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越权。决定季山嘉、罗加乔夫、拉兹贡离任，让加伦返任。这些处置都得到了联共中央的批准。根据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指示，苏联大使馆档案上留下的记录是：

政策：蒋仍继续革命，则当处处迎合其意，与之让步。

于是，季山嘉、罗加乔夫和拉兹贡调回，鲍罗廷和加伦将军返回广州。

于是，共产党员撤出了第一军。

于是，毛泽东的对蒋强硬的意见被否决。

于是，援助广州政府北伐的又一船军火于五月份第二周到达广州。

鲍罗廷回到广州，于五月上中旬在张静江的寓所与蒋介石频频会谈。「三二〇」事变后，汪精卫离开广州，随后到法国去



了。蒋介石提议由瘸子张静江担任中央执委会代主席，代替汪精卫，实际上是替蒋介石看守这把椅子，鲍罗廷同意了；蒋介石又提出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是市党部担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各党部执委总数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的部长，鲍罗廷同意了；蒋介石再提出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指示，均须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讨论后始能发出，鲍罗廷同意了。

五月十五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整理党务案》，把蒋鲍达成的妥协通过组织手续合法化。

蒋介石很快搞清楚了并无所谓中山舰异动加害于他的阴谋，但他将错就错，一石二鸟，打击了共产党，赶跑了汪精卫，他成了广州事实上的军政领袖。

美斟丹尼尔·雅各布斯著《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一书对此事作了客观的评述：

由于莫斯科下令不惜任何代价恢复在广州的立足点，鲍罗廷接受了同蒋介石达成的「和解」协议。这样做是为了挽救俄国和斯大林的威望。在克里姆林宫，争夺列宁位子的斗争已达到了高潮。

对苏联来说，在这一时刻被不光彩地踢出中国将会严重损害布尔什维克的形象，也会使斯大林陷入窘境，因为他极力推崇统一战线。只要苏联、国民党联盟重新建立——无论多么脆弱，只要北伐开始发动，形势就会朝有利的方向转化。

为促成这一转化，必须参加北伐。于是，鲍罗廷准备满足蒋介石提出的任何条件，包括进一步牺牲中国共产党。（中文版第一九五页）

中共写党史时，慑于斯大林的权威，把对蒋妥协退让的责任加到陈独秀身上，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陈独秀至多是同意

了鲍罗廷转达的斯大林的意见。陈独秀没有毛泽东那样锐敏的政治眼光和宏大的政治魄力,提不出像毛那样的主张。如果毛的意见被采纳,一代枭雄蒋介石能否在北伐中国崛起就成为问题了。

## 17 兴师北伐 蒋介石旗开得胜 考察农运 毛泽东立场鲜明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全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农讲所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国民党「一大」产生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立了农民部，由共产党员林伯渠出任农民部部长，共产党员彭湃任农民部秘书。设立农讲所，是彭湃出的主意。由农民部提出建议，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议决，将创立农讲所列为「农民运动第一步实施方案」。从一九二四年七月到一九二五年年底，农讲所已办了五届，所址在广州市东大道一号。前三届招生范围限于广东省，由几十人到一百多人，以后逐渐扩大到其它省份。国民党「二大」以后，一九二六年二月八日，毛泽东出席了国民党中央执委第三次党务委员会议，决定举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三月十九日，毛泽东又参加了第十三次党务会议，讨论通过由中央拨给农讲所经费七千九百八十元，任命毛泽东为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毛泽东预见到北伐即将开始，要发动组织农民在北伐军所到之处支持北伐军作战，欣然受命。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出席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上，他报告广西招生事宜，提出「民众运动与政治有密切关系，目前各省农民运动应以全力注意将来革命军北伐时经过之区域，如赣鄂直鲁豫诸省案」，会议通过这一提案。

五月三日,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这一届学员空前的多,达到三百二十七人(毕业时三百一十八人)。他们来自直隶(河北)、山东、河南、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奉天(辽宁)等二十个省。其中湖南、广西来的学员最多,湖南人三十六名,广西人四十名。本届学员授课十三星期,计二百五十二小时,共有学科二十五门。学员主要学习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方法,大部分都有讲义和参考材料发给学员。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和「地理」;周恩来讲授「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彭湃讲授「海丰及东江农运状况」;萧楚女讲授「帝国主义」、「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恽代英讲授「中国史纲要」;李立三讲授「中国职工运动」。学员军事训练时间一百二十八小时,占总学时的二分之一。由总队长赵自选(黄埔毕业)等人负责,实行严格正规的军事训练。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就是要把学员培养成为农民战争的骨干。在第六届农讲所,毛泽东主讲的农民运动课程给学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留传下来的一篇讲稿是《中国农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以这篇讲稿为基础,他又作了修改补充,改名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中国农民》第二期发表。我们看他毫无雕饰的讲稿,似乎更亲切些。他向学员们说:

你跑到农村中间去,无论你到什么地方,只要你留心去看,你便看得见有下列八种不同的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贫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这八种人分成八个阶级,其经济地位各不同,其生活状况各不同,因而影响于其心理,即其对于革命的观念也不同。

中国大地主的来源,一大部分是前清官僚贵胄后裔及现在

的官僚军阀；一小部分是城市富商置买土地；力田起家成大地主者极少。其利益建筑于对自耕农、半自耕农、半贫农、贫农、雇农五种农民的严重剥削之上。其剥削方法分为五种：第一种重租，自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八十，乃对于半自耕农、半贫农、贫农的剥削，此种剥削极其普遍而残酷；

第二种高利贷，月息自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七，年息自百分之三十六至百分之八十四，也是对半自耕农、半贫农、贫农的剥削，这种剥削之惨，有时较重租更甚，往往有困借债累息，数年即完全破产者；第三种重捐，乃用一种压力强迫自耕农、半自耕农按亩出捐，以充团防局经费。此团防局（或称民团）乃地主阶级的武装，为镇压农民暴动维持地主阶级剥削制度之必要的设备；第四种为对于雇农的剥削，即剥削其剩余劳动。但中国尚少资本主义的农业，大地主多不亲自经营土地，故此项剥的小地主较多，大地主较少；第五种为与军阀及贪官污吏合作在本年包缴征田赋，而来年索取重息于完粮之农民。合这五种剥削加于农民的惨苦，真是不可形容。所以，中国的大地方是中国农民的死敌，是乡村中真正的统治者，是帝国主义军阀的真实基础，是封建宗法社会的唯一堡垒是一切反革命势发生的最后原因。大地主阶级的人数，以收管业五百亩以上者计算，在农民中大概约占千分之一（包括其家属在内），在全国三万万二千万农民中（以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计）约占三十二万人。

小地主数目比大地主多，全国至少在二百万以上。其来源大部分为力田起家即自耕农升上来者，亦有一部分为都市商人购置土地，又有一部分为官僚后裔之衰败者及现在之小官僚。其剥削方法为重租、高利贷和剥削剩余劳动三种。……盖小地主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其欲望为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建设一个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然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不能发展，故需

要革命。但因现代中国的革命运动，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建设国家主义国家的阶级的发展及存在，感觉着威胁，又怀疑革命。有一个戴季陶的真实信徒（其自称如此）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乃活尽出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态度。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的学说解释民生主义，反对国民党联俄及容纳共产派分子。这一班乃中国中产阶级的右派，他们颇有跑向反革命地位的倾向。但中产阶级中有一个左派，在相当时候可以引向革命的路。……

自耕农属于小资产阶级，其中又分三种。第一种自耕农是有余钱剩米的。即每年劳动所得，除自给外，还有余剩，用以造成所谓资本的初步积累。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那小地主地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对于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这种人胆子极小，他们怕官，也有点怕革命。……这班余钱剩米派，乃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约占其中百分之十，计一千二百万人。第二种自耕农是恰足自给的。每年收支恰足相抵，不多也不少。这种自耕农比较第一种自耕农大不相同，他们也想发财，但赵公元帅总不让他们发财。随着近年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使他们感觉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从前的世界。……他们骂洋人叫「鬼子」，骂军阀叫「抢钱司令」，骂土豪劣绅叫「为富不仁」。对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运动仅怀疑其未必能够成功（理由是：洋人和司令的来头那么大）不肯贸然参加，取了中立态度，但决不反对革命。这一部分人数甚多，大概占自耕农的一半，约六千万。第三种自耕农是每年要亏本的……这种人因为他们从前过着好日子，后来逐年下降，负债渐多，渐次

过着凄凉的日子，真是「瞻愈前途，不寒而栗。」这种人在精神上感到的痛苦比一切人深，因为他们有一个从前与现在相反的比较。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颇有推进革命的力量。其人数约占自耕农中百分之四十，即四千八百万一个不少的群众，乃小资产阶级的左翼。以上说三种自耕农对于现代中国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一到战时，即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所以小资产阶级的自耕农是全部可以倾向革命。

半自耕农、半贫农、贫农这三种农民的数目，在中国农民中大概自一万万五千万至一万万七千万。分开来说，半自耕农大概占五千万，半贫农、贫农各占六千万，乃农村中一个极大的群众。所谓贫民问题，一大半就是他们的问题。这三种农民虽同半无产阶级，然经济状况大有分别。在半自耕农其生活苦于自耕农，因其食粮每年有一半不够，须租别人田地或者做工或营小商以资弥补。春夏之间，青黄不接，高利向别人借债，重价向别人余粮，较之自耕农不求于人，自然境遇要苦，然优于半贫农。因半贫农无土地，每年耕种只得收获之一半；半自耕农则租于别人的部分虽只收获一半，或不足一半，然自有的部分却可全获。故半自耕农之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半贫农。半贫农与贫农都是乡村的佃农，同受地主的剥削，然经济地位颇有分别。半贫农无土地然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及相当数目之流动资本。此等农人每年劳动结果自己可以得一半。不足部分，种杂粮，捞鱼虾，饲鸡豕，勉强维持生活。于艰难踟蹰之中，存聊以卒岁之想。故其生活苦于半自耕农，然较贫农为优。其革命性则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贫农。贫农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流动的资本。肥料



不足，田亩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荒时暴日，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升几斗，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业集，如牛负重。乃农民中之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

雇农用农北无产阶级，有长工、月工、零工三种。此等雇农，不仅无土地，无农具又无丝毫流动资本，故只得营工度日。其劳动时间之长，工资之少，待遇之薄，职业之不安定，超过其它工人。此种人乃乡村中甚感痛苦者，做农民运动极要注意。乡村手工业工人地位比雇农要高，因其自有工具，且系一种自由职业。但因家庭负担之重，工资与生活物价之不相称，时有贫困的压迫与失业的恐慌，亦与雇农相差不多。

游民无产阶级为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之剥削压迫水旱天灾因而失了土地的农人与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分为兵、匪、盗、丐、娼妓。……他们乃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的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清帮，做了他们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机关。处置这一批人乃中国最大最难的问题。中国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贫困，另一个是失业。故若解决了失业的问题，就算解决了中国问题的一半。中国游民无产阶级人数说来吓人，大概在二千万以上。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引道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我们组织农民，乃系组织自耕农、半自耕农、半贫农、贫农、雇农及手工业工人五种农民于一个组织之下。对于地主阶级在原则上用斗争的方法，请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让步；在特别情形上，即是遇了如海丰、广宁等处最反动最凶恶极端鱼肉人民的土劣绅时，则须完全打倒他。对于游民无产阶级则劝他们帮助农民协会一边，加入革命的大运动，以求失业问题的解决，切不可逼其跑入敌人那一边，做了反革命派的力量。

课堂讲授结束以后，便组织学生到农村实习，五十人赴韶关实习一星期，全体学员赴海丰实习两星期；使他们在「接受各种理论之后，亲入革命的农民群众中，考察其组织，目击其生活，影响学生做农民运动之决心极大。」农讲所还组织了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云贵、两广、福建、浙江、山东、奉天（辽宁）、直隶（河北）、河南等十三个农民问题研究会，按籍贯吸收学员参加，列出十分详细的纲目，在各省研究会内，引导学生研究实际问题。以这些研究成果为基础，毛泽东编了一个集子，叫作《农民问题业刊》，并亲自作序：《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开宗明义地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第六届农讲所十月五日毕业。这届农讲所密切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大大提高了学生的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学员毕业回到各省后，绝大多数成了当地农民运动的骨干。

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广州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被称为中国大革命的北伐战争开始了。当时北方军阀尚存三大派系。直系军阀吴佩孚，拥兵二十万，据有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和陕西的东部、河北的一部，控制着京汉铁路。从直系中分化出来自成一派的孙传芳，拥兵二十万，据有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五省。奉系军阀张作霖，拥兵三十五万，控制着东北各省和北京、天津及津浦路北段。此外，西南、西北还有一些小军阀，控制着本省或本地区。扫平军阀，消灭封建割据，是广东国民政府的首要任务。

北伐的战略计划是蒋介石和总参谋长李济深、俄顾问加伦将军一起制定的。本远交近攻的方略，初有「打倒吴佩孚，妥协孙传芳，放弃张作霖的口号」。因当时北伐旗帜下各路军队总数才八个军，十余万人，三大军阀的军队总数达七十五万，北伐军只有对敌各个击破，及时转用兵力，才有取胜可能。

一九二六年三月，湘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归附广州革命政府，将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赵恒惕逼走，出任代理省长。四月二十一日，倾向吴佩孚的第三师师长叶开鑫被吴任命为湘军总司令讨唐。五月二十一日，广州国民政府任命庸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中路前敌总指挥。唐叶之战成为北伐战争的序战。北伐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五月二十日从肇庆出发拓，三十日在安仁渌田参战。随后第四军主力和第七军入湘，重挫叶开鑫部。第四军克醴陵，第七军克永丰，第八军进占湘潭。

北伐军入湘后，由夏曦、郭亮主持的国民党省党部，发动工农群众组织，积极配合北伐军作战。组织乡导队，为北伐军引路；组织运输队，为北伐军运送物资；组织慰劳队，送茶送饭给北伐军将士。株萍铁路工人拆毁铁路，炸断桥梁，使占领醴陵的援湘军第七路唐福山师狼狈退回江西、安泊、株州的工人和醴陵、浏阳一带的农民，组织了使用梭标。乌统的游击队，自动截击北军小股武装和散兵游勇。长沙工团联合会在北伐军入城前组织了工人保安队，负责维持城内秩序。

七月十一日，北伐军占领长沙，叶开鑫部退守汨罗江北岸。

七月二十七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率总预备队一、二两师，从广州出发北上。第二、三、六军进至攸县至醴陵之线，向东警戒江西孙传芳部。

八月十二日，北伐军总司令部在长沙前藩台衙门召开军事会议，总司令蒋介石，俄顾问加伦将军，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公博，第四军代军长陈可钰，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第八军军长唐生智，以及各军参谋长出席会议，研究下一步作战计划。决定以第四、七、八军直取武汉；第二、三军集结醴陵、攸县，钳制赣敌孙传芳部；第六军和第一军之一、二师为总预备队，随主力跟进。

八月十九日,第四军攻克平江,第七军占领浯口,第八军收复岳阳。叶开鑫部万余人退据要隘汀泗桥。吴佩孚派第八师师长刘玉春率三个团增援,另派营务执法总司令赵荣华率大刀队,随同出发督战。二十七日,南北两军在汀泗桥展开了极其惨烈的争夺战。两军死伤很多,桥下伏尸累累,几使河水为之断流。吴佩孚下令,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军官后退者一律阵前处斩。大刀队连斩九个营团长,将血淋淋的人头挂在桥栏上。刘玉春师在火线上作了病狂的挣扎。但碰上的对手是第四军的叶挺独立团和第三十四团。这次战斗充分体现了叶挺的战术思想和战斗作风:前仆后继,前面倒下来后面上,不因敌人炮火猛烈而停止。前面有的倒下来是必然的,后面跟上是必须的。只有不怕伤亡,才能减少伤亡,只有不怕伤亡,才能缩短敌人的射击时间。时任排长的共产党员徐海东,带领全排冲垮敌人四个炮兵连。虽然死者纷纷落入水中,但仍前仆后继,和敌人肉搏,终于把吴军守桥部队冲垮了。

以后又经过贺胜桥战斗,北伐军第八军占领汉口、汉阳,九月十五日进抵武胜关。第四军和第七军进至武昌城下。由第七军军长李宗仁任攻城总指挥。此时蒋介石见武汉三镇指日可下,不愿让桂军和李宗仁风头大劲,急令嫡系第一军第二师由长沙进抵武昌。第二师师长刘峙慌报他的部队于九月六日鸡叫前已入城。第四军代军长陈可钰接到战报立即打电话给先头团团长叶挺,令其率部迅速入城。可是,当叶团进至大东门时,守在武昌城上的还是北军,不是二师的部队。正惊疑间接到一营营长、共产党员曹渊的报告:「其它师的奋勇队都没有靠近城墙,只有职营到了城根,并竖起了四座云梯,爬上去的士大都牺牲了,但革命军人有进无退,如何处置请指示。」报告最后是曹渊的署名,但渊守最后一笔拉得长长的,传令兵说:「曹营长写完这个

报告,头上中了一颗子弹,牺牲了。」攻城战打得很激烈。十月十日,叶挺独立团终于在通湘门附近用云梯攻入城中,占领蛇山。四、七军互相配合攻克武昌,俘敌两万余。叶挺向第四军代军长陈可钰揭穿了刘峙的骗局,叶挺的报告说:「从广东出发到现在,他们(刘峙师)设有看见过敌人,敌人也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们。他们这一行为,不仅有假造军情之罪,而且有陷害同志之咎,必须严重处罚。」

随着武汉三镇的陷落,吴佩孚的所谓直系便土崩瓦解,一蹶不振了。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在广州召开。毛泽东出席了会议。会上,他挺出「二五减租一,即‘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的提案。」会开得很好。通过了提高党权、实行民主、反对独裁、发展工农运动、实行「二五减租」等决议。十月二十六日,国民党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一九二六年十月底,毛泽东安行置杨开慧等亲属回长沙暂住,只身赴上海。途中,他调查了宗明、江阴、丹阳、无锡、青浦、泰兴、泰县、徐州、慈溪等县,写成《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一文,发表在《乡导周报》第一七九期。

十一月四日至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际代表联席会议拟定《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准备提交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审查。《草案》认为:「根据广东、湖南、湖北及其它诸省农民运动的经验,现在已经能确信地说,没有满足农民群众要求的农业政策,则国民党政权是不能维持长久的,整个解放斗争是要失败的。」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底)则指出:「在现时革命发展的过程阶段里,土地问题开始紧急起来,成为现在局面的中心问题。」

哪个阶级能够毅然攫住这个问题而给以彻底的答复,这个阶级就是革命的领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彭湃、阮啸仙等七人为委员。毛泽东到职后,制定了《目前农运计划》十一月十五日经中央局批准。计划规定:「在目前状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全国除粤省上,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并提出「各地农运须切实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并促成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武汉设立办事处。」「在武昌开办农民运行讲习所」。十二月初,毛泽东由上海到武汉开展工作。

十二月一日,湖南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同时在长沙举行。两会给毛泽东发来邀请电。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由汉口回到长沙。二十日下午两点,农工代表大会联合在幻灯场开会欢迎毛泽东,到会者三百余人,旁听者尤为踊跃。幻灯场楼上几为之满。二是许,摇铃开会,主席刘惊涛介绍说:「毛润之先生,是湖南湘潭人,是中国革命的领袖,而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意,此次系专为考察农运而回的。我们在开幕的时候,即电请毛先生回湘,对于大会加以指导。现在毛先生已回,我们非常欢喜,即请毛先生出席讲演。」毛泽东在热烈的掌声中发表了讲话。他说:

我今日的题目是工农商学联合的问题。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革命。但有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

他破题展开,滔滔不绝逾两小时,说明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要提高工人的福利,要发展工商业和教育事业,都必须依靠农民问题的解决。

湖南两会盛况空前。农民代表大会共到五十二县、两个特别区的代表一百七十人,代表注册会员一百三十六万七千余人。



工人代表大会共到各地区工会及产业工会五十二处的代表一百七十五人，代表会员三十二万六千多人。大会共开了二十六天，头几天两个代表大会联合开会，听报告，随后分别开分，讨论议案。农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减租、减押、禁止高利贷、取消团防、组织农民自行武装等重要提案。两个大会选举产生了全省农民和工人的领导机关，选出的负责人大都是共产党员。

十二月二十八日全省农工代表大会联合举行闭幕典礼，再请毛泽东莅临讲话。据《湖南日报》报道，毛泽东讲话的主旨是建立革命联合战线问题。他说，反革命方面已有国际、全国和全省的联合战线组织，革命方面也应该有同样的联合阵线来抵抗他们。毛泽东严厉驳斥了诬蔑农民运动为「惰农运动」和「帝国主义没有打倒以前，我们内部不要闹事」的谬论。他说，过去军阀政府时代只准地主向农民加租加息，现在农民向地主要求减点租、减点息就是「闹事」吗？赵恒惕虽然不在湖南了。而赵的余孽将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在湖南还有很大的势力，大家要提高警惕。

毛泽东在大会期间，听取了各地农运情况的汇报，参加了大会决议案的起草工作。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大会根据代表们的强烈要求，制定了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推翻封建统治，建立乡村民主政权，建立农民自卫武装，以及开展农村妇女运动和青年运动，开办农村教育，废除农村陋习等四十个议案，发表了《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大会闭幕后，毛泽东又把参加大会的党员代表留下，办了几天短期训练班，亲自作了三次关于农民问题及调查方法的报告。对湖南农民运动进一步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一九二六年七至九月间，北伐军进军湖南的时候，农村还没有什么大的斗争，对于农民的踊跃参战支前，北伐军高级军官还



「传令嘉奖」,社会上也是一片好评。十月以后,农民向土豪劣绅展开进攻以后,城乡「上流」社会立即哗然。北伐军军官中出身于地主阶级者较多,军官中也一片怨恨之声。当著名的封建豪绅头子叶德辉被枪毙后,湖南一班土豪劣绅大为震动,纷纷钻入北伐军中,请求党军官的子侄的保护,诬蔑农民运动「糟得很」。

湖南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以后,毛泽东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至二月五日,深入湖南农村,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民运动的情况。在三十二天里,毛泽东行程一千四百多里,广泛接触了农民和农会干部,召集各种不同类型的座谈会,获得了极其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毛泽东将沿途所闻所见,先后两次在中共湖南省委作了报告。二月十二日,毛泽东离开长沙去武昌。二月底,杨开慧和母亲、孙嫂一起,带着孩子来到武昌,住在督府第四十一号。回到武昌后毛泽东起草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周刊,从三月有五日起,分三次连载发表。报告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来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

了。」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的思想,虽然得到了瞿秋白的支持,但却为中共总书记陈独秀所拒绝,以致在《响导》周进只发表了前产部分,后面没有登完。

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日,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四省农民协会代表和河南武装自卫军代表在武昌举行联席会议。四月九日,选举成立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委员会,在十三名委员中有七名共产党员,五名国民党左派。主席是谭延文,毛泽东任常委兼组织部长,主持常务工作。同年三月至六月,在武昌黄巷(现名红巷)十三号又办了一期农民运动讲习所,由邓演达任所长,毛泽东任副所长,主持常务工作、学员八百多人,来自十七个省。大革命失败后,这些农运骨干像火种一样撒遍了全国的农村。

四月,湖南农民运动进入解决土地问题的阶段。十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民部发表《告全省农民》文告,提出「要从土豪地主手里夺取土地」的任务;并要取得「乡村政权,并组织农民自卫军,以镇压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为了研究土地问题的政策,四月二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成立了以邓演达、谭平山、毛泽东、徐谦、陈克文五人组成的全国土地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召开过一系列的会议,企图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既让地主满意,又让农民满意,但这是不可能的,地主和农民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在四月份的一次讨论中,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听说自己的岳丈被农民斗争,火冒三丈地宣布:「相当多的官兵,都拥有土地。因此,在决定土地政策时必须把这一情况考虑进去。」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上对待土地问题。共产党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国民党(包括左派分子)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说话,这是后来国共两党关系破裂的深层的阶级根源。

这一段从事农民运动的经历,对于毛泽东一生的道路有决定性的影响。在国共两党挤济人才之中,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对

农村阶级关系的认识,无出毛泽东之上者。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他的代表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构成了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础。以这一理论为指导,毛泽东在中国干了一番翻天覆地的大事业。

## 18 四月十二 蒋介石屠杀工农 七月十五 汪精卫背叛革命

由于国共两党共同努力,北伐军将士英勇作战,广大工农群众踊跃支援,北伐战争第一期作战取得了辉煌胜利。从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发布北伐宣言起,到十月十日攻占武昌,前后约三个月,收复湖南、湖北;歼灭吴佩孚主力十万人。两湖战事结束后,北伐军集中兵力于江西、福建战场,从九月初开始,经三个半月的作战,收复江西、福建两省,歼灭孙传芳主力十万人。尔后,挥师北顾,转入浙江、江苏、安徽三省作战,以摧枯拉朽之势,在三个月时间里,全歼孙传芳残部,占领长江中下游。

在北伐中,蒋介石到处收编吴佩孚、孙传芳旧部,扩充实力。打下南昌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六日),国民革命军总数达二十二万人。作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成为中国最大的实力人物。他羽毛丰满了。

根据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决定,广州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于一九二六年底到武汉。鲍罗廷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孙夫人宋庆龄为党的党政要员共三十余人于十二月十日到达武汉。但国民党中央执委代主席张静江和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文却被蒋介石留在了南昌。蒋介石坚持要迁都南昌。十二月三日,在鲍罗廷建议下,武汉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委员有:外交部长陈友仁、司法

部长徐谦、交通部长孙科，财政部长宋子文，以及宋庆龄、邓演达、吴玉章、谭平山、唐生智、董必武等，徐谦为主席。

鉴于蒋介石搞军事独裁，将自己凌驾于党和政府上，国民党中央发起提高党权运动。一九二七年二月九日，成立邓演达、徐谦、孙科、顾孟余、吴玉章五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三月七日至十七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南洋大楼举行。蒋介石借故拖延时间，迟迟不到会。在七日召开的预备会上，谭延文、陈公博提出等蒋，毛泽东提出应按时开会，不能再展期，宋庆龄、吴玉章、恽代英、于树德等也认为三十六个中央执委已过半数，全会应如期召开。会议于十日正式开幕。毛泽东又提出：全会期间「政治会议暂不开会，遇有重要事情发生，应授权主席团全权办理」的提案。蒋介石是政治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这一提案，实质上是停止了蒋介石和政治委员会的职权。在三中全会上，把蒋介石的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都撤掉了，改选了各部部长、政治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会议规定总司令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出征动员令须经军事委员会决议，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交总司令执行。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对农民宣言》，通过了董必武代表湖北省党部提出的《湖北征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会前湖北阳新发生了土豪劣绅用煤油烧死省农协特派员成子英等九人的惨案。大会决定成立「处理阳新惨案委员会」，由吴玉章、邓演达、毛泽东组成。委员会派出武装两个连前往阳新，召开公审大会，处决杀害农协人员的罪犯十余人，打击了农村的反动势力，推动了湖北农民运动的发展。

一九二七年三月，汪精卫夫妇和随行人员离开法国，取道德国、波兰、苏联，四月一日从海参威乘邮轮抵达上海。蒋介石、吴稚晖、宋子文和陈独秀等到码头迎接。

对于汪精卫的归来,蒋介石采取了两面手法:一面给汪写信促驾,一面在背后反对。

关于蒋背后反对的情况,中共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六)第二六一页提供了新的材料:

「(一九二六年九月)蒋介石派胡公冕同志来上海见仲甫同志(注:陈独秀字仲甫),请 C·P(共产党)勿赞成汪回,其措辞是:汪回后将为小军阀所利用和他捣乱,分散了国民革命的势力。仲甫同志是这样回答他:我们赞成汪回,于 K·M·T(国民党)、于国民政府、于蒋有三种好处,第一是武汉下后国民政府局面扩大,工作扩大,汪回来则政府增加得力负责之人,更能增强国民政府力量;第二是新起来归的小军阀,现时国民政府还不能去掉这般人,他们与蒋之间的冲突有汪出来可以缓和一些;第三现时张静江等在粤的腐败统治,汪回可以整顿,不致被贪官污吏劣绅土豪断送了国民政府之民众的基础。又详细说明我们在以下三个条件之下赞成汪回:一是汪蒋合作不是逼汪倒蒋;二是仍维持蒋之军事首领地位,愈加充实、扩大蒋之实力,作更远大之发展,决不主张别的军人拥汪以倒蒋;三不主张推翻整理党务众。」(《中央给广东信:汪蒋问题最后决定》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关于蒋促驾的情况,据汪精卫回忆:

「去年(一九二六)九、十月的时候,病得很厉害,不能思想。一月后,渐渐好了,连接中央及蒋同志的电报,催促回来。今年二月间,蒋同志又来了一个电报。说你如果再不回来,我也走了」。(《武汉分共之经过》)

蒋介石就是这样两面派。据汪精卫自述:「见面之后,蒋同志等提出两件事要兄弟赞成:一是赶走鲍罗廷,一是分共。

从四月一日到五日，一共五天，大家都是商量这两件事。」（《武汉分共之经过》）

这时候，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充满了书生气，起草了一篇两党领袖即汪精卫和陈独秀的联合宣言，经汪精卫同意后，于四月五日在上海见报。说：「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纠察队，这类谣言不审自何而起？国民党最高党部最近全体会议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毁工会之事……两党同志果能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则中国革命幸甚！两党章甚！」

蒋介石为准备建立新王朝，一方面在国外要求列强的支持；一方面在国内寻求大地主、大资本家的支持。一九二七年二月，蒋介石派戴季陶秘密访日，派王正廷打通和英美的关系。据一九二七年四月九日（密勒氏评论报）的透露：上海外国列强势力和中国买办资产阶级送给蒋介石一千五百万元作为反共的经费。据说这笔款是这样分配的：蒋自得一千二百万元。白崇禧一百五十万元，周凤岐一百万元，收买青洪帮流氓五十万元。并和蒋预约，在镇压共产党和工人队伍之后，再赠蒋三千万，作为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新王朝的经费。讲价成交，蒋介石动手了。

四月十二日，在上海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蒋介石主持了策划「反共灭共」的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何应钦、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陈立夫、要宗仁、白崇禧以及奉命从广州赶来的李济深、黄绍兴。据黄绍兴回忆：

蒋介石首先发言：「十三年国共合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时候，他们（按：指共产党）就不怀好意，人们的组织仍然保存，并且在我们党内发展组织。自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之后，选种阴谋日益暴露。北伐军到了武汉，中央某些机关和某些人受了分化或者受了动持，把武汉同南昌对立起来。因此，现在



如果不清党，不把中央移到南京，建都南京，国民党就要被共产党篡夺，国民革命军就不能继续北伐，国民革命就不能完成。请大家就此发表意见。」

从广州赶来的李济深报告了广东方面特别是在澎湃领导下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情况，他的结论是：「如果不早日清党，早日镇压，其它各县的农民都将起来效尤。广东的局面就无法维持了。」

黄绍兴接着说：「君拔群在广西东兰领导农民也闹起来了。现在要镇压是很容易的。其所以不敢镇压，是因为碍于中央党部和省党部的那些共产党人和他们的一同路人用党部的名义维护着农民。」

何应钦在报告南京方面的情况时着重谈到南京惨案，他居然为列强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作辩护，把南京惨案的责任加在共产党身上，说是因为「共产党鼓动士兵和地痞流氓抢了、打了外国领事馆和外国侨民，才引起外国兵舰开炮轰击的。」

白崇禧不提周恩来等共产党人领导上海八十万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解放了上海，更不提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亲自到龙华迎接百崇禧，使他兵不血刃进入这座中国最大的都会，却反咬共产党和工人，说「上海自我军占领之后，工人就组织纠察队封锁租界。他们有自己的武器，有自己的指挥系统，不服从军事长官的指挥。他们要冲入租界，占领租界。现在外国领事团已经提出严重警告，黄浦江上布满了外国兵舰，兵舰上的大炮卸了炮衣指向我们，租界里新近调来了不少外国军队。如果发生冲突，不但全国精华的上海完了，北伐事业也要完了。上海的帮会很有力量，什么阶层都有他们的组织，还有他们的武装，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杨虎都是坚决反共的。」

吴稚暉满口无锡方言，说什么「国民党已经变成了火中取

得的猫脚爪。」

反共产党的「大致方针」就在这次充满杀机的秘密会议上决定下来。

四月五日，又在上海道尹公署楼上再开秘密会议。吴稚晖和陈果夫拟了一个包括鲍罗廷、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毛泽东、张太雷等在内的一百九十七人的「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名单，起草了由吴稚晖向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的检举共产党谋叛的公文，呈文说四月十日举行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据与会者黄绍兴揭露：「完全是彻头彻尾的捏造。即使所那天的秘密会议改头换面，冒称「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的话，当时在场的也只有李宗仁、黄绍兴、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五人，只占全体中党委二十人的四分之一；蔡元培、古应芬、张静江三人并未参加，即使把这三个人加上也还不足半数。可是咨文不任把三个不在场的人加上，‘公推’一个不在场的蔡元培当主席，还把到会的人数说成是三分之二，这种睁着眼睛说胡话的撒谎伎俩也实在太拙劣可笑了。（见《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五辑）

蒋介石在接到咨文后，便装模作样地覆函中央监察委员会称：「中正接奉四二日党会全体紧急会议决议举发共产党谋叛证据来咨……事关叛党乱国，中正所辖各军防地已十万火急通电令行照办，静候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共议处分矣。」蒋介石就这样给「四一二」政变披上了「合理」、「合法」的外衣。

四月八日，蒋介石宣布上海戒严。桂系新军阀白崇禧与第二十六军军长周凤岐为上海戒严正副司令，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进行「协助」。十一日晚杜月笙出面邀请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汪寿华晚餐，汪应邀前往，在法租界被捕，押往龙华秘密杀害。然后宣布执行戒严令，断绝市内交通。十二日清

晨,有大批帮会流氓。袖佩工字臂章,冒充工人,持枪蜂拥到闸北工会向工人纠察队发起攻击,工人纠察队奋起抵抗。与此同时,在南市、浦东、沪西、吴淞、江湾等处都有流氓持枪进攻工人纠察队,枪声四起。戒严部队伪装调解,赶赴各处,将二千七百多人的工人纠察队解除了武装,打死一百二十余人,受伤一百八十余人。当天下午,流氓党棍在戒严部队支持下强占了上海总工会,戒严司令白禧则发表文告说「本早闸北工会大肆械斗,本总指挥特派队将双方肇事工友武装一律解除。以维地方秩序。上海总工会发出全市总同盟罢工的命令,以示抗议。戒严司令部又加给总工会一个罪名:「愚弄工友,煽惑罢工、希图扰乱后方,破坏国民革命。上海工人看见他们所欢迎的打着革命旗号的军队,忽然变成屠杀人民的刽子手,而且把罪强加给总工会和工人,无不悲愤异常。四月十三日上午十时,总工会在闸北青去路广场召开大会,参加群众约六万余人。会后整队向宝山路天主第二十路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提出发还枪械,释放工人,严征祸首,肃清流氓等项要求。当群众游行队行进到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第二师奉命用机关枪向迎面而来的群众队伍扫射,当场打死一百多人,受伤者不计其数。从四月十二日到十五日,工人被杀者三百多人,被捕者五百多人,失踪者三千多人,上海变成了恐怖世界。戒严司令部为掩饰屠杀工人的罪行,出布告说十三日之屠杀,实由工人及直鲁军图攻司令部,兵士乃不得不出于「自卫」之行动。令部属将作战中俘虏的直鲁联军士兵数十名游街,前导大旗,上书「上海总工会通敌证据确凿。」闸北区居民、社会名流郑振铎、冯次行、章炳琛、胡愈之、周予同、吴觉农、李三石等致函国民党上海政治分会委员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以目击者的身份戳穿了戒严司令部的谎言,原文如下:

子民、石曾、稚晖先生:

自北伐军攻克江浙,上海市民方自庆幸得从直鲁土匪军队压迫下解放,昨日闸北,竟演空前之屠杀惨剧。受三民主义洗礼之军队,竟向徒手群众开枪轰击,伤毙至百余人。「三一八」惨案段祺瑞之卫队无此横暴,「五卅」惨案之英国刽子手无此凶残,而我神圣之革命军人乃竟忍心出之。此次事变报纸记载,语焉不详,先生等或未能明白真相,弟等寓居闸北,目击其事,敢为先生等述之。四月十三日午后一时半闸北青云路市民大会散会后,群众排队游行经由宝山路,当时群众秩序极佳,且杂有妇女童工。工会纠察队于先一日已被解除武装,足证是日并未携枪械。群众行至鸿兴路口,正欲前进至虹江路,即被鸿兴路口二十六军司令部门口守兵拦住去路。正在此时,司令部守兵即开放步枪,嗣又用机关枪向密集宝山路上之群众瞄准扫射,开枪历十五、六、分钟,至少当有五、六百发,群众因大队拥挤不及退避,伤毙甚众,宝山路一带百余丈之马路,立即变为血海。群众所持青天白日旗,遍染鲜血,洒置满地。据兵士自述,群众当场死亡约五、六十人,而兵士则无一伤亡者。事后兵士又闯入对面义品里居户,捕得青布短衣之工人即在路上枪毙。此为昨日午后宝山路所目睹之实况,弟等愿以人格保证,无一字之虚妄。国民革命军为人民之军队,为民族解放自由而奋斗,在吾国革命史上,已有光荣之地位,今乃演此绝灭人道之暴行,实为吾人初料之所不及。

四月十四日,李济深根据蒋介石的密令以广东省政府军事厅长的身份召开军事会议,作了反共和收缴工农武装的具体部署。任钱大钧为戒严司令,广州市公安局长邓彦华在布告中毫不掩饰地说:「奉总司令(蒋)训令,迅将共产党分子全行逮捕并将各工友纠察队勒令解散。」五日凌晨,广州全市戒严,军警分三路进攻工农团体搜捕群众团体领导人和共产党员。广九、广

三、粤汉三大铁路系统的工人在农民军的援助下，与军警展开了一场强弱悬殊的血战。

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主持下，对蒋介石悍然发动政变，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和声讨。四月十七日，汪精卫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议决开除蒋介石常籍，免去其本兼各职。兵权在握的蒋介石自然不会示弱。四月十八日，在南京成立了蒋记「国民政府」，在全国树起了反苏、反共的旗帜，形成了新的政治中心。密切注视中国事态，寻找新的代理人的西方列强，立即表示支持蒋介石，对武汉政府施加压力。四月二十一日，英、美、日等国军舰三十五艘，侵入长江中游，遮断武汉；并下令设在武汉的英国汇丰银行停兑，制造金融风潮，扼杀武汉政府。

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曾建议东征讨蒋，但没有被中共中央采纳。鲍罗廷和中共中央多数决策者，认为奉军十万，进驻中原，张作霖声言「誓收武汉，进取粤湘」，这是当前主要敌人，支持武汉政府进行第二期北伐，进军河南讨奉。企图与冯玉祥的西北国民联军会合，打通翻苏联的交通线，壮大武汉政府的力量，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蒋介石。

北伐军避展到长江流域后，以冯玉祥为总司令的西北国民联军（辖第一、二、三、四、五军）于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在五原誓师，参加国民革命战争。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九日，武汉国民政府再次誓师北伐，任命正在率部由陕西向河南进军的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唐生智以副总司令名义，率第四、八、十一、三十五、三十六军和独立第十五师开往河南。五月初，北伐军在许昌、陈留、杞县等十五里农民武装的支持下，进到信阳一带。

大战在即，粮食却运不上来。漯河只有几天存粮。唐生智在漯河打电话给在武汉留守的幕僚、湖南教育厅厅长周熬山，嘱其赶快找毛润之想办法。周熬山找到毛泽东，告以唐总司令电话。毛泽东说：「唐先生北伐的事情，也是我们的事情，我们一定帮忙。我马上通知各地农民协会，请放心好了。」两三天以后，军粮源源不断地送到河南前线。五月中下旬，在上蔡、漯河及临颖

各次大战中打败了奉军。六月一日，北伐军和西北国民联军在郑州、开封胜利会师。唐生智事后回忆说：「假如粮食不如期送到，要想打败奉军取得北伐第二期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武汉政府对与冯军会师寄以厚望。主要负责人汪精卫、谭延、孙科、徐谦、顾孟余、庸生智与苏联顾问加伦将军于六月八日赶到郑州等候。第二天，冯玉祥在前往潼关迎接的邓演达的陪同下到郑。十日召开郑州会议。不料冯玉祥在会上提出调和宁汉、一致北伐的意见，希望武汉「分工」，武汉国民政府负责人除愿出洋休息者外，都到南京加入蒋记国民政府，使两政府合而为一。武汉赴会的国府大员，一听全傻了眼，汪精卫深知，他这个主席，没有一个总司令的支持是一天也干不下去的。蒋总司令反共。冯总司令也主张分共，只要走分共这步棋，就能得到两位总司令的支持，于是他动摇了。郑州会议是汪精卫走向反共的转折点。

蒋介石得到郑州会议的情报，非常高兴，通知冯玉祥，六月十七日他由南京出发到徐州，再自徐州到郑州与冯见面。冯玉祥主动一步，十九日赶到徐州，与蒋介石、胡汉民、李宗仁举行徐州会议。蒋介石点子多，与冯一见面就提出交换兰谱，结拜兄弟，并亲热地喊起“大哥”来，这就比汪精卫与冯玉祥的关系更进了一层；并答应自工七月份起，按月由南京接济冯部军饷二百



五十万元,这笔钱武汉政府是发不出来的。通过这两招,就把冯玉祥彻底拉过去了。徐州会议二十一日结束,蒋、冯两位总司令联名通电表示对国是意见完全一致。冯还单独打电报给汉口,劝武汉国民政府自动取消,国民党诸首要前往南京实现宁汉统一。

在第二期北伐期间,共产党于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九日在武昌都府堤十号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八十人,代表党员五万七千九百多名。参加会议“监督和指导”的除鲍罗廷外,还有四月三日到武汉的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印度人罗易。政治局会议都是在汉中路鲍公馆进行的。在政治局会议上,鲍罗廷和罗易发生了意见分歧:罗易主张“深入”革命,具体做法是通过没收土地争取农民,坚决支持农民革命,像湖南和湖北那样,掀起农民暴动;鲍罗廷主张“扩大”革命,他认为马且进行土地革命,意味着结束统一战线,而统一战线仍然是他和斯大林唯一的希望所在,为了维护统一战线。不仅不应鼓励工人和农民,而且还要约束他们的过火行为。他的具体做法是西北策略,恢复北伐,将革命势力扩展到西北去,使武汉政府冯玉祥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二人争执不下,罗易打电报给莫斯科,请斯大林裁决是他的“深入”革命的路线正确,还是鲍罗廷的“扩大”革命的路线正确,鲍罗廷也打电报给斯大林。说斌波:国民党领导人“不惜付出和国际决裂的代价,反对土地革命”斯大林回电覆示:既同意深入革命,也同意“扩大”革命。不论中共怎样理解;怎样执行,成功了都在斯大林的“英明”,失败了都是执行中的偏差。

五月三十一日,斯大林又给鲍罗廷和罗易发来一封电报,指示要求没收土地,但属于国民革命军官及其家属所有的土地除外。指示还要求阻止农民的过火行为;除掉不可靠的将领;武装



两万名共产党员；在湖南、湖北两省的工人农民中组织一支五万人的新军；吸收工人和农民进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组织一个以“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法庭，征亦反动军官。

这个指示是很值得玩味的。

原则上要没收土地分给农民，但国民革命军军官及其家属的土地除外，国民党县、省、中央党部和各级政府的文职官员及其家属的土地怎么办呢？如果也除外，大小地主大都可以逃避没收土地的厄运；少数家中没有子弟在新政权中做官的地主也可攀亲戚挂靠到政府官员的名下，最后就没有什么土地可以没收了。武汉国民党人认为没收土地就是“过火”，既要没收土地，又要制止过火行为。实际上是难以两全的。

至于“除掉不可靠的将领”和“惩办反动军官”，靠谁去办呢？共产党秘密去办行吗？如果不行，则要靠武汉政府，靠国府主席和国民党派领袖汪精卫，于是罗易把斯大林的电报拿给汪精卫看了，汪精卫抓住这个电报成了反共的理由，共产党人责备罗易“愚蠢”，那么“聪明”的办法是什么呢？

至于武装两共产党员和五万新军，斯大林也是要求在支持武汉政府和不破裂国共合作的前提下所做的。武汉所依靠的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唐生智和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能容忍吗？他们如不允许，硬要干就得翻脸，就得破裂，就得打仗。所以也是一个两难而无法执行的任务。只有翻了脸，才能去搞南昌起义。

斯大林发出这些指示，不是为了执行，他自己也知道行不通；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使自己在莫斯科对反对派的斗争中占住理，立于无懈可击的不败之地。

陈独秀和其它政治局委员处于碍难执行、不知所措的境地。陈独秀说：“以前季维也夫”（共产国际执委会前主席）一向教我

们帮助资产阶级，现在斯大林教我们二十四小时以内实行土地革命。

当然，陈独秀不是一个善于斗争的革命家。根据他的理解，保持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示的最高原则。无可奈何之中，处处妥协退让。因此处在中共领袖的位置上，他对大革命后期的失败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但让他替第三国际承担责任是不公平的。

最后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谭平山、瞿秋白、张国焘、苏兆征九人为政治局委员；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为政治局常委；陈独秀继续当选总书记。毛泽东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他在会上提交了“迅速开展农民土地革命，大力武装广大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政权的提案，陈独秀认为农民运动已经过火了，拒绝将这个提案列入议程。

中共五大‘对形势的估计充满了一厢情愿的幻想。认为汪精卫集团代表小资产阶级，“革命的现时阶段中，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比以前应当更加密切。资产阶级之退出（按：指蒋介石集团背叛革命），使国民党日益成为工、农、资产阶级三种被压迫阶级的联盟，无产阶级是这个联盟的原动力。在这种形势之下，共产党不仅与国民党共同担负责任，而且共同担负政权。”（《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案》）

事态的发展粉粉碎了陈独秀的幻想。五月十七日，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发动叛乱，攻打武汉。武汉卫戍司令叶挺率部打败叛军，挽救了武汉的危局。五月二十一日，隶属武汉政府的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指使其第三十三团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政变（马日事变），封闭湖南的革命团体，解除工农武装，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

六月中旬的一天，湖南省委委员郭亮来到武昌督府堤四十一号毛泽东住所，汇报了湖南白色恐怖的详细情况：五月中旬，临湘农民协会委员长李中和被惨杀；十八日，常德效农民协会委员长被凌迟处死；十九日夜，何键部将益阳县工会、农民协会占领，农民自卫军及工人纠察队被缴械；五月二十日晨，何键部熊震旅，将常德所有革命团体都包围起来，工人纠察队起而抵抗，遭机枪扫射，死八十多人。以后就是马日事变。为了反击敌人，组织了十万农民军，五月三十日包围了长沙。但省委书记李维汉赶到阵前宣读陈独秀的命令：“农民不得进行武装斗争，湖南问题静候国民政府解决。”农民只好撤退。几天以后，许克祥的军队进行反扑，在长沙一连屠杀七、八天。湖南有二、三十个县屠杀群众，到六月十日，被屠杀群众达一万余人。毛泽东听了义愤填膺。为了避开搜捕，杨开慧帮助郭亮把满头黑发剃光，给他换上农民的服装，让他先期返回湖南。

六月十七日和二十日，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两次在中央常委会议上提出湖南暴动计划的报告。他指出：现在浏阳、平江一带农民还有八千支枪，军事部已派了军事干部十人（其中有营长三人）到那里去，计划先取湘潭；集中浏阳、平江，全力攻下对手势力薄弱的城池，而以对手势力较强的地方则到各处打土豪劣绅，在可能范围内成立乡村的临时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亲自去见陈独秀，请求回湖南工作，陈独秀同意了，任命毛泽东为湖南省委书记。毛泽东尾随郭亮龙后来到了长沙。他一到就和郭亮、柳直苟等整理和重建农民武装，备准暴动。十天以后，陈独秀又下命令把毛东调回武汉，批评他组织农民军反对在武汉掌兵权的唐生智，会妨碍国共合作。

六月二十八日，陈独秀下令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把枪支弹药甚至连儿童团的木棍都交给了何键控制的卫戍司令部。

六月三十日,陈独秀召开中央扩大会议。通过了《国共合作十一条决议》。决议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并不含有联合政权的意义”,为了减少政局纠纷,共产党人可用“请假”名义退出政府;工农群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革命武装“均应服从政府的管理与训练”等等。陈独秀的右倾投降路线发展到了顶点。

七月四日,中共中央常委举行扩大会议。陈独秀又提出:国民革命军各军招兵时,农民协会的会员和自卫武装可应征入伍。这等于是让何键、许克为收编准备与他们作战的农民武装。毛泽东坚决反对,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他还主张拉队伍上山,并预料“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湖南的农民武装没有交出去,成为后来发动秋收起义的基础。

陈独秀的右倾投降路线指导理论是“二次革命论”。他认为‘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要等到资本主义发展以后,再来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因此,在资产阶级翻脸,统一战线破裂时,他手足无措,没有实行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思想准备,也反对别人这样做。这时候,陈独秀的领导已经破产了,改组中央领导的呼声日高。七月十二日,由鲍罗廷主持在鲍公馆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他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要陈独秀去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实际上解除了陈的总书记职务。陈认为中国革命失败,国际有责任,负气来去莫斯科,在家杜门谢客。根据国际的提名,成立了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成员有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三立、张太雷。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七月十三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严厉谴责了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工农;批评

了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的妥协调摇政策，“这种政策使武汉同化于南京，变成新式军阀的结合与纷争。”因此宣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七月四日晚，武汉国民党召开分共会议，跨党分子不得参加。宋庆龄没有出席，由陈友仁代表她发言说：“孙夫人反对分共，因为革命有这样大的成绩都是由于执行了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陈友仁不会讲华语，只能讲英语，讲孙科给他翻译。在翻译时，主张分共的孙科就和陈友仁吵起来了。廖促恺夫人何香凝也反对“分共”。这样，在中央执行委员中，反对“分共”的是宋庆龄、陈友仁、何香凝三人。闹了这段插曲之后，在汪精卫主持下多数通过了分共决议案。十七日，第三十五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何键开始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提如“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这就是“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二十四日，汪精卫覆电冯玉祥，谓“中共与鲍罗廷已加处置愿意迁都南京实行宋汉合一。”二十七日，被汪精卫于六月五日解除了国民政府最高顾问职务的鲍罗廷回国。汪精卫和宋子文到汉口火车站送行。至此，宁汉合流，都打着孙中山的旗帜，但孙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被国民党彻底抛弃了。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据国民党组织部长陈立夫说，从“四一二”到“七一五”，杀了共产党员两万多，干部四千多，中共委员三十七八个。在这一打击之下，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遇到了极大的危机。“这时党的形势是非常崩坏的形势。在这一形势之下，叛党的状况开始发生。首先叛党就是施存统（注：别名复亮。一九二〇年参加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二年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宣布脱党时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分校政治部主任），他是叛党开始的第一个

人。他是历史上很早的一个人，这个人叛党对党的影响是很大的，特别他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他的言论。在此形势之下，武汉许多同志公开宣布脱离党，人数一天天增加，初则一个一个的登报脱离，继则一批一批。这时可见党的崩坏非常之快，因为这时党在政治上没有出路。脱离党的事不但是在武汉，就在各地方如广东、上海都是这样。”（李立三：一九三〇年二月一日《党史报告》）中共组织遭到极大破坏。中共党员人数由“五大”时的五万七千多人降到一万人左右。但是，在蒋介石、李济深和汪精卫的疯狂屠杀面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九三七页）在沧海横流的日子里，坚持斗争的共产党人的代表有三个人：周恩来、毛泽东、张太雷，他们分别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将中国历史推进到一个新的时期。

## 19 遇变不惊 敢在危城开秘会 临危受命 秋收时节点甲兵

鲍罗廷和罗易被召回后，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三日，罗明纳兹受斯大林派遣来到武汉。贝索·罗明纳兹是斯大林的同乡，格鲁吉亚人，来中国时三十岁。他一九一七年三月参加布尔什维克，任过第比利斯委员会主席，巴库委员会委员，驻彼得格勒维堡区党代表，来华前是少共国际负责人。在他的领导下，八月七日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何键的行刑队每天都在处决共产党人，共产党领导人敢在汉口开会，这件事也说明了这些共产党人的胆略。当然，会议是极端秘密的，中央内部交通花了三天工夫，将与会者一个一个地带入会场。会场在三街四十一号（今鄱阳街一百三十九号）。这座房子是英国人在一九二〇年修建的三层公寓，当时称为怡和新房。参加会议的代表共二十一人，他们是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李震瀛、陆沉、毛泽东、杨匏安、王荷波、李子芳、杨善南、陆定一、彭公远、郑超麟、王一飞。邓小平以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李维汉担任主席。第一项议程由罗明纳兹作报告，瞿秋白翻译。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印发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这个《告党员书》是罗明纳兹在瞿秋白的帮助下起草的，瞿秋白在会议前一天晚上连夜译成中文，可以说，“八七”会议的灵魂是有



罗明纳兹。尽管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有许多失误,但促成“八七”会议的召开纠正投降主义路线是一大功绩。陈独秀当了六年中共的总书记,大家习惯于把他当作家长。如今家长犯了错误,没有人有这个资格代替他。只有国际代表出面来领导“八七”会议。五人政治局张国焘是牵头的。张国焘不同意陈独秀退出中共中央,而且以为没有办法召集会议。国际代表经过两三次催促,并声言如不召集会议,国际代表便直接召开全国代表会议,这才促成了“八七会议”会议的召开。

罗明纳兹来华的任务有两个:一是为第三国际和斯大林本人对中国革命指导上的失误作辩护;一是帮助中国党纠正妥协退让的路线。罗明纳兹出色地完成这两方面的任务。

在他起草的《告党员书》中说:

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实践上违背共产国际的根本原则及列宁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估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些根本问题上陷于最庸俗的机会主义。

在第五次大会时,土地问题议决案虽然通过了,但是党的领袖陈独秀、谭平山同志,却说现在只要扩大而暂时不能深入革命,所以没收土地还要等一等。

国民党中央的土地委员会开了三个礼拜以谭平山为领袖的共产党员改变了自已的主张,两次都是看着国民党代表是否接受而改变的;最后拟出了一个草案,只在原则上定出解决土地问题,而不求立即解决,当到国民党中决定不公布这一议决案,共产党员之中,没有一个人抗议的。

湖南同志领导农民运动的斗争,亦是这样光荣的中国历史的一页,农民协会的实际的政权,是共产党员领导而农民群众所创造的;自动没收大地主土地,分配土地于乡村农民,解除豪绅团防的武装,创立武装的农民军,严厉的镇压封建的反动分子,

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规模,而且会和国民党下层群众结合革命的联盟。而不是机会主义的联盟,最后组织农民暴动,以反抗长沙的反动政权(这次暴动如果不是中央党部要关在紧急关头采取可耻的退让政策,无疑是胜利的。)这都是湖南共产党努力的成绩。这是解决土地问题最好的方法。

伟大的湖南农民暴动,不但惊吓了资产阶级的地主军阀,甚至于惊吓了共产党的指导者;那时正是各地共产党群众力争这个运动的发展,勇敢的牺牲精神非常之可贵,然而中央受着国民党领袖恐吓犹豫的影响,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动政纲来解决土地问题。

长沙事变后,因湖南共产党员的建议,征调农军进攻长沙的反革命,如要农民的武装进攻不受党的指导机关这懦弱的犹豫的阻滞,那末,一个长沙城被十万农军所包围,并不是不容易打下来的。最后的几分钟,正当进攻长沙的前夜,中央政治局的委员湖南党部的指导者下了一个命令,取消进攻长沙的计划,说武装进攻长沙可能引起整个政局之纠纷,应当等一等中央的训令。隔了一天,中央的信到了,也说应当等一等进攻,先团结些力量,等国民政府来解决。停止进攻的命令送到了各地农军,大多数军因此而退却,只有两大队偶然没有接到命令,居然冲城攻打反革命派,经过坚决的奋斗,开始因为众寡不敌而败退。这一总败退的结果,就使反革命大奏凯歌,后来弄到几日全省的大反动。中央在农民暴动的关头,表现这样没有斗争的决心,简直等于出卖革命,这是无论如何不能辩护的,的确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个污点。

中央何以决定停止暴动呢?只有看二十六的议决案“现在本党的职任,既不是推翻他们(仇敌),也不是我们完全投降,还有中间的路;要找这中间的路,现在不宜于直接和他们武装冲

突,我们的职任是等时机,深厚自己的力量,以准备不可避免的进攻。”中央表现如此可耻的无决心,实际上不是帮助农民运动等候时机,乃是帮助反革命的长沙叛徒等候时机。《告全党党员书》最后的结论是:

共产国际严厉的批评我们的中央客观上出卖革命的机会主义的政策,我们承认这一批评完全是应该的,并且承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于中国问题的政策是对的。

在罗明纳兹报告后,毛泽东第一个发言。他说:

“农民问题。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当我们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发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索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成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于是党的意见跟着许克祥走了。甚可怪的,唐军还仅承认只有八处军官家庭被毁,我党反似乎承认不知有多少军官家庭被毁。总之,过去群众对于党的领导的影响太少。

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都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枪杆子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最后这句话被简化凝炼成为“枪杆子里面出

政权”的著名论断。

在瞿秋白作《党的新任务的报告》后，通过了农民、职工和组织问题议决案。《最近农民斗争之议决案》指出：“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最后，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选举结果是：政治局委员九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删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七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远、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八月九日政治局会议上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委，瞿秋白牵头全面负责，但没有使用总书记的名义。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略有上升，由“五大”时的中央候补委员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月九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对于湘省工作的决议》，决定由毛泽东、彭公达回湘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湖南省委，指定毛泽东为中冉特派员，彭公达为新省委书记。中央又决定从南昌暴动的军事力量中抽调一团或两团交湘南特别委员会指挥，集合湘南现有的工农军，夺取郴（县）、宜（章）、汝（城）一带，设立革命委员会，帮助全省农民暴动，规复全省政权。湘南特委以毛泽东、任卓宣、郭亮及当地工农同志若干人组织之，泽东为书记，受湖南省委指挥。

八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带领全家离开武汉回长沙。为防意外，他化了装。出发时，杨开慧在母亲的陪伴下，抱着刚出四个月的岸龙，带着大儿子岸英先走，毛泽东在后面跟上，约定在鲇鱼套车站会合。他们的二儿子岸青，已由孙嫂带着于八月初回到了板仓。为了革命，毛泽东把身家性命置之度外，带领全家离开龙潭，又入虎穴。到了长沙，不再住望龙园，迁到了北门外福寿桥附近的八角门楼。这里离沈家大屋很近，便于和省委联

系。

八月十六日，湖南省委改组。从十八日起。在沈家大屋举行多次会议，讨论秋收起义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彭公达、易礼容、夏明翰、贺尔康等。苏联驻长沙领事、共产国际代表马也尔到会指导。

会议讨论了秋收起义的土地政策。易礼容主张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分子的土地，小地主土地不应没收。认为小地主占地主阶级的多数，如果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则小地主必定和大地主联合起来，站到反革命方面去。夏明翰则主张必须没收全部土地，确定土地国有原则，即不仅没收大小地主的土地主多，贫农要求土地的又多，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住农民，必须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二、没收土地，要由我们的制定一个土地政纲，具体规定没收土地的办法，要农民协会或革命委员会执行。三、对被没收定土地的地主，须有适当的安插。四、宣布废除封建农民的各种苛税。毛泽东发言的基本精就是消灭地主阶级，彻底废除封建剥削制度，竟分满足广大贫雇农的土地要求，同时给地主阶级成员以生活出路。这个意见被大家所接受。

关于起义中是否仍用国民党名义的问题，省委根据以下几个理由认为国民党这块招牌已经无用：一、湖南马日事变，武汉国民党中央没有去镇压许克祥的暴行，国民党中央纯以几个投机的军阀的意见为国民党的意见，国民党自己立场已失，这时国民党已经死了。到七月十五日汪精卫等伪革命派叛变，国民党就不但是死了，并且臭了；不但臭了，并且臭气闻于天下。国民党这个工具完全为军阀夺去，变成军阀争权利抢地盘的工具。从唐生智、蒋介石、汪精卫甚至张作霖都可以拿这块招牌来作压迫民众、屠杀民众的工具，国民党变成军阀党了。二、国民党从

前在法律上承认民众很多利益,但是民众要他实现,则翻脸来压迫民众。民众现在认识国民党是骗人的党,现在不受骗了,他们不要国民党了。三、因此湖南此次起义。应当用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不应当用国民党左派的名义。

会议还讨论了起义中的政权问题,认为:一、中国革命的重要过程是土地革命,其政权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不是纯粹的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应扩大宣传工农民主政权。二、在我们起义力量发展最太的地方,应即刻建立工农民主政府。三、民选革命政府的口号也已臭了(吴佩孚、赵恒惕都说要“民选”),所以现在不能用这个口号,现在应竭力宣传和建设工农政权。

关于起义的区域,湖南省委在开始是想{鼓动全省农民起义。起义区域划分为:“一、湘东以长沙为中心;二、湘南以衡阳为中心;三、湘西以常德为中心;四、在西南之间的要冲是宝庆,宝庆也是中心地点。四个区域虽然已经划分,但要实行发动,人力财力都有困难。以后经过几次讨论,特别毛泽东的建议,在八月三十日省委常委会议上决定只发动湘东各县的起义,放弃其它几个中心。湘东的中心是长沙,决定要同时起义的是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等七处。

关于起义中的军事问题,毛泽东在湖南省委常委会议上发表了重要的意见:一、湖南的秋收起义,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是发动起义,单靠农民的力量不行的,必须有军事的帮助。有一两个团的兵力,这样起义就可以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二、起义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就一定要有兵力,没有兵力的护卫就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成熟,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关于起义中的宣传工作,湖南省委准备了对农民的宣传大



纲,并提出了十个宣传口号:一、暴动!打倒唐生智、汪精卫!二、暴动!打倒省政府!三、暴动!打倒“国民政府”!四、暴动!杀土豪劣绅!五、暴动!农民夺取土地!六、暴动!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七、暴动!实行农民协会专政!八、暴动!组织革命委员会!九、农民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十、暴动胜利万岁!

起义的领导机关,湖南省委决组织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起义的日期,决定九月九日开始破坏铁路,十一日各县起义,十五日长沙起义。

八月下旬,毛泽东将杨开慧和老人、孩子送回板仓,只住了一宿,就踏上了征途。他们是生离,但也是粒后的一别。

秋收起义的武装力量,有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安源的工农武装和平江、浏阳农军。警卫团的团、营主要领导干部都是共产党员,团长卢德铭根据中共的指示率领全国由武昌乘船沿长江东下前往九江,参加南昌起义,因南昌起义部队已南征在途,遂改变计划,来到修水休整待命。这时由罗荣桓率领的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一百多人驻在修水桃树港。双方沟通联系后,罗荣桓率部编为警卫国特务连。秋收起义的领导人大部分都牺牲了,只有罗荣桓幸存下来,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元帅。

安源的革命武装,基本成份是安源工人矿警队和萍乡、醴陵、衡山、安福、莲和等地的农军。矿警队原是资本家镇压工人的武装,安源中共地下组织派了杨士杰等一批工人党、团员打入矿警队,经过多年秘密工作,已经掌握了这支武装。萍、醴、衡的农军是从长沙撤回来安源的。安、莲农民自卫军攻打永新以后在总指挥王新亚率领下来安源休整。

平江农能工巧匠在北伐军解放平江后,改编当地民团武装



组建的,后来发展到五百人左右。由共产党员余贲民任队长。浏阳农军是县委书记潘心源组建的,约有六百人左右,“马日事变”后参加团攻长沙,因未接到撤退命令于五月三十一日单独进行了扑城战斗。一九二七年七月中旬,中共中央命令平浏农军合编为独立团,隶属于贺龙的二十军开往南昌参加起义。八月五日到达涂家埠,起义军已经南下,于是,平江农军开往修水,浏阳农军开往铜鼓。

九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传达“八七”会议和省委会议精神,整编部队。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的决定,将各县零散部队统一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全师约五千余人,师长余洒度,黄埔二期毕业,原省防军暂编第一师长;副师长余贲民,原是平江农军负责人。下辖三个团:第一团由原武汉政府警卫团两上营和平江农军编成,团长钟文璋;第二个团由安源工农革命武装编成,团长王新娅(原安福农民自卫军总指挥);第三团由警卫团一个营和浏阳农军编成。团长苏先骏;余洒度收编的部分土匪武装编为第四团,团长邱国轩。原警卫团团团长卢德铭从中央汇报回来,被任命为这个部队的总指挥。毛泽东以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领导这支部队。前委关于起义的部署是:第一团夺取平江,第二团夺取萍乡、醴陵,第三团夺取浏阳;得手后三路向长沙推进。在长沙市工人起义的配合下,夺取省城。

一切布置就绪,毛泽东从安源赶往铜鼓,他将随三团行动。途经浏阳张家坊,被民团抓住了。同他一起被捕的还有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安源煤矿工人俱乐部的易子义(易绍钦)。在团丁押解他们去团防局的路上,潘、易二人有意掩护毛泽东,向两个方向逃跑,吸引团丁们去追,从而造成让毛泽东逃脱的机会。毛泽东跳进一个水塘,周围野草业生,他蹲在那里等到天

黑。好几次搜捕他的团丁来到附近,但终究没有发现他。潘易二人被追回来了,毛泽东听到了他们和团丁对话,被押着过山坳奔团防局去了。毛泽东一生只有这一次被捕的经历,如果他被杀害了,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将会是另一个样子。估计团丁们已经走远,他才从水草丛中钻出来,向一条路走去。毛泽东丢掉了鞋子,赤着脚翻山越岭,彻夜赶路,他的脚在水塘里扎了一下,浸泡了半天,又走了很长的田间小路,受到严重的擦伤,行惫愈来愈困难了。天无绝人之路,他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是个农民协会会员,留他在家里住宿一夜,第二天,他掏出身上仅有的七块钱,托这位农民给他买了一双鞋、一把雨伞和一些食物。农民送到交车岭,告诉他:“到铜鼓,要走通往梅调的这条路。沿这条路下去,翻过儿座小山就是排埠,再往前走二十里,就是铜鼓了。”毛泽东辞谢了那位农民,大步流星地上路了。

在铜鼓萧家祠堂,第三团的官兵们正准备会餐,这天是阴历八月十五日中秋佳节。毛泽东的到来,使大家很兴奋。饭前,他和全体干部见了面,讲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然后和大家一起会餐。九月九日,省委组织部分群众,破坏粤汉铁路和株(州)萍(乡)铁路,切断敌人的交通运输一直到十五日。敌人的火车始终不通过。九月十日,第二团在安源起义。十日、十一日两次进攻萍乡不下,于是放弃萍乡,西进攻取老关,缴枪十余支。十二日,攻克醴陵,缴枪七、八十支。后因优势敌人来攻,退出醴陵,经老关北上,十五日攻克浏阳。十七日,在浏阳被敌军包围。在突围中损失兵力三分之二以上。团长王新亚牺牲了。王新亚原是北伐军的一个营长,湖南浏阳人。是王新亚向毛泽东介绍井冈山的地形和袁文才、王佐的情况,秋收起义失败后才很快找到了一个落脚点。十一日,第一团由修水出发,进攻平江长寿街之敌地方武装。当先头部队刚同长寿街守敌接触主力进到金坪

时，邱国轩团叛变。一团腹背受敌，牺牲一百多人，两个营被打散，团长钟文璋失踪，余部向浏阳转移。

第三团于十一日从铜鼓出发，攻占浏阳东北的白沙镇；十二日，攻占东门市。十四日上午，敌两个营兵力，由东门市团总鲁绥之、地主刘之成路，分两路包围三团。三营营长。共产党汤采艺身先士卒，率部与敌拼杀，腹中弹，小肠流出，英勇献身。全团与敌鏖战六小时，向上坪撤退。

毛泽东因脚底擦伤没有得到治疗，红肿溃烂不能行走。三团的起义军战士找把椅子，绑上两根杠子抬着他行军，九月十四日晚到达上坪。十七日当他得到各团的报告后，当机立断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以前委名义通知各部队到浏阳县文家市集结。十九日，第三团和一、二团余部，陆续列达文家市。当晚，在里仁学校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毛泽东说：“现在的形势是敌大我小，敌强我弱，革命已处于低潮时期，各路起义军均遭受挫折，应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迅速脱离平、浏地区沿罗农山派南移，寻求立足之地。”大家听了毛泽东对形势的分析和部队的出路，多数认为有道理，独师长余洒度反对，坚持要打长沙。总指挥卢德铭说：“现在敌人正集中兵力要消灭我们，如果攻打长沙，等于送上门去，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卢德铭是余洒度的老长官，在资格和威信上都压得住他。户这一票对统一会议思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起了重要作用。“那么，到底到什么地方落脚呢？”有人进一步提出问题。毛泽东拿着一份晕式地图，指着湘赣边界山形最宽的部分，用生动的表象譬喻说：“这里像眉毛一样的地方，是罗农山脉的中段。王新亚同志跟我讲过，这个地方叫井冈山。有大小五井地势险要，易守南攻。王佐、袁文才领导的宁冈自卫军至今仍在那里坚持，反动派拿他们没办法。这里适合作我们的落脚点。”会议开到深夜方散

秋收起义的余部从文家市出发,经桐木、小视,于九月二十日来到泸溪镇宿营。第二天清晨出发时,由于侦察不力,情况不明,遭第三军特务劳营和保安团的伏击,总指挥卢德铭率一个连抢占路边一个高地,阻击敌人,掩护部队转移,在战斗中卢德铭牺牲,部队损失数百人。卢德铭是四川宜宝人,黄埔二期毕业,在叶独立团当过连长、营长,他是中共军队的将帅之才,他的牺牲是很可惜的。二十四日,到达莲花县甘家村。当地中共组织领导人甘明山、贺国庆热烈欢迎起义军的到来。他们向毛泽东反映:九月十八日,莲花县农自卫队攻打县城失利,牺牲三十多人,被捕七十多人。请求起义军攻打县城,臂救被捕同志。毛泽东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二十五日,在甘家村召开军民大会,枪毙了六个民愤很大的土豪劣绅。会后,部队冒雨攻城。守城的只是一个保安队,不到半小时,攻克莲花。部队进城后,砸开监狱,解救了被捕的共产党员和农民自卫队队员,打开官仓,将粮食分给贫苦农目。经过艰苦转战,九月二十九日,起义军到达永新县三湾村。三湾地处九陇山区,是茶陵、莲花、永新、宁冈四县交界的地方,有五十多户人家,环境比较安定。在这里毛泽东领导了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

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三湾时已不足千人,但仍是起义前的编制,官多兵少,枪多人少,部队留下来的多数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工农运动中的骨干分子,有的亲人在白色恐怖中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除了上山造反他们已没有别的出路。也有一些旧军官和其它一些动摇分子,悲观动摇,感到没有出路,单个的、结伙的离开部队。师长余洒度走了,投靠了蒋介石,后又为蒋所杀。三团团长苏先骏也走了,投敌后出卖了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郭亮,一九三〇年红三军团打进长沙后,将苏逮捕,作为叛徒处决。整编中对动摇人,在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以后,采取自愿

原则,愿留者留,不愿留者,根据路途远近发给路费遣散回家。然后把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番号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辖两个营(一营、三营),每营三个连,加特务连,共七个建制连。编余军民成立军官队,伤病员编成卫生队。经过整编,人员虽然减少了,但部队精干了,战斗力提高了。

接着在部队建立中共的各级组织。毛泽东提出:“支部建在连上”,班、排党员够三人以上者成立党的小组。连似上单位,设立党代表,党代表与军事指挥员同为部队首长;营、团建立党委,重大行动都要经党委讨论决定。在整编后重新任命了干部陈浩、副团长徐恕、参谋长韩壮剑,一营营长员一民,党代表宛希先;三营营长张子清,副营长伍中豪,党代表何挺颖;特务连长朱建胜,党代表罗荣桓;

军官队队长吕赤;卫生队队长曹荣,党代表何长工。

为了建设亲型军队,毛泽东提出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长不许打骂士兵,废除烦琐的礼节,开会士兵有说话的自由,经济公开,宵兵待遇平等,吃饭穿衣都一样。在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是士兵的群众组织,在党代表指导下,开展宣传、文体活动,参与伙食管理。监督民主制度的实行。

整编后的第二天,部队集合,陈浩团长介绍毛泽东给大家讲话。只见他穿一件老百姓的旧棉袄,腿上打着绑腿,脚上套着一双草鞋,他脚伤未愈,缓缓走到队前,对着大家说:“同志们,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了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是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起义出来的,一个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们一百。我们现在有这样几百人的部队,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有成功!”

## 20 初上井冈 团结袁王兴大业 急赴茶陵 诛杀陈徐震三军

井冈山,在江西省西部,介在宁冈、雩县、那川、水新四县之父。北麓是宁冈的茅坪,南麓是遂川的黄坳,两地相距九十华里。东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县的水口,两地相距一百八十华里。四周从拿山起经龙源口、营盘圩、戴家埔、大汾、堆子前、黄坳、五斗、江、东坳到拿山,共计五百五十华里。山上大井、小井、中井、下井、茨坪、下庄、行州、草坪、白泥湖、罗浮各,均有水田和村庄。主峰海拔九百九十五公,地势险峻,到处是悬崖绝壁,只有几条小路通进山里。这些小路非常狭窄,大部分只能进一人通过。满山参天的杉树和茅竹,密密层层,把太阳光挡住了,有些地方白天走林子几步以外就看不清对面有人。在历史上是逃犯避难之地,兵匪窟宅之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成了毛泽东的革命根据地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日,朝阳牌耀着三湾高大茂密的枫树,部队在枫树坪整装待发。毛泽东在队前讲话,进一步说明向罗霄山脉中段井冈进军的意义,并复布行军纪律:说话要和气,买卖伍,向井冈山开进。下午,到达宁冈县古城。当晚,毛泽东在文昌宫召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部队营以上党员干部和宁冈县委龙超清、龙国思、萧子南等。会议开了两天,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主要是讨论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



的问题。要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首先要解决对袁文才、王佐部队采取什么方针?袁文才,时年三十八岁,宁冈县人。读过中学,一九二三年加入井冈绿林组织马刀队,后当了头领。一九二五年,经共产党龙超清的工作,袁文才将马刀队改编为宁冈县总保卫团,袁任团长。一九二六年九月参加龙超清领导的宁冈起义,改称农民自卫军,袁任总指挥。同年十一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佐,与袁文才同年,遂川县人,裁缝出身,后当了绿林首领。一九二七年一月,在遂川县农民协会负责人王文静的帮助下,将所部改编为农民自卫军。他们各有三百余人,六十条枪。王佐部队驻扎井冈山上中心地区茨坪,袁文才的队伍驻扎在山脚下的茅坪,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把住了通向井冈山的七条道路。袁王部队如今虽然也叫农民自卫军,但基本上还是绿林好汉的一套,在王佐的队伍里“土匪”习气更严重一些。因此,会上有人仍把他们看作是“土匪”,主张武力消灭,夺取进井冈山。毛泽东说:“你们太狭隘了,度量太小了。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着呢!历史上有哪个朝代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的?我们要团结改造他们,把三山五岳联合成一个大队伍,统治阶级就拿我们没有办法。何况,他们大多数是贫苦农民,与地主阶级矛盾很深。虽然有地方主义、绿林习气等缺点,但是可以教育改造的。我们不能采取旧军阀大鱼吃小鱼的吞并办法、现在的形势逼迫他们要革命,要靠近我们,因此,此时绝不可动武,应该主动搞好关系,积极争取他们革命,并通过他们团结井冈山广大群众。”宁冈县委盼同志听罢毛泽东的话深表赞成,龙超清、龙国恩和自告奋勇去做袁文才、王佐的工作。主张武力解决的被说服了,与会人员一致赞成毛泽东的团结改造袁王部队的方针。袁文才、王佐听说山下来了一千多人的队伍,因为情况芥明,确实紧张了一阵子,作了战斗准备。古城会议后,龙超清、龙国恩



与袁文才、王佐沟通了联系。袁文才派文书陈慕平作为他和王佐的代表与毛泽东派来的人谈判。第一次谈判主要是龙超清介绍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经过，到井冈山是为了同袁、王一起搞革命的。龙超清说，为了表示合作的诚意，毛泽东同志打算送给袁、王一批枪支，希望袁、王为革命军安置一批伤员，解决军粮和队伍驻扎问题。陈慕平回山向袁、王忙报了情况。袁文才听说这支队是中央委员毛泽东领导的，非常高兴。大革命时他就知道毛泽东这个名字。王佐虽然对毛泽东没有多少了解，但他相信袁文才，看到袁文才的这样钦佩毛泽东，他也表示赞同。因陈慕平在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认识毛泽东。袁文才嘱咐陈慕平第二次谈判时，要找机会见见毛委员，以防受骗。第二次谈判，龙超清、龙国恩将陈慕平要求面见毛委员的意思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在古城接见双方谈判代表。听说陈慕平是武汉农讲所的学生，毛泽东很高兴，问了井冈山一些情况，重申希望与袁、王真诚合作，共同开展革命新局面。陈慕平带回了毛泽东送给袁、王的一百条枪，汇报了与毛泽东本人见面的情况。袁文才、王佐觉得情况清楚了，心里踏实了，决定请毛泽东上山，共商大计。

十月六日，袁文才、王佐和他们的主要干部一早就来到步云山。山上有座太庙叫白云寺，是他们的“忠义堂”。在山上避难的永新县的中共党员干部刘珍、王怀、贺敏学、贺子珍也来了。等了一会儿，毛泽东沿着一条山间小路向山上走来，后面跟了副师长余贲民、团长陈浩等五六个革命军的主要领导干部。他们的穿着很不整齐，有穿国民党军服的，有穿中山服的，但每个人的脖子都系着一条一寸多宽的红带子，这是起义时统一规定的识别带。毛泽东穿一身灰布中山服。人很清瘦，颧骨都突出出来了。头发从中间向两边分开，很长时间没有理发了。皮肤晒得

很黑，神色上还留有经过激战后没有恢复的疲劳，但是一双眼睛很有神，显示他的睿智、深沉与毅力，他走起路来有点微跛，那是因为脚伤，华脓了。毛泽东看到迎候他的人群，快走几步上前同袁文才、王佐握手，然后转过身来，把陪他上山的干部逐个作了介绍，袁文才也把山上的人逐个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同大家一一握手。当袁文才领着毛泽东来到贺子珍面前时，毛泽东有些惊讶，他没有想到，在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然有一个年轻姑娘。只听袁文才介绍说：“她是永新的干部，叫贺子珍。”毛泽东疑团顿释，爽朗地笑起来说：“我还以为是你的女儿，或者是哪位同志的家属呢。”他握住贺子珍的手说：“很好，很好，今后我们共同战斗吧。”互相认识之后，进入白云寺正殿谈话。交谈中，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袁文才、王佐的自卫军，在革命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革命，为中共保存了一支革命武装。他提出，以后革命定要同袁文才、王佐的队伍协同作战，共同在井冈山立住脚跟。袁文才、王佐都很高兴。袁文才说早就盼望能同上级党取得联系，为革命做点工作。他和王佐当场表示：“欢迎毛委员带队伍上井冈山领导我们干革命。安置伤病员和队伍驻扎都不成问题。”袁文才还拿出十个竹筒，里面装的是一千块银元，亲自交给毛泽东作军费。

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与袁文才是中学时代的同学和好友。永新暴动失败后，贺子珍患严重的疟疾，就在井冈山避难和养病，和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住在一起。会见过毛泽东，她和袁文才一起回到茅坪家里。只听袁文才客家话对妻子讲述这次会见毛委员的经过，非常高兴地说：“我看革命高潮要来了，有了毛委员的领导，我们今后可以有很多事干了。”

茅坪是个东西狭长的村子，有六十多户人家。东南面有条小河，淙淙流水。终年不断；北面是一片山林，四季郁郁葱葱。

十月七日,毛泽东派余民率领军官队和伤病员来到茅坪,建立后方医院和留守处。袁文才带领农自卫军和当地群众,热情欢迎,暂时把伤病员分散安置百姓家里,腾房子,送粮食,担烧柴,关系非常融洽。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共分两路在井冈山附近的宁冈、永新、遂川、莲花、茶陵、万安、酃县等地活动,向群众作宣传,打土豪和筹款。分开行动不久,第三营在大汾镇遭萧家璧靖卫团的袭击与团部失掉联系。张子清营长把队伍带到桂东县,与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相遇,得到朱德的帮助,补充了物资和弹药。至十二月在茶陵归建。

毛泽东因为脚伤化脓,烂了一个洞,没有随队伍行动。在袁文才的安排下。在步云山住下养伤。后来袁文才又把毛泽东接到茅坪八角楼,这里离袁文才的住处只有几步远,治疗和生活都方便。八角楼原来是永新避难的党员贺敏学等住的,为了照顾好毛泽东,他们搬到别处去了。毛泽东利用这个机余,与刘珍、王怀、贺敏学、贺子珍等多次详谈,了解井冈山地区的情况。毛泽东说:“井冈山这几个县都是好的,你们永新的地理条件很重要,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也较好。你们永新的同志应该回永新去,重新建立党的组织,开展群众工作。”十一月月上旬;毛泽东在茅坪象山庵召开了宁冈、永新、莲花王县原中共的负责人会议,要求各县重建党的组织,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建立红色政权。他还指定刘珍为永新县委书记。会后,刘珍、王怀、刘作述等人。到三湾组建新的县委。贺敏学接受了毛泽东赠给的七支枪,又把先前埋在地下的枪支挖出来,建立了永新县工农赤卫队。毛泽东在脚伤初愈的时候,还在袁文才、王佐的陪同下察看了井冈山的地形。

十月,宁汉战争爆发,李宗仁率部讨伐唐生智。湘军集中力量对外。各县守备空虚。十一月月中旬毛泽令团长陈浩率一营和

特务连袭取湖南最东边的茶陵县。茶陵县城的守敌是“湘东清乡司令”罗定的一部分挨户团，战斗力很弱。稍一接触，敌人就垮了。十八日占领了县城。陈浩在县政府门前挂上块“人民委员会”的牌子，委任一个县长，其它旧官吏照常任事，升堂审案，收税派款。不组织发动群众，不开展打土豪的斗争。一营党代表宛希先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一情况。毛泽东立即给陈浩写信，指示撤销“人民委员拿”，成立工农兵苏维埃，部队要开展群众工作，发动打土豪的斗争。十一月下旬，井冈山根据地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苏维埃正式成立，工人出身的谭震林被选为苏维埃主席。红色政权成立后，组织了县工会、县农会、县赤卫队，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的斗争。

十二月下旬，湖南军阀暂时向南京方面妥协。敌第八军军长吴尚派独立团团长俞业裕率部进攻茶陵。独立团是八军主力团之一；再加上罗定的七、八个连，足有二十个连，两千多人，仅重机枪就有十二挺。工农革命军一团方面，加上从桂东县赶来参战的第三营，一共才七个连。武器装备更居劣势，只有一挺轻机枪，步枪的子弹也不多。团营指挥员多是军校出身，守就是守，攻就是攻，拉开架势打硬仗。战斗是从拂晓打起的。敌人在重机枪的掩护下一子攻到城郊。一团的步枪根本压不住敌人的火力，敌人成排成连地冲过来。一团的战士打得很顽强，阵地丢了，又奋勇地夺回来。许多人几次负伤，仍坚持战斗，伤亡不断增加。打到天黑，趁着夜幕，在交替掩护下撤出战斗，到湖口整理部队。休息了一会儿，本该向东、撤回井冈山、忽然传令改变方向，向南行进，行军的速度也猛然加快。许多人滴咕：南面是广东，有敌人的重兵，为什么连夜南行呢？走不多远，又传下令：“毛委员来了，部队返回湖口宿营。”

这件事很能说明毛泽东掌握局势、控制部队的的能力。一听

说

这件事很能说明毛泽东掌握局势、控制部队的的能力。一听说敌人反攻荣陵,毛泽东就敏感的预料到前线部队可能要出事情。他不顺脚伤未愈在,陈伯钧、毛泽东和袁文多才派出的一个班战士的护卫下,坐担架赶赴茶陵。行至第三天途中,遇见三个掉队伤员,从伤员口中知道了前线的情况。他们见毛泽东像见亲人一样,一个重伤员说:“毛委员,我带了花。走不得了。”毛泽东亲切地安慰他们,并把自己用的担架让给那个重伤员,和大家一起一瘸一拐步行赶到湖口。这时天已黄昏,前卫已经出发,大部队正在休息。毛泽东立即下命令:前卫返回湖口宿营。当晚,召集连以上干部会议,揭露了陈浩等人的叛变阴谋。陈浩对革命悲观失望,他利用茶陵一战革命军失利,伙同副团长徐恕、参谋长韩壮剑企图把队伍拉到湖南去,投奔驻在宜章的蒋系十三军。该军军长方鼎英任过黄埔军校教育长,陈浩是黄埔一期毕业生,因此有卖身投靠之想。毛泽东代表前委决定:陈浩等三人停职接受审查,任命张子清为团长,何挺颖为党代表,朱云卿为参谋长。第一营营长和党代表由团首长兼,第三营营长伍中豪,党代表毛泽东。第二天,部队返回井冈山。经前敌委员会讨论决定,将阵前投敌叛变的陈浩、韩剑、徐恕三人处决。初上井冈山,革命军遭遇到的一场极端严重的危机被毛泽东挽救了。这两件事迅速在部队传开了,大大提高了毛泽东的威信和权威。

在部的情绪平复以后,毛泽东又召开干部会,总结两次茶陵战斗的经验,特别是第二次作战失利的教训。他说:“战无常法,要善于根据敌我情况,在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原则下,抛掉旧的一套,来一个战术思想转变。打仗也要像做买卖一样,赚钱就来,赔本不干。现在敌强我弱,不能用过去那套战法,想一口吃个胖子。从前井冈山有个大王叫朱聋子,和官兵打了几十年

交道,总结了一条经验,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我们要改他一句:既要会打国,又要会打仗,打国就是为了避实击虚。强敌来了,不要跟他硬碰,先领他兜几个圈子,等他的弱点暴露出来,就要抓得准,打得狠,打得干净利落,要有缴获。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我们的战术。”

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四个连攻打遂川,在大坑打垮了地主武装萧家璧的靖卫团,县城的守敌闻讯弃城而逃,革命军乘胜占领遂川城。部队入城后,毛泽东集合部队讲话,他说:“遂川县有一些大土豪,银元都埋在地下睡觉,农民穷得要命。大家要打土豪,筹款子,发动群众。快过年了,要给群众分些粮食、衣物。开始时穷人一般都不敢要地主的東西,我们要在晚上把东西秘密送到穷人家里去,或者把这个地方土豪的资财,带到另一个地方分给穷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以班、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到四乡开展群众工作。一个小分队在大坑打开一家土豪紧锁的大门,仓库里五光十色,什么都有。光是泡在茶油里的腊肉、腊鸡、腊鱼和各种油炸果子,就有好几大缸。战士们对比穷人家啼饥号寒过去年的悲惨景象,心里充满了仇恨,把这个土豪家搞了个天翻地覆,只要能拿的,全都搬了出来。食物、衣服,一部分送到当地穷人家里。一部分带着沿途送给穷人。有的穷人不敢要衣物,怕地主反攻倒算。战士给他们食品,他们收下了,食品吃下肚不留痕迹。在遂川城里,二连的几个干部战士打着写有“宣传队”三个大字的红旗,在闹市停下来,群众团团围住,静听一个叫赖毅的战士用湖南客家话讲演,这个战士说:“我在家跟你们一样,受尽了土豪劣绅的压迫剥削,没命地干活,也吃不饱肚子。我们穷人要翻身,就得打倒土豪劣绅,要分他们的田,要组织起来跟他们斗啊!”这时有人带领群众高呼口号:“打倒土豪劣绅!”把群众的情绪鼓动起来了,



就带领大家到土豪劣绅家里去分东西：粮食、衣服、用具都分了，连猪也杀了，切成一块一块的肉分给穷人过年。由于军事胜利的影响和分兵发动群众，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斗争没有逃走的土豪劣绅，烧地契，烧借据，提出了分配土地的要求。一月二十九日，成立了遂川县苏维埃政府，贫家王次淳当选为县苏维埃主席。毛泽东出席了新政权成立大会，遂川的山歌能手们编了新的歌词反映生活的变化：

过新年，过新年，今年不比往常年，共产党军来到了，要打倒萧家壁。要活捉罗普泉（注：萧罗都是拥有武装的土豪）。

过新年，过新年，今年不比往常年，共产党军来到了，又分谷子又分田。

过新年，过新年，你拿斧子我拿镰，高举红旗开大余，工农翻身掌政权。

为了改造王佐部队，毛泽东派何长工去做党代表。何长工也是个传奇式的人物，湖南华容人，原名何坤，留学法国，回国后，办过学校，搞过农民运动。马日事变后，因他暴露了共产党员的身份，在华容不能立足，毛泽东安排他参加了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并改名何长工。这年何二十七岁。一九二八年初，何长工带着毛泽东的信来见王佐。王佐个子不高，五短身材，着黑色直贡缎短衣，挎一支新式驳谷枪。他看罢毛泽东的介绍信，连声叫道：“好！好！欢迎！欢迎！”命人摆酒设宴，为毛委员派来的人接风。席面颇丰盛，都是山珍海味。由他的左右手刁飞林、李克昌作陪。饮酒中王佐盘开了何长工的家底，何长工将个人经历坦诚相告。王佐也介绍了自己，因不满地主豪绅的压迫，才揭竿而起。

酒过三巡。王佐说：“党代表，你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我有个仇人尹道一，你能不能帮助我除了？”



尹道一是井冈山七县团总指挥，有名的恶霸地头蛇。王佐和他打了多年仗，结下血海深仇。这支武装也是工农革命军发展根据地的一大障碍。

何长工说：“有办法。我们一定要把尹道一除掉，把七县的地主民团肃清。”

王佐手下的三百多个弟兄，多是土籍人，无事窝兵务农，有事招之即来，善爬山，个个强悍。向心力很强，队伍打散了，就自己跑回来。

一开始，王佐对新来的党代表是有戒心的。把他安排在离他的“忠义堂”一里开外的一处小房里，叮嘱“不要随便走动，以免发生意外。”实际上是限制何长工的活动，不准他接近士兵。何长工小心谨慎，不通知参加的会就不去，不清的宴会就避开。王佐很孝顺他的母亲。

何长工主动到他家里看望老人，又认识了他的妻子和哥哥，对他家人宣传家人审传革命道理，交朋友，联络感情，王佐很满意。何长工又和刁飞林、李克昌来往，王佐也无戒心。何长工是个豪爽豁达，善于和三教九流交往的人。经过一毆接触，赢得了王佐全家和刁、李二头领的信任，都向王佐耳朵里吹何党代表的好话。王佐看到党代表不是瓦解他的队伍的，是真心实意帮助他的，撤销了对何长工行动的限制，允许他接近士兵了。何长工在士兵中做的第一件事是教大家唱歌。过去他们都是唱些、山歌野调，不像个军队的样子。经过王佐的同意，从每连抽出三个会唱歌的士兵作文娱骨干，何长工教他们唱革命歌曲。回去普及到各连。然后组织会歌、赛歌，逐渐打开了政治工作的局面。何长工抓住机会给大家讲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讲革命军以保护人民为宗旨。这支绿林武装的政治面貌逐渐地起了变化，组织纪律性也有提高。

一天,王佐又和何长工提到了如何打尹道一的问题。尹道一的司令部,驻扎在永新东乡的拿山,从那里到茨萍,中间要经过一个山坳,叫旗锣坳。据说,从前井冈山出过一个翰林,这里是举旗鸣锣接翰林的地方。何长工说:“我听说尹道一依仗人多势众,看不起你,每次打仗都是穷追不舍。”王佐说:“正是这样”。何长工说:“我们要利用他的骄狂。明天,你带一支小部队去引诱他,要把尹道一激怒,非追着你打不行;我带一些人就埋伏在旗锣坳,打他的伏击,准能得手。”

王佐深似为然,说:“我和李克昌带人去诱敌,你和刁飞林在旗锣坳打埋伏。”

计议已定,第二天指晓,王佐带人袭击了尹道一的司令部。尹道一仓促组织抵抗,吃了些亏,非常气恼。在王佐撤出战斗时,尹道一怎罢休,带着民国一路猛追,下决心要端了王佐的司令部,以报此仇。

天将中午,追到旗锣坳,已是人困马乏,尹道一下令休息吃午饭,说:“反正王佐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我要杀他个鸡犬不留。”他们正在休息做饭,突然枪击四起,尹道一慌了,心想王佐靠上了革命军,赶紧下令:“我们中计了,快撤!”民国武装哪里经过这个阵仗,四散奔逃,尹道一见已掌握不住队伍,想单身逃跑,刁飞林带人追上去,乱枪把他打死了。为报功,刁飞林还亲把尹道一的人头割下,用包袱包好,打扫战场,收兵回山。

早有报知王佐:“刁二哥把尹道一打死了。”

王佐接过勤务兵端上来的一盏灯,蹲下细看,在人确信无误时,拍了一下大腿说:“着!就是这个贼。

子!就是这个贼子!’,说罢传令摆酒设宴庆祝胜利。山上灯火通宵不熄,如同过年一般。

第二天,王佐派人抬上尹道一的人头,到各村游乡示威,让

受过民团遭害的老百姓也出出气。一连闹了几天。劳苦群众都称赞王佐为民除害。王佐听了美滋滋的尝到了一点当革命的味道。

打这以后,王佐对何长工佩服得五体投地。何长工趁势建议,要成大事业,创大局面,要扩充部队才行。王佐想了想,说,愿和袁文才合兵一处。他还是怕革命军吃掉他,何长工报告毛泽东,毛泽东说,就让袁王部队合在一起编成一个团,先叫他们自己商量,二人都没意见,就合编。

一九二八年二月四日,在宁冈大陇举行了庆祝合编大会。毛泽东到会,宣布袁王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为团长,王佐为副团长,何长工为党代表,徐彦刚为参谋长,游雪程为政治处主任。袁、王带头宣誓:拥护共产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向第一国学习。

一九二八年初,江西军阀朱培德的二十七师,派出第七十九团和第八十团各一个营,由吉安进至泰和,准备进攻万安;接着又以第七十九团一个营进与宁冈新城,对井冈山发动第一次“进剿”。毛泽东在遂川主持召开前委和万安县委联席会议,总结了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和万安农军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提出了“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原则,作为破敌之策。

进占新城的敌军,因为孤军深入,开始还谨慎小心。宁冈县松懈了。二月十八日深夜,毛泽东指挥工农革命军第一团赶到新城,在赤卫队的配合下,由南、北、东三面包围敌人,准备指晓发起进攻,留出西门让敌人逃跑,令第二团在西门外组织伏击。毛泽东说:“这叫围师必阙”,敌人有路可逃,就没有死战的决心;溃逃的敌人是没有斗志的。再遇一伏击,必有全歼。天亮了。敌人像往常一样,在东门外出操。攻东门的一营在第一连

连长员一民的指挥下,一个排子枪打过去,正在做徒手体操的敌兵大乱,有的连枪都没来得及拿就向城里夺路而逃。然后将城门紧闭,准备守城。团党代表何挺颖。

一连长员一民副食战士扛着梯子、背着稻草,跟踪追到东门。转眼间梯子搭上城墙,突击班沿梯而上。接着城门洞里冒出一股浓烟,烧城门的也得手了。一连战士穿过浓烟,冲进城去。攻击门和北门的三营也冲了进来。敌人四处乱碰,企图突围,被消灭一部分;大部分从西门逃出;出城不远,是片稻田,第二团正等在那里,前兵夹击,一场歼灭战就在这片洼地上展开了。打到中午,敌人正规军一个营,一部分民国,外加一个随军县政府,都被歼灭。打死敌营长王国政、靖卫团长李树滋,宁冈县长张开阳被生擒。俘敌近三百人,缴枪四百多支。解放了新城,使宁冈全县成为红色区域。二月二十一日,在宁冈砦市召开了万人大会,处决了伪县长张开阳,成立了宁冈县苏维埃政府,并决定宁冈县政府设在砦市。

宁冈战斗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第一个战斗,是毛泽东在军事上初露锋芒。公正的评论,毛泽东确实是个军事奇才。

从一九二七年十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登上井冈山起到一二八年三月,他保存和扩大了工农革命军,在临近几县重建了中共的组织,发展了地方武装,组织发动群众开始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通过游击战争,建立了茶陵、遂川、宁冈三个县的红色政权,创建了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根据地,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井冈山的红旗树起来了。古希腊科学家、理论力学的创始人种杠杆定理的发明者阿基米德说:“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举起地球。”毛泽东要把中国翻个个儿,他找到了支点,这就是井冈山;他打到杠杆,这就是人民军队。对他的雄才大略,当时没有人能够理解。军事和政治上的

对手蒋介石根本没把井冈山放在眼里；共产党的领导，从中央到省委到特委，都认为这是个错误。然而，毛泽东通向天安门的道路，从这里迈出了第一步，扎扎实实的第一步。

## 21 江书院 会朱德相见恨晚 西乡塘边 见子珍难欲红颜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北伐军第二十军和第二十四师等部两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所以把这一天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起义军由于没有与江西的农民运动结合而南下广东，于十月初在揭阳县汤坑地区遭到优势敌人的进攻而失败。

起义军余部两千多人，在第九军军长朱德率领下从粤北退入湘赣边界地区。一支孤军，一无供给，二无援兵，到处都是敌人，怎么办？到哪里？部队的思想是混乱的；许多人，包括一些中上级军官连续离开了队伍。建制也散了。每天出发前，朱军长照常下行军命令，但是传令兵到哪里去找接受命令的单位呢？有时就站在岔路口，看见个排长，把命令给他看看；看见个班长也给他看看。一路上人越走越少了。十月里，山区的气候已经凉了，起义军还空着单衣，几个月的长途跋涉和连续战斗，已经磨损得破烂不堪了，短裤遮不住小腿，鞋子早已穿烂了。行军常常赶不到村庄。或不敢在村庄里住，露营便成了常事。寒冷、饥饿折磨着人们，拉痢、打摆子的一天天增多，又没有医药治疗，有的人头天在树下和大家偎在一起露宿，第二天早晨就再也起不

来了。

在这黑暗重重、前途茫茫的时刻，朱德以天塔下擎得起的气魄，率领队渡过重重难关。经过战斗领到达天心圩，朱德召开了排以上干部会议，陪同朱德一起在会场出现的是陈毅和王尔琢。等大家坐好，朱德悦：“大革命失败了，我们南昌起义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愿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说到这里，朱德略顿一下，双目如电，环顾全场。大家都痛苦地垂下了头，谁也没有说话，只有风吹竹林，沙沙作响。这时，朱德提高了嗓音说：“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好比一〇五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一九一七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也会有自己的一九一七年的。我们现在还有八九百人，只要有一百人跟我走，我就有办法。”

朱德是四川仪陇人，这年四十一岁，在滇军当过团长、旅长，参加护国、护法战争，后又留学法国、德国和苏联。他的经历和学识，赢得了官兵的敬佩。

有人在下面小声私语：“朱军长有办法，跟他走不会错。”

陈毅是四川乐至人，留学法国，这年二十六岁。原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但他的公开身份是校政治部的准尉文书，是“追”着革命的。这时他以党代表的身份说：“同志们，要受得起失败的考验，做失败时的英雄。我们跟着朱军长，一定能找出一条道路来。”

欲人不疑，必先自信。朱陈在官兵中都是有威望的长官，他们以自己的坚定性，稳住了这支散乱的队伍。到一九二七年十月下旬，混乱的现象逐渐终止了。走的走了，留下来的是淘汰掉泥沙的真金，是最宝贵的革命的火种。在大庾、上堡、文英一带，



部队进行了整编与整训,八百多人编为一个从队,朱德任司令,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下分三个支队,相当于营,下面是大队、中队和班。两挺俄式机关枪和一门八二迫击炮编成机炮大队。陈毅领导整顿了党的组织。为了保存力量,度过难关,朱德利用与滇军将领、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曾是云南讲武堂同学的关系,与范秘密谈判建立反蒋统一战线。滇军在蒋军序列里是杂牌,范石生保持自己的独立想象扩大自己的力量,所以很快谈成了。朱德化名王楷,以第十六军总辩议的身份与范合作,所部编为一四〇团,由朱德兼团长。范石生给发了被服、弹药和经费,部队进驻兴,得到了短暂的休整。

十一月中旬,在上犹县营前与从井冈山下来的毛泽东部第三营取得了联系。营长张子清向朱德陈毅等详细介绍了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和上井冈山的经过,朱德、陈毅非常高兴,立即决定派原在叶挺部工作的上井冈山与毛泽东联系。

十二月上旬,根据中共广东北江特委的指示,朱德率部去支持广州起义。十九日行至韶关,收容了从广州跑出来的二百余人,始知起义已经失败,就在距韶关三十里的犁铺头,有点感想吧!你以到这里来了呢?

何长工说:“我现在改了名,叫长工,从井冈山来,毛泽东派我来找寻南昌起义的部队,我从井冈山到长沙,从长沙到广州,奔波了两个月,才找到你们。你们的警卫真厉害,把我当洋鬼子捆起来了,幸好碰到蔡协民,才给我松了绑。”

这时朱德来了,握手相见之后问:“你干什么工作呢?”

“秋收起义时,我当运党代表,大革命时期是湘西农民赤卫队总指挥。蔡协民是华容县委书记,所以我们认识。”何长工指指身后的蔡协民,好象请他证明似的,简要地作了自我介绍。

朱德详细询问了毛泽东部近况,井冈山的地形、群众、物产

等情况,何长工——作了回答。朱德带着奖赏的语调说:“我们跑来跑去就是要找一个落脚的地方,毛润之还有的这个地方好。我已派润之的胞毛泽覃上山联络去了,如果不发生意外,现在已经到了。”谈完话,已经三点了,招待何长正吃饭,在后派北江特委的秘密交通送他返回。

一九二七年冬,中共湘南特委和湖南省委提议,以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为骨干,在宜章、郴州、耒阳、资兴、永兴五县发动年关暴动。一九二八年二月一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会议,批准了发动湘南暴动的计划。

朱德率部以第十六军一四〇团的名义活动了一个多月,被李济深发觉了,令范石生解决这支造反的队伍,并逮捕朱德。范石生不忘旧谊,秘密通知朱德,迅速率部离开。阴历年前夕

朱德率部来到湖南宜章县境。中共宜章地下县委书记叫胡世俭,带着同族的胡少海找朱德联系。胡少海家是宜章有名的大地主,但他秘密参加了共产党。朱德决定利用胡少海在宜章的社会地位,智取宜章。胡世俭回县放同空气:“胡少爷在一四〇团当了副团长,最近要副食全国回宜章驻防,保护桑梓。”一传十,十传百,几天功夫,县城上下都知道了。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一日(阴历十二月十九日),胡少海骑着高头大马,率先头部队两个连进入宜章。十二日中午,朱德率大队入城,设司令部于女子学校。

傍晚县和杨教斌在县参议会宴请新驻防的驻军长官,二十多位地主豪绅的头面人物作陪。胡少海与营长龙楚、袁崇全带十多个干练的士兵前往赴宴。杨孝斌恭维了胡少海一番。然后请胡副团长讲话。胡少海起立突然宣布:“我们就是共产党!”杨孝斌顿时目瞪口呆。胡世俭派县农委员长杨子达带人闯入宴会厅,当场逮捕了县政府官员和与会的土豪劣绅。与此同时,朱

德、陈毅率部包围了团防局,缴了他们的枪;打开监狱,释放被捕的政治犯和无辜的群众;打开地主的粮仓,把粮食分给了穷苦人民。

一月十三日上午,在县城西门外广场,召开了群众大会,到会群众五、六千人。朱德与群众见面,并发表讲话。宣布成立宜章县苏维埃政府。处决了县长杨孝斌、前任县长黄得珍和团总刘秉钧。

震动全国的湘南起义拉开了帷幕。

朱德将部队政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

一九二八年一月下旬,许克祥率独立第三师来犯,朱德指挥第一师和宜章农军,在宜章南部和广东坪石地区击溃来犯的许军,歼其一千余人,缴获枪炮辎重甚多。二月四日,朱德挥师郴州,歼守敌六个连。二月十日,朱德部主力取耒阳,分兵侧击永兴、资兴,地主武装和土豪劣绅纷纷逃窜。五县起义取得胜利之后,中共湘南特委在宜章、郴州、耒阳、资兴、永必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三月中旬,湘南苏维埃政府在永兴成立。同时,将宜章农军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邝墉为师长,邓宗海为党代表;郴州农军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师,邓允庭为师长,蔡协民为党代表;资与农军成立独立团,团长李奇中,党代表袁三汉;永兴农军成立警卫团,团长尹子韶,党代表黄克诚。三月八日,将宋乔生率领的桐子山工农游击队三百余人编为特务营。至此,湘南起义的农民武装发展到八千余人。

朱德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在湖南冲共组织的配合下,与湖南农民运动相结合,发动了湘南起义,建立了五个县及临近地区包括一百万人口的苏维埃政权,进行土地革命,扩大人民武装,使湘南各县迅速赤化,大大震惊了湖南、广东两省的统治者。湘粤

两省军阀的反扑是必然的,战斗是不可避免的。湖南特委采取了成熟的以策,提出“紧壁清野,烧尽郴(州)宜(章)大道两侧五里内民房,不给敌人半点东西。”这种愚蠢的政策,朱德在军内抵制了,但地方执行了,后果严重。敌人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在郴州策动暴乱,在动员大会上,当场杀害了县委书记夏明震(夏明翰的哥哥)和县苏维埃委员长李才佳,还有一些中共党员和干部被杀害。朱德闻讯后,派陈毅率一个营到郴州,纠正那些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左”倾盲动主义的做法,控制了局势。

三月底,湘粤两省统治者,组织七个师的兵力,分南、北两路向湘南进攻,加上‘左’倾盲动主义在群众中引起不满,工农革命军在湘南站不住了。朱德决定除留一部分地方武装继续在湘南坚持斗争外,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共万余人退出湘南,向湘、赣边界的井冈山转移。

三月上旬,湖南特委代表、军事部长周鲁来到井冈山。他在领导人会议上说:“秋收起义没有按照原计划攻打长沙而把队伍拉上井冈山,这是严重的错误,现在我宣布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临时政治局地毛泽东等人的处分决定:

湖南省安员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应撤销其现在省委委员资格,彭公达同志应开除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并留党察看半年,毛泽东同志为八七紧急会议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收暴动政策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作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特委认为:前委右,烧杀太后,没有执行使小资产变无产,然后虽迫他们革命的政策。特委决,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井冈山部队编为第二师,取消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党委,以何挺颖为书

记,毛泽东改任为第二师师长。”

何挺颖当场提出异议,他说:“我不能胜任。你们这么搞组织手续也不当,怎么一个特委的特派员可以把前委书记撤了呢?”周鲁的回答是:“我代表特委,特委代表省委,省委代表中央,中央代表国际。”说得大家目瞪口呆。毛泽东故作轻松之态,他说:“军旅之事,未当学也。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凑成诸葛亮。我们这么多干部,大家当师长,大家当参谋长,我这个师长就好当了,也不悉打不好仗。”周鲁见毛泽东接受了新任命,立即下令将井冈山的部队调往湖南,与湘南起义军一起割据湖南,粉碎湘粤两省敌人对湘南的进攻。第二师离开以后,井冈山根据地平原地区随即被江西国民党军占领。

遵照湘南特委的命令,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在水口誓师开赴湘南。到酃县后,得悉湘南起义已失败,敌军正追击向井冈山转移的湘南起义军,即令袁文才、何长工率第二团向资与方向前进,接应湘南起义部队;亲率第一团至汝城,阻截敌人追击。

三月中旬,毛泽东率第一团到达植东县沙田村。由于极‘左’政策的影响,加上敌人添枝加叶的宣传,群众纷纷逃避。于是,在沙田万寿密召开垒师部会议,规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同时,决定组织宣传队,宣传工农革命军为工农谋利益的革命宗旨,号召农民起来,打土豪,分田地。三月下旬,毛泽东率部离开沙田,向汝城进发,途中歼灭地主武装何其朗部,然后向北,经土桥、田庄到达汝城,阻遏广东来敌,掩护朱德部从郴州向井冈山

撤退。

袁文才,何长工率领第二团,在去资兴的路上接到了从郴州撤出的邓允庭率领的农军第七师。他们配合作战,在出口和第十六军某部打了一仗。何长工听说陈毅与特委机关在资与城里,人城与陈毅及湘南特委领导人会面。何长工说:我们以资兴城来掩护你们到公庙,然后往井冈山撤,他是老相识,问道:润之同志什么时候到?”何长工说:“你不要着急,隔一两天就来了。”杨福涛和国团特委书记席克思商量后,拒绝上井冈山,提出要上衡阳。陈毅劝他们说:“杨福涛同志,你头脑要冷静,你们男女老少几十口子,东西南北口音,靠几支短枪能闯过民团的关卡吗?”何长工说:“要冷静,”你们男女老少几十口子,东西南北口音,靠几支短枪能闯过民团的关卡吗?何长工说:“你们现在要到衡阳,无疑是自投罗网。我的意见还是跟我们上井冈山为好,以后,再设法化装分批送你们走。”杨福涛却发了脾气说:“我是湘南特委,到你井冈山干什么!”席克思也说:“共产党员应该不避艰险,湘南特委躲上井冈山这是可耻的行为。”

军队不能把党和团的特委机关扣下不让走,陈毅、何长工无奈,只好送他们上路。陈毅是个心直口快的人,路上又说:“杨福涛同志,你们这一去肯定凶多吉少,就这样白白牺牲两个特委,将是我党历史上一个很大的踞。我们没说服你们心里感到很沉痛,说句不吉利的话吧,不如先给你们开个追悼会再走;毫无疑问,敌人现在已经红了眼,你们肯定会被抓住砍头的。”好说歹说,均无效果,他们还是奔衡阳走了。后来,到耒阳,安仁边界,被民团抓住,统统牺牲了。

陈毅率湘南农军第三师、第四师和第七师,与袁文才、何长工的第二团在资与会合后,经彭公庙到达沔渡是,朱德率领由南昌起义余部编成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自郴州出发,经永兴、耒



阳、安仁、茶陵已先期来到了沔渡。袁文才、何长工率第二团提前赶回耒市，为大军安排住处。四月中旬，朱德、陈毅率部到达耒市。袁、何把朱德、陈毅接到龙江书上。随后毛泽东率第一团在汝城完成掩护任务，经土桥、田庄、青腰圩、中村、水口，到达龙溪，在龙溪中洞遇到了萧克率领的宜章县黄沙区五百多名揭竿起义而起的农军组成的梭镖营，一起到达耒市。

四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与何挺颖

等主要干部来看望先期到达耒市住在龙江书院的朱德。早有人通报进去，朱德、陈毅、王尔琢等走出书院大门迎接。在行进中可长工告诉毛泽东：“站在最前面的那们，就是朱德同志，左边是陈毅同志，朱德身后的那位是王尔琢同志。”快走近书院时，朱德抢先几步迎上去，毛泽东也快了脚步，早早把手伸出来。他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使劲地摇着对方的手臂，是那么热烈，又那么深情。英雄惜英雄。二人都有相见恨晚之感。进到室内，毛泽东把带来的干部向朱德一一作了介绍，朱德也把主要干部向毛泽东一一作了介绍。

毛泽东带着赞扬的口吻说：“这次湘粤两省的敌人，竟没能整倒你！”朱德说：“我们转移得快，也全靠你们掩护。”一阵寒暄之后，毛泽东提议：“趁‘五四’纪念日，兄弟部队和附近群众开个热闹的联欢大会，两方面的负责同志和大家见见面。”朱德微笑着首肯。毛泽东转头对何长工说：“你负责大会的准备工作，要多发动些群众来参加。”礼仪性的会见完成之后，转入毛泽东和朱德单独会谈。部队的合编，领导干部的配备等等，要两支部队的主要的领导人交换意见，拿出方案来。

四月下旬毛泽东、朱德共同主持，召开两支部队连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两军会合以后的改编问题，确定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又召开了中共第四军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四军军



委，毛泽东常选为书记。

五月四日，召开了朱毛两部会师大会。在苍市东边的草坪上，用木板和竹竿抬起了主席台。周围插着数十面红旗。会场上有两条醒目的标语：“庆祝两以革命军队胜利会师！”“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到会万余人，尽是“揭竿而起”的英雄、锣鼓喧天，十分壮观。

十点正，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登上主席台。大会在威武雄壮的军号声中开幕。由陈毅主持会议，朱德、毛泽东都讲了话。毛泽东宣布了工农革命军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作为全军的守则，又规定了国的三太任务：一、打消灭敌人；二、打土豪筹款；三、做群众工作。

第四军成立时，按照湘南特委指定：“朱任军长，毛任党代表，朱部编为第十师，毛部编为第十一师，湘南各县农军编入两师中，朱兼十师师长，宛希先任党代表；毛兼十一师师长（本任张子清，因他受伤毛兼代），何挺颖任党代表；另一教导大队，陈毅任大长。”（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给中央的信）两师下辖六个团，番号自二十八至三十三，全军约万人。

第四军组建以后，紧张的战斗立即开始。比较起来，毛泽东更长于作政略和战略上的运筹，他把战役战斗的指挥交给朱德，这样的分工也很名正言顺。朱德是久经沙场的宿将，战场指挥是驾轻就热的事情。五月五日，他指挥第二十八团和第二十九团，采取声东击西、集中兵力歼敌一路的战术，在遂川黄坳歼灭赣军第二十七师第八十一团一个营。六日，在遂川县五斗江战斗中打垮第八十一团。接着乘胜追击，先后击溃第二十七师另一路第八十团和第七十九团。七月，占领永新，粉碎了赣军对井冈山的第二次“进剿”。五月中旬，赣军第二十七师和第七、第九师各一个团共五个团，对井冈山旋动第三次“进剿”。第二十

七师师部率第七十九团和第二十七团一个营进占永新，主力近四个团南渡禾水河，企图由龙源口进攻宁冈。朱德率部主动撤出水新，在城西七十里处的小西江地区待机。在得想敌军主力巴南渡禾水河的情报后，挥师东进，沿禾水河北岸奔袭永新，途中，在草市坳与出永新西进的敌第七十九团遭遇，朱德指挥第二十八团从正面发起攻击，第三十一团一个营向敌。

侧后迂回，经两小时激战，全歼该师，击毙敌团长。这时，敌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强有一个营的战斗兵守城。十九日，朱德率部再克永新，全歼第二十七师师部和临时配属该师的二十七团一个营，师长杨如轩逃跑时被击伤。龙源口地区之敌四个团惶惶向吉安撤退。这一仗，朱德以四个营的兵力歼灭敌

人一个师部、一个团另一个营，缴获山炮两门、迫击炮七门、枪三百多支（挺），银元二十余担，以及大量弹药和一部分被服、医药，粉碎赣军第三次“进剿”。

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由二十三人组成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宛希先为副书记，统一领导军队和根据地的斗争。毛泽东出任特委书记后，第四举军委书记改由陈毅担任。五月下旬，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在宁阿茅坪成立，主席毛泽东，副主席袁文才。

五月底，因给养严重短缺，由耒阳、郴县、资兴、永兴的农军编成的第三十、三十三团被遣送回乡，取消师的建制，军部直辖四个团：第二十八团（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团长王尔琢，党代表何长工；第二十九团（宜章农民编成），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第三十一团（秋收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团长朱云卿，党代表何挺颖；第三十团（井冈山袁、王旧部），团长袁文才，副团长王佐，党代表陈东日。全军共六千余人，两千条枪。（据一

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杜修经给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

六月十六日,根据湘敌较强、赣敌较弱的情况,毛泽东提出了‘对湘取守势,对赣取攻势’的作战方针。中旬,赣军以第九师师长杨池生为总指挥,集中第九师、第二十七师共五个团的兵力,对井冈山举行第四次“进剿”。湘军第八军第二师也由平江调到攸县威胁井冈山根据地的西侧。六月二十一日,在宁冈新城召开红四军军委扩大会议,讨论破敌方案。毛泽东和朱德都出席了会议。决定避强击弱,对湖南吴尚部取守势,集中兵力打击江西二杨。会后,朱德率部撤出永新,遇到根据地中心区域宁冈;令第三十一团(欠一营)佯攻湖南酃县,钳制第二师。杨池生以为红军主力远出湖南,率部进占永新后,以三个团分两路进犯宁冈。二十二日分别进至龙源口和白口。令两个团从永新县白口向永新,宁冈境老七溪岭进犯:一个团从龙源口向新七溪岭进犯。

二十三日上午,朱德指挥第二十九团和第三十一团第三十一团第一营抢占新七溪岭制高点笠月亭,战斗中朱德的军帽被子弹打穿。玉尔琢率第二十八团攻占老七溪岭制高点,尔后直插龙源口,切断进攻龙源口之敌的退路,与第二十九团前后夹击,全歼进攻新七溪岭之敌一个团,将进攻老七溪岭之敌两个团击溃,第三次收复永新城,缴获步枪四百多支,重机枪一挺。战后,根据地人民赞扬说:“毛委员坐镇井冈山,朱军长指挥打胜仗。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指第九师师长杨池生和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

龙源口大捷后,井冈山根据地已经拥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和酃县东南部。这是井冈山根据地全盛时期。

红军第三次攻下永新后,毛泽东有“大力经营永新”的计

划。一支支工作队派到永新各个乡。工作队的任务是；组织和训练工农暴动队，筹粮筹款，进行土地革命，建立中共组织和政权组织。贺子珍按照组织的决定，带着一支工作队，来到西乡塘边村。塘边是永新一个比较大的村庄，由大屋、塘边等四个自然村组成，有一百多户人家，五百多口人。在一打永新后，贺子珍曾陪同毛泽东来到这时，进行分配土地的调查研究。二打永新后，这里开始了土地革命。塘边分田的工作，在永新进行的最早。它是按照毛泽东制定的分田政策进行的，按人口平分，肥瘦搭配，抽多补少，大概每人平均分到三亩五分田。贺子珍这次到塘边村，还像第一次来时一样，住进一个贫农老婆婆家里。这个老婆婆住的是原来村里一个恶霸地主的房子。第一次打下永新后，镇压了这个恶霸，把他的房子分给了这个老婆婆。房子一共四间，右边连着三间，左边一个单间。贺子珍来了就住在左边的单间里，老婆婆和儿媳住在正房里。过了几天，毛泽东带着一个警卫班也到了塘边村，工作队“安排”他住在老婆婆的正房里。老婆婆高兴地把正房让出两间来让毛委员住。毛泽东提出开几个调查会，请工作队帮助安排。贺子珍主动地承担了这个任务。毛泽东不仅在塘边村作了深入的调查，还到附近的村庄去作调查。每次都是贺子珍帮助组织安排。每天晚上毛泽东都要油灯下工作到深夜，在这里他写下了《永新调查》。

在频频的接触中，毛泽东与贺子珍相爱了。贺子珍是永新县人，一九〇九年九月生。父亲贺焕文，中过举人，这安福县县长；母亲杜秀、广东梅县人，读过书，聪明俊秀。后因父亲丢了官，又入基督教会办的小学读书，“五四”以后接受了革命思想，转入修水女子学校学习，富有反抗精神。一九二五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六年加入共产党。一九二六年九月，北伐军开入永新，她以跨党分子的身份参加国民党县党部工作，任县党

部委员兼妇女部长，成为水新的风去人物。那年她十六岁，中等身材，洁白皮肤，秀气的瓜子脸，在又长又弯的眉毛下，是一只闪烁着刚毅光辉的大眼死过两个敌军官。秀美的容貌，刚烈的性格，百发百中的枪法，三者在她向上实现了和诸的统一。侠骨柔肠造成了她婚姻的喜剧和悲剧。她嫁给了毛泽东，又失去了毛泽东。自从在步云山和毛泽东握手之后，这位比她大十六岁的毛委员，便成为她心目中的英雄，开始是尊敬，后来是爱慕。毛泽东表面上是一种大丈夫漫不经心的姿态，但他们之间自自然然地接近，都是毛泽东不露形迹的巧妙安排。

一天，贺子珍外出工作归来，和往常一样轻手轻脚走进毛泽东的房间，见毛泽东正伏案写作。贺子珍倚在门框上，深情地注视着毛泽东，想了想很久默诵了多少次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毛泽东停住笔，要吸一支烟，转头见了贺子珍。初恋的姑娘，眼睛是会说话。毛泽东是过来人了，从贺子珍的眼神里，不需对方表白，他知道了一切。巧妙地安排，多日的等待，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时机成熟了。他拿把竹椅，让贺子珍坐下，自己吸着烟，短暂地沉默了一会儿，主动开口了：“你是个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欢你。我你对我的一片深情。但我要告诉你，我三十四岁了，结过婚，有妻子和三个孩子，她们都留在湖南老家了。秋收起义失败，我带队伍上井冈山以后，给农里去过一封信，但没有接到过回信。关山阻隔，也不知道她们是死是活，湖南的反动派抓到共产党就杀头，听说还指名抓我的妻子杨开慧，有的说她被捕了，有的说她已经不在人世。这些你能理解吗？”

贺子珍双颊绯红，低着头，静静地听着。抬头见毛泽东在等待她回答，想好了的一些话涌上心头，轻轻地说：“你为了革命，抛妻别子，孑然一身，我愿意照顾你的生活。”

永新的工作告一段落，他们的感情水到渠成了。回到茅坪，

贺子珍和自己的知己谢梅香(袁文才的妻子)诉说衷曲。谢梅香祝贺她,说:“女人总该有个归宿,毛委员是大人物,跟了了你会幸福的。”在袁文才和谢梅香的操办下,他们结婚了。贺子珍亲手为毛泽东缝了几个口袋,毛泽东出门必带的几样东西:笔、墨、纸、砚、洗漱用具,各得其所,使用非常方便。从此,行军、作战,毛泽东都把这个挎包背在自己身上。

茅坪的攀龙书院本是地主豪绅为教育本族子弟建造的学堂。“攀龙”就是效忠皇上的意思。书院有一种两层楼的普通砖房,为了光线明亮,在屋顶上用明瓦镶嵌了一个八角形的图案,所以取名八角楼。这在茅坪是取好的房子了,因而成了毛泽东和朱德的“官邸”,毛泽东夫妇住在楼上,朱德夫妇住在楼下,其余的房子由警卫班和炊事员住。八角楼前,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茅坪河。对面,是一片长得很茂盛的枫树林。毛泽东常常在工作之余或饭后,到河边和树林里散步、思考。对于上井冈山这件事情,中共党内同志还有许多微词;能不能长期占得住,追随者还有疑问:至于将来的前途大家更是茫然。必须在理论上回答:我们上井冈山,不能亡命者避难,也不是败“落草”。许多人把我们和梁山好汉相比,但我们和梁山好汉是不同的,必须让人们承认,井冈山的道路是马克思列宁的。在八角楼里,在如豆的灯光之下,他开始了理论上的创造。

## 22 昌进湘南 杜修经导引哗变 起义平江 彭德怀率部上山

一九二八年六月下旬，毛泽东与贺子珍到了九陇山区。这是稍有逊于井冈山的又一处军事根据地，永新县委就设在这里。一天，毛泽东的住处来了解一位不速之客，约有三十多岁，高个，人很消瘦，身后带着个警卫员。来人自我介绍说：“我叫杜修经，是湖南省委派来的，这里有省委给你的信。”说罢，撕开内衣上的一块补丁，取出信来。毛泽东招呼他和警卫员坐下，接过信来细细地看。信的大意是说省委制定了第二次湘南起义计划。要朱毛率红四军主力毫不犹豫地以郴州为中心的湘南发展，开辟新的区域，以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

毛泽东把信看完，放在桌上，脸色阴沉地说：“我不同意省委的意见。我们刚打开永新，需要巩固这块根据地，目前不宜分兵湘南。永新是个很富的县，再把莲花、遂川、宁冈这几个县建设好，可以就地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用不着把部队拉到湘南去筹办给养。”

“这是省委的决定。”杜修经也不让步。

“省委的决定也可以讨论。这么大的事情，我个人决定不了，还是开个会大家来讨论吧。”毛泽东提议开会，请杜修经也参加。

六月三十日，湘赣边界特委、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委在永新城



召开联席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陈毅、宛希先、王尔琢、刘珍（永新县委书记）和特委、军委、县委的委员们。毛泽东主持会议，他讲了这次开会所要研究的问题，掏出省委的信来说：“省委的信是六月二十日写的，要求我们‘留下二百条枪’守山，朱毛率主力‘杀出一条血路，向湘南资兴、耒阳、永兴、郴州一带发展，以造成四县的乡村割据，对衡阳取包围形势。’”正要说几句引导会议的话，杜修经站起来说话。

“上次湘南暴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后因为武装都上了山，扫动派杀了我们的回马枪。湘南是富庶之乡，与其在井冈山割据，不如同湘南割据，只要我们打回去，必会出现革命形势大发展的局面。”

听杜修经一讲，与会者有些心地动。

有的说：“井冈山太穷了，养不了大部队，应该向外发展。”

有的说：“湘南比较富，我们去打一仗，发个洋财再回来。”

毛泽东见会议走了方向，忙表明态度：“现在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时期，湘南的敌人比较强大，我们去是冒险，搞不好会失败的。光想到处流动，到处找食吃，是流寇思想。他对着杆修经说：“若执行省委指示，四军有可能被敌消灭，井冈山也得丢掉，建议省委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朱德说：“当初湘南暴动如果能久占，我们就不上山了。那里交通便利，湖南、广东敌联合对付我们、现在去湘南是要吃亏的。毛朱一发言，又把会议方向给扭过来了。最后决定不去湘南，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深入开展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但湖南省委的指示在部队中特别是在宜章农军组成的二十九团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七月上旬，湘赣两省统治者约定对井冈山进第一次“会

剿”。七月十四日，潮南第八军第一师和第二师由茶陵、酃县侵占新城。四军委快定：毛泽东率第三十一团在永新地区相机打击由新进占永新之敌；朱德率第二十八团和第二十九团进攻酃县、茶陵，威胁敌人后方，以“围魏救赵”之法，调动敌人回糖。七月十三日，朱德率部攻克酃县。十四日，进占永新之湘敌果然回头，经莲花撤回茶陵。朱德见目的已达，遂决定向永新靠拢，会同第三十一团，对付即将来犯错误的江西敌军。这时，随军行动的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附和第二十九团官（该团百分之八十是直章人）欲回家乡的情绪，导引部队向湘南冒进。营长朱仙峨带着一些人围着朱军长坚决要求回家，说是：“军长，给得我们假日，忙过秋收，我们立即归队。”“我们离家一转眼就是一年了。树随山栽，人随田转，我们要请假回乡秋收。”春起秋头，累死水牛。这个时候不回去，一家老小怎得活哟！他们借口湖南省委有指示要向滞南发展，召开团士兵代表会议作出决定由酃县去湘南。士兵委员会本是朱毛建立起来用以反对军阀主义，军官打骂士兵，监督管理伙食的群众组织，这时竟发展成为极端民主化，不听长官招呼，擅自行动。第二天，士兵委员会传令开往湘南。朱德出来讲话：“你们要革命，就要听军长的命令。”有的战士就嚷起来：“军长带我们回湘南去，回宜章去。”朱德说：“二十八团不去，二十三陵九团行吗？”二十九团是个农军团，没确二十八团，是不敢单独闯湘南的。朱德就指着特务边说：“你们特务连是听命令的，特务连先走，同沔渡去。”特务连长执行命令，立即率领全连出发了。特务连一带头，一营、二营、三营都按次序向东走。有人思想不通，骂骂咧咧的，骂归骂，还是跟着队伍走。到了沔渡，本来问题已接近于解决，杜修经又出来鼓动，支持士兵委员会要问湘南的意见。王尔琢和他吵起来，杜指着王尔琢说：“是你听省委的，还是省委听你的？”逼着开军

委会,会上杜修经以省委代表的身人分压服朱德。第二十九团官兵在下面吵,和杜修经相呼应。带这样一支尚不能做到令行禁止的队伍,有时就得迁就。十七日,朱德传令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团由酃县沔渡出发,同往郴州。二十四日进攻郴州击溃敌第十六军两个团。当日黄昏,在敌反扑下,被迫撤出郴州。这时,第二十九团多数官兵自由行动,跑回宜章家乡。团长胡少海收拢近百人,随军部和第二十八团向桂东转移。三天以后,箫克把他带的那个连拉回来了。第二十九团大部散失了。在资兴,朱德令第二十八团第一营营长袁崇全率本营和机关枪连、迫击炮连为前卫。袁崇全率部企图摆脱团部控制,从资兴市田圩出发一气向东南走了一百七、八十里。六连连长李见林、党代表赵尔陆,机关枪连党代表何笃才感到情况不对,就去问营长是往哪里走?袁崇全答:“是胡子(指朱德军长)的命令。”李见林等跟他要命令,他说是口头命令。李见林、赵尔陆等心思,当前卫不能跟大部队失掉联系呀!越发怀疑,约定六连、七连、八连和机关枪连夜半在来路集合,一调头就走向一百三十里,第二天中午四个连归队了。八月二十三日,朱德率部在桂东和毛泽东所率前来接应的第三十一团第三营会合,决定经赣南崇义、上犹返回井冈山。但行至崇义县境,听老百姓讲前面三十里思顺墟有红军二三百人,有三门大炮,团长王尔琢一定是五连和炮连,就和党代表何长率林彪当连夜去追,一直追到思顺墟,天快亮了,见有一所房子,王尔琢就喊:“喂,前边是二营吗!我是团长王尔琢,和党代表来接你们来了。”恰好叛徒袁崇全在房里,一排子弹打出来,当场把王尔琢团长打死了。王尔琢是湖南石英钟门县人,黄埔一期毕业,死时才二十五岁。袁崇全带少数人跑了,五连和迫击炮连随何长归队。不久,第一营营长林彪因在七溪岭等战斗中作战勇敢,指挥得力,受到毛泽东、朱德的赏识,被提

升为第二十八团团长。

九月八日，朱毛率部返抵井冈山南麓之黄坳。面对的形势是严峻的。赣敌第十四旅占领了宁冈新城和永新，独立第七师五个党进占遂川，第二十一旅和第三十五旅，盘踞在泰和、吉安、安福、莲花；

湘敌第八军三个师在修县、茶陵、酃县、桂东一带布防，两省国民党军对井冈山形成包围的态势，进行第二次“会剿”。

毛泽东和朱德决心仍采取对湘敌取守势、对赣敌取攻势的方针，利用根据地内线作战地利人和的条件，集中兵力，避强击弱，忽南忽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九月十三日，一战遂川城，歼赣敌独立第七师一个营，俘敌百余人；十月一日二战宁冈新城，歼赣敌第十四旅第二十七团一个营；十一月九日，三战龙源口，重创赣敌第二十七团。连战连捷，共俘敌五百余人，缴枪四百余支，基本上恢复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原有地区。两省国民党军被迫转入守势，第二次“会剿”即被打破。这个期间驻桂东沙田的湘军营长军占支和驻江西樟树镇的赣军营长张威各率所部起义，编为四军特务营和独立营。

十月四日至六日，在宁冈步支山白支寺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昔日绿林好汉的“忠义堂”变成了边界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会场，当年马刀阴首领袁文才、王佐也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了会议，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支以农民为主体的队伍政治的变化。毛泽东是大会的灵魂。他多日思考的问题已经条理化、理论化了。他说：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被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第一，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

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仅仅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小块。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机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生悲观的情绪。这是没有找出这种红色政权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正确的解释的缘故。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第二,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和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所以广州产生过三天的城市民众政权,而海陆丰、湘东、湘南、湘赣边界、湖北的黄安等地都有过农民的割据。至于此刻的红军,也是由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和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分化出来的。那些毫未

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毫未接受过工农影响的军队，例如吕锡山、张作霖的军队，此时凝决然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红军的成份来。第三，小地方民众政权之能否长期地存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继续地向前发展，而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停顿，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是不可能的。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附庸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换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所以难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第五，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除了上述条件之外，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以上是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中的一段。没有革命理论便没有革命运动。这些思想是对井冈山道路的最初说明。毛泽东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信仰者、追随者和支持者不是偶然的，他不仅是政治家和军事家，而且具有思想家的魅力。

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二届特委会委员，共十九人，除在军中任职的毛泽东、朱德、陈毅、宛希先、何挺颖、袁文才、王佐外，



还有谭震林(前任代理特委书)、龙超清(宁冈县委书记)、朱昌偕(永新县赤卫队党代表)、刘天千(即刘珍,永新县委书记),国盘珠(茶陵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谭思聪(茶陵特区区委书记)、李欲非(酃县县委书记)朱亦岳(莲花县委书记)、陈正人(遂川县委书记)、谭兵(酃县)、王佐农(遂川)、杨开明媚湖南省委特派员,以谭震林为书记,陈正人为副书记。

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中共中央写给毛泽东、朱德的信,经过曲折的地下交通送到井冈山时,已是十一月二日了。信中批评了湖南省委和湘特委“虽然连陷十余县,但始终只做了一些烧杀的工作,甚至主张烧毁城市”。指出“你们的任务就是在湘赣或赣粤边界以你们的军事实力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而推进湘鄂赣粤四省暴动局面的发展。”“关于你们的军队,你们可以正式改称红军”。因此,我们写历史时从一九二八年六月份起就称第四军为红军了。事实上“红四军”、“朱毛红军”的名称十一月以后才叫响。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结事后。

中央对四军前委的指示,纠正了湘南特派取消前敌委员会、撤销毛泽东前委员书记的错误,信中说:“中央认为有前敌委员会组织之必要,前敌委员会名单指定下: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等五人组织,而以毛泽东为书记。前委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同时即是最高苏维埃的军事委员长员会),以朱德为书记。”“前委所管辖的范围,当然由环境决定,暂时可包括:永新、宁冈、遂川、万安、茶陵、攸县、酃县,所有这一区域内的工作完全受前委指挥。”

十一月六日,在井冈山召开了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央六月四日来信。会议认为中央指示切合井冈山地区的实际情况,根据中央指示,前委由毛泽东、朱德、谭震林(前委所在地



党部书记)、宋乔生(愿为水口山工人)、毛科文(农民代表)五人组成。从此,毛泽东以前委书记的名义领导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成为井冈山根据地党、政、军名副其实的第一把手。

十二月十日,袁德怀率领平江起义的部队七百余人的到达井冈山。

袁德怀,原名袁得华,号石穿,湖南湘潭人,一八九八年(戊戌年)旧历九月初十出生于一个小自耕农家庭。六岁读私塾三年,从《三字经》、《百家姓》念起,一直读完《论语》、《大学》、《孟子》、唯独没读四书中的《中庸》,所以他一辈子不懂得中庸也道。八岁那年,母亲病逝,父亲有病不能劳动,家中还有八十多岁的伯祖父,七十开外的祖母,三个弟。小弟半岁,母死后不到一个月就饿死了。老的老,小的小,家中无以为生,先典押八亩山坡地,又卖掉几间茅草房,家中用具。床板察凳,变卖一空。艰难地熬过两年。

得华十岁那年,正月初一,家里无米下锅,带着二弟彭德华第一次出去讨饭。讨到油麻一个姓陈的教书先生家,主人问:“是不是招财童子?”得华回答:“是叫化子。”金华乘巧,赶紧大番瓜说:“是招财童子。”主人给了他半碗,一片肉。兄弟俩黄昏才回家,一进门得华就栽倒地上。弟弟说:“哥哥,一天没吃东西,他饭晕了。”

伯祖父名五十老倌,当过太平军,给得华讲太平军有饭同吃,土地平分,女人放脚等故事,幼小的得华萌生了打富贫为天下穷人找出路的思想。

十岁到十二岁,得华给一家当农放牛。十三岁到十四岁,到黄碛岭土煤窖做童工。

十四五岁这一年湘潭大旱。饿民自发闹粃,吃大户,彭德华也参加了。团防局派人来捉他,得华离级背井逃到湘阴县西村

园做堤工。

一九一六年三月，彭得华当了兵。部队的番号是湖南陆军第二师三旅六团一营一连。师长陈复初，旅长陈嘉佑，团长鲁涤平，营长刘，连长胡子茂。彭德怀由二等兵、一等兵、副班当到班长。一九二二进制年五彩缤纷月，因在区逐张敬尧的宝庆战役中作战勇敢，升任排长。一九二一年七月调三营十一连代理连长。驻防南县注滋口。当地恶霸地主欧盛钦，仗着哥哥野餐

恒惕督军署少将高参，横行乡里。贫苦农民姜子清因稻田笨地被霸占，向彭得华诉说苦情。彭得华对恶霸地主有本能的仇恨。当晚，派班长王绍南带两个弟兄，由姜子清领路，到欧盛钦家，把欧盛钦杀了。欧高参闻讯大怒，面秦督军赵恒惕。越恒惕传下话来，叫团长袁植重办彭得华。十一月底，团长派特务排长徐某带一班弟兄逮捕了彭得华，押往长沙督军署。士兵同情彭得华，悄悄地把绑他双手的绳子解开，让他跑了。

彭得华到了易家湾，投奔郭得支家。郭是彭当兵时第一个班长，现退伍回家作皮匠。为人仗义，仇恨贪官、军阀、地主豪绅。住了。一晚，为了安全，又的把彭得华转移到湘潭城外一个菜园内，这是郭得支的外甥李桂生家。怕彭寂寞，郭得支送来《水浒》、《三国演义》和一部《资治通鉴》。彭本是个闲不住的人，但避难至此，不敢出门，认真读起书来。那时他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接触到，脑子里想的是杀富济贫一类的事情。彭得华的经历很像《水浒传》里面的英雄。过了十来天，郭得支带队伍上的好友李灿、张荣生、黄公略来探望。司令部文书李灿说：“杀恶霸事，督军署下了一道通缉令，文官衙门照转了，第二师司令部只批存案，根本未转。”桂生上街买了猪肉、鲜鱼和一瓶米酒招待大家。这几个人都是彭得华的知心朋友，过去一起议论过组织团体的事情。席间，彭得华提议组织救贫会，将平日交

谈的意见归纳为四条,作为救贫会章程。这四条是:

第一、灭财主,实行耕者有其田;

第二、灭洋人,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

第三、发展实业,救济贫民

第四,实行士兵自治,反对笞责,体罚和苛扣军饷,实行财务公司。

这四条当然还很幼稚。那年彭得华才二十三岁呀!讨论时大家是严肃认真的,认为这就是救国救民的纲领。一致通过后,推举郭得支拟成条文。

不久,欧高参因贪污被撤职查办。对彭得华的通缉令无形中撤消,彭回乡种田。一九二二年夏。黄公略、李灿先后来信,相约去投考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彭犹豫有旧,张荣生以探家为名前来,说:“救贫会员和连上弟兄都希望你进讲武堂学习,以后好回连上来。要实行灭财主和洋人,还是要搞军队,李灿和其它救贫会员都是这样看的。他们推我前来,催你前往。”彭志遂决。八月去长沙考试被录取。因有杀恶霸遭通缉一案,改名彭德怀。黄公略也考取了。彭在一班,黄在四班。学习一年,一九二三年八月毕业。毕业后回到二师六团一营一连任连长。此时二师师长是鲁涤平,十月,鲁涤平摩部经衡山、永州入桂转粤,投靠孙中山。一九二四年四月,自供江经宝庆、湘乡回驻湘潭。彭德怀代理营长,在所属各连秘密发展了救贫会会员。

北伐开始,唐生智所辖第八军进入长沙,将原湖第二师改编为第八军一师,师长周盘;第六团改为第一团,团长由第二营营戴吉阶升任,彭德怀免掉代字,任第一营营长。随即进入湖北作战。团攻武昌时,一团参加进攻武昌城南门的战斗,与团攻通湘门的叶挺独立团并肩作战。攻克武昌后,第一师归三十军军长

何键指挥,受命经孝感向当场追击吴佩孚残部。周盘师长命彭德怀率一营进占宜昌与当场之间的玉泉山截击逃敌,师政治部秘书长(共产党员段德昌同往。

彭德怀率一营赶到玉泉山,直军已通过该地北去,就宿玉泉寺。这玉泉寺规模宏大,古柏苍松,令人有出尘之感。相传这是关支长显圣处。彭德怀与段德昌在关公塑像前,席地而睡,相谈甚深。

“你对关支长有何想?”段德昌问

“关公是封建统治者的工具,现在还被统治阶级利用作工具,没什么意思。”彭德怀借着月光直视关二爷的金身,作了这样的批评。

“你要怎样才能意思呢?”

“为工人农民打天下才有意思。”

“你以为国民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现在不是每天都在喊着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行二五灭租吗?我认为应当实行耕者有其田,而不应当停留在二五减租。”

段德昌见谈得投机,话就说得深了,他与奋地坐起来说:

“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也不应当停留在耕者有其田,而应当变生产资料私有帛为公有帛,由按劳分配发展为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帛制。共产党是按照这样的理想而斗争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已实行按劳分配,消灭阶级剥削。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党员就是要为这样的理想社会而奋斗终身。”

沉默有顷。

段问彭:“加入国民党了吗?”

彭答:“没有加入,我不打算加入。”

“为什么？”

“你看现在这些人，唐生智、何键等等，都是军阀大地主，还以信佛骗人；何键刘还卖鸦片烟，同洋人勾结。这些人连二五减租都是要反对的，哪里会革命呢？”彭见段没答话，趁势问道：

“国民党中央党部情形如何？”

段德昌直言相告：“蒋介石、胡汉民、孙科、宋子文、戴季陶等等都是些假革命、反革命。”这次谈话对彭德怀出一个杀富济贫的梁山好汉式人物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第一师在当场未停留，一团在玉泉山也未停留，翌日继续前进。经应城、皂市渡汉水，沿途无战斗，十二月下旬到达宜昌。

一九二七年元旦，彭德怀召开了他的秘密组织——救贫会会员大会。在家乡的郭得支已经病逝，军中会员八人都参加了。彭德怀把段德昌的谈话向大家作了传达。然后讨论会章。大家认为原来的四条不能完全适应新的情况，重新订了六条：

一、拥护孙总理遗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二、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三、打倒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行减租减息，逐步实现耕者有其田；四、国民革命军应当官兵平等，废除笞责、体罚，组织士兵委员会，实行士兵自治，自觉管理军风纪，不赌博，不强奸妇女，不扰民；五、反对苛扣军饷，实行经济公开，士兵有阅读进步书报的自由；六、士兵委员会有权逮捕反革命分子押送革命军事法庭，并有陪审权。

除了通过六条章程外，还通过了一个进行政治教育的口号：

“吃农民的饭，穿工人的衣，吃饭穿衣是工人农民给的，我们要为工人农民服务！”

规定早晚点名，吃饭站队时，先喊这个口号。

为了更广泛地团结组织士兵群众。决定在各连建立士兵委员会,作为救贫会的外围组织。

还以夜校形式举办营的训练班,主要请段昌给大家讲课,灌输新的革命思想。

一九二七年一月下旬,第一师随三十五军开回湘北,彭德怀率一营驻慈利县城。三月的一天,驻石英钟门之战斗垣旅打死该县江垭区农民协会常务委员,引起农民协会的强烈反抗,在戴旅司令部门口大操场上举行追悼大会,要求观者惩办凶手,抚恤死者家属。彭德怀率全营官兵参加了大会,彭还讲话表示对农民运动的支持。何键得悉彭营官兵参加了追悼大会。告第一师师长周盘注意彭的言行,问彭是不是共产党员?周答是国民党左派。何说:“搞个二等整金局给他。”周说:“他不搞钱。”

那时候,国民革命军里面真是五花八门,什么名堂都有。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三月中旬在临沔举行佛法大会,要求准尉以上军官都去行受戒礼。周盘以老长官的身份关照彭德怀说:“去一下吧,信不信由你。”彭说:“我信仰三民主义,反对封建迷信。”结果一营一个军官也没去。

五月中旬,第一师奉命开岳阳。十七日,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于宜昌叛变进攻武汉。武汉政府派叶挺部迎战独立十四师。第二天有电话通知彭德怀到师部接受任务。彭见到周盘师长,周说:“四川杨森部约三五个团进占监利、朱河、白河、新堤,有配合夏斗寅进攻武汉之企图。命你率第一团团团长戴吉阶请假如到城陵面一线隔江倦动,牵制江左之杨森部。”彭德怀率一团到城陵河没有佯动,而是隐蔽集结,筹集船只,乘黄昏时渡江,一举攻占江左之白儿。该地系湘江与长江的汇合点,水面宽阔,完全出敌意外。彭率部登岸,杨森部被击溃,向朱河方向退却。彭率部追出二十里而还。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武汉武府决定东征讨蒋。一九二七年六月，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下令所都夹长江东进，第八军主力和三十六军沿长江南岸，第三十五军和第八军第一师沿长江北岸，进至芜湖、合肥、蚌埠线，遭蒋军迎击，全线败退。第一师为江左后卫，彭德怀为代理团长，率第一团为最后掩护部队。何键的三十五军经汉口退往湘西北。彭德怀建议周盘师长率第一师走小路回南县、华容、安乡、摆脱何键的控制，周同意了。八月底，从汉口经监利、监埠渡长江到达华容。师部和第一团团部、第一营驻南县县城。一九二七年九月底，周盘召见彭德怀，说：“老师长跑原四连连长）接任一营营长。第一师教为独立第五师，团的番号不变，今后归鲁涤平指挥，摆脱何键的控制。”

彭德当了团长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反对南县成立清乡委员会。马日事变后，湖南的白色恐怖是异常严重的。各县都在组织清乡委员会、清乡团，对工农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青年学生滥捕滥杀。南县的地主豪绅为了反攻倒算，首先拉军队支持。他们给独立师师长周盘送万民伞，送重礼，请吃花酒。一天，彭德怀也收到一张堂班宴、名妓作陪的帖子，他在帖上批了“无耻”二字退回。驻军长官这种态度使南县的清乡委员会到九月底还没成立起来。后又酝酿在十月十日双十节这天成立，给驻军长官发了请帖。周盘借故去了长沙，彭德怀约集救贫会成员，吩咐准备大量标语、传单，和农民协会学生会联合，在十月九日一个晚上贴遍南县城乡：

“打倒土豪劣绅！”

“清乡委员会是反革命机关！”

“打倒清乡委员会！”

十月十日一早起来，地主豪绅莫不大惊失色，有的当天就逃



到长沙去了。一直到一九二八年彭团离开南县时，清乡委员会也没有成立起来。

十月十二日，中共南(县)华(容)安(乡)特委代褒张匡来到彭德怀团部，说明党考察他这几年的表现，决定发展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十二月下旬，救贫会会员、比彭先入党的张荣生告诉他：“省委已批准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今天黄昏后，特委张匡同志前来为你举行人党仪式。”彭德怀才知道他的秘密团体救贫会里面早就有了共产党。彭德怀入党后，张匡代表特委指定彭为支部书记，支部成员有邓萍(一营营部文书)、张荣生(团部传令排长)、李光(和持委秘密交通员，公开身份是彭德怀的勤务兵)。后又发展李灿、李力加入中国共产党。有了党支部，救贫会即停止了活动。

独五师要办随营学校。周盘自兼校长，要彭德怀推选副校长主持常务。彭德怀说：“你不是送黄公略到黄埔高级班深造，他担任这个职务很合适。”一九二八年二月中旬，黄公略由广州回到南县，与彭德怀、张荣生、李力等相见，大家非常高兴。因黄早就是救贫会的核心成员，彭德怀等无所避讳，什么都讲了。谈到打倒新军阀时，黄问：“谁是新军阀？”彭德怀说：“当然是指蒋介石。”黄公略突然变色说：“我们蒋校长怎么会是新军阀呢？”这一句话声音不大，但像爆了一颗手榴弹，在坐的人面前相觑，彭德怀定下神说：“公略呀？我们多年好友，你上黄埔一年多，跟了茨是石，咱们走的不是一条路了，你难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吧。”说罢示意张荣生动手。张荣生顺手抄一条白毛巾，先捂住黄公略的嘴，然后就把脖子勒住了。几十秒钟过去，黄公略脸变得熬白。李力说：“绞死他，今晚沉到南县河里去来迹。”这时，黄公略用手指着皮鞋后根，被邓萍看见了，就说：“先松一下，他好象有话，跑不了的。”黄公略脱下了一双鞋，光喘气

说不上话来,示意把鞋后跟拆下来。邓萍打开一看,是中共广东省委的介绍信。大家又是一惊,不知说什么好。半小时后,黄公略才缓过来,脸上有点血色了。彭德怀说:“你这是干什么?开这样大的玩笑!”黄公略说:“你现在当了团长,谁知你是真革命假革命?”喝了口水又说:“还有黄纯一同志一道来的,在外面伙铺里,请派人接他进来。还有贺国中同志,候补党员,请到伙铺查一下他到了没有?”这一场活剧弄得大家啼笑皆非。黄公略给大家讲了广州起义失败后,广州杀人之多之惨,以及路过上海、汉口、岳州,到处是白色恐怖,旅、饭店都写着:“休谈国事、宽饮自乐。”的告白解释说:“不是不相信老朋友,没点警惕性要掉脑袋呀?”有人开一笑说:“你警惕性高,差点把你沉塘。”大家都笑了是一种沉重的苦笑。

三天后,随营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师长周盘亲来主持,宣布黄公略为校长,贺国中为教育长,黄纯一为大队长。

一九二八年四月底,中共特委代表张匡指示成立团党委,彭德怀为党委书记,随营学校成立支部,黄公略为支部书记。

五月初,全师开往平江。师部直属队,一团的一、三营驻县城;

二营驻城南四十里的思村;第二团驻城北五十里至南江桥一线;第三团驻东乡长寿街、彭义镇一带;随营学校驻岳州。

原平江驻军阀仲儒旅、制定了一个清剿计划,五师、阎旅、民团一齐出动,推周盘为总指挥,准备五月十日后动手。彭德怀及时通知地方党,作应变的准备。

七月十八日彭德怀亲自到二营讲话,关照保护中共地下党和群众。恰在这时,营长陈鹏飞有亲戚从长沙来,说昨天长沙破获了共产党,发现有随营学校黄公略签名的通行证,周盘认出了笔迹。陈鹏飞很着急说:“我们同公略都是讲武堂同学,团长想

法救救他。”彭德怀立即策马赶回平江县，直奔电报局，局长说：“有电报给你，还有一份是给师部的。”彭说：“我正要去师部，一起交我带去吧。”遂把两封电报都拿回来了。一封遇叶盘亲信马弁陈玉成（救贫会员）打给彭德怀的。彭有陈玉成抄给的密码，很快就译出来了，大意说：“南华安特委负责人在长沙被捕，供出内公略是共产党，尉认出公略签发的通行证，发专电子表要李副师长立即捕公略、纯一、国中三人，别人尚无牵连。”

这时黄纯一在县医院住院。遂以探望黄病为名，党员都到了黄的病室，有邓萍、张荣生、李灿、李力、李光、彭德怀，中共省委特员腾代远也来了，举行紧急会议。

彭德怀说：“现在没别的办法，只有暴动，一点也不能犹豫，犹豫就会失败。”

张荣生说：“一营工作有氢握，士兵仇视反动县政府和清乡委员会。”

李力说：“特务连和机枪连也是如此。”

黄纯一前不久调任九连连长，从病床上坐起来说：“现在白天县政府和清团不敢杀人，更不敢在枯树坪杀人。大家对团长还有埋怨情绪，说为什么团长不出来干涉这样的事？”彭德怀说：“这只是你们九连吗？”黄纯一说：“不，十连、十一连、十二连也不相上下。”

张荣生说：“枯树坪杀害农民及青年学生的惨状，三营弟兄愤慨阻拦杀人的情况，通知了一、二营、特务连、机枪连，就是没有通知师特务营。”

彭德怀说：“今晚召开士兵委员会，布置闹饿呈现个月未发饷了，从三月超只预支两元。闹饷最能发动群众，是我们发动起义的主要手段。由秘密到公开，争取营、连、排长参加或同情，也可以说团长同意这样。只有闹饷，才能冲破师特务营这个堡垒，

团结全团绝大多数人,才能有效地防御二、三团可能的进攻。”

经过商量决定:七月二十二日(阴历六月六日)下午一点乘午睡时间起义具体分工:特务连连长李力负责组织特务连和机枪连,派出代表向师特务营串通闹饷;起义时看住特务营。二连连连长李灿和傅令排长张荣生负责领导一营并串通二营闹饷,争取营长和各连长的参加或同情;张荣生并负责组织团部和二、三两团留守人员闹饷。

李光当晚前往嘉义镇,给到任不久的三团三营长黄公略送信,通知他二十一日下午一时起义。派席洪全送信给贺国中(黄公略调任后赞主持随营学校),立即带随校全体开来平江。中共省特派员腾代远负责与地方党联系配合行动,并指导邓萍起草传单、布告、标语、口号等。

彭德怀亲自部署消灭民团、清乡团、警察署,释放犯错误人,解决师部人员,逮捕反动分子。关于起义后的番号,腾代远提议:“井冈山朱毛红军叫红四军,我们叫红五军吧。”大家一致同意。彭德怀提议留腾代远任红五军党代表,报省委批准。一切布置妥当,彭德怀以副师长李慧根的名义拍一密电给在长沙的师长周盘:“砥公师座巧电奉悉。三人已遵示逮捕,随校已令开来平江,请勿念。”把周盘稳住了。

七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时,彭德怀召集全团军官会议。扣押一批不参加起义的军官;十一时全团在东门外天岳书院大操场开会,起义官兵都在脖子系上红带子,作为标志。彭德怀带领大家宣誓,宣布全团起义。下午一时开始行动,到两点多,民团、清乡队全部缴枪,未打一枪控制了全城。部队方面,副师长,参谋长逃往长沙,也没有组织的抵抗。

平江城气氛骤然一变。国民党的党旗、国旗都不见了,满城红旗飘扬。标语、传单到处贴。商店照常营业。从监狱里放出

来的人自动组织起来游行、示威，捉反动派。地主豪绅有的逃跑了，有的藏起来不露面了。农民协会的积极分子又活跃起来。

七月二十四日上午士兵委员会召开关联席会议，推举彭德怀为红五军军长兼十三师师长，滕代远为党代表，邓萍为参谋长，下辖一、四、七团，第一团团团长雷振辉，党代表李灿；第四团团团长陈鹏飞，党代表黄公略；第七团团团长兼党代表黄纯一，贺国中为副团长。全军两千余人。成立红五军军委，滕代远任军委书记。

下午四时，中共平江县委召集群众大会，到会人员过五万人，盛况空前。宣布成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临时革命法庭，处决了民愤很大的反动分子。缴获的武器武装农，成立了农民自卫队。

平江起义后，先是湘敌来攻，后又有湘鄂赣三省的“会剿”，彭德怀率红五军转战于平江、修水、铜鼓、万载之间，与敌人打圈子，给了敌人一定打击，但在平江长寿街、黄金洞和万载大桥等地作战中失利，重要干部、共产党员张荣生、李力、黄纯一英勇牺牲；雷振辉、陈鹏飞叛变。部队减员到七百多人，编为五个大队。十月，红五军和湘鄂赣边一些县的游击队合编为三个纵队，总兵力近千人。在跳出三省敌军的合击圈以后，根据湖南省委的指示，以黄公略率第二纵队留在湘鄂赣边区坚持游击战争，彭德怀、滕代远率一、三纵队七百余入于十二月十日到达宁冈，同朱毛红军会师。

在苍市，彭德怀会见了朱德。

第二天在茨萍，毛泽东与彭德怀会见。毛泽东高兴地握住彭德怀的手说：“你也走到我们这条路上来了。”从此，彭德怀一生荣辱和毛泽东连在一起。

## 23 指导六大 斯大林功过参半 游击两省 毛泽东星火燎原

一九二九年一月四日至七日，毛泽东在宁风县柏露村召开前委、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和湘赣边界特委联席会议，传达刚收到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

中共“六大”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召开，出席大会正式代表八十四人，候补代表三十四人，代表党员四万多人。

会议之前的六月九日，斯大林同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等谈话，由中山大学学生、“六大”翻译室主任王明担任翻译。斯大林说：“目前，我们不能说中国国命已经处于高潮。革命高潮是将来的事，而不是眼前的事。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最重要的结果，是创造红军。如果能够把参加农民运动的人们争取过来，并且集中部队打下几个城市，那末，这将对今后局势有更大的意义。”斯大林这次给中国革命“指引方向”的谈话，是第二次和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根源。李立三也罢，王明也罢，都是想“打下几个城市来向斯大林邀功请赏，结果，适得其反，他们自己身败名裂，还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

中共“六大”是在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下召开的。大会一开始先由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作报告，题为《世界革命的形势与中共的任务》。加上翻译的时间他一共讲了九个钟头。在报告

中他点名批评瞿秋白和张国焘,说他们都是大知识分子,不能当领袖,要让工人干部来代替他们。还批评朱毛红军在井冈山进行的苏维埃运动,认为是没有前途的。红军只能人发散存在. 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的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他要高级干部离开红军,调朱德、毛泽东到苏联学习。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共“六大”的领导也有正确的方面,这表现在“六大”决议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确定。

“六大”决议是瞿秋白起草,米夫(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和布哈林修改,最后由瞿秋白定稿的。在“六大”以前,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在中共党内思想是混乱的。“六大”政治决议案指出:

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时革命为“不断革命”也是不对的。因为,(一)国家真的统一并未完成,中国并没有从帝国主义铁蹄之下解放出来;(二)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并没有推翻,一切半封建余孽并没有肃清;(三)现在的政权,是地主、军阀、买办、民族资产阶级底国家政权,这一反动联盟依靠着国际帝国主义之政治的经济的威力

所以革命出前的目标,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中国革命现时的骨干,它的基础及中心任务是:

一、驱逐帝国主义者,达到中国的真正统一。

二、微底的平民式的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实行土地革命;中国底农民(小私有者)要将土地制度之中的一切半封建束缚完全摧毁。

这两个任务,还并没有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范围之外



可是必须用武装起义的革命方法，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地主军阀及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政权，建立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苏维埃的工农民主专政，然后才能解决这两个任务。

三、因此中国革命现在资产阶级性民主阶段上的第三个任务，已经就是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这是引进广大的劳动群众参加管理国事的最好的方式，也就是实施工农民主专政的最好的方式。

六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由十四人组成，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林、张国焘七人为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七人为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八人组成，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五人为委员；李立三、徐锡根、杨殷三人为候补委员。向忠发被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当作是中国无产阶级的象征，当了中央政治主席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习惯称为总书记）。向忠发这年四十九岁，湖北汉川人，原在汉阳兵工厂做工，后来当水手和码头工人，一九二三年入党。

毛泽东在没有出席“六大”的情况下，被选为中央委员。毛泽东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发展了“六大”路线的正确方面。直到一九四九年以前，他在与党内反对派作斗争时一直是高举“六大”的旗。

传达文件之后，会议还讨论了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井冈山根据地军民在准备反对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第三次“会剿”期间，面临着敌军封锁造成的严重的经济困难。会议决定：朱毛率红四军主力挺进间射击，在外线实施机动作战；彭德怀率红五军并指挥红四军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坚持内线作战，以内外线相配合，粉碎敌人“会剿”。

一月十四日，根据柏露会议的决定，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

军主力(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特务营和独立营)共三千六百余人,从小行洲出发,经遂川县的大汾、左安向赣南进国。红四军出发以后,就遇到了一场南方少有的大雪。由于地温高,雪花落地便融化了,道路非常泥泞。战士们浑身上下湿漉漉的,穿着单薄的衣衫,有的连鞋子都没有,赤着脚行军,许多的脚被冻裂了,渗出的血水印在雪地上,给是也发生了严重的困难。原来,朱毛认为,大部队下山后很快会得到补充,就把收集副粮食大部分留给守山的部队了。赣南山区比较偏僻,人烟稀少,有时部队走两三天都找不到一个村子。而且,这一带群众,受国民党宣传的影响,对红军很害怕。即使路过村庄,群众都逃了,仍然买不到粮食,找不到向导。有时部队一天都搞到东西吃,只得饿着肚子行军。

一月十八日,红四军进占赣粤交界的大庾。赣军第五师师长兼第十旅旅长刘士毅、第二十一旅旅长李文彬率部尾追到此。因当地无群众组织,敌已迫近朱毛红军,他们尚不知晓,仓促应战,战斗失利。第二十团党代表何挺颖、独立营营长张威,在掩护军部撤退时牺牲。毛泽东和朱德等领导人突围脱险后,在距大庾四十里的杨眉收集整理部队。为了尽快甩掉敌人,毛泽东和朱德决定,连夜出发。他们不显激战后的疲劳,立即上路,摸黑走了二三十里,来到一个山沟,下令在山沟里宿营。为了不暴露目标,不准点火做饭,战士们吃点干粮,饿着肚子等到天明。

第二天拂晓,红四军以急行军的速度,一口气跑了九十里,傍晚他们来到广东南雄的乌迳。队伍没有进村,就在野外宿营。刚刚做了顿饭吃,侦察兵来报告,敌人追上来了。于是,立即转移,连夜渡过桃江,经过信丰转到安远。

二月一日晚上,红四军来到寻乌县的吉潭,在一个名叫圳下的小村庄宿营。军部设在村庄中间的文昌祠,为防敌人突袭,令

第二十八团在边警戒,第三十一团在右边警戒,独立营和特务营在军部附近的小河边。第二天早晨,追兵刘士毅部两个旅四个团包围了圳下。敌人兵力多。武器好,弹药足,从四面八方发起猛烈的进攻,紧缩包围圈,红四军被压缩到狭长的田垌中,无法充分发挥战斗力,终因寡不敌众,被敌人分割成几块,不得不各自夺路突围。朱德率独立营和军部机关从另一个方向突出冲围。但却走进了敌人的埋伏圈,左冲右突,拼死战斗,大部分牺牲了。朱德手提机枪率警卫班且战且退,跑出十几里路,与大队会合时身边只剩下三名战士了。

朱德的妻子伍若兰与朱德失散以后,被敌人俘虏了。她在受尽酷刑折磨以后,于二月十二日在赣州英勇就义。死后头被割下来,挂在城门上示众。伍若兰是湖耒阳人,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大革命时背叛富有的家庭投身革命,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湘南暴动时与朱德结婚,她高挑个儿,性格爽朗,朝气蓬勃,动作敏捷,能文能武,长于演讲,枪也打得好,是个典型的巾帼英雄。朱德每每出去作战,她都追随左右,从不留在后方,是朱德的好伴侣、好战友。朱德一辈子酷爱兰花,就是对品格高洁、英勇就义的伍若兰的永久的怀念。

二月三日,红四军前委在寻鸟县境罗福嶂召开会议,总结战斗失利的教训,研究面临的形势,决定向赣南转移。

会后,朱毛红军经福建武平和江西会昌,来到瑞金城南的谢坊。自下山以来,一直处在连续的行军作战中,同上级的联系中断,长期看不到报纸,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是“两眼漆黑”。他非常需要搞到一些近期的日报,从中了解全国形势和敌人动向。

毛泽东把副官长宋裕和找来,说:“给我一个连,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

“什么任务？”宋裕和问。

“进瑞金城去抢报纸，最近一个多月的报纸，上海出的，南京出的，江西、福建的日报，全要。”

收集整理报纸，是贺子珍的一项工作，但她现在怀孕，身子很沉了。当她听说毛泽东要派人进瑞金城搜集报纸时，仍然坚持要中。理由是“我知道你最需要什么报纸。”

毛泽东点点头，说：“好吧，行动要特别小心，快去快回。”

宋裕和带了一个连悄悄摸到瑞金城门口，突然打出一排枪，撂倒把守城门的哨兵；接着又甩出几颗手榴弹，炸死一些守城的敌兵，城门也炸坏了。守城敌军以为红军来攻城了，吓得慌忙逃跑。宋裕和带着红军战士进了城。

他们一进城，便兵分两路，宋裕和带一个班去县政府，贺子珍带一个班去邮政局。连长率本连的主要力量负责警戒掩护。邮政局的工作人员以为要打仗，放下工作都跑了。贺子珍见柜台上、墙角里堆满了各地的报纸和邮件。贺子珍指挥一个班战士，跟她挑报纸，特别是上海的《中央日报》、《申报》、天津的《大公报》以及江西、福建出的省报，注意日期，尽量搜罗齐全。

躲起来的守城敌军官冷眼观察，见进城红军不足百人，后面并没有大部队，立即又集合部队反扑。贺子珍等正在往褡包里塞报纸，塞不下又捆了一大捆，刚要撤，外面哨兵和敌人接火了。她立即带着大家冲出来。宋裕和担心贺子珍的安全，指挥战士们把文件、报纸捆了儿大捆，早就撤离县政府，指挥战士们掩护贺子珍撤退。他们且战且退，直奔城门口。刚出城门，只见约有一个排敌军开过来。这是刘士毅派出的侦察排，枪声把他们引到了瑞金城，后面就是刘士毅的大队。

宋裕和指挥连主力抢占有利地形击敌人，让贺子珍率一班战士带着报纸文件回军部。贺子珍将抢报纸历险的经过对毛泽

东讲了。毛泽东立即找朱德商量,认为敌人发现了我们,须立即转移。鉴于伍若兰被俘的教训,毛泽东对贺子珍说:“我和朱军长商量了,决定向大柏地转移,你身体不方便,先走一步吧。”说罢就到朱军长那里去了。

贺子珍把报纸分门别类整理了一下又捆好,交给了警卫员,叫他妥善保存。这时枪声又响了。贺子珍把自己的青棕马拉过来。这次下山,虽然分给她一匹马,但她从来不骑,让警卫员来驮东西。这次突要骑,一时竟找不到马鞍子,抓住马鬃抓上马背,用腿一夹马肚子,向大柏地方向疾驰而去。

正在寻找红军踪迹的敌军见有一骑向北跑去,就在后面开了几枪。有两个敌人也上了马紧追不舍,边追边打枪,子弹嗖嗖在贺子珍左右飞过。贺子珍伏在背上以缩小目标,同时从腰际把手枪拔出来。她有意放松只腿,让马跑慢一点。跑了一段,追兵的马蹄声愈来愈近,她回头一看不到二十来了。敌兵看清轮廓是个女红军,更加大胆放肆地追上来,边追边嚷,夹杂秽言,好象是叫后边一个快赶上来,活捉这个女红军。贺子珍打开扳机,从左边转过身去,一枪就撂倒了一个;另一个敌兵从右边后方抄过来。右手握枪打右后方的目标是很不得劲的,贺子珍伏在马背上反手瞄准,又是一枪,把右边的追兵也打落了马,贺子珍骑着马一气跑了四十多里,到达大柏地附近之黄柏墟,全身都湿透了,恰遇军部派出设营的先遣人员,心里才踏实了。从此,贺子珍百发百中左右开弓的威名在红军中传开了,赢得了红军上下的钦佩。

过了一些时候,大队到了。毛泽东见到贺子珍平安无事,打趣地说:“你没有死呀?”

贺子珍笑着回答:“死不了,可肚子真饿了。”

警卫员插话:“贺大姐,还给你留着饭呢。”说着从褡包里掏

出一个搪瓷缺子，用一条白毛巾包着。贺子珍接过来打开，是一缺子白米饭，上面有一层卤米，常用的一把搪瓷勺也在里面，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第二天是农历腊月三十。敌刘士毅部还在后面紧追不舍。大柏地东西两边峰岭相连，树木茂盛，中间是一个凹形狭长地带，只有一条石径小路通往外面。毛泽东和朱德见这一带地形有利，就召开排号：“消灭刘士毅，杀敌过新年。”

二月十日，刘士毅部进入朱德的伏击域，朱德指挥部队发起战斗，打了天，将敌十五旅两个团大部歼来。俘敌团长萧致平、钟恒以下八百余人，缴枪八百余支。因两团长混在士兵中没查出来，又跑掉了。大柏地战斗，扭转了红四军下山以来的被动局面。在黄柏墟休整了两天，缴获的银元和各种物资不少，火腿、腊肠、香烟、美酒等，原是刘士毅准备犒赏部队过年的东西，这下都“慰劳”了红军。

击破刘士毅部队以后，李文彬又尾追不舍。十三日，朱毛率部人宁都，经东固、永丰、乐安，于三月四日占领广昌，九日，又折回瑞金壬田，十日开往闽西，转了这样一个圈子，甩掉了尾追的敌人。十一日，抵福建长汀四都镇。

三月十三日，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一个团向红四军发起进攻被击退。十四日，朱德指挥红四军向长汀城南长岭寨二混旅主阵地反击，歼散两千余人，击毙旅长郭凰鸣，乘胜攻占长汀，缴获各种枪五百余支，追击炮三门，炮弹百余发，并夺取了一个拥有新式缝纫机的军服厂和两个兵工厂。朱德立即下令军服厂赶做军服数千套，不久，红四军全体官兵都上统一的灰色新军服。

在长汀，朱毛对红四军进行整编。全军三千多人编为三个纵队，每个纵队约一千二百人，五百余支枪。第二十八团编为第

一纵队，纵队长林彪，党代表由陈毅兼特务营和独立营编为第二纵队，纵队长胡少海，党代表谭震林；第三十一团编为第三纵队。纵队长伍中豪，党代表蔡协民。

一路经过村镇、县城，到处张贴《红四军司令部布告》。这张布告，四言龙文，通俗简明，易懂易记，一看文风便知出自毛泽东的手笔。布告全文是：

红军宗旨，民权革命，赣西一军，声威远震。  
此番计划，分兵西进，官佐兵夫，服从命令。  
平买平卖，事实为证，乱烧乱杀，在所必禁。  
全国各施，压迫太甚，工人农民，十分苦痛。  
土豪劣绅，横行乡镇，重息重租，人人怨愤。  
白军士兵，饿寒交并，小资产者，税捐极重。  
洋货越多，国货受困，帝国主义，哪个不恨。  
国民匪党，完全反动，口是心非，不能过硬。  
蒋冯阁奉，同床异梦，冲突已起，军阀倒运。  
饭可充饥，叶能治病，共党主张，极为公正。  
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送。  
增加工钱，老板担任，八时工作，恰好相称。  
军队待遇，承须改订，发给田地，士兵有份。  
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  
累进税法，最为适用，苛税苛捐，扫除干净。  
城市商人，债珠累寸，只要服从，余皆不论。  
对待外人，必须严峻，工厂银行，没收扫并。  
外资外债，概不承认，外兵外舰，不准入境。  
打倒列强，人人高兴，打倒军阀，除恶务尽。  
统一中华，举国称庆，满蒙回藏，章程自定。  
国民政府，一群恶棍，合力铲除，肃清乱政。



全国工农，风发协奋，夺取政权，为期日近。

革命成功，尽在民众，布告四方，大家起劲。

军长朱德

党代表毛泽东

蒋介石英钟及闽赣军阀小看了朱毛红军，认为是一支“梁山好汉”式的队伍，轻蔑地诬之为“共匪”。其实，如果仔细研究一下这个布告，便知朱毛红军不仅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明的纪律，而且有民众革命的完整纲领和实现这个纲领的具体政策。红军“剿”不灭，共产党杀不完，是有深刻的社会根源的。就以闽西来说，据龙岩、永定、上杭、连城、长汀、武平六县调查，田地平均百分之八十五在收租阶级手里，自耕农所有田地平均不过百分之十五。各县田租最低百分之六十，长汀百分之七十，连城南乡高至百分之八十。这可见农民要求土地之迫切，农民投红军，跟共产党，冒杀身亡家之祸而不悔，其目标完全在于土地。国民党代表农村地主阶级和城市资产阶级，共产党代表农村贫苦农民和城市工人阶级，共产党必然要兴盛，国民党必然要失败，全部根据就在这里。朱毛红军走一路撒一路火种，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在鞭闽两省地区眼看成燎原之势。

三月二十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讲座今后行动方针。决定利用蒋桂战争即将爆发的时机，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

四月一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第一、二、三纵队抵瑞金，与红五军会合。自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以后，彭德怀指挥红五军和红四军第三十二团与围山“进剿”的敌人三个旅激战四昼夜，打退敌人多次进攻，一月三十日，黄洋界、八面山阵地失守，彭德怀率五百余人向赣南突围，于三月底到瑞金，两国会合

后,决定将红五军和红四军第三十二团改编为第五纵队,纵队长王佐,政治部主任何长工;

湘赣边界赤卫队改编为第六纵队,贺国中为纵队长,曹荣为政治部主任。彭德怀以红四军副军长名义指挥越两个纵队。

四月三日,接中共中央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给毛泽东、朱德并转湘赣边特委的信。来信指出:“中央依着六次大会的指示,早就告诉你们应有计划地有关联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现时情况离未大明,但你们的主力确已离开井冈至赣南。”“中央决不是要你们采取失败主义的精神将红军遗散回乡,而是要你们在适宜的环境中(即是非在敌人严重的包围时候)可能的条件下(依照敌人的军力配置和我们武装群众的作战能力与乡土关系),分编我们的武装力量散入各乡村去。部队的大小可依照条件的许可定为数十人至数百人,最多不要超过五百人(自然这不是太死板的数目)。”信中还说:“中央依据于目前的形势决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因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既大,徒若敌人更多的注意,分编更多不便。”

五日,红四军前委在瑞金举行会议。讲座中央来信。会后毛泽东起草了《前委致中央的信》,回信说:“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济南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

“此次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因我们的部队是集中的,领导机关前委和负责人(朱、毛)的态度是坚决奋斗的,所以不但敌人无奈我们,而且敌人的损失大于他们的胜利,我们的

胜利则大于我们的损失。宁都和汀州三役的胜利，地头蛇郭刘二旅完全消来了战斗力，使赣南闽西西藏自治区方致有现在这群众发动成绩。无部队集中。指导机关健全，决办不到。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到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马列主义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井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欧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如打纳，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发动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这封信，总结了三年济南战的主要经验和战略战术，把中央的一些大顾虑一一解除了。关于朱、毛离的问题，回信说：“中央若因别的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的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得来，那是胜过我们的。”

四月十一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讲座下一步行动计划。会议决定：彭德怀率部回赣江以西恢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朱毛率部在赣江以东发动群众，建立赣南革命根据地。

三十日，毛泽东、朱德率部攻克宁都县城，歼守敌五百余人，活捉敌团长雷世宁。当红军战士把这位雷团长带来见朱德的时候，朱德和左右的参谋人员显得有些惊愕，带上来的是一个又短又瘦，萎靡不振的人。

“有三十个小老，还夸口要把我的头挂在宁都城墙上的家伙原来就是你？”朱德喝道。

俘虏唯唯，惶恐而狼狈，不知如何应对才好。

“听着！”朱德继续说：“我们本来该枪毙你，但只要你服从命令，就可以饶你一条命。你在石英钟城的家里，存有许多步枪、机关枪、军需品和银元，你已经有五个月没给你的部队发饷，把这些军火、银元、大米送到我们这里来；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张药品单子，你想办法派人到大城市去买。只要把这些事情一一办到，我们就放了你。”

雷世宁立即写信，由他的勤务兵送到他石城家中。过了几天，他的大老婆坐着肩舆，随带夫役车推肩挑运来大批物资，到宁都为丈夫赎身。三个月以后，红四军正在福建作战，他大老婆又派送来了所需的药品。红四军履行诺言，给雷世宁开了通行证，把他释放了。

因桂系军阀在蒋桂战争中失利后，与粤军第五军军长徐景唐联合反蒋，蒋介石央钟调闽西军阀陈国辉和闽南军阀张贞率部开赴广东东江地区，与徐景唐作战。五月十九日，趁闽西、闽南空虚，毛泽东、朱德率部从瑞金县武阳越过武夷山，再次向闽西进军。二十三日攻春龙岩，歼守敌两个营大都，俘虏二百余人；后主动撤出，二十六日占领永定。六月九日，红四军前委决定将闽西长汀、永定、上杭、龙岩四县的地方武装改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纵队长傅柏翠党代表李力一。十日，红四军进抵连城新泉附近休整。十七日陈国辉第一混成旅返回龙岩。十九日拂晓红四军乘敌不备突袭龙岩，迅速突入城内，除陈国辉只身脱逃外，该旅两千余人被全歼。

红四军攻克龙岩后，贺子珍分娩了，生了一个女婴。孩子刚生下，毛泽东就托人为孩子找到一个寄养的人家。他对贺子珍说：“把孩子寄养出去，今天我们只能这样做。我们以后会回来的。等到革命胜利了，我们再把她接到身边。”贺子珍隐忍着心中的巨大痛苦点点头，没有说什么。她是个刚强的人，不愿意让

毛泽东为这些事情多操心。

后红军主动撤出，毛泽东没让贺子珍马上随军转移，因为不久要回来，他安排贺子珍隐蔽在城外一个可靠的人家，让她多尽几天做母亲的责任，和自己的头胎女儿多呆几天。贺子珍带着孩子一共生活了二十多天。二克龙岩后，分别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她狠狠心，亲自用小被把婴儿裹好，送到联系好的大嫂家里去。她没有什么衣物给孩子留下，只给了大嫂五十块银元，说：“麻烦你的把孩子抚养大，日后我会回来接她的。”毛泽东回来见孩子不在了，问起这件事，贺子珍回答得很爽快：“我送走了。”毛泽东拍了一下她的肩头，算是赞许。谁知道这一次竟是与女儿的永别。一九三〇年四月，红军再次打下龙岩，毛泽东按照贺子珍的讲述找到那户寄养孩子的人家时，得到的答复是：孩子已经不在人世了。毛泽东的这个女儿，连个名字也没有留在人世上，就这样夭折了。

## 24 顾金大局 陈毅光明磊落 拥毛贬朱 林彪别有用心

朱毛两都会师于井冈山之后,开始阶段,毛泽东和朱德都有相见恨晚之感。惺惺惜惺惺,英雄惜英雄。有毛泽东在政治上和战略上挥斤运斧开拓道路,有朱德在军事上铁马金戈创立基业,共产党和红军作为一种社会势力引起了世人的瞩目。蒋介石所害怕的不是莫斯科的那些中国布尔维克,而是江西的朱毛红军。

但毛泽东和朱德都不是人圣超凡的神仙,也不是与世无争的隐士,而是有血性有个性的革命活动家。毛泽东具有领袖人物的才具,是个不能居于人下的人。朱德具有三军统帅的禀赋,叶少将旅长如敝履,独辟蹊径,来到井冈山,也不是为了当一个配角。时间长了,两个人谁当家,谁说了算的矛盾,总会暴露出来。组成红四军的官兵来源各不相同,有的来自北伐军,有的来自农民军,有的来自绿林英雄。同是北伐军又有这个部队那个部队之别,同是农民军又有秋收起义和湘南起义以及这个县那个县之分。所以建军初期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派系成见和地方观念。大而别之,则有拥毛拥朱两派。从南昌起义到湘南暴动一直跟随朱德奋斗的,爱戴朱德。秋收起义随毛泽东上井冈山的,以及袁王旧部,则把毛委员君作们的领袖。毛泽东欢迎朱部上山,是想扩大井冈山的力量,增加一员得力的军事助手。朱德愿

意上山,是想找一个落脚的地方,增加实力,找一位政治上的得力助手。毛泽东要的是供驱驰的战将而不是领导自己的军事长官;朱德要的是出谋划策的军师而不是踞于自己头上的主公。这个矛盾的最初解决办法是两个第一把手: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公开的命令、布告,朱德挂头牌,名字排在前面,毛泽东的名字居第二位;但党内组织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书记,是井冈山地区党内的第一号人物,朱德是委员,在毛领导之下。虽然名义上说书记和委员政治上是平等的,决定问题时那是一票,事实上在中共党的历史上和现实中,书记拥有比委员大得多的权力。这样一种格局,二人合作了一段,为了大局彼此都有妥协和让步,但一些事情积累起来,矛盾终于爆发了。这就是一九二九年六月底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

因为涉及到毛泽东、朱德两位领袖人物和林彪,红四军“七大”长期以来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个禁区。直至主要当事人都作古以后,原红四军四纵队队长,红四军前委委员傅柏翠(柏肃反扩大化被开除党籍)介绍了他所看的一个侧面。据他回忆说:

有的把朱老总出身旧军官看作旧军阀;有的以为毛主席没有和士兵一起挑米看作不与士同甘苦。编成顺口溜,说什么“朱老总挑米上坳,毛泽东在后方打炮。”有的批评毛主席“太独裁,不民主,对党实行家长制,爱发脾气,会骂人。”有的批评朱老总“别有用心,拉拢下属,妨碍下级干那行使权力,表现个人英雄主义,受吹牛讲大话,对士兵讲话时,动不动就说我们要扩大武装,可以打到南京去住洋房。讲到高兴显不自觉地吧裤子拉到大腿上,有流氓习气,太不尊严”等等。这时暗藏在背后耍阴谋鬼计的林彪,乘机从中肆意挑,别有用心地把那些蓄意挖苦朱老总难听的话语,私自写成一信送给毛主席。以这种小忠小信的手段,骗毛主席的信任。毛主席一时不察,将原信印成小册



子,公开出来,让大家时论,提批评意见,并要朱老总写文章辩驳。朱老总看了一时恼火地说:“我不会写文章,可以用口头采辩驳。”这样就在前委常委座谈会上,进行交锋,展开辩论。

这是“七大”

召开的小背景。“七大”会址是在龙岩中山公园公民小学,当时军政治部驻扎于此。出席代表四五十人,是各支部选出来的,除各级领导骨干外,还有一些士兵党员参加。由于毛泽东和朱德站在党内争论的互相对立的一方,都不便出面主持“七大”,由军政治部主任陈毅主持大会。“七大”的工作报告是由陈毅作的,陈毅事先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有些问题吸收了毛的意见,有些问题则坚持自己的看法。根据陈毅的报告,大会进行了讨论。会议争论的问题,据刘伯承的概括,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问题是:建立什么样的军队和党领导军队问题,在「七大」是以党代表权力过大问题进行了争论的。”

“早在一九二七年十月,毛主席在三湾改编时,就在部队里建立有党代表制度。团营有党委,连有支部,班排有党小组,原是军队的领导核心。党代表是这个核心的负责人,党的前敌委员会是部队的最高领导机关。党领导军队已经没有问题。一九二八年二月又建立了士兵委员会。由于党的领导,上下团结,如一二八年八月,毛主席率领部队到桂东迎接二十八团时,途中遭伏击,一个人都未损失,就有赖于党的领导和支部建在连。”

“习惯于旧军队领导形式,个人说了算的人,对党委制就不习惯,感到「党代表的权力太大」,感到政治工作麻烦,说它是「狗皮育药」,抵触很大。有的军政关系很不协调,发展到「七大」时总爆发。”

“政治和军事关系,古已有之的论点是:「军事是政治的继续。」这方面似乎没有争论,但是谁领导谁呢?古时候岳飞领导

的帅旗是「岳」，穆桂英领导导的帅旗是「穆」字。虽有皇上，军队是皇上的，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还是将说了算，是个人领导。国民党军队仍以个人为中心，形成派系，也是个人领导。资晒主义国家党派虽多，皆无军队，哪个组织政府，军队就归他指挥，也无党领导军队这个问题。”

“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是义务兵役制，每人都要当兵，有国法约束。国民党的兵是雇佣兵制，当兵吃粮，是被经济所迫，有吃粮的约束。红军那时一无岳役制，二无粮饷（是动员兵），而且物质条件极困难，形势极紧张，靠什么维持军队，使他们能忍饿耐寒，英勇作战呢？只有党的领导和阶级教育，政治工作是奥运会线就是这个意义上提出来的。由于习惯的影响，当时毛主席的主张占少数，受旧军队影响较深的人，还是赞成个人专断，认为党只能管一部分（政治工作），双方相持不下。”

“第二个问题是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体现党的领导，除党委制、政治工作外，还有民主集中制这方面也有争论。认为党代表权力太大的人，说自上而下的民主，民主半天还是党代表最后集中，还是他说了算，是家长制。这部分人加上对无产阶级民主不理解的人，认为要民主就要自下而上的民主，事无大小先交下级讨论，上级再作决议。开会时如果有人先提出方案或候选人的名字，就不合乎无产阶级民主精神。这实质上是极端民主。前一部分人的中心思想本来是强调‘军队以服从为天职’的，所以提出只要‘由下而上的民主’，是为抵制毛主席的主张和限制党代表的权力。这个问题在‘七大’争论也很激烈。”

“第三个问题是反对军阀主义的斗争。”

“受旧军队影响较深的人，认为不打不骂不好带兵，在文件上虽然没有一个人主张枪毙逃兵，但枪毙逃兵的事还是有的。打人最厉害的干部被士兵送外号外「打铁匠」。”

“为了克服旧军队管理方式,以增强团结,充分发挥士兵积极性,在四军组成后,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原在井冈山部队一九二八年二月就建立士兵委员会,在团部有办公机构,大家选举全国最好的士兵当主席),在党代表的领导下进工作。原有很大的权力,一切缴获都要受他的检查,不许发洋财,一切账目要交给审查,出布告除军长、党代表、政治部主任署名外,他也署名。他有权监督官长,如干部强奸妇女,反映到他这里就由党代表和士兵委员会进行斗争,干部犯了错误,他可以打手心,甚至打屁股,这样就使喜欢打人的干部就敢再打了。士兵委员会的权力是有些过份,但在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和紧张的战斗环境下,它有极大的建设作用。因为他可以「以毒攻毒」。主张打骂、强制纪律和「军队以服从为开职」的人,对士兵委员会有很大意见,有些军事干部,主张取消士兵委员会,这也是「七大」争论的最厉害的一个问题。”

“这时从苏联回来了一批人(起作用最大的是湖南省巡视员刘安恭),说苏联红军就没有军队民主、士兵委员会这一套,这使持错误意见的人更加认为有理,更加坚的地,同意他们意见的人还占多数。”

最后陈毅代表主席团结论,他一方面批评了朱德,一方面批评了毛泽东,号召全军停止争论,团结战斗,认为造成这次不应有的争吵,在群众中产生不良影响,朱毛都有责任,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应负主要责任,宣布给毛泽东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朱德以口头警告处分。

会议改选前委时,中央指定前委委员毛泽东、朱德不动,余由大会选举。结果,选出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和直属队、一二、三、四纵队各一名士兵代表组成前敌委员会;选举前委书记时,许多人不投毛泽东的票,陈毅当选为

前委书记。恰值毛泽东正患疟疾，周期性高烧，浑身酸痛，两腿无力，连大小便都要贺子珍挽扶。选举的结果使他的心情更加不好。就到上杭蛟洋养病去了。

红四军在赣南、闽西的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六月下令赣闽粤三省地方军队对红四军和闽西苏区进行“会剿”。七月二十九日，在上杭古田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决定采取“诱敌深入赤色区，击破一面”的作战方针，并以作战力较弱的闽军暂编第一师（张贞师）为主要作战对象。会后，陈毅赴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的军事会议并向中央汇报工作，朱德代理前委书记，率红四军主力第二、第三纵转战闽中，留一、四纵队在内线坚持。八月八日朱德率部占领漳平，二十一日攻大田不克，回师闽西。二十九日，在漳平县溪南岛张贞部第一旅遭遇，歼敌一个团，击毙其团长。三十日，在漳平歼敌一个营，再克县城。九月六日，重占龙岩。至此，赣粤两省敌军各自撤回，对闽西根据地第一次“会剿”遂被打破。九月二十一日，红四军乘胜攻克上杭，全歼守敌暂编第二旅两千余人。战后，朱德领导部队进行扩充和整顿。各纵队将两个支队扩充为三个支队，全军发展到七千余人。

九月下旬，朱德在上杭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讨论建立红军法规等问题。大会致函毛泽东，希望他回红四军前委工作。

十月十三日，接中共福建省致闽西特委、红四军前委的信，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朱、毛红军全部立即开到东江去，帮助东江广大群众的斗争。”朱德立即派人来请毛泽东，商量怎样执行。毛泽东身体仍很虚弱，部队派担架抬着毛泽东，贺子珍跟着，翻山越岭，来到龙岩。见面之后，前委多数人的意见是的妨行中央指示，独毛泽东持异议，他认为：“广东去不得。那里的

敌人比较强大,我们比较弱。”但他的意见没有说服多数。十八日,红四军军长兼代前委书记朱德向福建省委和中央报告:红四写立即调三个纵队向东江出击。报告中还说:“党内争论问,自七次大会后,即告结束,虽有少数同志仍留有点成见,但正确的指示,大家很诚恳的接受,消除一切成见去对付敌人。”又说:“陈毅同志仍未回来,毛泽东同志久病,现虽起床,尚不能行步,此次去东江地区作战,尚不能出发。”十九日,朱德令第四纵队留守闽西,率第一、二、三纵队开向广东东江地区作战。进军中,第一纵队在焦岭县枪源击溃敌军一个营。第二纵队在大埔县石下坝击溃敌军两个营,第三纵队在武平县岩前击溃闽西民团。突破敌人拦阻后,三个纵队于十五日乘虚占领梅县。二十六日,粤军第六十一师师长蒋光鼎率三个团反攻,朱德率部撤到城东南的南杭、马面山区待机。三十一日,率部再攻梅县,自晨至竿,先后七次冲锋,仍未得手。朱德判断敌人将向东江地区增兵,不宜继续留在东江地区,决定撤回赣南,经寻乌、安远,十一月二十三日转回闽西长汀。这次出征东江,部队减员较多。

红四军主力开赴东江后,毛泽东带着贺子珍来到永定县的苏家坡,继续养病,这是一个山村,很偏僻。朱德率部出征时,惦记毛泽东的安全,专门调了一个连来担任警卫任务;并向永县委书记张鼎丞交人,关照好毛泽东的生活和安全。地方党专门派了一个中医为毛泽东治病,派人送来银元、大米和蔬菜,还增派一个连地方武装,同时严密封锁毛泽东住在这里的消息。为了确保安全,负责警卫的干部想了许多办法,如白天住在村里的这户人家,入夜以后转移至村子另一头的人家住宿;随时备好担架,遇有敌情信号,立即把毛泽东抬到山上安全的地方隐蔽。毛泽东利用养病的机会同群众谈天,从风土人情、阶级状况到收成好坏,他都听得津津有味,特别注意征求群众对分田政策的意

见,往往一谈就是大半天。在朱德、县委和苏家坡群众的关怀、照顾和掩护下,毛泽东得到了在当时条件下最好的休养和治疗,身体渐渐康复了。

这天毛泽东忽来诗兴,展纸挥毫,书写《采桑子》一首: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廖廓江天万里霜。

毛泽东今年三十六岁,他并没有伤感老之将至,而是充满了斗争的喜悦。

在上海,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面情况以及朱德、毛泽东之间争论的详细汇报,决定由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政治局候补常委李立三以及陈毅组成委员会,起草一封指示信;周恩来全权代表中央解决朱毛的争论问题。

陈毅在上海停留月余,多次与周恩来交谈,并受周恩来委托起草中央给四军的指看专信,经周恩来修改审定后交陈毅带回,作为四军“统一思想,分清是非”的依据。

周恩来对朱毛争论的处理,表现了很高的政治水平和领导艺术。

在指示信中,批评了毛泽东、朱德各自的缺点,要他们及前委注意改正;并要前委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

周恩来代表中央告知陈毅,仍由毛泽东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

指示信说:“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前委对于一切问题毫无疑问应先有决后交下级时论,绝不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



作决定俟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的办法,这样不但削弱上级指导机关的权力,而且也不是下级党部的正确生活,这就是极端民主发展到极度的现象。前委种前次党的争论问题,即表示这个弱点,这是一个损失。

“党代表名称应立即废除,改为政治委员;其职务为监督军队行政事务,巩固军队政治领导,副署命令等。军政治委员可由前委书记兼,军政治委员可不兼任政治部主任。”

“党管一切的口号,在原则上事实上都是不通,党只能经过党团作用作政治的领导。目前前是挥军部、政治部,这是一个临时的办法。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由政治委员监督。前委应着眼在红军的政治军事经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上。一切工作归支部这个口号是对的,是作经过支部去工作的解释,但不是与党的民主集中制相对立。”

中共军队的领导体制,即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从此以后便定型了。一个军设军长、政治委员,为全军平行首长,签署命令时,军长在前,政治委员在后;在军党魏组成上,通常是政治委员为书记,军长为副书记,政治委员的权力略大于军长。下面师、团、营、连各级都是如此。

这种领导体制对于防止军队成为个人的工具,防止军事主官拥兵自重变成军阀,加强党对军队的控制,是一种有效的、优良的体制。在以后的长期奋斗中,在与国民党军的长期战争和抗日战争中,中共方面个别军官甚至高级军官变节的事是有的,但没有成建制的部队叛变投敌,政治教育之外,实有赖于这种组织体制上的保证。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对朱毛争端的处理,大的着眼点是巩固和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对毛泽东虽然也有批评,但支持大于批评,命令四军前委恢复毛的书记职务,是对毛泽东最大的支



持；但又不许贬损朱德，强调“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朱毛二人在江西根据地，在全国，都是一面旗帜，合则变美，分则两伤。于朱毛个人，于中共的事业都是不利的。十月下旬，陈毅带着中央的指示信和自己调解朱毛争端、维护朱毛团结的一片至诚，回到了闽西。

陈毅从上海回来，十月二十二日在焦岭县松源找到了朱德。寒暄过后，接着说：“我这次去中央，见到了周恩来同志，他代表中央详细听了我的汇报，谈了很多很好的意见，还说，前委书记还是要请毛泽东同志来当。要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要提高朱德、毛泽东在群众中的威信，红军才能担负自己的任务。”并拿出中央的九月来信给朱德看。二人商量以后，陈毅派专人把中央九月来信送往上杭苏家坡给毛泽东，并附信转达中央指示，请毛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长汀与朱德、陈毅见面。二十八日，毛泽东写信报告中央：“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

十二月中旬，毛泽东和朱德、陈毅在上杭县古田召开纵队、支队和部分大队党代表联席会议，开了十多天，为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作准备。

十二月二十八至二十九日，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即历史上有名的古田会议。首先由陈毅传达中共中央九月十八日的来信。中央九月来信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指出中国革命的特征是先月农村红军，后月城市政和权；肯定了坚持党的…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是正确的；批评了红四军中的极端民主化的倾向；要求红四军前委加强政治

思想教育工作，纠正一切不正确倾向。毛泽东根据中央来信的精神和红四军的具体情况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

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决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思想，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观点；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等项任务；并且必须在军内外建立正确关系，对敌军采取正确政策等。这个决议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革命军队如何建成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是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会议改选了前敌委员会，毛泽东重新当选为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

与陈毅的光明磊落襟怀坦白成为鲜明对照的，是林彪的明险深沉，拥毛贬朱，他那封信，对于激化朱毛的矛盾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听了中央精神的传达之后，他认为“跟对了人”林彪是参加南昌起义和湘南暴动，跟朱德上井冈山的。参加南昌起义的人，约占红四军的百分之二十，大都成了各级领导骨干，林彪是上升最快的，从排长升到了团长。他跳出来拥毛贬朱，在群众中是有影响的，对朱德的刺激也很大。事后朱德对龙楚说：“最令人痛心的，是林彪那个坏家伙，他竟公反对我。当时我以最大的忍耐，才没有使局面破裂。”林彪继续在毛泽东身上下功夫，又写信给毛泽东，以恭谨的学生态度请教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前途问题。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毛泽东给他回了封信，便是收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信中对红四军中某些人的消极悲观思想，也包括写信者林彪对革命的前途的一些模糊认识，从理论上作了深刻的说明。林彪写此信的目的，是为了联络感情，信中并没有提什么具体问题，只是表达自己对毛泽东的服膺和敬仰。果然引出了毛泽东洋洋洒洒的一大篇议论，毛泽东把林彪引为知己，刮目相看了。信的开头是

这样写的：

林彪同志：

新年已经到来几天了，你的信我还没有回答。一则因为有些事情忙着，二则也因为我到底写点什么给你呢？有什么好一点的东西可以贡献给你呢？搜索我的柘肠，没有想出一点什么适当的东西来，因此也就拖延着。现在我想得一点东西了，虽然不知道到底于你的情况切合不切合，但我这点材料实是现今斗争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使于你的个别情况不切合，仍是一般紧要的问题。所以我就把它提出来。

我要提出的是什么呢？就是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我从前颇感觉、至今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五月十八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最鲜明。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也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由你相信彭德怀式的流动游击政策一点看来，似乎你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有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来一个全国暴动，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形势的大革命。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于中国革命不适合的。

这两段文字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应林彪的要求，把第一段删去了，第二段作了修改，没提林彪和彭德怀的名字。但当时原信印发给红四军和地方干部看了。对于一个二十岁的团长来说，能和毛泽东讨论些革命大问题，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到后来

林彪成了大人物,才觉得这封信对自己不利了。林彪是个复杂的人物。作为军人来说,既开过小差(南昌起义失败后,跟随朱德向湘南转移的途中,他向有关方向逃跑,因白色恐怖严重,又主动归队),又是一个军事奇才。在红四军中,朱毛都欣赏他的军事才能,毛泽东又把他引为政治上的知己和坚定的支持者,他的地位的跃升具有必然性。后来他果然大红军中和中共党内像一颗耀眼的新星一般升起来了。

一九三〇年一月,赣闽粤三省敌军以十四个团的兵力,对闽西苏区举行第二次“会剿”,主力是赣敌金汉鼎为师长的第十二师。根据红四军前委决定:朱德率主力(一、三、四纵队)从古田经连城、宁化北进,十六日占领广昌,威胁敌第十二师的后方,金汉鼎立即回头,命令第十二师撤回江西。这时福建敌军发生内讧,粤敌也相继撤走,敌人对闽西根据地第一次“会剿”遂告结束。毛泽东率第二纵队在上杭、龙岩之间的小池地区给闽敌以打击后,翻越武夷山,于一月下旬到达广昌的东韶同主力会合。红四军合兵一处,在东韶稍事体整后进占乐安、永丰。

二月六日至九日,红军前委和赣西特委以及红五军、红六军(一九三〇年一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江西独立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团、赣西游击第二大队和湘赣苏区部分赤卫队合编为红六军,黄公略任军长,刘士奇任政治委员)军委在吉安县东固地区陂头村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扩大苏维埃区域、深入土革命、扩大工农武装等任务。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为了统一领导红军和地方党组织的工作,组织共同前委。红四、红五、红六军各成立军委,受共同前委统一领导。赣西、赣南和湘赣边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亦受共同前委领导。共同前委由毛泽东、郭贞、曾山、王怀、方志敏、朱德、潘心源、黄人略、刘士奇、彭德怀、谭震林、陈毅、邓子恢、张鼎枢、袁国平、李文林、滕代远等十七人组成,毛泽

东、曾山、刘士奇、朱德、潘心源为常委，黄公略、彭德怀为候补常委，毛泽东为书记。

二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朱毛指挥红四军和经六军一个纵队在吉水县值夏一带，歼灭向东固地区孤军冒进的敌独立第十五旅大部，击伤旅长唐云山，俘敌一千六百余人。这一胜利，促进了赣西南革命形势的发展。赣西南地区、东西由南丰到永新、南北由寻乌到峡江，民江西半壁，围绕赣江流域，从横数千里，包括吉安、吉水、泰和、安福、永新、莲花、宁冈、宜春、新余、分宜、峡江、万安、永丰、乐安、宁都、南丰、兴国、雩都、瑞金、会昌、信丰、南康、大庾、上犹、崇义、寻乌、安远、南雄、萍乡、万载、遂川、石城、茶陵、攸县（刘“一”线都是包括县城在内的县）等三十几个县。三月二十九日，赣西南特委组成，刘士奇为书记，刘士奇、萧道德、李文林、业允中、王怀为常委。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同时成立，曾山为主席。

红四军离开闽西后，三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大会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选举邓子恢、张鼎丞、郭滴人等三十五人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邓子恢为主席。辖上杭、龙岩、永定、连城、长汀、平和六县地区和龙岩、永定两座县城。四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军事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将龙岩、上杭、永定、连城、武平五个独立团合编为红十二军，伍中豪为军长，谭震林任政治委员。至此，朱毛红军完成了开辟赣南、闽西的战略计划，为尔后形成中共中央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 25 一占长沙 立三冒险攻城市 一番争执 润之辣手拘政敌

一九三〇年,中国共产党已从大革命的失败中恢复过来,党员人数由“六大”时的四万人发展到十二万人。经过三年游击战争,红军主力发展到十多个军七万余人,地方武装近三万。建立了包括赣南、闽西、湘赣、湘鄂赣、闽浙赣、鄂豫皖、洪湖、左右江、陕甘、琼崖等十几块革命根据地,在三百多个县建立了红色政权,深入进行土地革命。

五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各地红军分别集中组织成正规军团,全军进行整编。

第一军团总指挥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辖:第四军军长林彪,政治委员彭清泉;第三军军长黄公略,政治委员蔡会文;第十二军军长伍中豪,政治委员谭震林;第二十军军长曾炳春,政治委员刘士奇;第二十二军军长陈毅,政治委员邱达三。

第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滕代远。连:第五军军长邓萍,政治委员张纯清;第八军军长何长工,政治委员邓千元;第十六军军长孔荷宠,政治委员李楚屏。

一、三军团形成了红军主力,三万余人。

第二军团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周逸群,连第二军军长贺龙(兼),政治委员朱勉之;第六军军长邝继勋,政治委员段德昌,全军团一万余人。

工农红军川东游击军第三路,司令李光华,副司令王维舟,一千余人。

工农红军第一军(鄂豫皖地区),军长许继慎,政治委员曹大骏,六千余人。

工农红军第十五军(鄂东地区),军长蔡申熙,政治委员陈奇,一千八百余人。

工农红军第七军(右江地区),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小平,六千余人。

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东江地区),军长兼政治委员古大存,二千五百余人。

工农红军新编第十二军(闽西地区),军长贺沉洋,政治委员施简,五千余人。

工农红军第一独立师(琼崖地区),师长梁秉枢,政治委员杨学哲,三千余人。

工农红军第十三军(浙南地区),军长胡公冕,政治委员陈文杰,二千余人。

工农红军第十四军(苏中地区),军长兼政治委员李超时,一千三百余人。

这年五月,蒋介石同冯玉祥、净锡山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军阀混战,战场以河南为中心,三方投入兵力共一百多万,历时七个月。这场军阀战争,严重地削弱了参战各方势力,为中共势力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这时周恩来、瞿秋白在苏联,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夸大了主观力量,对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混乱、动摇,作了过分乐观的估计,中共党内原来就存在的“左”倾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幻想重演十月革命一举夺取全国政权的壮举。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倡导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



与一省或几省的首要胜利》的决议；形成了以冒险主义为特征的“立三路线”。

七月十六日，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的名义给共产国际主席团写信，提出“中共中央坚决执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的路线之下，决定组织南京兵士暴动，同时组织上海的总同盟罢工，并力争武汉武装暴动首先胜利，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现时革命突飞猛进发展的形势，有很大可能实现。”

随后中共中央制定了以夺取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还将各级党、团、工会的领导机关合并组成领导武装起义的行动委员会。计划规定：红一军团“以主力侧击南浔路”、“攻南昌，取九江，夺取整个江西，以切断长江”；红三军团“帮助鄂南与鄂东南地方暴动”，“战领大冶，切断武长路”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帮助鄂西与鄂西南地方暴动”；鄂豫皖地区的红军“帮助鄂中以及沿京双路的地方暴动，切断京汉路”。然后，各路红军向武汉进逼，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红三军团根据中央关于“切断武长路”的部署，七月四日攻占岳阳，然后转兵南进，前出到平江地区。这时湘军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以其主力南下衡阳、宝庆地区与张（发奎）桂（李宋仁）联军作战，而以七个团的兵力迎战红三军团，据彭德怀当时的报告说：“七月二十二日何键派危宿钟、罗霖两部约八九团之众，迫近平江，声势甚大，然革命高潮到来红军上气极振，不费几个钟头，打得他落花流水，抱头鼠窜。计缴敌新式步枪六百多支，机枪数挺，乘胜追至金井（离长沙八十里），何键……复败于金井，再败于朗梨，以至利用工事死守长沙城也被攻破……于二十七晚十二时攻克省会，平江、金井、朗梨、长沙四役，共缴得步枪约三千支左右，机枪二十八架，手提机枪二十余挺迫击炮二十余

门,山炮两门,无线电九架,子弹、炮弹九百担,其它军用品无数,俘虏敌兵四、五千人,伤敌团营连长没有统计,但我们也阵亡两个师长、五个团长、连长二十一个,师团政委伤亡六个,连政委十余名,官兵一千六百名……八月一日在十劳苦群众中通过苏维埃政府名单,以李立三为主席。”

李立三欣喜若狂,于八月一日和三日连续召开两次政治局会议,要求各路红军迅速向武汉推进;武汉暴动、南京暴动与上海总同盟罢工的同时,南方局要组织广州暴动。并于五日给共产国际主席团写信,要求国际“立刻动员各国支部猛烈扩大保护中国革命运动”,要求苏联蒙古直接出兵支持中国革命。

朱毛率领红一军团于六月二十二日由闽西出发,经广昌,绕兴国,于七月二十四日攻占樟树镇(今清江县城),歼敌第十八师一部。尔后西渡赣江,于三十日进到南昌对岸的万寿宫、生米街地区。八月一日,派出两个纵队攻击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鸣枪示威,以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在牛行车站,毛泽东从的纸上看到红三军团占领长沙的消息,立即派军团政治部主任杨岳彬带一个连去和彭德怀联系。部队转到安义、奉新地区休整待机。何键当然不甘心长沙被占。很快调回主力组织反扑。红三军团于八月六日撤出长沙,遇到平江以东的长寿街组织防御。何键率部分三路进攻。为了支持红三军团,红一军团于八月十八日进抵万载县黄茅。十九日,毛泽东在黄茅写信给赣西南特委转中央。信中说:

在我们占计目前形势是一个急转直下的形势。何键在被第三军团攻击大败之后,一定更加动摇,我第一军团(现在铜彭一带,即派人去联络了),把敌人次第消灭,占领长沙、岳州,进攻武汉、九江,开展三省更大的局面,促进全国总暴动的必要。在攻九江形势下,江南敌人必尽量往下游开拔,向九江前进。吉安

当不攻而破。

此时毛泽东并没有抵制立三路线、不打大城市的观念。在二打长沙失利以后，他才形成了抵制立三路线，坚决不再攻打大中城市的思想，他比立三路线的其它执行者回头更早一些，更快一些。

当何键部第三纵队（四个团）进到浏阳东南文家市和孙家等地时，朱毛决心，趁敌立足未稳，且不知红一军已经逼近，歼灭该敌。二十日，红一军团主力采取奔袭战术，一举歼灭文家市地区敌人第三纵队三个团又一个营，毙敌纵队司令戴斗垣，俘敌一千余人，缴获各种枪一千五百余支（挺）。缴获的电台被下极官兵砸坏了；还有好几箱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不知道利用，竟被焚烧了。

八月二十三日，红一军团同由长寿街南来的红三军团在浏阳东北永和市胜利会师。两军团前委举行联系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成立第一方面军和再次攻打长沙进而夺取武汉的指示。会议决定成立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下辖一、三军团，共三万余人。成立中共第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彭德怀、周以粟、滕代远、黄公略、林彪、谭震林等为委员。二打长沙虽然声劳甚壮，但实力对比，敌军明显占有优势。当时长沙城内守军有三十一个团，而且筑有较坚固的防御工事；攻城的红军兵力共十三个师，实际上相当于十三个团。红军编组为正规军了，才开始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还缺乏攻坚的装备、技术和经验。关于打长沙的问题，一、三军团态度是不同的。这一矛盾在总前委会议上暴露出来了。朱德总司令说：“红军的装备和训练都不宜打阵地战，如果攻取长沙，今后就要完全打孟攻坚战，其后果可有导致红军的毁灭。”彭德怀没有发言。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说：“三军一

个团军团也能打下长沙,现在两个军团会合了,还怕什么!你们一军团不敢打,就站在一边看,我们三军团单独打。”“你们既不打南昌,又不打长沙,还执行不执行中央命令?”朱德是个务实的军事家,他反对打长沙,不是政治上对立三路线的抵制,而是他知道红军的武器装备、战术训练完不成这样的任务。毛泽东这时是赞成打长沙的。所以还是决定一、三团会攻长沙。

会后,毛泽东写给赣西南特委并抄转中央的信中,对打下长沙是充满信心的,并准备下一步夺取武汉。他说:

三军团士气很壮,有七千枪,和一军团来前方者相当,明日即向长沙前进,大约经过一度剧战之后即可占领长沙。

望中央指示夺取武汉意见,并准备组织政权机关及红军总司令部,派一负责人到鄂南来。

信的落款是“毛泽东八月二十四日于浏阳永和市”。

八月二十四日,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在永和市发出命令说:“本方面军以消灭何键部队进占长沙之目的,决定三路向长沙推进。”二十九日,各路红军分别进到长沙东南郊约三十里的大托铺、龙头铺、菱中铺、枫树河、新桥一线,对长沙形成包围态势。九月一日,抓到一个敌军传令兵,缴获作战命令一份,得知敌挥拟集结十个团的兵力从长沙南铁路线上的猴子石出击。当夜,红军调整部署,红三军团监视正面之敌,红一军团三个军布置在敌出击的侧面,准备迎击。第二天等了一天,敌人没有出来。晚上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的四军、十二军向长沙发起进攻。九月三日,敌人出击了,敌陈光中旅在易家湾偷渡,企图侧击红军,被红军发觉,趁其半渡而击之。有七、八百敌死于河内,俘敌千余人,共歼敌约两个团,敌人慌忙缩了回地骈。从此,长沙守敌凭藉工事顽抗,不再出击,战事陷于僵持状态,九月十日,方面军总部再次下达总攻击命令。为突破长沙外国的电

纲,彭德怀令部队买了千余头水牛,把水牛尾蘸上煤油,点燃牛尾冲阵,但通敌人机枪扫射,水牛回头奔逃,冲乱了自己的阵脚。因为红军缺少强大炮火,终未突破敌人阵地。如旷日持久,敌援军到达,红军有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这时毛泽东认识到朱德的意见是正确的。红军确实尚不具备攻打大中城市的条件。毛泽东和朱德商量,想个什么理由撤离长沙外围呢?这时得到一个情报。说敌人的援军已到了湘潭。毛泽东提出:“先打援军,再攻长沙。”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九月十二日晚,总前委决定撤离长沙外围;转进萍乡、修县、醴陵、株州一线待机。十三日,总前委在株州召开会议,毛泽东又提出:“一、三军团给养业已告罄,当时每月需款四十万元,必须在萍、醴、攸三县筹款二十万,才能支持半个月的军费。这当然也是无可非议的。于是决定从九月十四日起,以十二天时间在三县筹款。关于下一步作战方案,决定不再打长沙,而去打南昌。打南昌是中央提出来的,自然也无异议。但毛泽东在发出的命令中留下了一个伏笔:“……夺取南昌的第一期方案,以第一军团攻取吉安,三军团攻取峡江、新干。”夺取南昌是虚提一笔,落实的是打吉安、峡江、新平等县城。就这样把部队带回了江西。九二十九日下午,朱德、毛泽东发出“照原计划拟于明(三十)口由此地袁州(注:今宜春)出动,经分宜向吉安前进”的命令。部队正准备出发,晚上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部长周以栗来了,他带着长江局的命令,要毛泽东、朱德率一方面军开回去三打长沙。长江局是一九三〇年八月一日成立的,以项英为书记。管辖的范围是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四川五省。中央通告有关方面:“湘、鄂、赣、川的红军及士兵运动过去为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指挥者,今后统归长江局军事委员会指挥。”所以,长江局是朱、毛的顶头上级。毛泽东热情接待周以栗,对他带来的命令,采取了“将在外,君

命有所不受”的态度。毛泽东与周以栗烛夜谈,陈述不能再转回去的理由。他说:“此次围困长沙十六天,大战数昼夜,终不能克,其原因有三:一是未能消灭敌之主力于工事之前。敌共有三十一个团,我在文家市、猴子石两役已消灭敌人五个团以上,但大部分尚未消除,即退入城壕,因此敌有余力守城;二是群众条件不具备,城内无工人暴动,无士兵暴动以为响应,粤汉路、株萍路及对河群众没有起来,不能断绝敌人之水陆交通,不能封锁敌人之经济及军事运输;三是技术条件不具备,敌之工事是欧式的重层配备,铁丝网、壕沟等计八九层,我们只有肉搏而没有重炮破坏敌人之工事,交通器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系不好,因而失机。以上三点是没有打进长沙去的原因,而以第一点为主要原因。现在拉回去再打,这些条件改变了没有呢,没有。敌人以逸待劳,我们劳师远征去攻坚,你想能手了下来吗?”周以栗本来是坚决拥护立三路线的,他来的任务是传令,督阵、监军,把一方面军调回去打长沙,但他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天,总前委召开了袁州会议,请周以栗参加,统一了思想,决定一、三军团分别向吉安、新干开进。

十月初,红军总部离开宜春城由西向东沿大路前进,走到离吉安不远一个十字路口时,从北面来了一个人,他就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李文林。毛泽东上前招呼,问:“从哪里来?”李文林答:“从中央来。”

“中央有什么指示?”

“中央还是要我们打南昌。”

毛泽东向他介绍了袁州会议的决定,说:“我们准备打吉安。你看,队伍已向吉安开过去了。”

李文林看到行进的队伍,说:“那也只好这样。”

二人交谈着随大队上路。



十月五日,红一军团夺取吉安,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守敌新编第十三师师长邓英率部乘船逃往南昌。这时,泰和、安福、吉水、峡江、新干、清江等地敌军,在三万红军的压力下纷纷撤退,赣南苏区发展到三十多县。苏区群众踊跃参军,红一方面军发展到四万余人(不含湘鄂赣的红十六军)。七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曾山任主席。同时,中共江西省委改称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以李文林为书记。

红三军团少数领导人跟随方面军总部一同回到江西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打下吉安后,一、三军团配合打南昌、九江。如今吉安已经拿下,他们力主火速北上,攻打南昌、九江。经过争论、说服,毛泽东提出了一个策略性的方案:“有计划、有配合、有步骤地夺取南昌、九江,先向袁水流域推进”,“在袁水与瑞州河之间(包括分宜、新余、清江和峡江等县县境)布置工作……发动这一带群众筹措给养……暂以七天为期。”实际上还是不打南昌、九江。在向袁水流域推井中,为泽东沿途打干部谈话,个别做说服工作。

十月十七日,在峡江召开了扩大会议,除总前委委员外,还有红一、三军团各军的军长、政委,以及江西省的党政负责人。会议开了一夜,发生了严重的争论。红三军团之五军和十六军大多数是平江、浏阳人,八军大多数是阳新、大冶人。有的领导干部代表部队的地方主义思想,怕丢掉湘鄂赣边革命根据地,坚持在赣江以知动,湘机夺取南昌和九江。红一军团也有人认为,从秋收暴动起,在赣江西岸就有基础,也不愿离开这里。毛泽东苦口婆心,分析利害,他说:“蒋冯净大战已经结束。反动统治阶级必将联合起来,进攻我们。据得到的情报,敌罗林、毛炳文、公秉藩、张辉瓒、邓英、谭道源共六个师的兵力集中南昌。我们没有重炮,不能攻坚,现在硬去打南昌、九江是以卵击石。我主



张东渡赣江到革命根据地内部去关门打狗。西岸这块地区,夹在湘江、赣江之间,机动范围里。”这时红三军团又有人提出一、三军团分开活动,一军团到赣江以东,三军团留在赣江以西,两个军团夹江而阵,这样既可集中消灭敌人的大部队,也可以转为单位分散于湘赣边、湘鄂赣边、鄂东南地区进行游击战,对将来夺取湘鄂赣三省政权都有利。这个折中意见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那时候是群雄并起,各有各的山头,各有各的领袖。毛泽东的意见虽然得到朱总司令的支持,但朱毛两个人的威望也还不足以压服持不同意见的人。这时主要看彭德怀的一票,他站在哪一方面,哪一方面就占优势。他要是坚决不过江,毛泽东也是无可奈何的。没有私,顾全大局的彭德怀发言了,他说:“一、三军团如果分开,一次战斗要消灭敌人一个师(三旅六团制)是很困难的,如果两个军团合起来消灭敌人一个师就比较轻松。为了消灭敌人,必须反对地方主义,在政治上以朱毛为旗帜,集中统一红军,一、三军团不再分开。一、三军团分开,两军团夹江面是陈,这对于目前准备粉碎蒋介石的大举进攻不利。不少同志担心三军团过江东以后,湘赣两江之间谁人坚持,苏区不是白抗了几年?这是三军团带群众性的意见,也是正确的提出问题,必须重视。湘鄂赣边区可扩大十六军;鄂东南已有五个小团,准备成立第九军;湘赣边区已有独立师,可再扩大,依靠这些革命力量,可以坚持湘、赣两江之间的斗争”彭德怀这一翻话,入情入理,义正辞言,三军团的干部见主帅如此,也就没人再说什么。

峡江会议由于彭德怀表态使争论大体上得到了解决,但没有完全统一思想,特别是以李文林为书记的省行委,对形势的认识和应取的战略方针,与毛泽东尖锐对立。于是在十月下旬在新余县的罗坊召开了红一方面军前委会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联席会议。从十月二十六日通过的《红一方面军前委会、江西省

行动委员会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两党的任务的指示》来看,争论双方互有妥协让步。

吉安的夺取是完成赣西南数百万有组织的群众,二十余县苏维埃政权最有群众最有基础的暴动。吉安胜利就是江西一省胜利的开始。这一胜利是红军群众几年来的战斗中的第一个主要城市的夺取,他不仅是更有基础的帮助红军向前发展,他不仅要号召全江西革命群众最近期完成江西总暴动,这对于全国革命形势的推进,对于争取全国革命胜利,同时是有伟大意义的。无疑的应继续吉安胜利的规展,争取江西首先胜利。

这是李文林坚持的立三路线夺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观点,毛泽东作了让步。

目前在敌人大举增兵与南昌、九江固守工事的形势之下,单凭红军轻袭南昌、九江,而且红军相当给养都不具备,运输条件十分缺乏。这无疑的是要成为游击的进攻,结果攻不下,又转而他往,反使一省胜利延期实现。

不打南昌、九江,是毛泽东的核心观点。但在表述上要 and 立三路线的精神相一致,所以李文林也同意了暂时不打南昌和九江。

目前的战略是在占领南浔路、占领南昌、九江的总目标之下,继续吉安胜利,争取进一步的胜利,即在吉安、南昌之间一带地区发动广大的群众、筹措给养,同时加紧后方的群众发动与给养筹,准备兴敌人作大规模的决战,消灭敌人主力,实现全省胜利。

这一段是各有各的理解,都从文字上得到满足。在立三路线的代表李文林看来。“目前战略是在占领南浔路、占领南昌、九江总目标之下继续吉安胜利,争取进一步的胜利”,下步行动方针还是要打南昌,九江;在毛泽东看来,“在吉安、南昌一带地

区发动广大的群众,筹给养,同时加紧后方的发动群众与给养筹措,准备与敌作大规模的决战,消灭敌人主力”,这才是行动方针,而前面只是些虚话。

两省联席会议通过了共同签署的文件,但各有各的理解,各按自己的理解去执行。分歧和矛盾不是解决了,而是被掩盖起来了。到散会的时候,敌军十万已经向红军杀过来了。

这时候毛泽东接到报告:“赣西南破坏了 AB 团组织。赣西南特委一九三一年的工作报告概述了事情的经过。”

在去年(按一九三〇年)红色五月间开始破获 AB 团的组织,如安福西区、纯化、兴国等地,当时只是破获了他们一些下级的零碎组织;到去年(一九三〇年)八月间,赣西南特委破获他们大批的组织,他们准备以纯化为中心举行反革命暴动,结果他们的反动组织事先为我们打坍,故无法实现他们反革命的企图。……一直到夺取吉安以后,AB 团问题表现严重(如调查许多地方土地未彻底分配,强迫扩大红军,与脱离群众的现象)……

AB 团的全称是 ANTI—BOLSHEVIK 团,是反布尔会维克,即反共产党的意牌。这个组织是一九二七年一月由段锡朋、周利生、程天放、王礼锡等人组织的一个反共组织。那时蒋介石设总司令部于南昌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并策划反共。AB 团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一九三〇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驻节吉安县城时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名义给共中央写了封信说赣西南“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 AB 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 AB 团富农所充塞。”因此,决定进行一场以‘打 AB 团’为名目的肃反运,对赣西的中共组织“来一番根本改造”,以“挽救这一危机。”

这时,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经过地下交通送到红一方

面军。这才知道九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会上特生（向忠发）作中央政治局报告，少山（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七月决议案，柏山（李立三）在发言中承认了被指出的错误已离开了领导岗位，之大（瞿秋白）作了政治讨论的结论。会议纠正了李立三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左”倾估计，决定停止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恢复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日常工作，从而结束了第二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会议还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补选朱德为补捕中央委员。六届三中全会的结果加强了毛泽东的政治地位。由于李立三的倒台使李文林作为 AB 团重大嫌犯关押起来了。抓李文的直接导因是省行委对红一方军面战不配合，不支持。十一月二十四日毛泽东率总前委到了永丰县南部之水南。在这里他给江西省行委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到：

我要财政部派两人，一往永丰、宁都，一往纯化、水南、陂头、白沙、东固办理红军给养问题。财政部负责人员，只接应了，实际并没有做。等两天红军到了这些地方，油、超载、米问题全然不能解决，特别是超载须从省政府的盐中挑一部到这些地方，方能供给红军，不用钱买。筹款一事，一百二十万元还只有十三万元到手（此十三万元无论何人非得总前委命令不能发用分文，务望注意，）非努力进行捐款不可。红军一到红色区域，一切供给都要向省政府领取，此外没有第二出路，务望省委对此重新计划一番，随时严厉督促，不稍疏忽，是为至要。

马上要打大仗了，三万大军粮饷无着落，毛泽东如何不急，联系一路上的争论，毛泽东断定，由于李文林对退往江东作战思想不通，故意在地方上消极怠工，不予配合，是不是故意破坏第一次反“围剿”作战呢？在红军和他本人随时都面临生死存亡

的对敌斗争环境中,他不能不提高警惕。于是他下令把李文林抓起来了。

李文林是赣南红军和苏区创始人,这年三十岁,原名周金堂,又名周郁文,江西吉水县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后回吉水开展革命武装斗争。一九二八年任中共赣西特委委员兼秘书长,先后领导组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曾率部攻克乐安、兴国等县城,创建以东固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一九三〇年二月任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到中央见过李立三,回来任中共江西行动委员会书记。他是个立在一路线的坚决拥护者和执行者,但不是 AB 团,不是阶级敌人。毛泽东用这种不正常的手段排除反对者,混淆了敌我矛盾,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逮捕省行委书记李文林之后,十二月三日,毛泽东起草了《总前委致省行委信》,把前委与行委的平行关系改为上下级关系,信中说:

为了斗争的需要,同时有中央通知一七四号的规定,总前委的职权必须在省行委之上。所有红军及地方一切军事政治党务均归总前委统一指挥,这种权力集中是革命的必需,我们相信省行委必定是同意。

信的主要内容是授予李韶九全权带领武装人员到赣西南党政机关中去抓 AB 团,信中说:

党内地主富农成分现在举行大规模叛变;此问题在赣西南还是异常严重,必须运用敏捷手段立即镇压下来。红军中危机已得挽救,地方的危机务必迅速挽救。据此间所获 AB 团刘天兵、周来、曾韶汉供出现在省委省苏工作之李白芳、江克宽、小袁、老曾,红军学校之曾国辉,遂川之刘万清都是 AB 团要犯,周赤并供段良弼是 AB 团,龙超清 AB 团,除龙超清已由此间直接

讯办外，特派李韶九同志率兵一连，代表总前委及工农革命委员会帮助省委省苏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的反革命线索，给以全部扑灭。

省委接到此信务必会同李同志立即执行扑灭反革命的任务，不可有丝毫的犹豫。赣西行委及红军学校方面须防 AB 团闻信暴动，故处置亦须迅速，二十军须找到线索来一个大的突破，二十二军已大批破获。

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分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与政府必定是 AB 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到了讯办。

李韶九武装士兵将省行委机关包围，率十余人冯人省行委办公室，将赣西南特委书记段良弼以及各方面负责人李白芳、刘万清、任心达、谢汉昌、金万邦、周冕等一一逮捕，挨刑讯逼供。

据段良弼在富田事变后富给中央的报告说：“十二二月七日晚提我们去审问，首先提我去审问，李韶九问我：『段良弼，你是 AB 团，你现在承认好吗？以免受刑罚。』我厉声道：『我也是 AB 团？从我的斗争历史看，又从我现在的工作看，看哪一点是 AB 团，请你调查一下吧。如果我 AB 团，那么是无产阶级的罪人，不要你们来动手，自己拿手枪打死自己。』接着李韶九答道：『不管斗争历史，不管现在的事实，我与你讲道理，是不能讲过你的，我只有七项刑罚，第一项是打地雷公烧香火……』七项皆说给我听了。『哎，七项刑罚我怕什么，任凭你怎么样……』话来说完，李韶九令左右士兵脱我衣服，立即的我变成体跪在地上，打雷公烧香火的惨刑临到我身上来了。初我挺身给他们烧死算了，我觉得人生在世死是不可免的，不过迟早的关系与死法的不同耳。于是两个大拇指几乎被打断，身体已被烂，几成体无完肤了。”

李韶九办案,不招供,不停刑。受审者熬不过酷刑,只好乱供,AB团越打越多。十二月九日,李韶九根据乱供的名单又抓了二十五人,还没来得审讯,国民党飞机来投炸弹,慌乱之中,李韶九下令,将这二十人一律绑赴郊外枪杀了案。

从十二月七日晚至二十日晚富田事变之前,五天时间,李韶九对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机关一百二十多人进行刑讯逼供,先后处决四十余名。机关内外出现了异常恐怖的局面。于是,逼出了个富田事变。

李韶九是湖南嘉禾人。北伐时在第六军第五十七团某连任党代表。南昌起义后参加起义军。他是毛泽东任命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捕杀AB团和富田事变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过去是个禁区,近几年有一些文章和专著揭开了这一事件的内幕。论到责任,往往是上推王明路线,下推李韶九。为毛泽东讳过。公正的说,一九三一年四月以后,由于执行王明路线的中央代表团任弼时、顾作霖、王稼祥到了江西苏区,他们支持毛泽东继续肃AB团,改组派,主要责任应由中央代表团负,毛泽东的责任降到了第二位;在这以前错杀的那些人,毛泽东是主要责任者,李韶九是个执行者。正如一句西方谚语;所说:“不要只看到乱砍的剑,而要捉住握剑的手。”



## 26 富田事变 喜德怀识离间计 龙冈布阵 张辉瓒作阶下囚

正当毛泽东运筹帷幄，准备对蒋介石十万大军第一次“围剿”的时候，祸起萧墙，发生了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主角刘敌，原名欧阳俊，湖南醴陵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过中共莲花县县委书记。一九三〇年成立红六军时任三支队政治委员。七月攻打吉安时腿负重伤，离队治疗两个月。伤愈后调入红二十军，任第一四七团政治委员。他见许多熟悉的老战友、老首长突被关押审讯，非刑拷打，认为萧 AB 团是个大阴谋，遂串连一营营长张兴、政委梁贻开紧急会议，决心“站在布尔什维克立场，挽救党的危机。”于十二月二十日率领一营包围了红二十军军部，想逮捕李韶九，因李闻讯逃走，只抓住了帮助李肃 AB 团的二十军军长刘铁超。后恐李韶九到富田处决被关押的干部，遂于十二日包围了富田的几个村子，缴了李韶九派的一个排看押分队的械，释放被关押的段良粥等七十余名“AB 团要犯。”这时红军学校部分武装人员奉命来制止他们犯上作乱，被他们解除了武装；然后，把队伍拉到赣江以西的永阳去了。他们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说毛泽东“有党皇帝思想”，声明脱离总前委的领导。这就是所谓的“富田事变”。

十二月中旬的一天夜晚，驻在东山坝的红三军团来了一位

信使。秘书长周高潮接待了他，接近了一封送给彭德怀的机密信件，周高潮不敢耽搁，叫起了已经睡下的彭德怀。彭德怀在灯前展开一看，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那是毛泽东给总前委秘书长古柏的一封亲笔信，内容如下：

古柏同志：

据目前各方形势的转变及某方来信，我们的计划更要赶快的实现。我们决定捕杀军队 CP 与地方 CP 同时并进，并于捕杀后，即以我们的布置出去，限你三日内将赣西及省行委任务完成，于拷问段、季、王等中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注意勒令招出朱、彭、黄、滕系红军中 AB 团主犯，并已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捕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

毛泽东 10/12

彭德怀反复琢磨这封信，字体像毛泽东的笔迹，因为毛字另成一体，往来书信常见。但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毛泽东要杀我彭德怀和黄公略、滕代远，甚至还要杀朱总司令，这可能吗？不可能。这是彭德怀看信以后的初步结论。彭德怀抬起头来问秘书长：“送信的人呢？”“在外面。”周高潮回答。

“请他进来。”

周高潮转身去叫送信人，彭德怀继续看传单。传单的标题是《段良弼等致朱彭黄滕的控告信》接下来写道：

我们十二日夜自富田交黄同志送去你们一信收到没有？我们为了避免阴谋家的暗算，才移过河西永阳来办公。同志们，阴谋家现在又用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继续要把赣西南干部一网打尽，同时大造谣言说，中央派来的易尔士同志被杀了，AB 团叛变了，你们相信吗？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是一点也不明白呢？我们过永阳后，曾派负责同志到黄陂来，并且还不愿提出反的口号来，我们极力过于报复的情绪，恐为敌人所乘，可是派

来黄陂的同志路上不能通过，半途打回了。同志们，党的大难已经在前面，党内永远永远地就这样暗无天日吗？我们只有痛苦，只有为党流血？

同志！我们不否认 AB 团在江西省有了普遍组织，并且已经打入了苏维埃区域，因为我们过去都是肃清 AB 团的积极分子啊？可是爱一次肃清 AB 团的内幕，说来是痛心极了。你们要注意，总前委派来李韶九到省行委唯一目的是用极刑逼供。段良弼同志是过去赣西南特委肃清 AB 团、破获 AB 团的第一人，他这次被诬是 AB 团，在两星期前段良弼同志还在省行委常委会上对二十军妥协 AB 团，认为是非阶级的行动，两星期后，他竟做了 AB 团。李文林、曾炳春、金万邦、李伯劳、任心远、业允中、王怀……除了曾山、陈正人、几乎无一干部都不是 AB 团。毛对陈正人在罗坊谈话一天一夜。陈正人对李白芳说：周（按：周以栗，长江局派往赣西的代表）毛二人说，赣西南特委二全会议是 AB 团操纵，李韶九并且说，这次主张与敌人速打是 AB 团；报告了敌人是 AB 团。

刘敌同志是一营政治委员，他为什么胆子这样大？为什么敢暴动？这是李韶九的力量使嗜。据李敬同志讲，李韶九对他讲了：“这不是 AB 团的问题，是政治问题。”刘敌同志敢于把我们几十个忠实的同志放出来，就是在这几句话里认识了。

这次毛贼派李韶九到省行委来，一开始便找陈正人。业允中同志回省委，被扑不能与会（他是常委、组织总长）。拷打李、段、马、刘数同志时，是指名问李文林是不是 AB 团？……省委问题半点没解决，但派了古柏来！派两连人过河西，抓起王怀中同志，但派陈伯钧些赣西书记。原本决定抓了李天柱、陈东日的，因为陈伯钧与东日谈过一次话，但不抓陈东日了。陈东日对红军学校学生讲话说，这是领袖之争，并不是 AB 团的问题。同

志们！省行委是根据中央正确指示去工作的，尤其是李文林、段良弼二同志是到过中央的，并且这次是极力主张与敌人速打的，因此，就首先诬他们是 AB 团。总之，凡是赣西南干部，只要发表些意见的，但说他是 AB 团，这是何等的毒计！同志们！你们为什么到现还一点也不明白呢？痛心极了。

传单上说的事情，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彭德怀又有些困惑了。他不由的又把毛泽东给古柏的那封信拿起来，这是当前最急迫的需要使主意的问题。“勒令招出朱、彭、黄、滕系红军中 AB 团主犯”，他把目光停留在这一句话上，冷静地思考着，思考着。蓦然，组中有细的彭德怀发现了一个疑点：毛泽东平常写信，日期一律写汉字，这封信月日是阿拉伯数码。哦！想起来了，业允中会摹仿毛体字，听人说他摹仿的已达到了乱真的地步。富田事变分子贴出大字报标语：“拥护朱彭黄，打倒毛泽东”。这封信的目的不就是拉我们和他们站在一起反对老毛吗？这是个大阴谋，分裂红军、分裂中共的大阴谋。

彭德怀已经看穿了敌人的奸计，形成了处置的复案。他抬起头来。周高潮已经回来了，见彭德怀思考告一段落，报告说：“送信人走了，追也追不上了。”

“送信人就这样走了吗？这样重大的事情，不派重要人来进行商谈，而派这样一个普通送信人，既不要回信，又不要收条，这才怪咧！”

周高潮听完彭德怀的话，拿起信来看。边看边说：“为什么这样阴险啊”！

彭德怀吩咐：“明天九点召开紧急前委会议讨论这件事。除前委同志外，团长、政委、主任、参谋长都参加”。

周高潮看看腕上的表，说：“已经两点了，是今天九点吧？”

“对，是今天九点。”彭德怀笑了，又接着说：“你先把滕代

远、袁国平、邓萍三同志请来。”滕代远是军团政治委员，袁国平是政治部主任，邓萍是参谋长。三位应召而至。

彭德怀把信和传单递给了滕代远，又依次传给袁国平和邓萍。等大家都进入了情况，彭德怀说明了自己的看法。滕代远：“好危险啊！这是一个大阴谋。”大家广议论了好一阵子了，天就快亮了。彭德怀说：“我们和总前委相距有六七十里，请示来不及了，为防意外事变，我们要发表个宣言，明确表示态度。”大家都同意。“那你们先吃饭，我来起个草。”彭德怀铺开纸，提笔就写。大意是：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性质的；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这就是阴谋分裂红军，破坏粉碎白军进攻的计划：一、三军团在总前委领导下团结一致，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总前委领导。

“军团长，先吃饭吧。”滕代远招呼彭德怀。

“还有几个字，就写完了。”彭德怀插好笔帽，把起草的写信送到滕代远手里。自己去吃饭。大家传看了，都无异议。

九点了，参加会议的干部都到齐了。秘书长周高潮宣布开会。先把伪造信件和传单给大家读了，然后彭德怀讲话。彭德怀说：“富田事变是反革命行动，伪造信件，陷害同志，企图分裂一、三军团，破坏总前委粉碎白军进攻的计划，公开宣传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这不是党内路线争论，而是反革命的行为，是AB团的阴谋毒计。省行委是AB团统治的、其中有立主路线者同它结成同盟。这封假信是富田事变的头子业允中写的，他平日学毛体字，学的比较像，但是露出了马脚，毛泽东同志写信，年、月、日也是用汉字，不用罗马字和阿拉伯字。我们要发表一个宣言，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总前委的领导。”他又把起草的宣言给大家念了一遍。与会人员一致同意军团领导对这一事件的处理。会后，彭德怀嘱咐参谋长邓萍：“派一个班，把宣言和

那封假信、传单送到黄陂总前委去。”

第二天，三军团由东山坝转移到小布，这里离总前委只有十几里路。彭德怀亲自到总前委，见到了毛泽东和朱德。原来朱德也收到了同样的假信和传单。为了表示一、三军团团结一致，巩固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彭德怀请毛总政委到三军团跟干部见见面。毛泽东在彭德怀的陪同下来到了三军团，三干部会上讲了话。

十二月十七日，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在黄陂发表《为富田事变宣言》。十八日，又发表《给曾炳春等一封信》。曾炳春是第二十军政治委员，扔入了富田事变。公开信指出了“富田事变”的严重性及其在客观上造成的恶果，呼吁苏区工农群众、红二十军广大官兵及共产党的各级干部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反动派。

后来查明，在江西共产党的组织系统中根本没有 AB 团。富田事变是毛泽东处理内部矛盾不当激化而成。但江西省行委有人用挑拨红军领袖之间关系的办法采反对毛泽东，亦属严重错误。如果不得逞的话。将是毛泽东、朱德、彭德怀之间的一场火并，其后果以从内部摧毁红军，蒋介石可以不战而胜。肃清 AB 团的斗争因富田事变的出现进一步复杂化、扩大化了，错杀了许多忠诚的共产党员和红军官兵，这是后话。

那边厢，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围剿”，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蒋介石任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围剿”军总司令，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至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中旬，国民党军增至十一个师又两个旅，共十万人，从吉安、建宁之线，由北向南，以朱毛所在地黄陂为中心，分路对红军进行向心攻击。在吉安的是罗霖的第七十七师，只有三千条枪，其任务是守城。在建宁的是刘和鼎的第五十六师。主要任务是堵东面的

口子,防止红军东逸。由最西头的吉安至最东头的建宁,两地相距八百里。在这八百里中间,敌四路攻击军展开于吉水(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永丰(张辉瓒的第十八师)、乐安(谭道源的第五十师)、南丰(毛炳文的第八师和许克祥的第二十四师)。张辉瓒作为前线总指挥居于右翼并指挥公秉藩师,形成攻击军的主要突击方向。张、公二师都是鲁涤平的嫡系,卖力气自然是义不容辞。第十八师是第九路军的主力师,但师长是鲁涤平自兼,张是副师长代行师长职权,公秉藩对受张辉瓒指挥并不服气。

攻击开始日期,蒋介石指定为十二月十六日。

张辉瓒和公秉藩各率所部由永丰、吉水向前推进,按照预定进度应于十二月二十日到达东固附近。当公秉藩师如期到远东固时,红军已主动撤离,公师扑了个空,却越过前线总指挥张辉瓒通电报捷,夸大战鼎,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张辉瓒并不知晓。张亲率第十八师来能按预日期推进,于十七日停顿一天,延迟于二十一日早晨才迫近东固;适遇大雾,误认先期到达的公秉藩师为红军,竟行攻击,双方激战达四小时之久,都有不小的伤亡。事后,二人大吵了一顿。公认为张辉瓒事出有意,率部自由行动到因富,从此脱离张的指挥;张也负气不再与公联络。公、张反目使原来形的主要突击方向不复存在。张为了掩护后方安全,擦朱耀华的五十四旅留于东固,仅率戴兵(五十二旅)、王捷俊(五十三旅)两旅向龙冈轻率冒进。

在黄陂红一方面军总指挥部,毛泽东和朱德以逸待劳,观察着各路敌军的动态。在主攻方向的选择上,他们选择了张辉瓒或谭道源。张、谭两师各约一万余人,红军则有三万多人,十三个团的兵力,一次打它一个师,兵力数量上占优势,有把握。只要歼灭其一个师,切断敌军八百里连营的阵势,就把蒋介石策划



的这次“围剿”打破了。

十二月二十四日得到情报，谭道源在源头大肆拉夫，准备出发，向小布前进。

小布地形有利于设伏。

方面军于二十五日拂晓向小布开进。在小布树林里，召开了军民誓师大会。会场上贴着一副醒目的对联：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毛泽东以这副对联为题目，给到会的军民通俗地讲解红军的战略战术，进一步增强了苏区军民的胜利信心。

会后，作战部队进入设伏阵地。严格规定，前线指挥员不许带马，部队白天不能煮饭，以求隐蔽和静肃。全军遵命而行。从早晨等到黄昏，等了一整天，敌人没有来。当晚撤回黄陂。第二天半夜又去，从拂晓一直等到天黑，仍未见敌人，只好再次忍耐撤回。这时部队求战心切，有人讲怪话了。毛泽东说服大家，不要着急，机会总是有的。后来查明，并非情报不确，谭道源确曾下令向小布前进，其先头部队已经出发了，这时从苏约跑出一个奸细向敌人告密，说小布埋伏了许多红军，谭道源立即改变主意，把已经出发在途的前卫部队叫回去了。活该张辉瓒倒霉。他在和公秉藩闹翻之后，企图东进向谭道源靠拢。朱、毛获悉张师动向后，遂于十二月二十九日传令全军到君埠及其以北一带，隐蔽待机。当天黄昏得到情报，知张辉瓒师先头部队已进到龙冈。谭道源仍在源头。毛炳文师移到洛口、平田、东山坝一带，张辉瓒处在一个孤立突出的位置。毛泽东、朱德非常高兴，立即下定决心，于晚八时下达作战命令，全文如下：

红一方面军攻击进占龙冈之敌张辉瓒师的命令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九日午后八时于君埠街总司令部红字第十二号。

(一)敌张辉瓒师由南垄向我前进,本(二十九)日午前十时其先头部队到达距此三十里之龙冈圩(戴岳旅一〇三团),后续部队不明。潭头有到敌说。

谭道源师仍在源头、上下溪。

毛炳文师移到洛口、平田、东山坝一带。

(二)方面军决以左路军于明(三十)日攻击龙冈之敌,右路军则应派部队协助歼灭该敌。

(三)第十二军(缺三十五师,包括六十四师在内)任左翼,应于明晨四时前出动,向表湖前进,应以一部分占领龙冈南端、水西西端之盲公山,以主力截断通南垄之大道(经兰石、茅平),须于午前十时占领所要之阵地。

第三军任右翼,应于明晨五时出动,占领木坑以右地区及亭子岭之主要阵地,向龙冈攻击前进(须于午前九时半开始攻击)。右与右路军派出部队获取联络,如右路军未派出部队,则应向右延伸,特别注意右翼。

(四)总攻击龙冈时间为三十日午前十时。

(五)右路军应于明晨派出一部经回龙到还铺附近,左接第三军,右接第十二军,向龙冈之西北端(张家车附近)攻击前进,到达时即向三军及总司令部取联络。如上固无敌,则应以主力向还铺、张家车之线攻击前进,而应以小部警戒下固、潭头。

(六)各军小行李及伤兵收容所、绷带所等,均自择位置。敌方俘虏招待所设小别。

(七)大行李仍位置于阳城停止待命,如小布发现敌情,则迳向约溪移动。

(八)总司令部明日移到小别附近指挥。

附记:

1、明日出发前,各部应集合官兵讲话,做好政治鼓动,预备

队亦应随时做好政治鼓动。

- 2、十二军应注意竭力截断南垄之增援部队。
- 3、各军俘虏兵可向小别招待所转送。
- 4、各军应注意相互间之联络及搜集情报。
- 5、各部须注意搜集西药,无线电亦不准破坏。

此令

总司令 朱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第二天拂晓,雾满龙冈。龙冈东面有个黄竹岭,敌军东进必须仰攻该山。红三军第七师已奉命在黄竹岭前面木坑、亭子岭一线占领阵地。张辉瓒令先头旅早饭后从龙冈出发,向东前进。到达黄竹岭时,旭日东升,群山雾散。正当敌先头戴岳旅一〇三团艰难地登山时,受到红七师的迎头痛击。敌军系仰攻,面向东,射手被太阳迎面直射,照得睁不开眼,大大影响了火力的发挥。战斗从九点钟打起,至中午,敌人两个团全部展开,向黄竹岭猛攻。红七师依靠有利的地形和天候条件,扼守阵地,在量杀伤敌人。此时张辉瓒仍控制王捷俊旅于龙冈,既不向黄竹岭增援,也不逃跑,陷于进退失据境地。午后两点,红二十军从戴旅左翼迂回,插到龙冈同端,切断了张辉瓒与在因富的公秉藩师的联系。龙冈正南是大山密林,无路可通。红四军和红三军团遵照命令在北面上固一线占领阵地,防止敌五十师来援和十八师向北突围。张辉瓒见四面被围,乱了方寸。王捷俊旅东奔西突打了一阵子,副旅长洪汉杰、团长李月峰等阵亡。午后三时许,红四军和红三军团从北面跑步冲下山来,敌十八师(欠五十四旅)全线崩溃,一片混乱,红军各部队进入了缴枪抓俘虏的阶段。当黄公略指挥红三军包围了张辉瓒的指挥所时,张的警卫营营长原是共公路在湘这国独王师办随营学校的学生,他把全

营集合好，令号兵吹敬礼号缴械。黄公略来到时，他毕恭毕敬。

地向黄军长报告，全营举枪敬礼。有一部分漏网敌人往西向南垄逃命。当他们跑到龙冈、南垄志间的大山时，朱毛早派红三十五师在这里等候多时了。所以，此役张辉瓒以下，一个师部两个旅，九千多人全部被歼，无一漏网。这“无一漏网”是战场上的真实情况，并不是浮词虚语。

战斗结束以后，毛泽东和朱德从黄竹岭指挥所健步走下山来，沿着大路向龙冈走去。一支红军部队正在打扫战场，押送俘虏，收集武器弹药，还有的挑着银元担子，人来人往，很是忙碌。只听有人喊：“抓住张辉瓒啦！”“前头捉住张辉瓒啦！”毛泽东和朱德大胜之后，非常兴奋，但他们尽量不使喜形于色，毛泽东平静地对朱德说：“走，到前面看看去。”二人的警卫员牵着马，跟在后面。来到龙冈大坪，只见俘虏们正在集合站队，缴获的武器辎重，堆成了小山。

毛泽东命令警卫员吴吉清：“去，找后押俘虏的负责同志，把张辉瓒带来。”

不一会儿，两个红军战士押着张辉瓒过来了。他换了士兵穿的灰布棉军服，帽子不见了，双手反剪被捆绑着。俘虏收容所的负责人介绍说：“这就是张辉瓒。刚抓住他时，他隐瞒了身份，说是书记官，当场就被一个俘虏揭穿了。”

张辉瓒三十多岁，是个大胖子。这位前敌总指挥是坐着八人抬的绿呢大轿来到龙冈的，头指气使，非常自信，作梦也没想到会当了俘虏。见前面并肩而立的两个人，衣裳破旧，但气宇轩昂。那个留着大背头的不是毛泽东吗！张辉瓒在湘军混事多年，认识毛泽东。和他站在一起的那一位想必是朱德了。张辉瓒心里判断着，一阵懊恼，没想到败在这两个人手下。但现实的处境很快使他清醒了。他谢率地鞠躬行礼，但又不失风度地说：

“润之先生，久违了。”那声音不高不低，像是他乡遇故人的样子。

“这是朱德司令”。毛泽东介绍朱德。

“朱将军，久仰，久仰！”张辉瓒转向朱德再一次点头致意。

“你既俘虏，愿意生，还是愿意死？”朱德冷峻、平静地发问。

“我当然希望生。但不知你们要多少钱才肯放我？”张辉瓒反问。

“你想错了，我们不是要你的钱，我们想办一所红军学校，你愿意留下当教官吗？”朱德说。

张辉瓒心里一百不愿意，但嘴上不得不说：“愿意。”

“以你的意见，我们下一步行动应该进攻哪一个师？”毛泽东接着问道。

“进攻十九路为最上策。”张辉瓒回答。接着又把十九路军的一切情形，如番号、兵力、驻军、主官姓名、各师、旅的战斗力量等。作了详细地介绍。他说的真实准确，和红军得到的情报完全相符。

毛泽东、朱德面无表情地听着。等他说完，毛泽东向俘虏收容所的负责人交代：“把他带下去吧，要好好看管。不要杀他。”然后，转头和朱德说：“总司令，他是想保存他指挥的二十八师和五十师。叫我们舍近求远，往西去打十路军。”

朱德说：“随后他的二十八师和五十师在东边抄我们的后路，陷我们于腹背受敌的困境。他当了俘虏还在寻求战上的转机哩。”

“是这样子的。不能叫他牵着鼻子走，我们要向东打，歼灭谭道源的五十师。”毛泽东说。“对。我们带上张辉瓒，叫他看着我们去歼灭五十师。”

国民党军十八师主力被歼，前线总指挥张辉瓒被俘之后，对

各路“围剿”军震动很大，纷纷东逃北撤。于是：打倒一个，吓跑一群。红军休整了一天。一九三一年元旦，红一方面军向小布移动，准备再打谭道源。谭师主力经南团向东韶退却，与许克祥师靠拢；一部经源头、中村向南北坑逃窜，走在后面的被红军“二路军”（专门派出迷惑敌人部队）截击，缴获甚多。得知谭师主力向东韶退去，一九三一年一月二日晚十时，朱毛下命令分三路追击：红十二军任正面，经南团、林池向东韶攻击前进；红三军团任左路，经陂头向东韶攻击前进；红三军任右路，限于明日十二时进至田营，以主力钳制洛口许克祥师，阻其增援，以一部迂回到东韶东端山下之高地，向东韶之敌攻击。红四军为总预备队。三日晨，红十二军先头部队即与逃敌接战，随后，主力陆续赶到。谭师才到东韶，依山布防，工事未及完成；即遭包围。谭道源无心恋战，率精锐突围。主将一逃，第五十师溃不成军，被俘二千余人。缴枪千余支。谭道源经宜黄逃回抚州，五日给蒋介石发电，报告败讯，电文说：

职师江（三日）晨在东韶遇朱、毛、彭、黄全部号称八军之众，孤军重围，作殊死战，自辰至酉，黄团长敬及营长，等相继阵亡，初级官兵死伤尤重，战斗之烈，从来未有。职随从员兵或俘或伤，势穷力竭，几难幸免。除将突围官兵移驻抚州整理外，所有损失数目容详。

谭道源 微（五日）

从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三十日发起龙冈战斗，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结束东韶战斗，五天打两伏俘敌一万余人，缴枪六千支，机枪数十挺，子弹百万发；红军伤亡两千余人。红一方面军在朱毛的指挥下，胜利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尔后，向乐安、永丰、南丰、宜黄、建宁、黎川、宁化之线以南以西地区，展开战略进攻，扩大了拥有数十万群众的新苏区。第一次反

‘围剿’的胜利，是毛泽东的政治中线和军事路线战胜“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不战胜立三路线就没有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朱德、毛泽东指挥第一次反“围剿”战役的特点是：第一，创造性地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把敌人诱到革命根据地内行；第二，慎重初战，没有准备好不打，没有打胜的把握不打；第三，坚持打运动战，打运动中之敌；第四、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作战方式是四面包围敌人，主力从敌之侧后攻击。毛泽东深思熟虑，算无遗策，大大提高了他在红军中的威信。

如何处置上万的俘虏呢？专门召开了一次大会，向他们说明红军的性质和宗旨。红军是穷苦人自己的队伍，是为穷苦人翻身解放而打仗的。凡是愿意参加红军的，欢迎大家留下。愿意回家的，每人发给三块光洋的路费。当场就有三千多人愿意留下当红军，其余的资遣回家了。在留下来的人中，有敌十八电台台长王诤和他领导的报务人员。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朱德在小布亲切接见了他们。以他们为技术骨干，成立了方面军司令部无线电队。从此，红军有了无线电通讯。

一月下旬，在东固召开了有三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公审张辉瓒。张辉瓒进入革命根据地，曾下令，只要家里有当红军的，满门抄斩，烧掉房子。一路来，找不到红军就杀老百姓，谎报战果。在东固，因为和二十八师打误会，没处出气，杀害群众特别多。成千上万的红军眷属、老人、妇女和儿童惨遭杀害。十几个村庄变成了瓦砾场。红军回到东固，看到的是烧焦的树木和断垣残壁，听到的是血泪控诉和令人心碎的哭声。复仇的火焰熊熊烧起。张辉瓒被判处死刑，由那些亲人遭受屠杀的战士执行、张辉瓒欲砍了头。行刑者犹未解恨，找来张姓宗祠一块大匾，将张辉瓒的人头钉在上面，上插一面小白旗将本匾放入赣江，顺水向北漂去。



## 27 二次围剿 蒋介石调兵遣将 四中全会 陈绍禹呼风唤雨

一九三一年二月上旬的一天，阴云笼罩着赣江两岸，天哗哗地下起雨来。在吉安南郊沿江高地上值勤的哨兵警惕地监视着江面。突然一声炸雷，哨兵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哆嗦，一个耀眼的闪电照亮江心，只见有一物体从上游泰和方面随便逐流而来。哨兵立即报告给带班的班长。班长令停靠在江边的渔船打捞上来。近前一看，在场的人莫不大惊失色。原来是张氏宗祠的一块大匾，一棵人头被钉在上面，旁边插着一面小白旗，上书“张辉瓒首级，送给鲁涤平”。

张辉瓒师在龙冈覆灭后，鲁涤平曾亲拟一电给蒋介石，电文说：“龙冈一役，十八师片甲不还。”蒋回电云：“十八师失败，是乃事之当然，不足为怪。我每闻共党，但惊皇失措，何胆小乃尔！使为共党闻之，岂不为之所窃笑乎？如安为赣中重镇，望严督固守，只许前进，不许后退。”于是鲁涤平只好将第九路军司令部移驻吉安。令公秉藩派一个旅驻赣江东岸。

师部率一个旅驻吉安市，派出现两个团驻守吉南郊沿江高地。值勤的哨兵就是二十八师派出的。很快将发现张辉瓒人头一事按级报告上来。公秉藩派副官、参谋、士兵多人前往江边，将匾原样抬到第九路军司令部。鲁涤平一见，如丧考妣，悲痛万分，命令制做楠木假身，空戴农冠人殓，送到南昌埋葬。这次遗

憾,鲁涤平受了很大刺激,闭目即见张辉瓒人头,越想越觉得呆在吉安不安全,遂乘飞机回到南昌,一见何应钦,就提出辞去本兼各职,不敢参加剿共战争。

杀张辉瓒,实出于红军下层官兵和受害群众的愤激,毛泽东和朱德事后都批评了这件事情。张被俘不久,毛泽东、朱德接到中共中央来信,说国民党派人联系,愿以现金二十万元并翻放所有在押政治犯。

作为交换张辉瓒的条件,但张已被处决,事成过去,无法挽回了。

一九三一年三月,蒋介石增加兵力,调整部署,准备对朱毛红军发动第二次“围剿”,其战斗序列如下:

设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出任行营主任,赴南昌坐镇指挥,下属部队有八个师另三个旅,共约二十万人。

第五路军,由王盒钰任总指挥,辖第二十八师(师长公秉藩)、第四十三师(师长郭华宗)、第四十七师(师长王钰兼)、第五十四师(师长郝萝龄)、第七十七师(师长罗霖)。

第六路军,由朱良任总指挥,辖第五师(师长胡祖玉)、第八师(师长毛炳文)、第二十四师(师长许克祥)、第五十六师(师长刘和鼎)、新编第十三师(师长路孝忱)。

第十九路军。由蔡延锴代总指挥,辖第六十师(师长蔡延锴)、第六十一师(师长戴战)、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旅长马昆)。

第二十六路军,由孙连仲任总指挥,辖第二十五师(师长孙连仲兼)、第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骑兵第一师(师长关树人)。

行营直辖第五十二师(师长韩德勤)、第四十九师(师长张

贞)、第六十二师(师长香翰屏)、新编第二师处兴邦旅、新编第四旅(旅长周志群)。

还有位于南昌、樟树镇、吉安机场的第一、第三、第五航空队配合作战。

在作战方路上,蒋介石指示,首先在苏区周围集结重兵,并实行经济封锁,然后“以主力分别由东、北、西三方面进剿,一部由南面协剿,并依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为原则。”以期彻底消灭朱毛红军,摧毁江西苏区。

王金钰是山东人,保定军校毕业,原为孙传芳的部下,北伐中投蒋。蒋冯净中原大战时,王金钰率四十七师在陇海线上与西北军作战卖了些力气,蒋介石升任其为第九军军长、第五路军总指挥,调入江西参加反共战争。一九三一年二月初,王金钰到达吉安。归属他指挥的第二十八师师长公秉藩前去欢迎。一见面,王金钰说:“咱们都是杂牌部队,带的官兵都是北方人。杂牌部队无家可归,部队一调远了,留守处的东西就要丢掉。这个苦头,你是吃过的。”

这下子可好了,蒋总司令允许我出任江西主席,咱们今后将要有家了。有了东西,不会嫁心没处放,前途有远大的希望。咱们好好地干吧。

张辉瓒的人头事件在将领们中造成了一种恐怖的气氛。为了给大家打气,王金钰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又说:“张辉瓒这些南方队伍,作战能力本来较弱,他又疏忽大意,才搞了个全军覆没。”现在我们这些北方队伍到了,都是能征惯战、久经沙场的,当然和张辉瓒的情形大大两样。中原大战时,闭锡山、冯玉祥是多大的力量,多好的装备,还不是我们的对手呢、何况红军,他们只有一些土枪土炮,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罢了,这还不是天赐我们换肩章的机会么!”就这样,五路军成了蒋介石进行第二次

“围剿”战争的主力 and 先锋。

孙连仲指挥的二十六路军，是中原大战后投蒋的。调入江西前，蒋介石召见该路军师长以上高级军官。孙连仲率领众师长和高级幕僚前往南京。车到浦口，蒋介石派高级文武官员热烈欢迎。到达南京，安排他们住在最高级的中央饭店和安东酒店，每日花天酒地，白天组织他们游鉴名胜古迹，晚上招待看戏。蒋还不时请到官邸共进晚餐，向孙许愿，只要率军人赣，拟发表孙为江西省主席。西北军将领苦惯了，没事过这样的福，慨叹地说：“过去我们多年替冯先生卖命，从来受过这样的招待。相反的，个人生活享受一点，还提心吊胆地怕发觉受处分，现在蒋总司令对我们这样优待，今后定要好好地替他出力。”于是又一支生力军杀向江西。

就在蒋介石得心应手，调兵遣将，准备发动第二次“围剿”的时候，在共产党内部发生了王明夺权、罗章龙闹分裂等一系列的事件。这一切事件的最终结果，影响到毛泽东在中共和红军中的地位，影响到反“围剿”战争的胜败。

王明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金家寨人，一九〇四年生。武昌商科大学毕业。一九二五年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山大学学习时形成以他为首的宗派小集团，人称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据个中人盛忠亮回忆，“可确定的成员”按英文字母的顺痔排列如下：张琴秋（沉泽民之赛）、张闻天（洛甫或思美）、陈昌浩、陈绍禹（王明）、陈原道、秦邦宪（博古）、朱阿根、朱子纯（女）何克全凯（凯丰）、何子述、夏曦、萧特甫、李竹声、李元杰、孟庆树（陈绍禹之妻）、沈泽民、盛忠亮（盛岳）、孙济民、宋泮民、杜作祥（陈昌浩之妻）王稼祥、王保礼、汪盛获、王盛荣、王云程、杨尚昆、殷鉴、袁家庸。

一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共党内的一個政派，后来有些

人投敌叛变了；有些人转变了观点，在长征中，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在建国以后，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不同程度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如张闻天、王稼祥、杨尚昆等。

一九二七年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斗争激化。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支持托洛茨基，被斯大林撤销了职务，任命教务长阿古尔为代理校长。副校长米夫从中国执行特别使命归来，依靠王明小集团的支持，抗垮阿古尔当上了中山大学校长。从此，王明成了米夫的心腹。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在莫斯科举行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的群众游行。在经过红场时群众中有人呼喊反对斯大林的口号：“回到列宁去！”“制止斯大林分子胡作非为！”“斯大林正在欺骗工人阶级！”中山大学的部分中国学生比俄国托派喊得更响。中大部分中国学生中出现反斯大林的情绪，是因为他们认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责。这件事引起了斯大林的震惊。他怒气冲冲地信米夫对中山大学的托派活动进行彻底调查，经查明在红场上高呼反对斯大林口号的中国学生，为首的是陆渊、梁干乔等，被驱逐回国；跟着喊的，有的被送去劳动改造，有的受留党察看处分。王明和他的追随者，则成了清查托派分子的骨干，进一步受到米夫的器重。

为了确保中共完全忠于共产国际，忠于斯大林，加速实现中共“布尔什维克化”，王明集团大部分人在一九三〇年夏相继回国，包括王明、张闻天、秦邦宪、沉泽民、李竹声、王稼祥、夏曦、何子述、殷鉴、孟庆树、陈原道、陈昌浩、杜作祥、王云程、朱阿根和李元杰等。一九二九年三月，王明回到海。开始被分配到沪东区委任宣传干事，后调任《红旗》报编辑。十一月十二日在英租界被捕，经组织解救，一九三〇年二月十八日出狱，因泄密受党内警告处分，到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参加《劳动》报的编辑工作。

六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关于《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

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传达后,王明写了许多鼓吹立三路线的文章。后得知国际拒不批准六月十一日的决议,又忠连博古、王稼祥、何子述,揣摩国际意图,于七月九日中央机关召开政治讨论会时,抢先发言,指责李立三犯了躲在“左”倾词句之下的倾机会主义实质的错误,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为此,中共中给王明留党察看半年,博、王、何三人严重警告的处分。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在瞿秋白、周恩来领导下举行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的错误,会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但共产国际对瞿秋白不信任,决心提拔王明等人进入中共领导的最高层。一九三〇年十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定了《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即所谓“十月来信”;稍后又有《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人产党三中全会与李立三同志的错误的报告》,给三中全会列了七条罪状:

- (1) 三中全会没有揭发立三路线的实质;
- (2) 三中全会模糊了这个路线和国际路线原则上的不同;
- (3) 三中全会没有研究中国革命过去阶段的教训;
- (4) 三中全会没有提出并解决革命现在阶段的现实任务;
- (5) 三中全会对于全党同志没有解释领导机关所作的错误,反而模糊了这些错误的实质;
- (6) 三中全会没有责备在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际有不同意见的时期,所表现的那些反共国际的言论;
- (7) 三中全会上表现了领导机关之中有不健康的小团体的两面三刀的空气。十月来信和报告矛头是针对瞿秋白的。

瞿秋白失宠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根本的原因是在任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团长期间,在处理中山大学中国学生的纠纷事件中,保护了与王明对立的李剑如一派(李剑如批评支部局宣

传委员王明态度傲慢,摆官僚架子等等,仅此而已),得罪了王明;他还不满意米夫蛮横地插手中国党的事务,曾向国际执委会书记、东方部部长库西宁建议撤销米夫东方部副部长职务,是罪了米夫。王明和米夫串通起来向斯大林告状,说瞿秋白“放刘仁静回国,途经土耳其,找托洛茨基面授机宜”。把瞿秋白和托派联系起来,一状就告准了。在十二月初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会议上,库西宁说:

我稍微说一说秋白同志的东方式的外交,我们在今年夏天曾经在政治委员会上面审查过秋白同志参加中大纠纷的问题。那时决定秋白同志最好不要再参加中国的代表团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和其它的同志领导了中大小团体的纠纷。就是李剑如的小团体,这个小团体实际上和托洛茨基合作的。我们决定了秋白退出代表团,当然我想政治委员会的委员都没有以为秋白退出代表团就要加入政治局,仿佛是为着在中大小团体工作反而得到了在中国的奖赏。

另一位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皮亚特尼茨基说:

在苏联有许多学校有几好几百中国同志在那里学习,他们之中有很好的同志知道列宁主义有尔塞维克的理论和实际。……费力很多力量和钱才能够把他们派回中国去,然而秋白或立三不要他们作党的工作,我以为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允许的。现在怎么办呢?我以为应当发动一个公开的运动反对立三主义和那一部分政治局“委员”。

造了这样大的国际舆论之后,米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于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日突然来到上海。米夫原名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福尔团,这年三十岁。他是带着国际的尚方宝剑和对瞿秋白的个人恩怨来中国的,他的使命就是把瞿秋白拉下马,把王明扶上台。在米夫的高压下,中共中央于十二月十



六日通过了《关于取消陈韶禹、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处分问题的决议》。但王明不能从宣传于事一步登天进入政治局，十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又任命王明为中共江南省委书记，领导江苏、浙江、安徽和上海的党的工作。为了要当领袖，王明又赶写了洋洋十万言的名为《两条路线》的小册子。这个小册子今天我们作为历史文献客观地研究，有三个特点：一是引文多；二是着重点（“即在文字下面”）多；三是武断的结论多。与毛泽东的理论修养比越来，确实不在一个水平上；与瞿秋白相比，也相形见绌，差得很多。然而，共产国际要把这样一个二十六岁的不成熟的青年强加给中国共产党作领袖。

米夫还越俎代庖，起草了《中共四中全会决方案》，以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的名义拟定了改组后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补选的中央委员名单，圈定了出席会议的代表。在做好这一切准备之后，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东方旅社秘密召开。出席会议的除中央委员、候补中委二十二二人外，还有全国总工会、海员总工会、铁路总工会党代表，苏维埃准备委员会和白区党的基层组织的代表，团中央以及从莫斯科回来的学生代表，共三十七人。米夫规定凡参加会议的都有表决权，以保证王明当选。

王明在会上发表演说，打着“执行国际路线”的旗号，指责李立三的成熟是在“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瞿秋白、周恩来主持的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

抛出了题名《两条路线》的小册子作为理论纲领。关于苏区的工作，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在苏维埃区域第一等重要的任务是：在最有保障的地域里来建立起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完全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而能够做这一政府的支柱的红军，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根据地，以便将来依照

军事政治的环境进而能够占领一个或者几个工业的行政的中心城市。

这几句话是王明上台后至一九三四年以前中共江西苏区各项工作的总纲,不可等闲视之。

许多人要发言,米夫不允许,说大会必须在当天结束,马上进行选举。但这时王明还不是中央委员,先补选王明、韩连会、王尽仁、沉先定、黄苏、徐畏三、曾炳春、沉泽民、夏曦等为中央委员。然后选举政治局成员。经过表决,米夫提出候选名单获多数通过。

政治局委员九人:向忠发、王明、周恩来、项英、张国焘、徐锡根、声福坦、任弼时、陈郁。

政治局候补委员七人:关向应、罗登宝、毛泽东、温玉成、顾顺章、刘少奇、王完全。

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时,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当选王明没有当选;会后不久,在米夫的坚持下,又增补王明为政治局常委。

随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进入中央、省级和红军领导岗位的有:王明兼江苏省委书记,张闻无为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兼中央机关刊物编辑部主任,秦邦宪、王云程为共青团领导人,李元杰到山东省委,陈原道,殷鉴到河北省委,沈泽民任鄂豫皖省委书记,朱阿根在上海领导工人运动,王稼祥任中国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到鄂豫皖红军任政委,夏曦到洪湖贺龙的部队任中央代表。从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达四年之久。

米夫对王明集团的兴起非常得意。他是这样描述这一段历史的:

“在陈绍禹的领导下,上海地区的党组织开展了反对李立

三半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这场为实行正确路线的斗争颇见成效。陈绍禹(王明)同志把全党的优秀力量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卓越和最有才能的领袖之一,他和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沉泽民和陈原道同志等其它党的领导成员一起,在两条战线进行战斗,成功地使得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列宁斯大林主义路线获得了全党的公认。”(米夫《英雄的中国》第六十八页)

从此毛泽东陷入了两面作战的困难境地。他一方面要率领红军和蒋介石作战,一方面又要团结支持自己的同志在党内和王明及其追随者斗争。这时,由于富田事变前后肃反扩大化的恶果,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党和群众以及红一方面军中的威信起大降低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五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苏区中央局在宁都成立。中央指定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在周恩来未到职前,由先期到达苏区的项英代理书记。项英到职后,根据中央决定,撤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成立苏区中央局,同时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自任主席,朱德任副主席兼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副主席兼方面军总政委。

三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项英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关于打 AB 团的“富田变事”的问题,项英与毛泽东分歧在,认为不是反革命暴动,决定采取党内教育形式解决问题。一方面,他制止了乱捕乱杀的现象;另一方面,又严肃批判段良弼等人的行为是“分裂”,客观上“反党”,必须公开承认错误,挽回影响。

江西省行委和红二十军领导人对他的处理表示接受,纷纷作出沉痛检讨。但王明认为这是“调和路线”。四月初,又派出

任弼时、顾作霖、王稼祥作为中央代表团到达宁都，四月十七日召开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指责项英“右倾”，推翻了前段会议对富田事变的决定和处理，认为“模糊富田事变的反革命性，没有认清富田事变是 AB 团领导的，立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参加的反革命暴动，而用“党内派别斗争”来解释这个事变。这种解释是非常错的，脱离阶级立场的，这种解释是放松了反 AB 团的斗争，使 AB 团能够在这种错误的解释之下，继续活动，继续发展他们的组织，所以中央局的决定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危险这次反右纠编对尔后打 AB 团扩大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继会只开了一天，因敌人进攻在即，不得不转到军事问题上来。十八日，讨论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问题。这时候，敌情已是相当严重了。四月一日，敌人分四路大举进攻。第十九路军两个师由南面的兴国内宁都方向前进；第五路军四个师从西面的泰和、吉安、吉水、永丰向宁都方向前进；第二十六路军主力两个师由北面乐安、宜黄向宁都方向前进；第六路军第三个师由东面南丰、康都向宁都方向前进。虽然国民党军强调稳扎稳打，进展缓慢，但包围圈已开始紧缩了。新到的苏区中央局领导人认为，何应钦率领二十万大军对我四面包围，步步为营，处处筑碉，以三万红军是无法取胜的，提议放弃江西苏区转移到四川去重建根据地。论据是国际共运领袖斯大林说过，四川将是中国最理想的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朱德表示有办法打破敌人的“围剿”，建议留在中央苏区打，不应退出江西。双方争执不下。毛泽东提议明天把各军军长、政委请来，听听红军高级干部的意见。第二天继续开会。彭德怀、林彪、滕代远、黄公略、罗荣桓、罗炳辉、谭震林等红军将领都到了。大家一致支持毛泽东、朱德的意见，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并表现出高昂的士气和

必胜的信心。这给新到的苏区中央局领导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既然将领们有信心打赢这一仗，他们只好批准毛泽东的战略方针。

打不打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就是怎样打的问题。先打哪一路敌人？是等敌人前进时打？还是去攻坚就敌？这些问题主要是指指挥员之音的争论。有人主张先打蔡延锴的十九路军，理由是它只有两个师，孤立地驻在兴国，距离其它各路军远，虽然它作战力较强，但兵法上说过：“只有战略进攻者可以自由选择进攻的时间和目标（或地区），而战略防御者，则必须以主力对敌这主力。不打败敌之主力，即不能完成战略防御任务。”对此，毛泽东的答复是：“十九路军不但在各路军中最强，而且到了兴国相当久的时间，完成了防御工事，两个师又集中在一起，不易分割。如果我们去打兴国，守际上是攻坚就敌，放弃我军打通动战的长处。如果一时打不下来，北边的敌人一下子压下来，红军就要吃亏。即使打下兴国，北面的敌人势必靠拢，难于打破围剿。至于兵法上说的必破强敌才算完成了防御任务，当然有它的道理。但也不是绝对的，《管子》说：“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坚者瑕。”就是说，你打强敌打不下，弱敌也变强了；你消灭了弱敌，强敌也变弱了。这里面有辩证法。”一席话把大家说服了。周以栗说：‘山沟里有马列主义’。

又有人主张先打朱绍良的第六路军。理由是朱绍良、毛炳文、胡祖玉都是蒋介石的亲信，我们不打杂牌，专打蒋的嫡系。毛泽东认为：‘打仗不同于政治斗争。嫡系非嫡系，不是军事上的着眼点，好不好打，打得赢打不赢才是军事上的着眼点。打它就得向西扫，西边为赣江所限，打完后，无发展余地。若再向东打，则劳师费时，初战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毛泽东头头是道，议论纵横，使赫的苏区中央局领导人暗暗心

折。‘泽东同志的锦囊妙计是什么呢?’王稼祥提问。“我的意见先打第五路军。虽说五路军兵力最大有四个师(未算守吉安的第第七十七师),但他们从北方新到,水土不服,不惯爬山,杂牌军彼此各怀鬼胎,对我恐惧,士气不振,内部矛盾多,便于打。打垮五路军,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之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总司令朱德和各将领都一致赞同毛泽东的意见。项英见无人发表不同看法,宣布散会,就算批准了毛泽东的作战方案。

四月十九日,朱毛发布《战前部队集中命令》,令红一方面军主力从二十日起开始移动,向龙冈地区集中。随后,又令红一方面军再西移四十里,到东固地区集中,隐蔽集结,待机破敌。总司令部移驻东固之坳上。

这时五路军开到前线的四个师已进到富田、水南、白沙、藤田之线,深沟高垒,筑成堡寨:大型者可容一营兵力,中型可容一连,小型可容排班,用交通壕相连,非常坚固险要。一连二十几天,不离阵地。

打先锋的二十八师自到达富田固陂圩后,即派便衣侦察队四处侦察。侦察队长刘老汉是帮会基层头目,第一次进犯苏区到达富田时,他的情报很准确,这次却漆黑一团,一点情况搞不到。他预感到情况巧妙,向师长公秉藩请假,说家有老母,年逾古稀,要回去奉养。公秉藩以为他闹情绪,知道他有鸦片烟瘾,发给了大烟和银元,但还是搞不来情报。便衣侦察队失掉作用,只有依赖各部队的武装侦察严密搜索。据驻富田的八十二旅旅长王懋德报告,该旅一六三团和一六四团武装侦察结果,从富田通九雨领的道路上没有红军跟踪迹。这条道路凡是险要处都被破坏,骡马不能通行。据驻固陂圩的八十三旅长柴乔松报告,该旅一六五团和一六六团武装侦察,由固陂圩通山坑、中洞直达头



陂、东固领这条道上没有红军踪迹，也没有老百姓，可是这条道路被挖断的地方很多，不仅骡马不能通行，就是徒步行进也有困难。公秉藩非常高兴，亲自审问。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我在红一军团第四军×师×团当排长，因犯错误受了很重的处分，乘看押嘴兵疏忽逃出，从密林峭壁出来，只求发个路条，准我回家。”

“红军主力现在什么地方？”

“你们的步哨线以外的十里地主方，就是红军主力。红军准备了多日，光是你们这个正面，就有七八个军。”

“朱德、毛泽东在什么地方？”

“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都在东固。”

公秉藩一听，脑袋都大了。张辉瓒的下场就要轮到自已，心里滴咕了一阵；又一转念，也许是红军派出来的间谍，用苦肉计侦察敌情。努力镇静一下情绪，来到电台室向五路军参谋长、代总指挥齐向辰（总指挥王金钰到南京出席国民会议）和南昌行营主任何应钦分别发撤。公秉藩师部电台是一百瓦特，可以直接和南昌通报。当日何应钦覆电：“齐电悉，已派飞机仔细侦察，仍盼督馀所属确实搜索，严密监视。”公秉藩派出了更多的介衣和武装侦探，没有发现任何征候。

五月十一日，何应钦又给公秉藩直接发来电令：“连日派出飞机侦察，均未见敌踪，仍盼鼓励所属，不顾一切，奋勇前进，如期攻下东固，树各路也先声。”

五月十二日，五路军代总指挥兼右路军第一纵司令官齐向辰给各师下达进入命令：

着第四十七师由现地富田出发，经过九寸岭、观音崖向东固攻击前进。着第二十八师由现地固陂圩出发，经过山坑、头陂、



东固岭,向东固攻击前进。限令十五日以前占领东固。

第二十八师师长公秉藩接命令后作如下部署:

(一)派第八十三旅旅长柴乔松率领一六五团团长吴宗周、一六四团团长傅修身,由现地固陂圩出发,经过山坑、中洞、头陂、东固岭向东固攻击前进,每日前进四十里。前卫采用散兵线形式,不论地形如何复杂,密林峭壁,必须通过,严防做军伏击。

(二)派八十二旅旅长王懋德率领一六三团团长柳振汉及一六六团团长杨四忠为预备队,位置于富田、九寸岭之间。

(三)我率师直属部队沿八十三旅前进道路,在队尾跟进。

(四)师兵站留驻固陂圩,派工兵营监护。

第四十七师代师长唐云山(师长为王金钰兼)率领该师主力向九雨岭前进,分派该师一部守卫富田齐向辰的前线指挥部。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五月十三日侦知敌五路军准备出发。当即通知各军作好迎击准备。十四日,朱德、毛泽东部署兵力,区分任务,参谋人员记下要旨,起草方面军书面命令,当晚八时拟就后,毛泽东亲自作最后修改。为了保密,分别派高级干部亲自将书面命令送给红四军、红三军和红三军团的军政首长,当夜连军参谋长也不知道命令的内容。这个绝密的命令全文如下:

红一方面军攻击富田的命令命令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四日午后八时于总司令部

(一)敌情见参谋处本日通报。

(二)方面军决先消灭王(金钰)、公(秉藩)两师之敌,拟于后(十六)日从左向富田方向出击。

(三)第三军团为右路军(三十五军在内),应于明(十五)日进至江树头附近宿营,严密断绝交通。后(十六)日经固陂向富田前进,须于后日午后一时以前攻击富田。

(四)第三军(缺第七师)为中路(正面),应于明(十五)日

拂晓进到罗坑、张家背、淘金坑一带，并占领白云山、更鼓、石唐、窖子、在垅一带阵地。十六日午前八时开始向轿头江一线攻击前进，得手后以一部追击败走之敌，以一部协助正面之第四军侧击观音崖之敌。(五)第四军(并六十四师)亦为中路，(正面军)明日以全军进驻东固一带，以一师叶领三彩、神弯前一线阵地，六十四师则应位置于蜗牛山之背端，十六日分两路，一攻观音崖，一攻九寸岭，向富田之敌进歼，十六日午后二时猛攻。

(六)十二军(缺三十五师)为右路军，明(十五)日以一部占领大山脑一带主要阵地，牵制由上坊、潭头三方向之敌，后(十六)日待我左路与中路得手后，敌全线败退时，则相机向水南追击。如后天右路之敌(上坊、潭塘)不来，则为方面军之总子预备队。

(七)一〇四团亦归第四军指挥。明(十五)日应即集结兵力，后(十六)日午前八时相机向大元坑之敌攻击，策应中路军，待敌败走时配合正面夹河向富田追击，攻取富田河北端阵地，截击由富田溃走过之敌。

(八)野战医院应于十五日移到东固开设(各军伤兵即送此转后方医院)。

(九)总司令部随中革军委，明(十五)日仍在此地(坳上)，后天则在正面军后沿三彩、观音崖向富田前进。

附记：1 各部应各带米粮五天。

2 战后俘虏兵送东固。

此令

总司令 朱 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十五日下午三时，无线电大队王诤队长(原张辉瓒十八师无线电人员，被俘后参加红军)亲自上机值班。敌二十八师电

台与驻吉安留守处通报时,又用明码作了如下的谈话:

师部台:“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

吉安台:“到哪里去?”

师部台:“东固。”

王静一字不漏地记下了这份重要情报,立即亲自到总部向朱总司令、毛政委报告。几个钟头以后,总部通向各军的有线电话忙开了。到晚八时止,总部下达了命令:“夜十二时起床,一时吃饭完毕,一时半集合,二时出发,务于拂晓向占领东固领一带的有利地形,坚决消灭来犯的敌二十八师……。”五十六日早晨,二十八师师长公秉藩像平常一样,打了一套“八段锦”,早饭后,按计划率师部各单位出发。特务营为前卫,后面就是师长、副师长、参谋长的三座四抬大轿,再后是机关人员、无线电队、驮载骡马和输送队、野战医院人员等,共有一千多人,行军纵队达五六里长。

公秉藩正要上轿,担任预备队的八十二旅旅长王懋德从富田赶来送行。彼此见礼后,王懋说:“八十三旅出发三天以来还未遇见红军,后方各地平静的像水一样,可见从九寸岭逃出的红军排长所说情况与事实不符。”

公秉藩叮嘱,“虽然未发现敌情,我们还是小心谨慎为上。”说罢上轿登程。公秉藩率师部走的路线就是八十三旅走过的路线:固陂圩 山坑 中洞 头陂 东固领 东固。既然八十三旅出发三天未遇敌情,说明这条路是安全的,所以浩浩荡荡,人马嘴杂,放心大胆地前进。上午十点,到达山坑,这里有一条街,约四五十户人家。特务营刚刚通过,公秉藩的绿呢大轿行至街心,只听一声炮响,步枪、机关枪从两侧上劈头盖脑扫下来,山鸣谷应,响彻云霄。

## 28 各个击破 毛泽东神机妙算 损兵遣将 蒋介石痛哭失声

在山坑伏击公秉藩二十八师师部的是黄公略指挥的红三军。十四日晚毛泽东部署了第二天的作战行动后，夜不能寐。山坑两侧，路狭、山高、林密，是理想的伏击阵地；如果红三军晚到一步，二十八师过了这个地段，就打不着了。想到这里，他半夜起身，赶到红三军军部，拉上黄公略一起找向导调查路线，在东固通中洞中大路的南侧，找到了一条小路，改令红三军沿这条小路前进，完满实现了预期的目的。

二十八师遭伏击后，死伤一大片，人马乱作一团。师长公秉藩命令机关人员和通信队进入路旁的民房避弹，由特务营一、二连猛攻西面高山，三、四连猛攻东面高山，自己进入一座坚固的民房，作为临时指挥所，命令紧急架设无线电电台，联络前后方。

公秉藩口授拍发中洞北面八十三旅旅长柴公的电报是：“我率师直属部从行抵山坑，遭到两面高山红军夹击，势甚凶猛，看该旅立即前进，速派一团驰援山坑。”

立得柴乔松旅长的覆电说：“我一六五团进展桥头冈附近，其第二营与红军总司令部相遇，正在战斗中，营长郭钟麟受伤。我率一六四团抵达中洞以南，遭受红军伏击，激战甚烈，无法应援，请示机宜。”

公秉藩给富田以南八十二旅旅长王懋德的电文是：“我率

师直属部队进抵山坑，遭遇红军伏击，势其危岌，着该旅长驰率所部增援山坑。”王懋德旅是师预备队，解师座之围义不容辞，公秉藩所脱险希望寄托在出发时给自己送行的王懋德身上，吸了一支烟，迫不急待，又给王懋德发了第二个电报：“着率所部轻装跑步前进，支持山坑，勿失时机。”

位于富田以南的八十二旅已被林彪指挥的红四军所包围。王懋德给他的师长回电说：“我第四十七师九岭、观音岩一线已被红军击溃，大部队从左右两翼绕到后方，固陂圩通山坑的山口已被红军占领，我旅正在原地与敌激战，请示办法。”

公秉藩接电，见自己手下两个旅都已动弹不得，自身难保，心中凉了半截，只有向五路军工总指挥齐向展求援了。他夹着纸烟的右手微微擅抖着，口述电稿：

“十万火急。富田右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官齐向展：我率师直属部队进至山坑，遭受红军夹击，情势危岌，请速派得力部队增援，勿失时机。”

齐向展手星的部队是四十七师，代师长唐云山率师主力进至九岭、观音岩与红四军遭遇，胶着不能脱身，只剩下一个团保卫代总指挥、第一纵队司令官齐向辰。这时候，红三军团在彭德怀指挥下，侧敌侧水（赣江）迂回到富田东边，从后面向富田发动了进攻。面授机宣时毛泽东问彭德怀：“有没有危险？”彭德怀说：“无危险，敌人意想不到我军会敢侧敌侧水进攻。”按命令，午后一点彭德怀下令向富田发起攻击，齐向辰指挥部队仓促抵抗，哪里还顾得上公秉藩。立复一电：“二十八师师长公秉藩：敌主力从我右翼迂回后方包抄，固陂圩已被占领，富田正在激烈战斗中。该师无论前进到什么地方，着即停止。”

公秉藩接到齐向辰的电报，心里全凉了，知道二十八师已陷入天罗地网，急忙召集副师长王庆龙、党务特派员荆介臣、参

议韦捷生、秘书长郑秋帆、参谋处处长朱子奇等，说明形势，商讨对策。大家一致主张突围。公秉藩一摊手说：“没兵怎么突围。”有人说集合溃兵和抬伤员下来的士兵。就这样收集了百余人，由少校副官席宝庆率领，于下午五点多钟开始突围。席宝庆和十九名卫士带头，他们都佩确德国造二十乡驳壳手枪，每人有二、三百发子弹，还是有些战斗力的。席宝庆双手打枪，专派一个兵给他押子弹。这位神枪手真起了点壮胆的作用，士兵们呼喊着想跟他们冲上一个山头。山上红军以步、机枪猛烈扫射，未堵住这群作困兽之斗的溃兵。快到山顶时，席宝庆的右脚跟被子弹穿透，伤了动脉，血流如注，一步也不能走了。公秉藩命卫士把他背上山顶。这时红军撤到后边一座高山上去了。公秉藩举目望去，山上随处可见特务营士兵的尸体，这是中午攻山时三、四连爬上山顶被红军打死的。他在山顶环顾一周，发现仍在强大红军的包围中，检查一下冲上山顶的士兵，只剩五十余人，副师长王庆龙对公秉藩说：“屏轩（公秉藩的字）你赶快逃命吧，我们实在爬不动了。”参议韦捷生说：“师长你去吧，我就在这里听天由命吧。”公秉藩让卫士把他们背上走慢些，他们坚决不肯。公才挥泪离去，带着未伤的士兵逃窜。

他们迷了路，不知道山和村庄的地名，也不敢找人问，只是判定一下方位，一直往西走。走了三天，在值夏附近的山上被赤卫队发现了。先是东边一支赤卫队约二、三百人逼近他们，士兵开枪抵抗，后来南边又来了一支四、五百人的赤卫队，将他们包了，高喊“缴枪不杀！”公秉藩下令缴枪，和士兵们一起钻出树林，赤卫队长清点了一下俘虏，一共四十七人。进入值夏街头，在赤卫队长家门口停下来，招呼他们进去在堂屋、院内和屋檐下休息。只有少数赤卫队人员在门口站岗，其余各自回家了。赤卫队长对他们说：“你们缴了枪，就不用怕。你们要参加革命，

就留下干；要回家去，我们还要发给路费。”傍晚，赤卫队员把饭送来了。八个人一桌、四大碗菜：一碗鸡，一碗鱼，两碗青菜，还有一大碗米汤，主食是香喷喷的白米饭。这群三天没吃上饱饭的败兵，真是狼吞虎咽，吃得连腰也弯不下去了。

吃罢饭，赤卫队干部调查登记每个人的姓名、年龄、籍贯和职务。几名卫士都说是特务营的士兵。问到公秉藩，卫士们替他回说：“他是我们营里书记，字写得好，你们要写啥，就找他写。”赤卫队干部轻信了，还交待政策说：“莫说你是书记，就是营长、团长、只要士兵同志们说你好，我们都不杀。凡是不压迫士兵，不剥削士兵，不杀害人民的反动军官，我们一律释放回家。如果有人反映他的恶迹，我们就要开大会公审。”就这样国民党第二十八师师长公秉藩蒙混过关了。

五月二十日早晨，外边敲锣集合。赤卫队员把俘虏们叫起来，站好队，带着他们去苏维埃政府领路费。到一个窗口前，每人发两枚花边（银元），一张路条，俘虏们鱼贯而过，领了路费和通行证。事有凑巧，发到公秉藩那里，只剩下一块银元了，工作人员说：“你等一等，我们正在征收，等送到就发给你。”公秉藩一看士兵们都上了通往吉安的大路，心里着了慌，就说：“同志，吉安离这里不远，有一块花边足够花，我不等了，愿和他们一路同行。”工作人员说：“你既不愿等了，一同去也行。”公秉藩深深鞠了一躬，转身大步去追赶他那几个贴身卫士。走到中午时分，来到赣江。只见一只汽艇，汽笛长鸣，来回游弋。一个卫士用白毛巾挥动，船就开过来了。上面有一排武装士兵，排长报告是王懋德旅长派来专接公秉藩师长的。公秉藩就这样回到了吉安。

朱德、毛泽东指挥的第二次反“围剿”首战告捷，歼灭敌二十八师全部和四十七师一个旅的大部，缴枪五千余支（挺）。公秉藩师部七部电台，其中包括一部一百瓦特的电台，以及无线电



队全部人员,均被红军缴获。有了一百瓦特的电台,苏区就可以直接和上海通报了。为了避免机器的损坏和技术人员的散失,黄公略军长派了一个参谋带领一个特务连专门看管,安全送到方面军总司令部。

红军主力五月十七日在富田胜利会合。按照毛泽东的作战方略向东横扫,第二天,红三、四军猛攻水南。敌四十七师歼部退到水南,与原驻水南的四十三师一个团合兵一处,听说二十八师被全歼,充满了失败惊慌的情绪,很快就被红军击溃了,复退往白沙,红军乘胜追击,十九日围攻白沙,截住逃敌,全歼四十七师一个旅的残部和四十三师的一个团,缴枪四千余支(挺)。

属于五路军的第五十四师这时在藤田布防,红军再横扫过来,就轮到他们了。师长郝萝龄召集重要干部商量对策。一六二旅旅长李大同说:“敌人是实行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办法,一个师、一个师地往这边打,哪一个师也顶不住。我看今天四十七师就得垮。人家连夜来,不等天亮,明天就来打咱们来了。硬挺着挨揍,不是办法,快把沙溪一个旅撤回来吧。”郝萝龄沉吟毕晌,采纳了李大同的意见,深夜下令将一六一旅从沙溪撤回。随后四十七师被打垮的消息也传来了。李大同又说:“干脆还是远远脱离敌人,撤回永丰吧,免得敌人找上来。”大家同意,郝下令连夜退往永丰。

这时二十六路军收到南昌行营的电报,说红军正向郝萝龄师进攻,令位于南团的二十七师迅速救援。师长高树勋决心取道中村,向藤田前进。由南团到中村,仅十华里,但道路狭窄,只能单人通行,路旁全是密密的竹林,高树勋率师部走了三个小时才到达中村。由于郝萝龄率五十四师未打而先撤,使高树勋师处于突出暴露的不利地位。五月二十三日,红三军团为左翼,红四军为右翼,将二十七师包围在一条南北狭、东西长的山谷中,

歼来其两个多团，缴枪三千余支（挺）。高树勋率残部奋力冲击，与孙连仲合兵一处，向宜黄撤退。

朱德、毛泽东在二十万敌人的包围圈里，指挥三万红军，打一仗胜一仗，所向披靡，这使新到苏区的中央局领导人不能不佩服。重大作战行动都要经过苏区中央局指批准，费时费事，且有贻误戎机之虞。于是项英开五月份让位，由毛泽东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

五月二十四日在南团重新成立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毛泽东为书记。这样毛泽东又获得了全部指挥权和最后决策权。二十五日，毛泽东在洛口严坊召开第一次总前委会议，决定二十六日全军开到广昌县古竹集中，下一个作战目标是敌六路朱绍良部。

朱绍良慑于红军声威，于五月二十三日带领八师、二十四师由广昌向南丰撤退，留胡祖玉第五师防守广昌，朱德、毛泽东令红三军经甘竹向南丰方向追击北逃之六路军主力，指挥红军主力直逼广昌城下，于二十六至二十七日攻克广昌，歼敌一部，击毙第五师师长胡祖玉。敌五十六师约七千人，自安远以南仓皇窜回建宁城。

朱毛决定：加派红四军第十师北上南丰，协同红三军继续追击，切断南丰与建宁之间的联系；亲率红三军和红二十军万余人，继续向东，出敌不意于五月三十一日拂晓袭击建宁城。在建宁北门外的溪口及其左侧高地，与守敌主力一六七旅发生激烈战斗。战到下午二时，该旅旅三三二团及三三四团伤亡惨重，渐不能支。旅长刘尚志跑回城里向师长刘和鼎要求撤退，未等刘和鼎答复，他就给三三三团、三三六团下了撤退命令。在一片混乱中，刘和鼎率五十六师残部五六百人逃回将乐。建宁战斗歼敌三个多团，俘敌三千余人，缴获各种枪二千五百余支（挺）和大批西药，这些药品可供方面军半年之用。

至此,朱毛指挥三万红军,从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自西向东: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建守、横扫七百里,五战五捷,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两万余支(挺),子弹百余万发,粉碎了二十万敌军的第二次“围剿”。红军伤亡四千余人。

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充分表现了毛泽东的军事天才。蒋介石以二十万装备精良的军队“围剿”三万红军,孤立地、静止地计算兵力对比,七比一,应该是有胜利把握的,蒋介石就是这样想的。一般军事家也都是这样看。但毛泽东认为:“敌虽七倍于我,但分四路来攻,散在山川阻隔的广阔空间,不进到一定位置,各路不能够互相支持,这就给了红军各个击破敌人的机会和条件。根据各方面情报和敌人廷力展开的情况,毛泽东决定集中兵力打敌第五路军。因为第五路军刚从北方调来,情况不明,水土不服,与敌其它各路关系不密切,打这一路,其它几路不会积极增援。打这一路,也不是同时对付四个师,而是着重打它处于右翼突出暴露位置的二十八师和四十七师。对这两个师又不是一口吞下,而是再分割,拣最弱的打。毛泽东将红军主力埋伏在东固山区,当打响第一仗时,敌在前线作战的不是二十万大军,也不是四个师,而是二十八师一年多人的一个师部,不是敌七倍于我,而是我几十倍于敌。毛泽东是这样表述他的军事思想的:处于战略上内线作战的军队,特别是处于被“围剿”环境的红军,蒙受着许多的不利。但我们可以而且完全应该在战役战斗上,把它改变过来。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个别的小围剿。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分进合,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分进合击。将敌军对我军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战斗上的优势。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变为战役或战

斗上的强者的地位。这即是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蒋介石也算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大军事家。扫平吴佩孚、孙传芳、打败阎锡山、冯玉祥，兵多将广，械精粮足。但和毛泽东一交手，则显得呆头呆脑，笨手笨脚，总是棋差一着，输个满盘。蒋介石深知，只要毛泽东不被共产党内的派系斗争搞垮，将来与自己争夺天下的必是此人。因此，下定决心，一定要在他羽毛未丰，气候未成之时打败他。于是，紧接着部署第三次“围剿。”

一九三一年六月二一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面对着狼狈逃回的各路将领，气不打一处来，大骂诸将无能，并出现了痛哭失声的失态场面。他宣布立即增加兵力，调整部署，发动第三次“围剿”，并“御驾亲征”。他要在战场指挥才能方面和毛泽东一见高低。最后他发誓说：“这次围剿如不获全胜，死也不回南京。”第三次“围剿”增加了他的嫡系部队五个师十万八，还调了一些杂牌军，加上原来在江西的部队，总兵力达三十万人，在数量上超过红军的十倍。其战斗序列和兵力部署如下：

蒋介石亲自担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均驻南师，并聘请英、日、德等国的军事顾问随军参谋策划。

以何应钦兼任左翼集团军总司令，辖两路进击军和两个军团。蒋介石嫡系四个师编在左翼集团军，是这次“围剿”的主力。其部队编成是：

第一路进击军，为蒋的嫡系第六师，由赵亲涛任总指挥兼师长。

第二路进击军，为蒋的嫡系第十八军的两个师，由陈诚任总

指挥兼十四师师长，罗卓英任十一师师长。

第三军团，总指挥朱绍良，辖第五师（师长周浑元）、第八师（师长毛炳文）、第二十四师（师长许克祥）。

第四军团，由蒋的嫡系第九师编成，由蒋鼎文任总指挥兼师长。

右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驻吉安，指挥一路进击军和两个军团，担任助攻任务。其部队编成是：

第三路进击军，总指挥上官云相，辖第四十七师，上官云相兼师长；第五十四师，师长郝梦龄。

第一军团，总指挥蔡廷锴，辖第六十师，师长蔡廷锴兼；第六十一师，师长戴战；第五十师，第二军团，总指挥孙连仲，辖第二十五师，师长孙连仲兼；第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

总预备军为蒋的嫡系第十师和攻城旅，由卫立煌任总指挥兼十师师长。

还有执行“清剿”和维护后方安全任务的八个师另两个旅，这些部队的番号是：第二十三师（师长李云杰）、第二十八师（师长公秉藩）、第五十三师（师长李韞珩）、第五十六师（师长刘和鼎）、第七十七师（师长罗霖）、第七十九师（师长路孝忱）、骑兵第一师（师长关树人）、第四十九师（师长张贞）及第十二师三十四旅、新编第四旅。

另有空军一、三、四、五、七队配合作战。

蒋介石计划，以三路进击军和四个军团，共七路大军，由北向南猛插，贯穿赣南苏区，直到赣南后部，消灭红军之全部或大部。七月一日，蒋介石签署了第三次“围剿”作战命令。担任主攻的左翼集团军七个师从南城、南丰向广昌、宁都、石城前进，寻找位于建宁地区的红军主力决战。右翼集团军七个师由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一线南进。

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毛泽东在南丰县康都召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着重讨论粉碎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作战地区选定问题。七月十日，毛泽东和朱德率部从建宁地区分路出发，沿闽赣交界的武夷山脉，经宁化、长汀、瑞金，避开敌人前锋，绕道千里回师，于二十二日抵雩都县北部银坑地区；与左右江暴动诞生的红七军（军长李明瑞，政治委员葛耀山）在这里会合。朱毛决定，将红七军编入红三军团，参加这次“围剿”作战。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和朱德率红军主力到达兴国县高兴圩地区。

这时，蒋军上官云相指挥第三路进击军两个师由永丰出发经沙溪来到龙冈，与陈诚率领的第二路进击军两个师在这里相遇。陈诚对上官等将领说：“我从宁都绕了一个大圈子，也没有碰见敌人。他们看见大军追剿，都已流窜了。”上官等人听了，心里立刻轻松了许多。说罢就分手了。陈诚率部向东固方向前进。

八月三日，蒋军每军团三个师进至崇坚，第一路进击军（第六师和第四军团）第九师到达兴国，第二路进击军（第十一师和第十四师）到达富田，第三路进击军（第四十七师和第五十四师）正向良村、莲塘前进中，这时，朱毛率红军主力在高兴圩，北、东、南三面受敌，西临赣江，情况十分严重。毛泽东和朱德，不失大将风度，沉着平稳，在转移途中召开作战会议。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红四军军长林彪、红三军军长黄公略、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耀、红七军军长李明瑞、红三十五军军长邓毅刚和总参谋叶剑英都到了。在一个狭谷的谷底，两侧高山耸立，林水葱茏，非常隐蔽，毛泽东叫参谋点亮马灯，把地图铺在地上，用马灯压住翘起来的地图的一角，从容地说：“现在开会。请总司令讲话。”朱德戴上眼镜，凑近地图，众将领站起起围了一圈，不约而



同地把头伸过来,好象在看一局精彩的象棋比赛。只见朱德的大手比划着:“最后得到的情报是这样,南面富田是陈诚指挥的十八军两个师,北面兴国是赵观涛指挥的一个师,东面崇贤至东固一线是蔡廷锴指挥的十九路军三个师,西面是赣江,敌人三面包围了我们,企图寻我主力决战。但是敌人并不知道我们就蹲在这里。在江背洞和崇贤之间有四十里的间隙地带,我和毛政委的意见,我们要从这里钻出去,转向莲塘寻求战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跳出敌人的合围圈,为达此目的,我们意见,红三十五军和红十二军三十五师,再配属一些地方武装,伪装成红军主力,向万安、良口方向退却,将敌人主力吸引过去,只要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就夺回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大家又议论了半个小时,决定了各部队的行军路线和次序。最后,毛泽东特别向红三十五军军长邓毅刚交代:“一路上要大张声势,扬旗鸣号,多号房子。只有把敌主力牵走,我们这边才能得手。”

八月四日,红三十五军跳出敌人的合围圈以后,向西面的万安前进,故意淌起尘土,只见红旗招展,烟尘滚滚,人喊马嘶,气魄浩大,真像一支几万人的大军。飞机转了几圈;就回去报告去了。战士们讥讽地说:“呸!还美呢!送假情报去吧。”为了让敌人证实空中侦察的正确性,第三十五军派出人员,在行军的贫路口,用白灰画上箭头,写上“三军团由此前进”

“四军由此向两”。一到宿营地,只要会写字的都拿起笔来号房子,见门就写:“团×营×连驻地”。在显眼的墙壁上还有留言:“××同志:速到前面×地找我,有事要。番号呢,只要红军有的,随意写就是。”这些情报到了南昌,就变成了蒋介石和何应钦定下决心的基础,令陈诚率第二路进击军两个师西进,向万安进攻;令赵观涛率第一路进击军(一个师),蒋鼎文率第四军团(一个师)向赣江边的良口追击,求歼红军主力于赣江东



岸。等蒋军嫡系四个师呼啸西去,八月五日晚,朱毛率三万红军主力从江背洞和崇贤之间四十华里的空隙东移,六日中午来到连塘,专等蒋军第三路进击军的到来。

且说蒋军第三路第五十四师师长郝梦龄带两个旅于八月五日来到了良村。第二天上午,上官云相率该路四十七师谭子钧旅和五十四师张奎韶旅也到了。上官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对师旅长们说:“我打算把良村作为据点,由一六〇旅和军部特务营先在这里构筑工事,巩固这个据点。派四十七师谭子钧旅进占良村以南三十里的莲塘村,警戒南面。四十七师裴昌会旅上来后占领良村以北的要点,警戒以北和以东方面。五十四师向西南兴国方向搜索前进,和右路友军会师兴国。大家没有表示异议,便决定依计而行。”

散会后,上官云相摆上大烟盘,要抽烟过瘾,正在喷云吐雾,谭子钧来了急电,说他们到达距连塘五里地时,部队正在山沟里行军,突然两面山上发现大部红军,整个将他们包围,用猛烈的火力攻击,部队陷于极不利的态势,伤亡很大,万分危急,请火速驰援。上官很沉得住气,抽足了烟,派了一个排去侦察。睡了一觉,到天亮那个侦察的排也没回来;又派了一个连去,等到中午,又没见回来;下午派了一个营再探,还是有去无回。到八月七日晚上七八点钟才给五十四师师长郝梦龄发电报,令该师两个旅连夜返回良村。郝梦龄令一六二旅旅长李大同率部先回。一六二旅连夜急行军赶回良村。李大同见了上官云相,上官命令李旅接替一六〇旅在良村四面山由的防务,叫一六〇旅驰援谭旅。李大同遵令接防,一六〇旅在旅长张奎韶的带令下准备前往莲塘。

上官云相正在抽大烟过瘾,谭电员送来十九路军的一份情报,接过来边看边对李大同说:“友军来电,有两万余敌军向我

们方向窜来,要我们多加注意。”

李大同说:“两万多,力量这么大,谭子钧怎么受得了?再去一个旅也不行,顶不住哇!”上官说:“这怎么办呢?裴同野(裴昌会子同野,时任四十七师旅长)旅在后面还没上来呢。”

李大同说:“这里东西要紧,西面没情况,我把防守西边的六团撤下来,叫他们跟张旅一起上去。”

上官说:“只好如此了,谭子钧犯了行军大忌,哪有山地行军,不搜索两边的道路。他这一被围,搞得全军都被动了。”

李大同说:“军长说得对,谭子钧犯了对两面山上不严密搜索的毛病,闷头前进,仓促遇敌,无法展开,吃子大亏。我想,敌人预料我们必然派队驰援,在良村以南两面山上也设了埋伏。军长派的侦察部队一定也犯了同样的毛病,只顾迅速向前侦察谭旅情况,钻进了敌人的『口袋』,遭到了状击,所以就一去不返了。”

说完这话,李大同辞别上官出来,叫传令兵把六团团团长刘神如找来,面授机宜:“你在一六〇旅后面出发,不要跟得太紧,要离开四、五里地的光景。如果前面部队遇到情况,你好有展开余地,注意一定要抢占高地。千万要派出尖兵连,对两侧山上一面搜索,一面前进,不要以为张旅在前面,就平安无事。现在你等他们走后半钟头再出发吧。”

一六〇旅走了半个小时,六团还没有出发,只听前方枪声激烈,一阵骚乱,一六〇旅退下来了。原来一六〇前半截钻进了红军的「口袋」,遭到伏击,后半截回头就跑,溃败下来。这时,五十四师师长郝梦龄带着师部机关以及担负后勤运输的骡马车辆也开进了良村,人困马乏,机关急着号房子,运输队人员骡马在街头巷尾横躺竖卧,倒在地上就睡着了。

郝梦龄问明情况后,急忙拉李大同到了村外,用手往东指着

说：“你看，东面这个大山口子，十分重要，必须派重兵把守。第五团防线过长，兵力分配不过来，守山口的人太少。敌人如果从这个山口冲进来，就全完了。你去传我的命令，把工兵营和特务营都拉上去，守这个口子。”李大同去传达命令。工兵营遵令上去；特务营营长说先埋锅造饭，吃了饭再上去，实际根本没有执行命令。

正在这时，东面山口子枪声大作，军号齐鸣，红军高呼“活捉上官云相”的口号，象湖水一般上来了。上官一看形势危急，立即下令拆电台，收拾行李，准备跑。

一六二旅旅长李大同见状问道：“军长，这里怎么办？”

上官说：“裴旅怎么还没到，我去找他们去，叫他们马上增援上来，你在这好好顶住吧。”

李大同转身去找顶头上司五十四师师长郝梦龄，郝梦龄已经不知去向。

李大同举目四望，满山遍野都是四十七师和五十四师溃退的官兵，谁也不理谁，只顾个人逃命。李大同大喝一声：“架起机关枪来，谁退就打谁。”

一六二旅参谋长宋肯堂说：“旅长，现在没法守了，指挥系统全乱了，连官都找不着了。你遇见五十四师的，他硬说是四十七师的，连长不承认是连长，排长不承认是排长，你怎么指挥呀！眼看敌人进来了。现在不退，我们就得当俘虏了。”

李大同愣了一会儿，低声说：“军长、师长都走了，我们也走。”说罢带着特务连和旅部人员加入了溃退的洪流。

红军初战大胜。在莲塘全歼四十七师一个旅，击毙旅长谭子钧。继又在良村歼灭向莲塘增援的第五十四师一六〇旅一个团，击毙旅长张绍奎。在追击逃敌中，又歼五十四师一部，毙敌副长魏我威，参谋长刘家祺。莲塘、良村两仗，共歼敌两个多旅，

俘敌三千五百余人。继获各种枪，三千一百余支（挺），迫击炮十四门、马二百余匹。

良村战斗后，朱德、毛泽东令红三军佯攻龙冈，率主力继续东进，于八月十一日包围了黄陂。守黄陂的是毛炳文的第八师。他们居高临下，踞守着有利地形，又修好了工事。朱毛决心：以红四军、红十二军（欠三十五师）由黄陂南侧实施主攻，红三军团并指挥红七军迂回到黄陂东面，断敌退路。当天中午，天降大雨，乘守敌松懈麻痹之机，集中的炮火突然打向敌人的前沿工事，几十名号兵一齐吹起了冲锋号，林彪指挥红四军和红十二军主力冒大雨发起攻击，一举突入黄陂，歼敌两个多团。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和红七军从东方发起攻击，歼敌一个多团。午后三时，敌师长毛炳文率一残部向洛口、宁都突围而去。这次战斗，共歼敌约四个团，俘敌四千多人，缴获各种枪三千余支（挺），迫击炮十一门。

朱毛红军从八月七日至十一日，三仗三捷，共毙伤俘敌一万余人，从被动中夺得了主动。随转到君埠以东君领导雪山区，利用占斗间隙休整待机。

蒋军三十万，进入赣南苏区四十天，跑了上千里路，硬是没有找到红军主力，气得蒋介石七窍生烟，发誓要和毛泽东决一死战。

## 29 出使国际 陈绍禹临危避祸 建都瑞金 毛泽东暗降明升

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五日,朱德、毛泽东利用蒋介石急于找红军主力决战的心理,令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谭地要率该军主力(欠三十五师)大张旗鼓地向东北方向行进,并攻占了乐安县城。蒋介石果然上当,急调卫立煌率总预备军第十师赶到临川,加强防守;同时下令赵观涛和陈诚率一、二路进击军追击。敌军主力被牵走了,朱毛红军由群埠转移到兴国东北的白石、枫边地区,以逸待劳,休整了半个月。

九月初,两广军阀利用蒋军主力深陷江西苏区之际,向湖南衡阳进兵,对蒋介石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在此情况下,蒋下令结束第三次“围剿”,实行总退却。蒋军在赣南来回奔波两个月,劳师无功,士气低落。朱毛抓住战机,九月六日发起老营盘战斗,歼灭蒋鼎文第四军团一个旅,俘敌二千余人,缴获各种枪两千支(挺),迫击炮十门。七日发起高兴圩战斗,毙伤蔡廷锴第一军团两千余人。十三日发起方领战斗,歼灭第一军团第五十二师,俘敌五千余人,缴获各种枪四千五百余支(挺),马二百余匹;师长韩德勤被俘,混在俘虏里又跑掉了。

方石领战斗后,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在指挥部队转移时,遭敌机空袭,腹部中弹,不幸牺牲。至此,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围剿”又失败而告终。朱毛指挥红军共歼敌十七个团,三万余人,

其中俘敌两万余人，缴枪两万余支（挺），子弹三百万发。红军伤亡约六千人。

十月二日，朱德、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总部到长汀。红军各部队按总部指定的区域展开；红三军和独立第三师（由红三十五军改编）位于瑞金以西之雩都地区，尔后向筠门岭、寻乌、安远、重石地区推进；红四军位于瑞金以北石城南部地区，尔后向石城北部地区推进；红十二军同闽西根据地的新十二军合编后，位于瑞金以东之长汀地区，尔后向宁化、连城地区推进；红三军团（包括红七军）和新成立的独立第二师位于瑞金以南之会昌地区，尔后继续向外扩展。各部队在四个月的战略进攻中，攻占会昌、寻乌、安远、石城等县城，拔除了豪绅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团子几百处，消灭了大量土杂武装，在新占领的地区，建立政权，分配土地，建立党团组织，并动员一万二千名青年参加红军。至此，中央苏区发展为联成一片的二十一个县，赣南有黎川、广昌、瑞金、兴国、宁都、石城、雩都、信丰、会昌、安远、寻乌等十一个县，闽西有建宁、秦宁、宁化、清流、长汀、连城、上杭、龙岩、永定、归化等十个县，面积达五万平方公里，人口约有二百五十万人。这是中央苏区的全盛时期。

上海的中共中央，在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后。陈绍禹，（王明）则成了名实一致的中共中央第一把手。但这个第二把交椅实在不好坐。王明是个胆子很小的人，他不敢在中央会议上露面，成天生活在恐怖之中。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搬到上海郊区的一座疗养院去住。委派康生、陈云为他安排。为了安全，他要租下疗养院的整个一层楼，为此，中共中央支付了一了安全，他要租下疗养院的整个一层楼，为此，中共中央支付了一笔相当可观的租金。办妥后，陈绍禹和他的妻子孟庆树就搬了进去，足不出户，过上了隐士生活，事无大小

全部交给康生、陈云去办。七月间，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个机关又被国民党破获。王明心惊肉跳，再也不敢留在上海，要求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由米夫替他活动，共产国际批准后，他提名二十四岁的秦邦宪（博古）代替他为中共中央的总负责人。四中全会选出的领导班子并没有秦邦宪，他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一下子当了总书记（习惯称呼）。经共产国际批准，由秦邦宪、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六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秦邦宪、张闻天、卢福坦为常委，秦邦宪负总南。陈绍禹再三关照秦邦宪，大事都得请示共产国际，决不可擅自决定，更不能听信于他人。九月二十日，在陈绍禹的授意下，临时中央起草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这个文件的主要精神是：

“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正在加速的进行着……写出了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

要求苏区的党，在冲破了蒋介石第三次“围剿”之后，必须立刻在政治上与军事上巩固已行得到的胜利，更坚决更彻底的执行国际与中央的一切指示…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之下，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

再一个要求是“在十一月半前，各苏区必须选出和派出代表参加中央苏区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选举时必须做最广大的宣传鼓动工作，更彻底的实现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法令。中央苏区必须在十月革命切正式成立苏维埃全国临时中央政府。坚决的与那此借口军事紧张而推迟这一工作的错误倾向做斗争。各苏区也必须于十月革命节前成立当地苏维埃政府。”

王明授意临时中央政治局起草的这个文件，实际上是他出国前的政治交代，要博古监督执行。王明走了，王明路线留下



了。他要苏区中央局办的两件事：一件打下一个像样的城市作为红色首都：一件在苏联十月革命节之前成立苏区中央政府，是有深刻的用意的。王明盘算着，他到莫斯科的时间正好赶上十月革命十四周年纪念日，他要向斯大林献上一份厚礼：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了。他没有辜负共产国际的期望，上台半年多的时间，就身手不凡，在中国革命舞台上做出了新成绩，开辟了新局面。王明果然受到共产国际的奖赏，在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五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二十次全会上，他成为执行主席之一，会后又当选为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成了国际共运的领袖人物。

苏区中央局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至五日在瑞金叶坪召开了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会议在项英和任弼时的主持下，通过了《政治决议案》，说“苏区党的最严重错误就是执行了立三路线”，不指名的批评了毛泽东，具体问题有四个：一是“富农路线”。在土地分配问题上，毛泽东制定的政策是“以乡为单位，把这一乡所有的土地山林都算起来，分为上中下三等，折为谷的担数，再算这一乡有多少人（地主家属、富农都算在内），不论男女老少按人口平均分配，近山的多分山，近田的多分田，由农民原有土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确定土地私有权。”《决议案》认为“分配土地给一切人”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被没收土地的所有者，没有分配任何土地的权利。”“富农在没收土地后，如果不参加反革命活动而且用自己劳动耕种这些土地时，可以分得较坏的劳动份地。”所以后来把王明路线的土地政策概括为“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

二是“狭隘经验”、“游击主义”。《决议案》认为“为使红军能够担负起大规模作战和争取一省与几省的首要胜利的任务，

红军中的一切工作必须实行彻底的转变,完全脱离游击主义和小团体主义传统……要教练阵地战、街市战、白刃战、夜战的技能,要坚决反对落后的阻止红军技术进步的狭隘的经验论。”

三是“以党治国”。毛泽东建立的苏区最高领导机关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他以总前委书记的名义发号施令,不论红军各部队、地方党、苏维埃政府、各群众团体都可指挥调动。王明路线认为这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余毒”。在《关于红军问题的决议案》中指出“打破党的包办主义,把红军中超过政治委员、政治部的职权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取消。”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之下,再次取消了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再次撤消了毛泽东的总前委书记职务。同时规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是中国正农红军高级的指挥机关,管理红军的组织与给养以及教育熟练并指挥红军作战行动。”

四是“肃反扩大化。”决议案指出:“中央区的肃反工作是获得了伟大胜利,反 AB 团的斗争是正确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在肃反工作中仍旧有很大的错误。首先反 AB 团底思想斗争与群众中的教育工作更是非常缺乏,尤其是反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第三党、取消派、右派的斗争更是缺乏,而把反对一切反革命派的斗争缩小到破获、捉拿、处决的范围里去。同时,又把一切反动分子,一切不满生活与群众政治生活落入非常状态,这是把反 AB 团的斗争简化了,并且过分估量 AB 团底力量,轻视革命力量,因此发生恐怖,而把 AB 团扩大化。”

赣南会议批评毛泽东的这几条错误,前三条是颠倒是非,站不脚的,只有第四条是符合实际的。富田事变前后反 AB 团的竞争,错杀了很多人,冤枉了更多的人。毛泽东写的《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就承认“此次红军破获 AB 团四千四百以上”,占红军总人数的九分之一;地方党政机关比例更大,有的整县、整乡

的党员领导被当作 AB 团分子拉出去枪毙了。

据罗荣桓回忆红四军肃清 AB 团的斗争,把政治部的几个部长、科长都抓起来了。连刚从十师调来的勤务兵、十四岁的王东保也被指控为 AB 团,入了狱,准备第二天就杀。罗荣桓去视察监狱,一进门就见着王东保,问他:“怎么回事?”

王东保一见是罗政委,连忙站起来,用袖子擦擦眼泪,说:“我就是帮助他们买了半斤花生米和一斤酒……”

罗荣桓皱起了眉:“你不要哭,慢慢地讲,帮谁买了花生米和酒?”

王东保说:“就是十师宣传队的,前几天杀掉了,我不晓得他们是 AB 团……”

罗荣桓以军政委的权威责问陪他前来的保卫局的干部:“一个小孩子,怎么会是 AB 团,把他放了。”

处理完王东保的问题,又有人反映,军部特务营政委陈志坚打 AB 团很不得力,右倾手软,说不定本人就是 AB 团;兴国县抓 AB 团最多,萧华是兴国县人,也有 AB 团的嫌疑。罗荣桓不听信这些捕风捉影的猜测,将他们保护起来。

红四军撤到宁都时,军政治部通知红十二师师长萧克和政委张赤男说,红十二师的宣传队长和一个队员是 AB 团,于是师里立即将这二人逮捕,提审时,这两个人不承认;一用刑罚,承认了,又供出了十几个人。再抓,再打,再审,这十几个又供出几十个。到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底,这个师已抓了一百多人。当时前委规定,捕人由各团党委决定,杀人由各师党委决定,毋须向军党委和前委请示报告。十二师准备杀三十多个人。就在准备行刑的这一天早晨,萧克感到杀这么多人有问题,便骑马到军部向罗荣桓报告。罗荣桓和红四军军委秘书长黄益善接见了萧克。罗荣桓明确答复:“不能杀。”萧克立刻策马回到师部,救下这三

十多人。红四军是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老底子发展起来，可以说是政治质量最好的部队，连这里都抓出这么多 AB 团来，别的部队和地方党政权关就可想而知了。红四军有个罗荣桓，红十二师有个萧克，使许多“该死”的人侥幸活下来了。有些部队主官奉命唯谨，许多人就做了刀下冤魂了。

历史应该是公正的。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记头功的是苏区最高领导人，总前委书记毛泽东；萧清 AB 团，处理富田事变，萧反扩大化，首要责任者，也应该是毛泽东。

会议开到最后，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再由项英代理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正是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那一天，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场设在瑞金叶坪松山冈子，就在露天广场上举行。广场上搭起了一座披红挂绿的大会主席台，台口顶上会标高悬：“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台口两侧彩门式翠柏青松枝叶上，有对联一副：

镰刀劈碎旧世界 铁锤打出红江山

主席台正中悬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巨幅画像，两边各有一面巨大的红旗。

会场四周红旗招展，一幅幅大字标语牌林立其间，写的是：

建立苏维埃，工农来专政！

实行新制度，人民大翻身！

无产阶级领导革命，必定最后成功！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华苏维埃万岁！

中国工农红军万岁！

会场的绿色草坪中间，又用洁白的石子铺成一行大字：

踏着先烈的血迹前进！

在当时的物质条件,虽然尽可能把会场布置得庄严隆重;但在今天看越来,这个开国大典,比一个工厂的基层工会选举还要简陋。没有麦克风和镁光灯,没有大礼堂,没有宴会厅,没有新建的政府大楼,更没有外国政府的贺电。虽然物质上是简陋的,但与会者们的精神是富有的。他们有这个气魄把自己在这个山沟沟里成立的政府看成是与得到全世界列强承认的南京国民政府相对立、相对抗的政权。他们自信,有朝一日推翻蒋介石政权,在中国建立一个新制度、新国家。与会者们是怀着神圣的使命感来参加这个盛会的。出席会议的代表之一陈毅对毛泽东说:“将来夺取了全国政权,我要出任外交部长。”毛泽东拉着陈毅的手一说:“一言为定。”

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是:项英,周以栗、曾山、朱德、张鼎丞、陈正人、邓发。项英是会议的主角,主持了开幕式。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临时政府对外宣言》、《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关于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决议案》、《关于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决议案》、《告全国工人与劳动大众书》等文件。十一月二十日,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共六十三人:

毛泽东 项东 张国焘 周恩来 卢福坦 朱德

瞿秋白 张鼎丞 鄂发 王稼祥 徐锡根 范乐春(女) 陈绍禹  
彭德怀 关向应 孔荷宠 方志敏

任弼时 贺龙 沈泽民 谭震林 黄平 曾山

林彪 陈郁 罗登贤 夏曦 邓子恢 刘少奇

刘达朝 陈正人 袁德生 瞿琪 屈登高 段德昌

葛耀山 彭执 陈福之 吉大存 韦拔群 张华先  
何叔衡 黄苏 胡海 滕代远 萧恒太 罗炳辉  
陈毅 张云逸 周以栗 卢德光 胡均鹤 徐特立 邵式平 洪紫清  
刘光万 余汉朝 吴致民  
刘建中 李宗白 刘先元 王永盛 阮啸仙

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这个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相当于国家元首。从此，人们称毛泽东，不再叫毛委员、毛政委，而改称毛主席。这个称号，终毛泽东的一生。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面，设人民委员会，相当于国务院，是最高行政机关。组成人员是：

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项英

外交人民委员：王稼祥

军事人民委员：朱德

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

劳动人民委员：项英（兼）

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在上海）徐特立（代）

内务人民委员：周以栗

司法人民委员：张国焘（在鄂豫皖）

最高法院院长：何叔衡

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

执行部部长：李克农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主席：朱德

副主席：彭德怀 王稼祥

委员：朱德 彭德怀 王稼祥 林彪 谭震林 叶剑英 孔荷宠 周恩来 邵式平 贺龙 毛泽东 徐向前 张国焘 关向应 王盛荣

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了全部议程，胜利闭幕。闭幕后，进行阅兵，红军战士排成六个方队，穿着灰色新军装，戴着八角帽，手持明晃晃的上了刺刀的步枪，整齐雄壮地通过主席台：接受新选出的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晚上，举行了盛况空前的提灯游行，把欢乐的气氛推向高潮。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了。毛泽东是中央政府主席；相当于国务院的人民委员会组成了，毛泽东又是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担任了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这样两项职务。从此，毛泽东名扬四海，成了共产党、红军和红色政权的象征。

但实际上，通过苏区中央局第一次代表大会和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大权旁落了。在苏区中央局，给他保留了个委员的位置；在中革军委，也只给他保留一个委员的位置。成立中革军委的通令中向中共全党全军宣布：“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即取消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及其组织。”不能领导党和指挥红军，毛泽东这个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是寸步难行的。虽然这样，毛泽东还是走马上任了，他带着贺子珍来到叶坪，被领到给他备的主席官邸的门前，推门进去，只见房子里除了几个盛谷子的空罗筐以外，一无所有。毛泽东半晌无言，心中一阵酸楚，想起当总政委、总前委书记时，谁敢不尊敬？行军作战条件再差，也要把当地最好的房子留给毛泽东，如今管理部门竟然这样势利眼……。还是贺子珍开朗，叫警卫员到老百姓家里借来两块门板，架在箩筐上当床铺，他们就这样住了。

叶坪大部分青壮年都参军了，许多家庭剩下老弱妇女。苏维埃政府要求军队和政府干部，每周星期六帮助烈军属劳动，模仿列宁的义务星期六活动。毛泽东尽量抽出时间参加这一活



动,他戴上斗笠,和警卫员一起,到烈军属田里干活。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第三次“围剿”失败后,令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驻守。“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奉“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全国人民抗日反蒋浪潮高涨。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要求回北方抗日,遭到蒋的严厉拒绝。爱国将领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等开始酝酿寻找新的出路。在中共秘密党员刘振亚、袁汉澄(即袁血卒)、王铭五、罗亚平的帮助下,赵博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又在七十三旅、七十四旅、七十九旅、八十旅、总指挥部执法队发展了一批下级军官和士兵党员。军官和士兵分别建立了党支部。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秘密串连,酝酿起义。

十二月十日,派袁汉澄到瑞金红军总司令部进行了联系。军委主席兼红军总司令朱德和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接见了袁汉澄。朱、王听取了汇报后,立即召开军委会议,研究了二十六路军的情况,决定批准他们马上起义,并拟定了具体步骤和措施。会后,王稼祥陪同袁汉澄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完全同意他们的起义行动计划。当晚,袁汉澄住在了叶坪。第二天辞别王稼祥时,王稼祥拿出十块银元叫袁汉澄带上,说:“你任务艰巨,危险很大,这两天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身上多少带点钱,可以应付意外急需。这钱是少了些,但这是党对你的关怀。”王稼祥握着袁汉澄的手说:“为了万无一失,中央军委决定,我和刘伯坚、左权同志带上电台到宁都附近掌握情况。你带好密码,有事直接和我通报。告诉赵博生同志,按计划大胆进行。我们把红四军调到宁都城郊,接应你们。”袁治澄带着必胜的信念潜回宁都。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在中国地下党组织的周密策划和率领下,宣告脱离国民党阵营,加入红军。全军改编为红五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董

振堂任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十五军军长。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给他们颁发了委任状。五军团从此成为红军的主力之一。

毛泽东是不甘心当一个礼仪性的共和国主席的。一九三二年一月，毛泽东病了。中央局决定让他到东华山休养一段时间。东华山在瑞金以东二三十里的地方，是一个松苍柏翠的风景区。上面有一座古庙，久无僧道。有关部门派人把东厢房打扫了一下，毛泽东带上贺子珍和警卫员就在这里住上了。

毛泽东到东华山休养，随身带了他那两个出门必带的铁皮文件箱。闲来无事，他就打开箱子，把里面的文件翻出来阅读，有时候，他把几年来战斗中在马背上哼成的诗词，细细推敲、修改、再把它摘抄一遍。情绪好时还给贺子珍讲解诗词的意义和引用的典故。因为房子久无人住，潮湿阴冷，天气晴好时，贺子珍就动员毛泽东到室外晒太阳。她和警卫员把铁皮箱搬到院子里，找块木板当板凳，毛泽东在这里一坐就是半天，阅读山下送来的文件、报纸，读书，写字，还教警卫员吴吉清学文化。有时拿出洞箫来吹奏一曲，排解心中的烦闷。贺子珍和吴吉清上山砍柴、打草，毛泽东有时也参加，遇到老乡总要攀谈一阵，随时进行调查研究。共和国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无公可办，就这样消磨岁月。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周恩来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中旬进入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统一领导苏区的党政军各项工作。沿途他和一些干部谈话，了解到苏区肃反扩大化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周恩来一到瑞金，第一件事就是纠正肃反扩大化。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他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毛泽东作为委员也参加了。会议通过了《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决

议指出：

富田事变是 AB 团所领导的反革命暴动，过去反 AB 团的斗争是正确的，是绝对必要的，的确给 AB 团一个致命的打击，破获了 AB 团的重要组织，巩固了苏维埃政权。但是过去因为对 AB 团及一切反革命派认识不正确，将 AB 团扩大化了，以为一切地主残余富农分子都可当 AB 团看待，以为一切从异己阶级出身的分子都可能是 AB 团，把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犯错误的党员与群众都与 AB 团问题联系起来，甚至发展到连工农群众都不相信了。

反 AB 团反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方法不仅简单化，而且是恶化了，如专凭口供，大捕嫌疑犯，尤其是乱捕工农分子。乃至苦打成招，以杀人为儿戏。最严重的是党内因此发生恐慌，异己分子，夺回反革命欺骗影响下的群众，相反，反倒使我们自己的阶级阵线革命力量受到动摇与损害，这是最严重的错误。

周恩来纠正了毛泽东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但保护了毛泽东的威信，决议没有追究个人责任，没有点毛泽东的名。只在一月二十五日作出了《关于处罚李韶九同志过去错误的决议》，决定给他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派到基层做群众工作。

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建立起国家政治保卫局。派李克农率工作组到石城、广昌、雩都、兴国、平安寨等地，细致地审查，甄别在这些地方关押的大批反革命嫌疑犯，把整错的 AB 团、社民党、改组派案件全部给以平反，让那些蒙受冤屈的革命者重见天日。后又任命李克农为红军保卫局局长，甄别平反了红军中的一些冤假错案，将政治保卫工作纳入了中共党委领导下轨道。

### 30 赣州失利 书生用兵初碰壁 闽南报捷 润之出山展新局

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秦邦宪（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发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要求“必须依照中央最近的军事训令来努力求得将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

周恩来接到决议后，致电中共临时中央，说明中央苏区红军目前攻打中心城市确有困难。二十四岁的代总书记博古一心要打下一座大中城市作首都，将来作为中共中央总部的所在地，不察战场形势，不问敌情我情，蛮横地回电说：“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为执行中央指示，周恩来在瑞金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项英、任弼时、朱德、毛泽东、王稼祥、顾作霖等，列席会议的有总参谋长叶剑英、总政治部副主任聂荣臻。会上讨论的主题已经不是打不打中心城市问题，因中央一定要打；所能讨论的是在抚州、吉安、赣州三个城市作出选择。”抚州及其周围有朱绍良的十个师，吉安及其周围有陈诚的五个师，相比之下，只有赣州守军较少，且

与周围驻军关系不密切。所以，很快就转到了打赣州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赣州是敌人必守的坚城，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如一定要打，也只是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调动敌人材野战，打运动战。军委主席朱德也反对打赣州。项英极力主张执行中央决议，并说：“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开会时，我问过彭德怀，能不能拿下赣州？彭德怀说：赣州守军马昆旅有六千人，地方靖卫团两千人，共八千人，如有时间，蒋介石又不来增援，是可以打下来的。”与会多数附议项项的意见、最后表决，多数通过打赣州。这是执行王明路线决策的第一个军事行动。

三次“围剿”失败后，江西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坐镇南昌。他的军事部署是：赣西由陈诚负责。兵力有五个师，两个独立旅，固守吉安；东路有自己的十个师，坚守抚州、南城、上饶一带；赣南由绥署直接指挥以赣州为支撑点。赣州是赣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是连接江西广东两省的军事要地，座落在章水和贡水的汇合点，三面环水，只东南侧是陆地。四周城墙坚厚，守敌长期设防，易守难攻。驻守顿州的是镇军金汉鼎部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旅长马昆，辖六十七、六十八两个团及一个独立连，共三千余人。正规军之外，尚有赣南十七个县地主武装组成的民团五千余人枪，由民国头子萧升尺指挥，协助守城。

彭德怀的攻城部署是：以第七军（军长李明瑞、政委葛耀山）和第二师（师长郭炳生，政委彭雪枫）担任主攻，第一师（师长侯中英、政委黄克诚）位于沙石埠为预备队，第四军也第十三师（政委张际春）位于塘江及其以北地区监视可能增援赣州之

蒋军,并截击可能由赣州北逃之敌,第四军之第十师(师长王良),第十一师(师长周昆、政委张赤男)及第三军团之第三师(师长彭熬、政委徐策)分别于南康、新城、杨眉寺及王母渡地区,阻击可能增援赣州之粤军。江西军医、闽西军区共六个独立师以游击战配合。

二月四日至六日,受领任务之各师分别由会昌和石城地区进抵赣州附近。到处涂写巨幅标语:“夺取赣州,活捉马昆”“只杀马昆一人,不杀守城官兵!”马昆见红军声势浩大,经反复考虑,撤守东门外的天竹山和白云山,将城外防御工事毁坏,缩短防线,撤兵进城,建立火力点,构筑工事,挖掘坑道,以固守内围。实战证明,马昆的缩短防线,固守内围的方针是正确的。

围城一周后,红军以坑道爆破攻地。将东门月城的城门洞炸塌,造成进攻的一个缺口。红军战士发起冲锋后,遭到城门洞两异城墙上密集火力的封锁,伤亡很大,未能攻进城内。

距第一次爆城十天后,红军实行第二次坑道爆破,这次选在东门左翼的城域。不知根据什么认定爆破后城墙会向里倒塌因此组织了二百人的突击队埋伏在城外墙脚下,以便起爆后趁机攻入。但一声巨响之后出现了意外情况,城墙全部向外倒塌,突击队全部牺牲。

又隔了一个星期,红军组织第三次攻城。这次在东门的右翼爆破。突击部队四五十人乘爆破余威构带云梯攻上大城城楼,但未能巩固夺取的阵地,被守敌用火力压了下来。为了解除红军突上城楼的威胁,马昆亲自指挥从城楼上用绷索吊下迫击炮弹,撞击城门洞石板铺成的地面,产生猛烈的爆炸,造成攻城

部队很大的伤亡。第三次攻城又告失败。

这时,红军中有两人投敌,这两人是南昌起义时被俘的滇军,一个姓唐、原是排长;一个姓马,原是上士,曾在马昆手下干过。他们向马昆报告:三天以内,红军将第四次爆城,已装好三个炸药包,东门外的城墙将全被炸毁;正在调炮兵上来配合攻城作战。马昆获此情报后,连夜火速进行顽抗部署,决心弃守旧城墙,构筑新城墙。他不顾百姓的死活,悍然下令:将东门内整条铁匠街的房屋全部拆毁,并强令每户送一个沙包,构筑一条新的防御工事。当时赣州布店的布匹,不分颜色全被买光。有的老百姓无钱买布做沙包就用裤子扎成沙包送到阵地。当夜,第二道新城墙就筑好了,成为新的战斗屏障。

果然,第二天天亮,红军第四次攻城。当第一个炸药包点燃时,叶烟冲天,但没有起爆。这时马昆手下的一个亲信营长李自林大喊:“共产党倒霉了,炸药包冲丢了,第五连前进,占领原有城墙。”当他带领第五连冲到城墙根时,另外两个炸药包连续起爆,泥土砖石横飞,李自林和他带领冲锋的第五连无一幸免。但马昆率部坚守新的防御工事,红军连续四次冲锋,付出很大伤亡的代价,仍未攻入城内。战斗进入相持状态。

何应钦见赣州危急,下令第十八军三个师和两个独立旅,统由第一师师长罗卓英指挥,从吉安出发,经遂川到达赣州的对河,集结在赤主领。由于沿江上下游都被红军封锁,无法渡江,马昆夜间由北门用绳索吊出城外,偷越临时浮桥,跑到赤主领去见罗卓英,商议解围之策。马昆提出:“要解围不一定大部队渡江。支持我两个团和一个工兵营,再补充些弹药,我从城里可以



突围出来。”罗卓英照准，派一工兵营连夜随马昆由北门浮桥偷越进城，又令十一师三十三旅旅长黄维率两个团跟进，秘密潜入城内，受马昆统一指挥。马昆指挥工兵用一天一夜工夫在城的东南角和西南角各挖一条出城坑道。三月七日凌晨两点，马昆带两个团从东南角坑道冲出，黄维带两个团从西南角坑道冲出。围城红军连日作战疲劳过度，处于沉睡状态，仓促应战；城外敌军一部由西南面的杨梅渡、南桥间渡过章水，从侧后配合，致固守南门到西门的红三军第一师师长侯忠英以下全部被俘。

红军攻打赣州，历时三十三天，城未攻下来，反遭很大伤亡；整个建制师被俘这是有红军以来的第一次。撤团赣州后，主力转移到赣州以东南地区休整。

在东华山休养的毛泽东、自发起赣州战役后，连日心绪不宁，每天急着看前期的战报。有时没有战报送上山来，他就翘首远望，总希望山下有人上来。三月中旬的一天，乌云密布，大雨将至，警卫员看看天气，看看通往庙门的山路，突然说：“有人上山来了。”

“是谁？”毛泽东连忙发问。

“看不清，是两个骑马的。”

毛泽东站起来仔细望去，想看清是什么人，但因天低云暗，看不清楚。再等一会儿，来人快到庙门口了，这才看清，原来是项英和他的警卫员。

项英进了东厢房，一脸严肃的神情，毛泽东好像预感到什么，开门见山地问：“你这时候来，有什么事吗？”

项英说：“恩来同志让我来请你下山去，领导这次打赣州战

斗。”

他喘了一口气,接着说:“眼下,部队伤亡很大,敌人援兵又到,红军处境非常困难。中央局在前方召开会议,恩来说,一定请你下山,商量一下怎么收拾这个局面。”

上次中央局会议,在攻赣州问题上,项英和毛泽东是打和不打的两位代表人物。项英上山来请说明他知错认错,胸怀坦荡,出以公心。所以毛泽东敏捷地站起,爽快地说:

“我马上就下山,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来。”

送走项英,毛泽东立即叫警卫员收拾东西。这时,天空一个霹雳,紧接着一个闪电划破长空,暴风雨来了。

贺子珍说:“等雨过了再走吧。你身体不好,再淋病了……”

毛泽东笑着说:“我一到了战场,病就好了。等雨停了,你回叶坪去,在那里等我。”

毛泽东迎着暴风雨,打着一把伞,下山了。到了山下,雨停了。

毛泽东骑上他的黄膘马,后面一勒缰绳,战马前蹄腾空,后腿直立,仰天长啸。然后平稳地驻足山巅,毛泽东举目远眺,碧空如洗,峰密滴翠,足下驿道无限延伸,有一种任重道远之感。

三月中旬,在江口召开的苏区中央局会议上,毛泽东锦囊在胸,提出向赣东北方向发展,以求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领山脉以北的广大农村建立苏区。但这个意见,未被多数同志所接受。多数同志认为,打赣州是错了,夹赣江而下,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其它城市。

为执行新的作战任务,中央红军重新进行了编组。加之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官兵一万七千余人在赵博生、董振堂等领导下,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宁都起义,通电反对蒋介石,加入红军,新老成份和各级干部需要很好的搭配,以利旧军队的改造作战任务的完成。三月十二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发布训令,重编红一、红三、红五军团。

红一军团 总指挥:林彪

政治委员:聂荣臻

辖:红四军 军长 王良 政委 罗瑞卿

红十五军:

军长:黄中岳

政委:

左权红三军团:总指挥 彭德怀

政治委员:滕代远

辖:红五军

军长:邓萍

红七军 军长:龚楚

红十四军 军长:博生 政委

黄火青红五军团:总指挥 委振同

副总指挥:董振堂

政治委员:萧劲光

辖:红三军

军长:徐彦刚

政委:葛耀山

红十三军 军长 董 振

政 委 何长工

以赣江为分界线,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红三军团组成西路军,夹江两阵,向北发展,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与朱德总司令一起随中路军行动。在进军途中毛泽东说服了林彪和聂荣臻,向闽西发展为有利。毛朱林聂向中央局建议,将中路军改称东路军向闽西发展,中央局批准了这个建议。四月一日,东路军一军团抵长汀。在长汀,毛泽东向一军团团以上干部作了东征动员。他说:“我们的新任务,是经闽西向闽南发展。当前日寇势力已到达厦门,我们进军闽南,对日寇侵略阴谋是一个打击,以实际行动贯彻我党抗日主张,无论对国内和国外,都将产生极大的政治影响。同时应该看到我们中央根据地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国民党『剿共』大本营就设在南昌。如果向西发展。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往返不便。向南发展则南尚布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因此决定趁第三军反『围剿』胜利以后敌人暂时无力组织新的进攻的时机,实行外线作战,打到闽南去,发展根据地,扩大我军的政治影响,并获得物资补给。”

与东路军向闽南进军的同时,彭德怀则带领三军团作为西路军向湘赣边去了。

东征动员以后,朱毛令一军团开赴长汀以北的新桥待机。毛泽东电周恩来对下步作战行动提出建议,认为东路军必须直下漳(州)泉(州)方能调动敌人,开展局面。若单纯在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面的文章不好做。同时,漳州地形难守

易攻,于我有利,顺虑的是粤敌从大埔出龙岩,威胁我后路,希望在赣南信丰的红五军团尽快东调龙岩,以解了作红一军团兵力单薄,后方空虚的顾虑。周恩来批准了毛泽东的作战方案。毛泽东很高兴,立即到上杭、旧县,向谭震林(福建军政治委员)、张鼎丞(福建省苏约埃政府主席)布置配合东征龙岩、漳州的任务。

四月二日,红一军团在林彪、聂荣臻率领下离长汀,经河田、涂坊等地,七日到达白砂,八日到达龙岩西部约五十里的大地圩,九日侦察敌情勘察地形,得知守龙岩的是张贞第四十九师的两个团和少量地方民团。这时朱德率军委机关移驻长汀。毛泽东赶回红一军团,与林彪、聂荣臻一起研究部署了攻取龙岩的战斗。十日拂晓,红十五军为先头,红四军跟进,乘敌不备,向龙岩发起进攻。红十五军先消灭了小池的少量敌人,即向龙岩外围的要点考塘前进。敌一个团及一个补充营凭借既设阵地和炮楼包隅顽抗,红十五军行动受阻,红四军随即沿两侧坚决进攻,遂将考塘之敌包围全歼,当天占领龙岩。张贞闻讯,将部队收抛,全部退守漳州。

红五军团四月十四日赶到龙岩,即以红十三军驻守龙岩,负责保障龙岩到漳州的战略供应运输线、红三军配属红一军团参加进攻作战。十五日,攻城部队来到漳州西北约二十多公里的马山。经侦察得知,防守漳州的兵力为敌第四十九师第一四五、第一四六两个旅力静上地方靖卫团共八九千人。其主力部署在漳州西北天宝到南靖一线。一部在漳州市内;其主阵地在大尖山、十二岭到天宝以北,地势险要,山岭起伏。要进攻漳州,必先

突破这一阵地。林彪下令：红四军越过龙江支流东溪，到达大尖山北的南坪、内洞一线进攻出发阵地，红三军也进到这一地域。因十七、十八两日连降大雨，推迟到十九日拂晓发起攻击。主张部队红十一师在红十师配合下，向杨梅岭、十二岭和风霜岭发起猛烈攻。红十一师师长刘海云、政委刘亚楼，下辖三个团：红三十三团四月十七日作为师的先头部队由政委刘忠和副团长陈冬生率领，克服河水暴涨的困难，抢先渡过东溪，掩护全师展开，并受命配合十师攻占大尖山东侧敌阵地，尔后直插天宝；红三十一团由团长吴皋群、政委宋成泉率领，绕敌后攻歼大尖山守敌，并规定一定要等三十一团从敌后打响后，全师才发起攻击，以利全歼敌人；红三十二团由政委杨成武率领，随三十三团后跟进，扩张战果。整个战斗都是按预定的作战方案实施的。在天宝到大尖山一线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天宝阵地被摧毁后，敌人防线即全面崩溃了，歼灭了敌人一个旅。红十五军在助攻方向进展也很顺利。其先头部队红四十四师在师长洪章、政委刘英的率领下。佯攻宝林桥，强渡芄水，配合主攻部队把沿途各点的敌人歼灭或击溃了。敌四十九师师长张贞见大势已去。下令将城内弹药炸毁，率残部弃城而逃。四月二十日，东路军占领漳州城。随后又相继占领离厦门不远的石码，漳州以北的长泰，以南的漳浦、云霄、平和。此役歼灭第四十九师大部，俘敌一千六百多人。

四月二十日上午八点，红军进入漳州。指定入城的部队由司号员鸣号作前导，大部队步伐整齐地开进市区。毛泽东戴一顶草帽，骑着他那匹黄膘马，随队入城。因为进行了入城纪律教育，秋毫无犯、市尘不惊，商店照常营业。城外的部队无许可证

一律不得入城。

入城后,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了东路军师以上干部会,决定红十五军驻南靖到天宝一线,红三军和红四军驻漳州郊区,对广东方向警戒,随时准备打击来犯敌人,同时要组织工作队和宣传队,收集战利品,搜查国民党党政军机关,通过商会向城市工商业户派款,向地主豪绅筹款,向群众宣传,发分粮食给群众,扩红。毛泽东说:“我们能打下漳州来,但我们还没有那么大的力量长期占领,将来还要撤回根据地去,因此,新区的工作方针是公开宣传,秘密组织。以龙溪为中心,向向靖、云霄、平和、漳浦等五县发展游击战争,创造小红军,建立小苏区。在漳州,只散发谷物,不建立政权,不分土地。”

四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漳州大捷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影响时局甚大。东路军下步行动方针为:发展闽南游击战争,准备消灭入闽之敌,以期迅速北上。”

部队打了胜仗,情绪很高。毛泽东的话传达到部队中去,又使胜利之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各项工作。一个多月中,筹款一百多万银元,还有大量布疋、粮食、食盐等。这些钱和物资,绝大部分送往中央局和军委总部,缓解了中央苏区党和红军财政支出和物资供应的困难。还缴获了两架侦察机,其中一架由一个朝鲜驾驶员开回了瑞金。一、五军团干部战士也都发了新军装。最使大家开心的是轮流看了一次无声电影。群众工作也很有成效,向贫苦群众发放谷物四万多石。工农青年参加红军的九百多人。在漳州和附近的县,建立了地下党、秘密工会和秘密农会,有的县还组织了游击



队。漳州秘密工会有三行多人参加，还组织漳州工人参观团到苏区参观，周恩来在长汀接见了参观团。

战后余暇，毛泽东在军中阅读文件，他看了四月十四日《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其中谈到：“巩固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及各省的苏维埃政府，使得全国反帝主义的群众得到领导的政治中心与鲜明的旗帜。”又看到《红色中华》上刊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时间是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五日，署名是：“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这个宣言是上海临时中央起草的，发表之前并没有给毛过目，其中“夺取中心城市”的口号是他所不能同意的，他有一种当傀儡的屈辱感。但又一转念，毕竟是用“毛泽东”的名义发表的，这又给一些安慰。中央文件中讲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是领导群众的。“政治中心与鲜明的旗帜”，这不是把自己摆在了“中心”和“旗帜”的位置上么！临时中央尽管与我毛泽东有许多严重分歧，但他们并不准备把我搞倒。只要能保留这样一个位置，将来是大有可为的。转念至此，毛泽东笑了。

一九三二年五月，国民党政府撤销原驻赣绥靖公署，改设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任命何应钦为总司令，陈济棠为副总司令，将所辖部队分为九路，每路为一个“清剿”区，其第一路为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十九个团，部署在南雄和赣州、南康、大庾、信丰地区。

六月五日，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发布军事训令：“一、五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三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在可能条件

下占领梅岭关，再沿江北上，占领赣州、吉安、樟树，以争取南昌为目的。”

为执行中央指示，中革军委空席朱德六月八日在上杭县官庄召开军事会议。毛泽东出席了会议。会上决定东路军所属红一、红五军团经广东梅县回师赣南，计划月底到达赣南与红三军团会合，打击进犯赣南的粤军。六月九日，朱德、毛泽东给红一、红五军团下达班师命令。回师途中，红四军军长王良于六月十三日在武平县大禾侦察敌情时被地主堡寨里射出的冷枪击中而牺牲。王良是四川綦江人，死时才二十七岁。王良牺牲后，由周昆接任红四军军长。六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朱德兼总司令，王稼祥兼总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仍辖红一、红三、红五军团，取消东路军、西路军番号。毛泽东以政府主席身份随军运筹，但无军职。

这时，粤军发现红军主力回师赣南，遂以六个团的兵力由南康向大庾集中。朱德、毛泽东为了调动入赣之敌回援南雄，令红一、红五军团和独立第三师由信丰南部直取南雄。

七月二日，红三军团主力，于大庾东北池江与敌接战，击溃其四个团，溃敌退据大庾。三日，红一军团击溃梅岭关守敌一个团，控制了梅岭关，有盘马弯弓直取南雄之势。陈济棠急调粤军独立第三、第五师由韶关兼程北上赴南雄增援。独立第四师由信丰向南雄集中；并令第十四、第五十二师由上犹地区迅速南下，企图南北对进合击红军主力。七日，敌南路援军到达南雄，信丰之敌进抵乌迳；北路敌军属陈诚系，行动迟缓。朱毛决心集中三个军团同时消灭南雄和乌迳的粤军。部署如下，红一军团

和红十二国攻歼由南雄出击之敌；红五军团及独立第三、第六师担任消灭乌径之粤军独立第四师的任务；红三军团为总预备队。八日凌晨，红五军团在总指挥董振堂、政治委员萧劲光率领下由罗田、赤石向乌径开进，先头进至黄坑附近的，得知乌径敌已沿浈水南岸西窜，遂改向水口方向截击。当日下午到达水口对岸时，与敌接战，迅速击溃国两个团，敌退水口带防。九日，粤军增援部队六个团由南雄抵水口，该处敌军增至十个团。红五军团不知敌情变化，仍按原定计划实施攻击，结果伤亡很大。幸陈毅率独立第三、第六师及时赶到，才稳住了战局。十日拂晓，红一军团及红十二军也到达水口。在水口周围和浈水河畔，双方兵力相当，人员密集，展开了空前惨烈的内战。许多红军战士手持大刀与敌人拼杀，简直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敌人终于硬不过红军战士，十个团被击溃，退回南雄。部队白天打仗，入夜就露营。有的战士疲劳过甚，倒头便睡，第二天早晨醒来才发现在死人堆里睡了一夜。有的战士夜间口渴，摸到河沟去喝水，尝到一股血腥味，天亮一看，河沟里的水泛着红色。南雄、水口战役，总共击溃粤军十五个团，打击了粤军的嚣张气焰，稳定了赣南战局；虽然打胜了，但不是歼战；没有缴获或缴获不抵消耗。毛泽东认为“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

七月二十一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的指示信》，这封信洋洋洒洒，一万五千字，除了空话，就是指责，中心思想是“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在这些话的下面都加上了着重号。赣州没有打下来，不承认是中央决策的失误，而归咎

于“在中心城市我们的工作的缺乏”；批评了打土围子，筹粮筹款，发动群众，训练部队，准备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是“防守的休养生息。准备在遥远的将来去抵御敌人的进攻”，是“山上的劳维埃的理论，总而言之，要去主动进攻敌人，打下一两座中心城市来。”

收到这封电报，周恩来感到巨大的压力。他把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交副书记任弼时代理。以中央局代表的身份上前线亲自掌握作战行动。周恩来赶到安远县天心圩红一方面军总部，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见面。

七月二十五日，鉴于苏区中央局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和毛、朱、王商量后以四人的名义致电苏区中央局：“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治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这个电报，当然是周恩来的主见，其它人附议的。

所谓“取消政府主席一级”并不是要罢免毛泽东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治主席的职务，而是说在军中毛泽东以政府主席的名义出现，名不正，言不顺，不利于作战的决策和指挥。周恩来看重毛泽东在军事上的才能，想在这方面多发挥他的作用。但中央局复电仍坚持让吉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二十九日，周恩来以个人名言再次给中央局写信，说：这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无事可做。

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

误”。坚持由毛泽东任总政委，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宜”，再三恳请中央局考虑前方意见。八月初，中央局接受周恩来的意见，但有一个条件，在前方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最高军事会议，以周恩来为主席，负责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

周恩来在兴国主持苏区中央局全会，正式通过了组成最高军事会议和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议案；并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消灭驻守乐安、宜黄的国民党军，进师威胁与夺取吉安、抚州，以配合鄂豫皖、湘鄂西红军反“围剿”战争。为便于指挥，将红五军团第三军编回红一军团，将红一军团第十五军编回红五军团。八月八日，中革军委发布通令如下：

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已到军工作的通令

(一九三二年八月八日)

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现毛同志已到军工作。我第一方面军全体战士今后应坚决在朱总司令与毛总政委领导之下一致为发展革命战争争取革命在江西及邻近几省的胜利而努力，仰我全体战士一体知照。

此令

中华军委主席	朱 德
副 主 席	王稼祥
	彭德怀